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研究

The Study of Sixtee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Grand Ming

Dynasty of Jiang Yingke

林朝勝

Chao-Sheng Lin

指導教授：鄭幸雅 博士

Advisor: Hsing-Ya Cheng,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June 2018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研究

The Study of Sixtee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Grand Ming  
Dynasty of Jiang Yingke

研究生：林朝浩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徐志平  
王靜淑  
鄭幸雅

指導教授：鄭幸雅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十九日

#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研究

## 論文摘要

江盈科（1553-1605），字進之，號淶蘿山人，明湖廣桃源縣（今湖南省桃源縣）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長洲縣令、吏部考功司主事、大理左寺正、四川提學僉事，萬曆三十三年（1605）卒於官，享年五十三歲。江盈科是晚明公安派的一員，他在公安派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地位僅次於袁宏道。江盈科作品豐富，具「格調超逸、意味深遠之特色」，但是歷來研究重詩歌、小品文，輕傳統散文。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本，最早刻于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是江盈科以大理寺正身份刑恤滇、黔在公務之暇創作的。歷來對此書的研究極少，絕大部分將其視為「世說體」小說，《四庫全書》中，江盈科的這部作品是被收入在史部存目中，似乎是被視為史傳體。本文力圖將江盈科置於晚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分析他的思想淵源、文學主張、詩文作品和文本內容，在晚明「世說體」大為流行的情況下，希望就兩者的文學特點進行一番比較，以期在比較之中突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主要文學特色及其在江盈科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及寫作用意。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釐清整理前人研究文獻資料，並對於研究範圍，論文架構作一說明。第二章為「江盈科生平概述及其文學」，此章將就江盈科的家世與生平、與公安派的關係、文學思想做一分析。第三章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書寫背景及體例分析」，此章將就《皇明十六種小傳》成書背景依政治、社會、學術三個面向說明，《皇明十六種小傳》與「明代野史」、「世說體」之關係，《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分類內容及意涵。第四章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敘述及思想呈現，此章將就《皇明十六種小傳》敘述模式、人物形象的展現、思想呈現三個面向說明加以討論。第五章為「結語」：總結全文觀點，並提出未來展望。

關鍵詞：江盈科、公安派、皇明十六種小傳、世說新語、世說體、史傳體

# Abstract

Jiang Yingke (1553-1605), born in Taoyuan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also named Jinzhi, referred himself as Luoshanzen. He was appointed Jinshi in the 20<sup>th</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Wanli Emperor. In his career, he served as the county chief of Changzhou and held several government positions. He died at the age of fifty-three in 1605. As a member of Gong'an School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critical influence he had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Gong'an typology was second only to Yuan Hongdao. Jiang Yingke was a productive writer and praised for his versatility writing style characterized as being "elegant, breeziness and profound."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mostly on poetry, short essays, with few on prose.

Jiang Yingke completed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Sixtee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Grand Ming Dynasty" in the 29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1601) while he served as an Dalisi officer. The research on this book has been sparse. Most studies regarded the book as a "Shishu-style" novel. When the Qing Dynasty librarian compiled "The Siku Quanshu", Jiang Yingke's works were filed under the historical writing. The study aimed to highlight both the book's literary features and Jiang Yingke's literary significance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his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works, and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his style and the "Shishu Style", which was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 clarifies the scope of the study,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explains the structure of the paper. The second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Jiang Yingke's profi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ng'an school and his literary philosophy. The third chapter, in terms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academics, explores the context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Sixtee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Grand Ming Dynasty". Also examined is the book's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Anecdote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Shishuo-Xinyu Style"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ntent. The fourth chapter investigates the narrative, 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s and ideology. The fifth chapter consists of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and present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Jiang Yingke, Gong'an School, Emperor Ming Ming's Sixteen Kinds of Small Biography, Shishuo-Xinyu: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Shishuo-Xinyu Style,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style

# 目 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 錄 .....	III
表目錄 .....	V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步驟 .....	8
第二章、江盈科生平概述及其文學 .....	11
第一節 江盈科家世與生平 .....	11
一、家世背景 .....	11
二、科考之途 .....	12
三、仕宦之道 .....	14
第二節 江盈科與公安派 .....	23
一、同科之誼 .....	24
二、交遊結社 .....	27
三、聲氣相應 .....	30
第三節 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與創作 .....	34
一、學術師從 .....	34
二、文學主張 .....	35
三、文學創作 .....	39
第三章、《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書寫背景及體例分析 .....	51
第一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成書背景 .....	52
一、《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政治背景 .....	52
二、《皇明十六種小傳》的社會背景 .....	57
三、《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文學背景 .....	61

第二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文體與體例分析 .....	66
一、	《皇明十六種小傳》與明代野史關係 .....	66
二、	《皇明十六種小傳》與世說體關係 .....	71
三、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體例 .....	80
第三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內容主題 .....	84
一、	《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內容 .....	84
二、	《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意涵 .....	89
第四章、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敘述及思想呈現 .....	110
第一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事實性敘述 .....	112
一、	正文採陳述語態 .....	113
二、	贊語採祈使語態 .....	115
三、	事實與實錄 .....	118
第二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人物形象 .....	123
一、	善用語言陳述人物個性 .....	123
二、	運用細節描寫人物行止 .....	126
三、	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以突顯人物形象 .....	130
四、	以互見手法豐富人物面貌 .....	133
第三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思想呈現 .....	138
一、	崇德性，奉正統 .....	140
二、	能臣幹吏善治國 .....	143
三、	尚奇好異資勸懲 .....	146
第五章、	結論 .....	152
參考文獻	.....	155
附    錄	《皇明十六種小傳》摘要 .....	161

## 表 目 錄

表 3.1 《皇明十六種小傳》內容主題 .....	85
表 3.2 《皇明十六種小傳》內容分類 .....	85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江盈科是晚明公安派的一員，他在公安派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地位僅次於袁宏道，但是在歷史上卻沒有引起較多的關注。黃仁生著〈江盈科生平、著述考〉曾提到：

江盈科是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派」的創始人之一，他與袁宏道等互相唱和，反對復古模擬，提倡抒寫性靈，從理論到創作都有所建樹，在當時影響頗大，有「袁、江二公」之稱，曾為公安派的創立立下過汗馬功。但隨著竟陵派的崛起乃至有清一代，江盈科卻一直頗受責難和冷落，他的生平、著述也長期淹沒無聞。即使自本世紀三十年代公安三袁受到重視以來，人們對於江盈科的了解，仍主要限於他的寓言、笑話和他為袁宏道詩文集所作的四篇序文<sup>1</sup>。

他的詩文理論包括「元神活潑說」；反對復古模擬，主張文隨時遷；宣導詩文別才；論詩人必備詩才、詩膽。他認為抒寫性靈是一個情出於心，以心攝境，再流之於筆端的過程，而要寫性靈必達的文章就要做到「元神活潑」，即身心自由，無拘無束；他主張作詩和作文各有其法，不能以文為詩、以理為詩，同時詩人也要具備一定的才學和膽量，敢於說真話、述真情。

江盈科的詩文創作頗豐，且格調超逸、意味深遠。詩歌既有揭露時弊、關注民生疾苦的篇章，也有對世俗生活的描寫及表達他吏隱心態的呈現，更有其對女性文學的重視。他的散文包括傳統散文和小品文。傳統散文文筆恣肆，超逸爽朗，特別是他的的小品文，言切而旨遠，詼諧而不失蘊藉。他的的小品文有尺牘、序跋小品和戲謔小品，其中尺牘、序跋小品打破復古模擬之習，無論政論文章還是與朋友往來的書信都真實的表達了自己的感情；戲謔小品主要有諷刺小品和笑話小品兩類，諷刺小品幽默不失諷喻，有對朝政腐敗的抨擊，對百官不盡心於政事的嘲諷，還有對貪婪的人性的鞭撻，以及對聰明才智的讚賞，內容豐富，蘊意深刻，給人以很大的啟

---

<sup>1</sup> 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附錄三），長沙：嶽麓書院，1997年，頁1092，以下有關取用此書之條目，皆以《江盈科集》稱之，不再以詳目呈現



示作用；笑話小品表現出機智、博學、幽默、敏捷等才華，再現了晚明文人通過戲謔放鬆身心，活躍氣氛的生活方式。

其中，《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本，最早刻於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是江盈科以大理寺正身份恤滇、黔在公務之暇創作的。卷首有雲南僉事鄧原岳所作的〈皇明十六種小傳小序〉以及他自己的〈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皆作于萬曆辛丑夏。鄧序曰：

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慕說古哲，灑灑不休，暇則采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成者，不率仿《世說》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之<sup>2</sup>。

對其與《世說新語》的關係進行了一番說明。

而作者的〈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則就該作的編輯體例和意圖作了闡釋：

《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輯其語而為之傳，匯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奸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或因一事紀一人，或就一人摘一事，大都事不能概當人，人不能概當代，要於挺拔突兀，不經聞見，使人讀之，能有所聳動而感發焉。譬如燕會看演傳奇，全本演完，又於別本中抽演雜劇，夫雜劇非全本也，而實全本中之豔麗新特者也，故更盡酒闌之後醒人睡眠者，必雜劇也。然則茲編也，謂之國史中雜劇，不亦可乎？<sup>3</sup>

正文卷一有小傳五十三篇，卷二有二十五篇，卷三有五十四篇，卷四有二十篇，凡一百五十二篇。

綜上所言，鄧原岳在他所作的〈皇明十六種小傳小序〉提及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慕說古哲，灑灑不休，暇則采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成者，不率仿《世說》

<sup>2</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頁 903

<sup>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頁 904

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之。」後之學者便多以《皇明十六種小傳》為世說體之體裁認知。然考證歷來對於晚明世說體之研究，卻未發現有將此書列入世說體的研究範疇之內。儘管有清一代四庫館臣在編撰《四庫全書》時，有意回避公安派等人的作品，江盈科的這部作品是被收入在史部存目中史傳類，其著錄為《明十六種小傳》四卷，僅去一「皇」字而已<sup>4</sup>。似乎在《四庫全書》中，《皇明十六種小傳》是被以史書認知的，而黃仁生在〈江盈科生平、著述考〉認為是「頗具文學色彩的明人野史<sup>5</sup>。」，似乎也是將其以野史看待。

對於此傳歷來研究極少，文中將其列為史傳著作亦有其可討論性。本文力圖將江盈科置於晚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分析他的思想淵源、文學主張、詩文作品和文本內容，在晚明「世說體」大為流行的情況下，希望就兩者的文學特點進行一番比較，以期在比較之中突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主要文學特色及其在江盈科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及寫作用意。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前面曾提到江盈科是晚明公安派的一員，他在公安派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地位僅次於袁宏道，但是在歷史上卻沒有引起較多的關注。對於他的研究一開始也是很零散，學術界研究江盈科，始於二十世紀末期，由臺灣學者首開其端。多數是對江盈科在文學史中的歷史地位、文學思想及作品內容的概述，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一，由於其文學理論和創作上的貢獻肯定其在公安派中的地位

1980年11月，臺灣《書評書目》第九十一期，龔顯宗著《主性情說的〈雪濤小書〉》，是臺灣最早論述江盈科的文章。作者認為江盈科論詩，綜而言之，不外一個「真」字。細分之，則有下列四點：一、性情說；二、詩文不同體；三、遍究中晚；四、論詩膽。作者結論：「時人並稱他與袁中郎為「袁江」，但進之的論點並不與公安派完全相符，例如他反七子之擬古而不反盛唐，非宋詩之議論而予歐、梅、黃、

<sup>4</sup> 《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一百零七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8月，頁687

<sup>5</sup> 《江盈科集》（附錄三），頁1105

陳以極高的評價，「詩膽」一章則影響到葉星期，詩文才別之說更展現了卓越的見解，在批評史的公墓裏，他的碑石是該再豎高一點的，江進之的被忽略，是個不大不小的悲劇<sup>6</sup>。」

1988年5月，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林美秀著《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碩士論文，是臺灣最早論述江盈科生平與文學理論的學位論文。在附錄中，首度為江盈科做了年譜紀事及著述的考訂<sup>7</sup>。同年，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編《文學研究叢刊》第五期，夏咸淳著〈論公安派重要成員江盈科〉，論述江盈科的生平、交友、思想，首度論述江盈科在公安派中的地位。特別推崇江盈科的寓言創作，認為成就大於散文，散文的成就大於詩<sup>8</sup>。

1997年，黃仁生先生搜集整理了江盈科的作品並結集出版《江盈科集》，這對於江盈科的研究邁出了歷史性的關鍵一步。長期以來，江盈科備受人們冷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作品人們無法看到，現在這一現象終於得到改觀，人們不再因為資料不足而無法對其進入深入研究。

章培恒在《江盈科集》的序言中指出公安派正式形成是從中郎擔任吳縣縣令時開始的，袁、江一起打開局面，「他們在文壇上發生的影響，或者說在擴大公安派的影響方面的作用，雖不會相等，也不致懸殊<sup>9</sup>。」

陳蒲清也在序言中認為竟陵抨擊袁、江的俚俗淺率，從整體來看是一種倒退，江盈科對公安派的巨大貢獻在三個方面為他人所不能代替：「公安派創立、文學理論完善、創作領域拓展。」江氏山水在性靈小品方面比不上中郎，但有兩點勝出：詩文多關心過國計民生，發論精警，具大家風範；寓言和笑話創作成績突出<sup>10</sup>。

黃仁生認為，貴真、重趣、崇實、尚奇、倡變是江盈科文風的五大特徵，是其痛詆模擬剽竊，強調個性獨創的文學思想的具體體現。這一思想和「性靈說」的闡

<sup>6</sup> 龔顯宗〈主性情說的〈雪濤小書〉〉，臺灣《書評書目》第九十一期，1990年11月

<sup>7</sup> 夏咸淳〈論公安派重要成員江盈科〉，《文學研究叢刊》第5輯，1988年12月

<sup>8</sup> 林美秀《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高雄：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頁154

<sup>9</sup> 《江盈科集》（序一），頁2

<sup>10</sup> 《江盈科集》（序二），頁9

發----「元神活潑說」以及反對尊古卑今，主張代各有文，兩大文學思想相輔相成。在〈江闊無澄浪，林深有墜枝----論江盈科與公安派〉一文中他指出：「中郎論江氏『俊逸爽朗』，詩文『務為新切』，評價客觀公正<sup>11</sup>。」江氏詩文的這些特徵和弊病皆其主張與時勢使然，一定程度上又取決於其吏隱心態，高遠的情致和清新的文筆相結合形成了他「超逸爽朗」的文風。其文筆態肆恣，富於批判精神，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乃至於有補於時事的創新見解，反映了公安派對歷史與現實的關注，而此正為三袁所不及。他的小品還表現出傳奇性、諷喻性、幽默性，所謂窮新極變、不拘格套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2004年堪貽春〈試論江盈科對公安派文學的貢獻〉一文認為江盈科作為公安派的一位重要作家，不僅積極參加了公安派的創建，而且在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他和袁宏道一起在公安派的發源地吳中地區打開局面，「性靈說」也是在兩人商討的情況下提出的。在文學理論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文學革新觀點以「元神活潑說」影響最大，這大大的豐富了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思想內涵<sup>12</sup>。

2006年，《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六期，黃仁生著〈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作者從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視角，重新考察和闡釋公安派在現代文壇所產生的多重迴響，認為周作人及其門生、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以魯迅和阿英為代表的左翼作家，這三大群體對公安派的解讀與接受雖然有所差異，甚至引發過歷時幾年的論爭，但對於代新文學的發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sup>13</sup>。

2006年，《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三十二卷第四期，何宗美著〈公安派結社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文中提到江盈科是公安派北京成立葡萄社的成員。他認為公安派結社匯入到明代文人結社的整個洪流中，大大豐富了明代文人結社的內容，對於公安派的形成、發展，以及文學思想的傳播，文學影響的擴大等，

<sup>11</sup> 《江盈科集》（前言），頁 39

<sup>12</sup> 堪貽春〈試論江盈科對公安派文學的貢獻〉，《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10月，頁 22

<sup>13</sup> 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復旦學報》上海：復旦學報編輯部，2006年第 6期，頁 93

皆有深刻的影響<sup>14</sup>。

2017年，時人張覺明著《晚明公安派副帥江盈科研究》，作者在前人對江盈科生平考述的基礎上，系統性地分析、歸納和評價了江盈科的時代背景、生平事蹟、交游往來、文學理論與文藝創作，不僅對江盈科的生平進行梳理和考證，同時對其思想觀念作探討，這對於擴展晚明研究的文獻範圍，考察視野，深化關於中國社會特質與演變趨勢的認識，都有重要的意義<sup>15</sup>。

二，在創作上推崇其詩歌及寓言、笑話、小說等小品文的價值。

2005年楊碧雲在〈論江盈科的小品文〉中對他的小品文進行分類論述，她認為歷史小品見解獨到頗具現實意義；抒情小品靈動通悅，趣味盎然；諧謔小品尤其為人們所稱道，既有人木三分的諷刺，又有令人捧腹的幽默<sup>16</sup>。

2012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新怡著《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作者從江盈科《雪濤小說》、《談叢》、《談言》、《諧史》中，挑選寓言小品一百二十七篇為研究對象探究江盈科作品，多是江盈科飽經人生歷練的結晶，對當代弊端的諷刺之作，在中國寓言史上別具特色<sup>17</sup>。

對於《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敘述及研究略述於下：

鍾林斌、李文祿的《公安派研究》提及江盈科小說時主要把論述的重點放在了江盈科對公安派的貢獻這一層面上，指出了江盈科以寓言、故事、笑話等形式的創作大大拓寬了公安派的創作領域，並對江盈科的寓言、笑話、歷史小品等著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方面進行了選擇性的闡釋。其書中還提到了一直為前人所忽略的《皇明十六種小傳》，遺憾的是該書因為受到編排體制所限，並沒有對《皇明十六種小傳》作品展開更加詳盡的研究<sup>18</sup>。

---

<sup>14</sup>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三十二卷第四期，2006年

<sup>15</sup> 張覺明《晚明公安派副帥江盈科研究》，新北市：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7年4月

<sup>16</sup> 楊碧雲〈論江盈科的小品文〉，《新余高專學報》，2005年6月，頁32

<sup>17</sup> 陳新怡《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sup>18</sup> 鍾林斌、李文祿《公安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頁238

前面也曾提到黃仁生在〈江盈科生平、著述考〉認為《皇明十六種小傳》是「頗具文學色彩的明人野史」但是在其文章之中似乎就沒有看到其他對《皇明十六種小傳》論述。

2006年，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張瑞文著《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江盈科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敘事作品，文中將《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四大類十六小類之分法，就內容去統整分析歸類，探究是否合於門類所列；同時就《皇明十六種小傳》是「世說體」亦或是「史傳體」的體裁去做比較，不過研究卻僅有泛論，尚乏全面的研究<sup>19</sup>。

2008年，南昌江西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周坤著《江盈科小品研究》。首先，對江盈科的生平以及與他的小品創作相聯繫的文學思想做了一個簡單介紹。接著，將其小品文分為三大類：寓言小品、史傳小品、尺牘小品，分別進行細致地探討。寓言小品作為他小品中最具諧謔風格的一類，也是後世流傳最廣的一類。歷史小品以《皇明十六種小傳》為代表，抓住其與《世說新語》的異同，通過對比而得出其在文學方面的成就<sup>20</sup>。

2012年，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劉雅君著《江盈科小品文研究》。就政治、社會、思想、文學發展等因素，探討晚明小品文盛行原因，並針對江盈科的小品文進行研究，說明其內容思想，分析藝術風格與表現特色。藉由作品之論述，以知其人並論其世。作者認為，江盈科的作品既注重自我個性的表現，又不放棄對政治和社會人生的關注，他在社會關注與個體價值之間達到了兩全重視，因而與三袁兄弟相比，其創作內容更豐富，創作領域更廣闊。她將《皇明十六種小傳》視為模仿《世說新語》的史傳小品<sup>21</sup>。

2012年，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徐敏著《江盈科小說研究》。江盈科所創作的小說，內容涉及當時的民風民俗、委巷傳聞、風物典制、科舉弊端、官場醜行等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這些小說的存在，不論是從內容還是形式

---

<sup>19</sup> 張瑞文《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sup>20</sup> 周坤《江盈科小品研究》，江西：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年5月

<sup>21</sup> 劉雅君著《江盈科小品文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上都極大的開拓了明代公安派文學的創領域，為公安派在文學史上開闢了性靈詩文之外的一席之地，使江盈科在晚明文言小說創作圈中也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而在這裡《皇明十六種小傳》是被視為「世說型」的筆記小說看待<sup>22</sup>。

綜觀以上篇章，學界對於《皇明十六種小傳》的研究似乎仍不夠深入。黃仁生算是對江盈科研究貢獻最多一位，他搜集整理了江盈科的作品並結集出版《江盈科集》，這對於江盈科的研究邁出了歷史性的關鍵一步。而他的一些文論，也讓大家對江盈科有更多的認識，因此筆者將在他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對《皇明十六種小傳》進行進一步研究探討。同樣的張瑞文著《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筆者將就其所提到《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四大類十六小類之分法，更進一步統整分析歸類，探究是否合於門類所列；同時就《皇明十六種小傳》是「世說體」亦或是「史傳體」的體裁去做比較。筆者試著從中去觀察，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人們認識江盈科其小品文的價值，肯定了其小品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卻只著重在寓言、序跋、尺牘、贈文、祭文等部分，而古論、奏疏、論說文及《皇明十六種小傳》卻少有人重視，沒有人對《皇明十六種小傳》進行全面細緻的分析。因此筆者將試著以江盈科的《皇明十六種小傳》為基礎材料，細讀作品各章節內容，分析其體例、分類內容、體裁及意涵，並考究其與明史關聯性為何，並從中掌握編者的價值判斷及所表達之思想內涵。盡量力求完整的分析，回歸至作品本身，探求清晰的文學面貌。

###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步驟

####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文本分析法」、「文獻探討法」及「歷史研究法」詳論如下：

##### （一）文本分析法

以江盈科的《皇明十六種小傳》為基礎材料，細讀作品各章節內容，分析其體例、分類內容、體裁及意涵，並考究其與明史關聯性為何，並從中掌握編者的價值

---

<sup>22</sup> 徐敏《江盈科小說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年

判斷及所表達之思想內涵。盡量力求完整的分析，回歸至作品本身，探求清晰的文學面貌。

## （二）文獻探討法

透過蒐集所得之參考文獻，援用古籍、近人研究、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所呈現的觀點及依據，以求論述觀點之周延，以作為本文研究與立論之依據。

## （三）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認為歷史乃記述人類社會活動之體相「較其總成績，求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也<sup>23</sup>。」也就是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資鑑<sup>24</sup>。」因此歷史研究除了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呈現事件的因、果或趨勢，提出精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而在此針對時代進行歷史背景的考察，進而深入解讀作品形成之因果關係與呈現出之編選理念。

## 二、研究範圍

江盈科的著作，其主要詩文集為《雪濤閣集》，《雪濤閣集》為萬曆二十八年四月江盈科擔任大理寺正時付刊，該集共十四卷，卷一至卷五為詩集，共收詩八百二十四首；卷六至卷十四為文集，其中，卷十四題為小說，但實際上為寓言小品。卷首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和江盈科〈雪濤閣集自序〉。萬曆二十八年以後的詩文，以及〈法祖疏〉、〈宦寺疏〉、〈中興疏〉此三疏並沒有收入集中，而是散見於《桃源縣誌》、《常德文征》、《楚風補》等地方誌中，此外，還有《雪濤諧史》、《談言》、《談叢》、《雪濤詩評》、《閩秀詩評》、《皇明十六種小傳》等著作，已經散佚的著作有：《尺牘雜著》、《易說》、《庚訂十七史詳節》、《續四史詳節》等。

江盈科所保留下來的作品由黃仁生先生於 1997 年整理搜集長沙嶽麓書院出版而成《江盈科集》。其中包括《雪濤閣集》、《雪濤詩文輯佚》、《雪濤談叢》、《談言》、《雪

<sup>23</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10 月，頁 45

<sup>24</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10 月，頁 184



濤詩評》、《閩秀詩評》、《皇明十六種小傳》及附錄。《皇明十六種小傳》最早是萬曆二十九年刻本，後來也收錄在黃仁生先生於 1997 年整理搜集而成《江盈科集》中，因此，本文研究範圍文本部分將以黃仁生先生《江盈科集》為主，間以參考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所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up>25</sup>。

### 三、研究步驟

本論文在研究《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步驟，首先將先探討江盈科行述與文學，從江盈科的家世生平談起，科考及第之後為官之道，與袁宗道相識之後相互影響而成公安派重要一員之過程，然後再闡述其文學主張及文學創作，分析《皇明十六種小傳》在其作品中角色地位。接著將《皇明十六種小傳》置於晚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依政治、社會、學術三個面向說明其成書背景。然後再討論《皇明十六種小傳》與「明代野史」、「世說體」之關係，將兩者特色加以比較分析，並藉以探究《皇明十六種小傳》的體例，顯現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分類內容及意涵。最後，將論述《皇明十六種小傳》中的敘述及思想呈現，從文本內容的敘述模式、傳主人物形象的展現、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呈現三個面向說明加以討論。以期在比較之中突出《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主要文學特色及其在江盈科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及寫作用意。最終章將總結全文觀點，並提出未來展望。

---

<sup>25</sup> 《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一百零七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 8 月，頁 588-687

## 第二章 江盈科生平概述及其文學

江盈科（1553-1605），字進之，號淶蘿山人，明湖廣桃源縣（今湖南省桃源縣）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長洲縣令、吏部考功司主事、大理左寺正、四川提學簽事，萬曆三十三年（1605）卒於官，享年五十三歲。本章將從江盈科的家世生平談起，科考及第之後為官之途，與袁宗道相識之後相互影響而成公安派重要一員之過程將是下一步驟，最後再闡述其文學主張及文學成就，分析《皇明十六種小傳》在其作品中角色地位。

### 第一節 江盈科家世與生平

#### 一、家世背景

江盈科出生於風景秀麗、文化底蘊濃厚的桃源縣，與公安派三袁同屬湖廣人，都是在楚風的薰陶下長大的。他出身貧寒，父親是普通農家。據江盈科《雪濤閣集》卷九〈明故九十壽鄉濱江公昆嶽老處士墓誌銘〉得知：「江氏的祖先很早就居住在這裡，但他的先祖也曾是詩書宦宦之家。」江氏的六世祖「華」曾「仕為曲周縣二尹」，五世祖「海」「漢起家明經，入國學，世其父官」，自曾祖「環」始中道衰落，祖父「伯玉」，雖然務農，但卻頗有見識：

語祖母劉曰：「江氏之先，率以詩書占仕籍，至吾父不幸為書困，所為困者，不獨以貧故，亦其昆貧自為計，不能相羽翼期於有成。語曰：『獨樹不茂，一掌獨拍，雖疾無聲。蓋謂是哉？』今吾瑩瑩一兒，欲命續父業，吾慮無所羽翼，而復為吾父繼也。」於是課之農，且曰：「農之子，常為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出於此，吾謹俟之耳。」已吾父生不肖科兄弟四人。不肖最長，公篤愛不肖，不肖亦以此附焉。甫五齡與公俱起卧，公口授小詩，輒成誦，信宿不忘。已乃舉唐宋人勉學語口授之，亦復成誦。公顧謂吾父曰：「若有子矣，所賴抒吾憤，竟吾父之業，而光先世之籍者，將在是乎？」至七齡，遣就傅，公親費餼糧，旦夕遺之以為常，歲牧豕易貲為其師贄。已不肖補博士弟子，數歲舉孝廉，公乃喜曰：「向固意其能讀父書，今果然

矣<sup>26</sup>。」

一方面他不忘記「江氏之先，率以詩書佔仕籍晴」，但同時也深知「今吾瑩瑩一兒，欲命續父業，吾慮無所羽翼，而復為吾父繼也」，他把重振家業的希望寄託於盈科之父「鳳翎」，可惜鳳翎終歲課於農。但是，眼光長遠的「伯玉」的還是沒有看錯，不久後他果然在自己的長孫「盈科」身上看到了希望。江盈科生後便跟從祖父學習詩書，其生性敏慧，深得祖父喜愛，他的出色表現給了祖父些許慰藉。祖父在與盈科之父鳳翎的談話中曾欣喜的稱道：「若有子（盈科）矣，所賴抒吾憤，竟吾父之業，而光先世之籍者，將在是乎？」江盈科從小就被寄予了家族的厚望，希望他能夠像他的名字「盈科」一樣，盈科而後進，在科考的路上一帆風順，以光耀先世之籍。而「江盈科補博士弟子，數歲，舉孝廉」後，其祖父欣喜之色溢於言表，「向固意其能讀父書今果然矣。」可以說，江盈科的祖父是他的啟蒙老師，也是發現他文學才華的伯樂，沒有祖父的努力培養和堅定扶持，很難想像當時一個出身貧寒農家的弟子能夠克服種種困難，衝破世俗的藩籬，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不錯的成就。

## 二、科考之途

除了祖父自行教導以外，在江盈科年紀稍長之後，祖父極力支持他拜師讀書。羅潼江夫婦、葉日葵先生與文蓮山先生對他的影響頗深。羅潼江先生是江盈科的啟蒙老師，也是引導江盈科走上科舉之路的恩師。身為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比起他的同學來，江盈科家境要差很多，有時候自然免不了受到同學的嘲笑。羅老師與師母，總是出面來維護他，勉勵他努力攻讀，對江盈科寄予了莫大希望。當江盈科遭到鄉人的嘲笑時，羅老師為他辯解：「若不佞某，農家子，家君課之儒，遣從先師潼江先生遊。其時草衣食，手一編兀兀終日，間或效鉛槧家語，同儕相與目笑之曰：『此牛口下子耳，乃亦希溷章縫為<sup>27</sup>？』」，老師的話給了他極大的鼓勵和自信。江盈科不僅家境貧寒而且少年喪母，缺乏母親的關愛和照料的他，師母帶來的極大關懷和補償。在〈祭羅師母〉中，他深情緬懷師母給予的幫助：「疼吾先母，脫珥延師，

<sup>2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九），頁 460

<sup>2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一），頁 542

無何捐棄，孤鳥誰依？師母見憐，收而撫之。我饑我食、我寒我衣。」同時也抱怨自己無法及時回報師母對他的幫助，「噫嘻，師母冀我入官，不肖偃滯，冠纓拜母，不及歸還。嗚呼，終天之恨，昔為吾母，今為師母。欲養不待，愧彼烏哺<sup>28</sup>。」由此不難看出江盈科是個知恩圖報，有情有義之人。

江盈科於萬曆四年（1576），二十四歲時考取府學生員，此時結識郡守葉日葵先生，葉先生點燃了他的求學希望，還對他的生活多有接濟。對此，江盈科有所追述：

某也不肖，少困泥塗，掛角而哦，帶經而鋤。鄉里醜其饑寒，市井笑其迂闊，某亦自疑終濩落。于時我師出守常武，相士超乎牝驪，拔某起於儔伍。慮其跡弛不羈也，而時範之以繩墨；念其貧困不振也，而時繼之以粟帛<sup>29</sup>。

江盈科為諸生後，師事文蓮山先生。文先生於萬曆五年到萬曆九年（1577-81）為桃庠師，據《雪濤閣集》卷七，〈蓮山文師去思碑記記載〉：

言動舉止，必謀諸道，書無所不讀，即邊笥善簾，何啻過之！猶注意六曹諸務，沿習興革，咸究竟顛尾，務令可行<sup>30</sup>。

其師關心社會、熱心時務，主張物隨時遷的思想應當也影響到身為生員的江盈科。

江盈科七歲入學，二十四歲考中秀才，萬曆十三年（1585）三十三歲，鄉試中舉。但是，此後於萬曆十四年（1586），萬曆十七年（1589）兩次赴京參加進士考試，皆不第而落榜。在這煎熬困頓漫長的日子裡，好友宋楚山先生聘請他擔任教職教授自己的公子。後來，江盈科回憶起此段生活，於〈祭宋楚山〉一文中言：

已諸郎就試有司，不甚利，公不謂我為傳無狀，知遇合有蚤莫也。不佞亦數數困場屋，建旗鼓而往，曳兵而還，公不以為戰之罪，知時有未利也。……不佞家貧好施，好觴客，公不以我為糜費，知我疏節闕目，不拘拘尺牘間

<sup>2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一），頁 523

<sup>2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一），頁 516-517

<sup>3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 350

也」，……嗟夫，知我於童年者，吾師乎？知我於髫年者，吾楚山乎<sup>31</sup>？

可以想像，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想要通過科考出人頭地是多麼的不容易。一方面他要背負照顧家人生活的重擔，一方面又肩負著振興家族命運的責任。生活的困頓、鄉人的嘲弄，理想不能實現，連他自己都對此產生了懷疑。這其中的辛酸、無奈、孤獨和對成功的渴求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刻的體會。幸運的是，在這人生最艱難的時候他能夠堅定自己的理想，並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終於不負眾望於萬曆二十年（1592）和袁宏道一起中進士，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 三、仕宦之道

萬曆二十年（1592）壬辰科殿試，江盈科榮登金榜，從此開始了他的宦官生涯。此時江盈科四十歲，與比他小十五歲的袁宏道同年進士，同科進士有顧天峻、黃燿、李騰芳、吳用先、謝肇淛、鄧原岳等人。而比他小七歲的袁宗道，卻早在六年前就以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編修。唯有比他小十七歲的袁中道後來科舉之途坎坷，直到萬曆四十四年才中進士。

江盈科在〈與周民部景玉〉書信中也記錄了當時他在北京等待候選時的情況：

記壬辰歲相與客長安，馬蹄參差，玉珂銜接，看上苑之花，詩篇唱和；席名園之草，杯酒流連，自謂此樂可長，令人忘死。無何，不佞領牧長洲<sup>32</sup>。

這期間江盈科可以說是輕鬆自在的，努力多年的理想終於實現，對未來的仕途充滿了期望和信心。同年八月，在京候選五個月之後，江盈科授長洲（今江蘇蘇州）縣令。

江盈科欣然赴任，但在長洲為官期間，他體會到更多的是為官的艱辛和無奈。長洲為令六年，他苦心經營吏事，卻換來骨瘦如柴，身體不堪負荷。〈自述〉一詩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sup>3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三），頁 443

<sup>3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84

昔餘宰長洲，百事紛縛束。徵比急如火，文案高於屋。丹墀類蜂房，候者遞踐逐。上官與貴人，往過來復續。東走又西馳，自是如奔鹿。過時不得餐，子夜不得宿。如此六寒暑，萬苦皆諳熟。瘦骨似枯柴，攬鏡面無肉<sup>33</sup>。

長洲素稱「江南巖邑」，難於治理。江盈科在與朋友的書信中〈與印與山〉嘆道：

長洲稱東南最巖邑無兩，里長七百有奇，國稅四十八萬，兩臺一監司駐節城中；又東南都會，貴人車騎絡繹不斷；而其民如鬼如蜮，習於訟訐；吏胥長於舞文，蚩尤之霧在股掌間。其令往往載星而出，視篆未了則束帶伏道傍候貴人，日晡而返，理敲朴，檢簿領，漏下三鼓乃休；漏未盡，又復戴星出。令如是，亦苦甚矣，然尤不免遭彈射，何者？賦稅重，難於取盈；送迎多，易於見過；又其民健訟，衆口難調，謗言易起。……<sup>34</sup>。

江盈科周旋在苦難百姓、商人大賈及地方豪紳之中，就算他有心想要一展長才，有所作為，卻仍深感力不從心。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明太祖曾經因為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是張士誠據以反抗地區，所以平吳後田賦特別重。蘇州一府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相等，農民困苦，《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sup>35</sup>

長洲地處東南吳地，到了萬曆年間更是當時朝廷稅收的重要來源地，僅長洲的

<sup>3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頁 11

<sup>3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50-1

<sup>35</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78，志 54，（食貨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3 月，頁 1895。以下有關取用此書之條目，皆以《明史》稱之，不再以詳目呈現

賦稅就相當西南一藩省。尤其「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著往往有之。」江盈科雖在長洲，但長洲與吳縣同屬於蘇州府治的臨縣，同城分治，極為難治，最為棘手的問題仍是賦稅。適逢當時明朝內憂外患嚴重，朝廷多事之秋，所謂「東封西款邊功多」，而史上所謂神宗「萬曆三大征伐」，即從江盈科任長洲的萬曆二十年開始，萬曆二十年西北征寧夏哱拜、萬曆二十東征豐臣秀吉援朝抗倭、萬曆二十二年西南征四川播州楊應龍。三大征伐歷時十餘年，喪師數十萬，費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府庫空虛，朝廷只好加重賦稅，作為一個最基層的管理者，徵稅又常常遭遇到各種困難，難以順利完成，甚至還有拖欠數年之久，即謂之逋賦，江盈科所承受的徵賦催科壓力自然可想而知。

江盈科著〈催科〉：

為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由古昔為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為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繼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sup>36</sup>。

〈與陳霽岩老師〉一文中亦提到：

不肖視事以來，寢食幾忘，形神兩廢，狗馬之力無遺，靡補民間萬一，自迹行事，祇足府怨于縉紳先生與閭閻小民耳。夫不肖豈甘心府怨而無所忌乎？大端此中賦稅，瘠民即不能輸，頑民又不肯輸，士夫家僮又有所憑藉而不欲輸，苟意因循，則蒙譴於當路，且奉職謂何，而令惟共之供，由我坐耗。一意追求，則士夫小民且目我為繭絲，為竭澤，怨咨叢起。蓋撫字催科，兩者

<sup>3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四），頁 651

無一可行，如此時事，恐必須通方之才，乃能勝此艱難之任<sup>37</sup>。

出身農家的江盈科是能夠深刻體會貧寒之苦的，因此每當親眼目睹沉重賦稅壓迫下民眾的窘迫，江盈科內心感受就會十分矛盾：但是職責所在，讓他不得不去執行朝廷的命令，卻同時要為徵收苛捐雜稅加重百姓負擔而感到不忍心。所以他在長洲為令時關懷役夫生活，在長洲設置役田，以補貼負責運輸賦糧到北京、南京的役夫，使役夫的生活改善，安心出役，一縣百姓得以安定，也同時解決百姓賦稅的問題，〈長洲役田記〉記載：

余之令長洲也，自漕糧二十萬石聽衛卒輸輓外，計所應運白糧凡若干石，半輸京師，半輸陪都，歲役凡若干人。陪都稍近，轉運稍易；京師最遠，且難舟楫，徒旅守候交割，騷然繁費，校算額編貼役銀米載在經賦者，非不與其役相稱，而余猶皇皇然，念其或疲于力，而終至於不可繼也，於是為置役田。……。共計三項，得田二千九十四畝。歲除賦稅之入，以其花利九百七十一石，計民之領南北運者，就中計量遠近繁簡難易而輕重布之，號曰役米。蓋欲使往役之人稍有所藉，而不疲於力。<sup>38</sup>

江盈科關懷貧窮書生，還曾「置田一百二十畝，名曰學田，歲收米凡六十石約及青黃不接之際，請於當路，擇士之最艱難者而賑之。」救濟生活貧困的書生，使書生的生活改善，安心學習。〈長洲學田記〉記載：

矧夫長洲號東南巨邑，人文之盛，較諸其他，何啻十倍？士之占名膠庠者，約五百以上。此五百人者，計十之六食其土之毛，無所事哺。又廩於官者二十人，藉歲餼，比於筆耕。其他無田可租、無廩可支者，率受里巷，齒牙閣閣，傳經授書，日得百錢易斗米，以黔吾突。邇歲以來經林立，執經稱弟子者乃反落落如晨天稀星，令流俗有醫多病少之笑，則逢衣緩帶者，欲遂効顏子之樂，然簞食瓢飲尚不能具，其奈之何？不肖焉！思有以贍之，而官帑匱乏，計無從出，乃稍稍區處二百餘金，一百二十畝，名曰「學田」，歲收米凡六十石，約及青黃不接之際，當路，擇士之最艱難者而賑之。此其於貧士

<sup>3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57-558

<sup>3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 386



也，譬猶剖粒飼鶴，其與幾能何？聊以見吾心耳！抑欲使後之繼今者，歲歲而增之、人人而廣之。譬諸累土為臺，以一簣始，以千仞終，未可知也。斯余作記意也<sup>39</sup>。

江盈科仿效北宋范仲淹設置義田的前例，購置役田、學田，不僅是對家人，對朋友、百姓、對貧苦的讀書人多有體恤，能夠替他們設想周到，足見他是一個憂國愛民的好官員。

長洲為令六年之間，江盈科除了努力扮演一個官吏該有的角色之外，對於地方建設也不遺餘力。萬曆二十年重修姑蘇獅子林禪意園林、萬曆二十三年建長洲縣城隍廟。萬曆二十六年建虎丘五賢祠，堂中奉祀的是唐代先後任蘇州刺史的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宋代長洲令王禹偁、蘇軾。他曾著有〈五賢祠記〉以記之<sup>40</sup>。萬曆二十六年他又以長洲前志獨缺藝文，延張鳳翼、張獻翼兄弟、葉成章、錢允治、陳文烈等重加纂輯，益以藝文十卷，成《長洲縣志》二十四卷，其邑志得以完備。

這樣一位處處為人民著想，努力於政績治理的好官，卻因為徵賦不能完額而受到「奪餼」的處分，在這般矛盾的心態下，江盈科對自己的仕途越來越覺得有心無力，對此江盈科漸生厭苦之心，已漸漸無意於官場。然而由於家庭經濟因素，雖無意於官場，卻無法像袁宏道一樣毅然決然辭官，但是他的心態已漸趨於吏隱。

江盈科著〈答顧靖甫〉：

僕近日足疾牽纏，形骸如削，支床雞骨，強與馬牛俱奔，亦不達於性命之理矣！遂欲解綬東歸，高臥桃花流水間，嘯歌徜徉以終餘年。而家無負郭，未免藉五斗供堂上人饘粥，坐是不能引決<sup>41</sup>。

江盈科著〈與謝在杭〉：

弟邇來官況益蕭瑟，強自排遣，托於更隱，廳事兩墀，植雜花數十，氣候既

<sup>3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 387

<sup>4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 377

<sup>4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57

至，爛漫如繡，脫頭上進賢冠，舉酒澆之，引滿大醉，人且謂我河陽乎？彭澤乎？吾適吾興而已，不知其他<sup>42</sup>。

除此之外，他更將其書齋取名為「小漆園」，就是希望能取法莊子逍遙遊的精神來獲得精神上的解脫，同時著〈小漆園記〉以誌之：

《南華》內外篇，大抵發明逍遙之旨。逍遙者，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也。莊周生季世，為漆園小吏，在囂煩冗瑣中，而見解超脫，不膠於事，為能極夫逍遙之趣。世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欲逃無何有之鄉，以求所為逍遙者，溺其旨矣！不荷上不棄，拔入制科，擇為長洲令。……令日夜操鞭笞，與疲民從事，猶以歲課不登見奪餼。大較長洲令見長難，取譴易，不稱苦心乎哉？不佞在職逾年，昕夕拮据，形容凋落，攬鏡自照，瘠如枯魚。家人固疑予之不樂，而予中則無日不逍遙也者。要之，盡吾之心，行吾之事，毀譬諸聚蚊，得失比於夢鹿。內無所營，外無所冀。退食之頃，兀坐此，掃地焚香，消遣塵慮，悠然忘其身之楚人也，所居之吳苑也<sup>43</sup>。

江盈科為官江南時還結識了許多好友，如江南名流王稚登、張鳳翼、張獻翼、屠隆等。王稚登（1535-1612）字伯谷，先世家江陰人，移居吳門。《明史》稱他「四歲能屬對，六歲善擘窠大字，十歲能詩，長益駿發有盛名」、「吳中自文徵明後，風雅無定屬。稚登長及徵名門，迎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sup>44</sup>。」張鳳翼、張獻翼亦是吳門名士，與鳳翼並稱「三張」，他們一生大都是遠離政治、尊重個性的才子型詩人，其創作不事蹈襲，或清新灑脫、或直抒胸臆，對公安諸子有所影響。江盈科在政事之餘經常與他們詩文酬唱、書信往來，可從《雪濤閣集》尺牘卷窺其一斑，他們共同追求自適的人生，深化了對自然人性的體悟。

按《明史·職官志》中所記載的明代考功制度，外官為三年一考<sup>45</sup>。江盈科卻因為被冠以「催科不力」之名未得升遷，任長洲知縣長達六年之久。萬曆二十六年，

<sup>4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77

<sup>4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 346-347

<sup>44</sup> 《明史》卷 288，列傳 176（王稚登），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3 月，頁 7389

<sup>45</sup> 《明史》卷 72，志第 48，職官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3 月，頁 1741

期滿即將升官，他做好《錢糧徵放冊》準備交接，朋友也歡送他能任滿升官。但是這次升遷卻極不順利，即發生了所謂的「改官大理寺正」事件。江盈科本應擬調為吏部考功主事，卻被戶部給事中李應策以「征賦不及格」的理由彈劾，改派為大理寺正。看似同為正六品的職位，實際上吏部主事之職務遠比大理寺正權重而位尊。吏部主事手握實權，掌管天下官吏的選拔與考核，而大理寺正是掌審管平反刑獄之事，自然就無足輕重，屬於閑職。其實，所謂的「征賦不及格」也不過是朝廷當權人物的一個藉口而已，江盈科被改遷的真正原因是遭到了當朝權貴的嫉恨。他曾以懇切而激烈的言辭上〈法祖疏〉、〈宦寺疏〉、〈中興疏〉三篇文章來表達自己對朝政的看法。他指出萬曆皇帝重用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礦、稅政策之危害，直言當務之急是「罷稅、罷礦、罷中貴」<sup>46</sup>，這無疑是損害了權貴們的既得利益，江盈科因此遭到疏遠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這他的集子中也多有記載，如〈憶昔〉

昔在長洲時，報遷吏主事。為幾遭口語，改屬大理寺。

風波轉盼間，變態胡爾亟？當其報吏部，賀者雜沓至。

及聞有後命，吊者履相次。賀者喜欲狂，吊者憐欲泣。<sup>47</sup>

江盈科自己倒是很豁達地看待這一切，經歷了六年官場生涯的他早已看透箇中內幕，賦詩寫懷、排遣憤懣之餘，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他終是赴京就任了大理寺正一職。

大理寺正雖為閑職，江盈科仍然認真負責。江盈科著〈棘寺簡同事〉：

敢云能照覆，但自切臨冰。決獄思空圍，臨書想結繩。

門非邀駟馬，傳恥列蒼鶯。自笑慈悲意，居然有髮僧。

同時江盈科利用公餘閒暇勤於筆耕，在大理寺正任內完成他重要的著作《雪濤閣集》並編成付梓，時為萬曆二十八年四月，西楚江氏北京刊本。

江盈科著〈雪濤閣集自敘〉：

<sup>46</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文輯佚·卷二），頁 756

<sup>4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頁 15

夫人之性，不能澹然無好。當其所好，無論有益無益、工與不工，而自有戀戀不能捨者。故性好弈，雖終日輸棋，不廢弈也；性好賭，雖終日輸錢，不廢賭也；性好酒，雖醉欲死、瘦欲死，不廢酒與色也。何者？誠好之也。余才不能文、不能詩，而性好為文與詩。廿年以困於計簿，縱好焉而不得逞。比由縣吏，量移棘曹、曹務甚簡，於是得肆志於文與詩，凡逾年，得雜文三卷，詩三百餘首，合於舊所撰著，舊所撰著，總為十四卷彙刻之<sup>48</sup>。

而這時也是他與公安派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此一部分將留待下節討論。

萬曆二十八年冬，江以大理寺正的身份卹刑滇黔。主要的工作就是複查獄訟，這項工作事關人命責任重大，作為一名有良知的官吏，他在長洲為官時即對辦案小心翼翼，絕不敢馬虎了事、草菅人命。此次卹刑滇黔，因為他的勿枉勿縱，細推案情，為之平反者達三百多人

江盈科〈與王百穀書〉曰

不佞審讞兩省，解主上之網，死而生之者，凡三百人。然而兩省元元，苦兵苦飢、苦貢金、苦鑿礦、苦抽稅，死者十三，徙者十四，譬諸黃冠代富翁設醮，放魚放鳥，名曰放生，以為功德，而富翁屠戮羊豕以肥其口，誅求逋負以肥其室，較所生者與所殺者，才萬一耳，奈何奈何<sup>49</sup>？

江盈科〈與劉起南諫議〉：

乃今握符出宰，戴星出入，精銷肉枯，而案牘如山，不加理也；逋賦如麻，不加核也；老吏巨猾，如鬼如蜮，不能盡屏斥也。蒞官八月，未展寸長，回視江都之政，何啻坐培塿望太山，奚而冀職業之稱、名譽之光乎？第一念澡雪，常如神明鑑臨左右，四知之金，不敢使得近也；一夫之冤，不敢不為籲呼，而求伸也。其他若是我非我、毀我譽我，都置不問，以求不負主上。辜

<sup>4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頁4

<sup>49</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文輯佚·卷二散文·尺牘），頁780

蒼赤，而不見擯於交游之末，則所永肩一心，之死靡忒者耳<sup>50</sup>。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有和他「第一念澡雪，常如神明鑑臨左右，四知之金，不敢使得近也；一夫之冤，不敢不為籲呼，而求伸也。」一樣的想法，世間就不會有那麼多無辜枉死的人了。

此時，江盈科也完成《諧史》的寫作。萬曆二十九年夏，《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也付梓，同科好友雲南僉事鄧原岳為之作序。

萬曆三十年夏，江盈科不辱使命完成恤刑任務，從雲南經貴州至湖廣，因勞累致病，先順道返故鄉桃源探親，休養了一段時間。同年秋天返京，即被提升戶部員外郎，官為從五品。萬曆三十一年任職期間，又出差到四川擔任鄉試主考。直至萬曆三十二年七月陞遷四川提學副使，萬曆三十三年卒於四川提學副使任內，任此官僅一年而終，享年五十三歲。江盈科一生貧困，乃至卒後其子無資為其治喪，袁中道〈江進之傳〉嘆曰：「自為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贖金〈喪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sup>51</sup>！」

綜觀江盈科的一生：家境雖清貧，卻堅持學習；為官時間雖不長、仕途也算不上十分通達，卻頗有政績，深受百姓的愛戴。

<sup>5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 565

<sup>51</sup> 袁中道著、錢伯城箋校《珂雪齋集》〈江進之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 17，頁 727，以下有關取用此書之條目，皆以《珂雪齋集》稱之，不再以詳目呈現

## 第二節 江盈科與公安派

關於公安派在晚明文學革新的運動中的功績和意義，學術界已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但論者往往都以三袁作為公安派的領袖，而對曾為公安派的創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江盈科卻少有論及，甚至因襲古人成見，視其為公安派之末流而被以惡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江盈科的詩文集《雪濤閣集》自萬曆二十八年刊行以後，從未有人翻刻過，人們因難以讀到《雪濤閣集》而不知其真實面目。二是竟陵派鍾惺〈與王稚恭兄弟〉一文對江盈科的貶責流播甚廣，而後人又多以耳代目，於是信以為真，人云亦云。其文曰：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于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陽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著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挾，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曆低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聾然之間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聾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女觀場。

52

此文寫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當時袁宏道、江盈科二人皆已逝世，而袁中道尚未進士及第聲名大起之時。很明顯，這實際上是一篇討伐公安派的檄文，旨在為竟陵開宗立派而張目。然而，我們卻可以從反對派的批評中，獲得一個可靠的資訊，即當時文壇以「袁、江二公」並稱，足見江盈科在當時公安派具有其一定的地位。

按照黃仁生對公安派生成的分期，「萬曆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為醞釀準備期」、「萬

<sup>52</sup> 〔明〕鍾惺《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二十八，1992年，頁463

曆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為開宗立派時期」、「萬曆二十九年到三十八年為調整發展時期」、「萬曆三十九年到天啟年間為矯弊救衰時期」<sup>53</sup>。江盈科為公安派貢獻突出的是開宗立派時期和調整發展時期這兩個階段，這與袁宏道和江盈科的仕宦與交遊有密切關係。江盈科與袁宏道的交往集中在萬曆二十三年袁宏道令吳之後，到萬曆二十九年袁宏道告假南歸，特別是萬曆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二人在蘇州作官這一階段，其間二人完成了公安派的理論建設。公安派的開宗立派正值袁、江密切來往時期，下面就以袁、江交往為線索去探討江盈科對公安派的貢獻。

## 一、同科之誼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萬曆二十年（1592）和江盈科同科進士，江盈科於數月後即授官長洲知縣，直到萬曆二十六年調職。而袁宏道于進士考中後請假告歸，回到家鄉。二人為同榜進士，應當相識，至於是否有深入交往，依據二人文集，並未看到二人尺牘往還之證據，估計當時應該只是一般性的社交關係。但三年後，宏道授官吳縣令，來到吳地。且二人同屬蘇州府，治所也在一起。這樣，開啟了二人正式交遊的大門。袁江交往集中在二人共事吳中的三年，在相互交流與切磋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同為一地之官，是二人深入交往的契機，而相近的政治觀點與仕宦意識。使二人心靈更為貼近。二人來到吳地，一方面對於這裡的山川秀麗和富饒昌實深為感歎。但另一方面，對於蘇州之地賦稅之重和百姓生活之難，又給予極大的同情，〈小漆園記〉一文記載：

長洲于東南稱最巖邑，又文明之區，而吳會之衝也。蓋縉紳多於鄧林，使軺密於魚鱗，監臨眾於九牧，簿領叢沓，有如棼絲，胥吏閃幻，有如鬼域，且頻年，井邑蕭條，而五十萬之常賦，要於取盈。<sup>54</sup>

江盈科這段文字真實反映蘇州府當時的社會現象。而對於這種國家政策下吳地百姓

<sup>53</sup> 黃仁生〈論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復旦學報》，1998年第5期，90-93頁

<sup>5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346-347

的重壓生活，袁宏道也曾作詩感歎：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苦催激，朝廷新例除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  
江淮陸地生洪波，內庫馬價支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蘇州舊逋七十萬，漕  
折金花居其半。安得普天盡雨全，上為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難、官日苦、  
竹開花、礦生土。<sup>55</sup>

從前面所引的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二人都有對於仕宦生活的厭倦。當然這與中晚明文人士大夫追求自適生活和個性自由有關，也還有二人具體的現實遭遇有著很大因素。當然，江盈科與袁宏道還是有一定的區別，袁氏在授職之後即有一種苦悶而意欲擺脫的心態：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今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  
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  
狀如何，先此報知<sup>56</sup>。

這是袁氏剛剛到達吳縣時的書信，雖然也有幾分新鮮與豪邁，但也透出了幾許的無奈與擔憂。其後的身體之病與仕宦之苦，更使袁宏道備受煎熬。而江盈科是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感到失望與悲哀，在〈與祝吳江〉：

不肖待罪巖邑，視事以來，戴星出入，卒卒不暇。咫尺高賢，德星在望，無  
絲一奉顏色。至厘下執事錫之手翰，並辱腆儀，感甚媿甚。竊惟江南繁劇之  
邑以數十，而吳江、長洲為之最。不肖之至長洲也，見其政如絲棼，官舍如  
蜂衙；上司之急賦稅也，如捧漏沃焦；疲民之應有司誅求也，如生龜脫殼。  
即以長材御之，尤懼弗勝，而碌碌如不肖，是蚊負山也<sup>57</sup>。

袁宏道與江盈科，兩人是同年進士、是同地僚屬、是同志官長、是同趣好友，袁宏道對江盈科的文才也極為推崇，每每稱其為「江郎」，將其比為南朝大作家江淹。

<sup>55</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逋賦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34  
以下有關取用此書之條目，皆以《袁宏道集箋校》稱之，不再以詳目呈現

<sup>56</sup> 《袁宏道集箋校》〈寄同社〉，頁201

<sup>5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二），頁554



既然同城為官，兩人便常有一同出遊之機會。對於袁江交遊情況，袁宏道在吳期間，其弟袁中道於萬曆二十三年八月，順大運河赴蘇州看望乃兄，並與江盈科會面，一道遊覽姑蘇。江盈科有〈九前二日袁中郎昆仲登上方山〉詩：

秋色蕭然萬里來。故人相逐此徘徊。尊前歌舞憐吳俗，座上風流羨楚才。

為趁斜陽催進艇，更呼明月共登臺。異鄉兄弟堪行樂，謾向牛山起暮哀<sup>58</sup>。可見其與袁氏兄弟的關係已經建立，同時表達了對袁氏兄弟的傾慕，又是一種自我肯定。

袁中道〈江進之傳〉寫道：

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輿，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備，若江文通、袁淑明雲。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為。即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為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即與中郎大有唱和<sup>59</sup>。

二人在這共同仕宦的兩年裡，形成了莫逆的友誼，當袁宏道要擺脫這「囚籠」，意欲「作世間大自在人」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好友表達了戀戀不捨之情：

橫將一尺素，寫出消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絹文裂。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憂不共切。密意臭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鐵。喜怒性情真，緩急肝腸熱。所以小修言，江郎吳令傑。官雖暫時離，交豈中道輟。古井絕回波，深山無化雪。<sup>60</sup>

萬曆二十四年，袁宏道辭官去無錫，臨行時，江盈科作〈袁中郎移病南歸〉七首贈別<sup>61</sup>，袁宏道有〈答江進之別詩〉曰：「一一相商決」，便是指創立公安派的主張和活動。袁宏道為袁中道刻詩集，並為之作序文〈敘小修詩〉，正式發表了他與

<sup>5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三），頁 174

<sup>59</sup> 《珂雪齋集》（江進之傳），卷 17，頁 726

<sup>60</sup> 《袁宏道集箋校》（答江進之別詩），頁 154

<sup>6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頁 37

江盈科「商證」過的「性靈說」。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入京，江盈科不久也報遷吏主事改官大理寺正，於是他們又能夠聚在一起談禪論學於京師，公安文學理論的重要著述其袁宏道〈雪濤閣集序〉即作於此時。

## 二、交遊結社

萬曆二十六年(1598)江盈科進京後，因遭人中傷，改官大理寺正，江盈科在〈憶昔〉中談起這個事件也說：「主事。為幾遭口語，改屬寺。」此間他便開始以吏隱心態處事，袁中道〈江進之傳〉曰：「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為詩文。」<sup>62</sup>，與袁氏兄弟及公安派其他成員聚集談詩文，並整理《雪濤閣集》成書。這時期他的思想漸趨於儒、道、釋相容融，詩文中多流露出對棄官後清靜悠閒生活的嚮往，如〈閒中自嘲〉：

一座圖書一柱香，垂簾風景似瀟湘。燕京春半草還短，楚客心閑髻漸長。  
門絕俗流惟道侶，官無家累有餘糧。年來跪債償應足，膝肉增多一寸強<sup>63</sup>。

又〈睡起〉：

午夢悠悠一枕仙，綠槐篩影灑床前，兒童笑說天公道，補我長洲夜不眠<sup>64</sup>。

作品中明顯流露出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的生活態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公安諸子齊聚京師，結社於京師城西的崇國寺葡萄園談禪論學，飲酒賦詩，這對公安派的發展影響頗大。明代文人很多都有結社的習慣，結社風氣興盛，成為當時的潮流，公安派也不例外。而結社對於一個文學流派的發展也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首先，葡萄社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文學活動，活躍了成員之間的文學生活，也擴大了公安派的文學陣營和創作影響，同時也對增添京城的文化氣氛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葡萄社活動全盛時期，江盈科適逢其會。袁中道著〈江

<sup>6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一），頁 1068

<sup>6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56

<sup>6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五），頁 292

進之傳〉：

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於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sup>65</sup>！

據何宗美初步統計，葡萄社大大小小的文學雅集達到數十次之多，這些活動大體可分為齋集和郊集兩類<sup>66</sup>。

齋集是指在社中重要成員齋中舉行的雅集，郊集則指郊外舉行的雅集。目前可查，江盈科參加的齋集活動有兩次，一次是「袁伯修齋詩會」，袁宗道所居在西長安門附近，名白蘇齋，以「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sup>67</sup>取名。

這次詩會氣氛熱烈，江盈科有詩〈飲袁太史伯修齋中〉為證：

高齋列坐共飛觴，一縷天風透骨涼。盆石活如螺吐肉，階松瘦比鶴休糧。  
徵來酒母甘勝醴，選得歌兒曲繞梁，醉後移樽吸新月，幾回卜地徙胡床<sup>68</sup>。

詩中記錄了時的熱烈情景。另一次是在袁宏道的「文漪堂」，江盈科有詩〈重九前二日袁中郎席上〉<sup>69</sup>涉及此次的詩歌唱和活動。

江盈科參加郊集的詩社活動較多。萬曆二十七年五月，袁氏三兄弟與江盈科、丘坦、黃輝、方丈僕等七人集于崇國寺，以「五月江深草閣寒」分韻賦七言詩，宗道得「五」字、丘得「月」字、中道得「江」字、方得「深」字、江得「草」字、宗道得「閣」字、黃輝得「寒」字<sup>70</sup>。萬曆二十七年秋，袁宏道召集江盈科、王以明、王文僕、王袵及中道共六人于崇國寺分韻賦詩。江盈科〈袁中郎召集崇國寺方、王諸子分韻地吹字〉為此次詩會之作。

社社秋深木葉知，一尊相對破鄉思。饌羅水族蝦兼蟹，果吸寒漿柿與梨。

<sup>65</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一），頁 1068

<sup>66</sup>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頁 131-132

<sup>67</sup>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頁 131-132

<sup>6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18

<sup>6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35

<sup>70</sup>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頁 135

甘菊味清宜露漬，苦瓜藤老怯風吹。醉來酒力溫如繭，月下無妨席屢移<sup>71</sup>。

葡萄社除了上述的詩酒酬唱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談禪論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葡萄社其實也可以稱做禪社，公安派的成員大多受心學影響，對於佛禪有著濃厚的興趣。其領袖袁宏道就受佛禪影響頗深，在〈途中懷大兄詩〉中，對葡萄社成員當時的學禪情景這樣描述：

余時官閑局，弟也負書至，每當聚首時，言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痾，當機無回顧。俱悟昔時非，馳馬歇狂絡。淨侶攜數人，結期向北寺。下直即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sup>72</sup>。

可以想見當時的公安派成員對佛禪的如癡如醉，連以前不談佛論禪的江盈科也開始讀經、吃齋。〈學佛〉一詩有：

空門聊自託行藏，起漱寒泉浣穢腸。撲虱每憐傷佛子，割糖生怕損蜂王。  
香焚梅散午煙細，卷誦蓮華秋漏長。最愛年來塵事少，板聲無復到眠床<sup>73</sup>。

表明了這一時期的無拘無束，不再為官務苦惱的輕鬆心情：〈夜坐〉一詩有：「玄房兀兀萬緣空，時向蒲團習坐功<sup>74</sup>。」表明他對佛禪學習有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身體力行，練習佛家基本的打坐之功。另有〈崇國寺吃齋〉、〈讀經〉等詩文描述自己學佛的情景。

公安派在京師的社集頻繁，社友眾多，聚而論學，或清議、或賦詩，京師學風為之一變，然而，公安派士人的社集活動也常被一些當政者指斥為「異學」、「偽學」，但公安派諸君子志業方銳，不顧譏謗而為之，故從禪風熾盛的萬曆二十六年前後至萬曆二十九年前後，不過數年，京師攻禪頭便日漸高漲。萬曆二十九年（1601）前後最為高潮。異端思想的代表李贄於萬曆三十年（1602）遭彈劾，被逮入獄，攻禪的對象是以公安派為首的文人集團和他們標舉的「異學」之風，於是此時的公安派

<sup>7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24

<sup>72</sup> 《袁宏道集箋校》，卷二十六，頁 872

<sup>7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35

<sup>7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頁 237

結社論詩告一段落，公安諸子也逐漸離開京師，把活動轉移到南方。袁宏道在攻禪高漲之前就已攜中道回家鄉，江盈科也於萬曆三十年（1602）受刑恤滇黔之命而南下，二人來往便漸漸稀少。今存宏道與盈科的詩文中不見二人這一時期的交遊，空間的阻隔和個人經歷的不同，使得二人的文學主張也朝不同的方向發展，但二人之間的友情並未因此受到任何的影響。萬曆三十二年，宏道與龍襄、龍鷹兄弟等同游桃花源時，不禁想起生於斯，長於斯的同道好友，遂作〈望深蘿山，有懷江淥蘿年兄〉一詩以表思念：

好在青溪曲，岩花石乳新，空閒流水引，不見淥蘿人。  
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不憶仙隣<sup>75</sup>。

從萬曆二十三年吳地共仕算起，二人相交恰是十年。宏道因地而憶人，心境雖變，但朋友之間的深情卻在山水之間靜靜流淌，永不磨滅。

江盈科在公事之餘繼續詩文創作，萬曆三十二年，盈科在京刻印了《雪濤閣四小書》，包括《談叢》、《聞紀》、《諧史》、《詩評》。而其中的《詩評》是瞭解這一時期江盈科文學觀念最為直接的材料，盈科曾在〈白蘇齋冊子引〉中提出「元神活潑」的觀念，以應和宏道之「性靈說」，而《詩評》則較為全面的闡述了盈科自己本身的詩學觀念。其中〈求真〉、〈擬古〉、〈評唐〉、〈貴真〉、〈法古〉、〈復古〉諸篇，鮮明的展現了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他平時仍以吏隱心態處事，無意於爭功邀賞、逢迎上意，只是盡可能完成為官之事罷了。直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提學四川，江氏當年卒於官。萬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聽聞江盈科去世，不禁悲從中來，並寫詩痛悼好友，其〈哭江進之有序〉云：「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sup>76</sup>。」

### 三、聲氣相應

江盈科在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完善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萬曆二十四年，袁宏道《敘小修詩》撰寫完成，由此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公安派理論，學

<sup>75</sup> 《袁宏道集箋校》，卷三十一，頁 1011

<sup>7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一），頁 1068

界普遍將此認定這是公安派正式形成的標誌。

弟小修，少也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sup>77</sup>。

而幾乎與此同時，江盈科受袁宏道之托作〈白蘇齋冊子引〉，提出了「元神活潑說」，與袁宏道的「獨抒性靈」交相輝映。袁宏道後來在〈哭江進之詩序〉中也說：

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嘆曰：「是已！」後為餘敘〈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sup>78</sup>

由此可知，袁宏道的「性靈說」最初是在同江盈科的討論與切磋中提出，並通過二人「商證」後才遂漸完善的，而袁宏道的「性靈說」不僅是受到李贄「童心說」的啟發，也明顯地與吳地人文影響而來的。

對於江盈科是否亦受到李贄的影響史料中雖沒有記載，但透過他提出的「元神活潑說」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元神活潑說」也是明顯受到了李贄「童心說」的影響的。在《雪濤閣集》、《雪濤詩評》中皆提到過李贄，所以，其實江盈科是認識李贄的，同時也是了解「童心說」的。同時江盈科比袁宏道早到吳地三年，對吳地文化他也是相當熟悉的。江盈科的文學思想在輔助袁宏道創立「公安派」的過程中和創作實踐中形成，晚年又有所充實和延展。其中有些觀點是在與袁宏道「商證此道」時產生，自然與宏道同調，但也不乏他自己獨到的認識。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的《敝篋集》、《錦帆集》編成付梓，江盈科為之作〈敝篋集引〉、〈錦帆集敘〉。

<sup>77</sup> 《袁宏道集箋校》，頁 187

<sup>7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一），頁 1068

在〈敝篋集引〉中江盈科對「性靈說」大力推闡，並對「性靈說」的理論內涵進一步進行補充和延伸。袁宏道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總綱，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但對於實踐這種理論的創作過程與特，則江盈科著〈敝篋集引〉補充闡述得更為細緻。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日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爾。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螳蜂蠆皆足寄興，不必《雉鳴》、《騶虞》；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sup>79</sup>

袁宏道把「性靈」與「真」，與「時」、「變」、「趣」、「韻」等的關係，表達得非常清楚，卻缺乏對「性靈」本身的內涵和顯現方式地具體說明。這對於一個新的理論來說，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而這時彌補這不足的人就是江盈科。他將「性靈」闡釋得淋漓盡致。這可以看作是公安派對於模擬復古詩風的第一次理論批判，也是公安派自身詩學理論的公開宣言。其中對於「性靈」的重視和對於「真詩」的判斷，是公安派詩學理論的精要。

江盈科〈解脫集序二〉：

夫近代文人紀遊之作，無慮千數，大抵敘述山川雲水亭榭草木古蹟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敘佳山水，並其喜怒動靜之性，無不描畫如生。譬之寫照，他人貌皮膚，君貌神情。若夫尺牘，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筆直盡，種種入妙<sup>80</sup>。

他對「性靈」文學的創作進行了一番評鑑。江盈科知袁宏道之得在於此，其他人之失也在於此，失在「志乘」山水，缺乏真情真性。袁宏道對「性靈」自身的內涵和顯現方式，卻鮮有具體的說明，這個工作實際上是盈科做的。江盈科對「性靈」的

<sup>7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頁 399

<sup>8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頁 404-5

闡釋，使「性靈」說更為世人了解。

黃仁生在其〈江盈科論〉亦將兩人做一比較：

〈敘小修詩〉：情（性靈）→境→字→本色獨造→真詩

〈敝篋集敘〉：（蘊含性靈的）心→境→腕（寫作能力、技巧）性靈畢達的作品→真從心詩→新穎從心有性靈變性靈之作，

〈敘小修詩〉著重強調「情與境會」、「情隨境變」，於是就「字逐情生」了，似乎凡是有情人就詩；〈敝篋集敘〉則補充了「以心攝（統轄）境，以腕運心」的過程，實即強調詩人「情與境會」時從意象生成到意象跡化（指將頭腦中已生成的意象形諸文字）過程中的主體條件（包括才能、技巧）和能動作，只有「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才能將心中的性靈轉化為真詩。這種補充闡釋，使中郎「性靈說」的內涵進一步充實。<sup>81</sup>

除此之外，《雪濤詩評》是一本針對詩文理論的專門論述，而《閨秀詩評》則體現了盈科對於女性作家的關注，這些都是江盈科對「三袁」詩文理論的補充，也是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完善。

江盈科實現了公安派創作實踐的拓展。相較於「三袁」，江盈科在將性靈理論付諸創作實踐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例如，他對於寓言、笑話創作的鍾愛，即使是其小品文創作中也常常見到寓言說理的痕跡。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三袁」的關注視野較為集中，而江盈科的創作實踐則顯得開闊了許多。他的作品中對於國計民生的關注，議論精警，已具大家風範。這些大略可以看作是江盈科對於公安派創作實踐的擴展，這些將留待下節論析。

---

<sup>81</sup> 黃仁生〈江盈科論〉，《文學評論》，第2期，1998年，頁75-76



### 第三節 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與創作

作為「三袁」之外公安派的又一力將，江盈科的詩文理論和「三袁」特別是袁宏道同氣相求，彼此呼應，以鼓吹抒寫性靈、反對模擬復古為宗旨。前面提到江盈科的詩論主要集中在《雪濤詩評》和《閨秀詩評》中，這是兩部頗有系統的詩評作品，理論性較強，是公安派文學中罕見的詩論專著，對於闡發公安派文學觀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他的文學理論散見於〈白蘇齋冊子引〉、〈敝篋集敘〉、〈錦帆集敘〉、〈解脫集引〉、〈解脫集二序〉、〈陸符卿詩集引〉、〈喻言摘粹引〉等著作和篇章中。

#### 一、學術師從

前文曾提到江盈科的祖父是他的啟蒙老師，也是發現他文學才華的伯樂，沒有他祖父的努力培養和堅定扶持，很難想像當時一個出身貧寒農家的弟子能夠克服種種困難，衝破藩籬，在文學創作上取得這樣的成就。而後師事羅潼江、葉日葵先生，為諸生後，師事文蓮山先生。據《光緒桃源縣志》：「江盈科生平湛於經術，尤留心時務<sup>82</sup>」，為詩為文反對復古，主張文隨時遷。文先生本人也鄙棄復古模擬，主張因心為文，〈蓮山文師去思碑記〉云：

以時進諸生橫舍，辨析經旨，不即訓詁，不離訓詁，往往標象外之理，令聽者欣然會心；評騭文藝，以清虛解脫為宗，盡浣剝剝之陋。嘗曰：「說經必證諸心，不證諸心，說雖說，說鈴耳。摛文必根諸心，不根諸心，文雖工，雕蟲耳。以心釋經，因心為文，即經世吾垂不朽，有他道乎<sup>83</sup>？」

明中葉以後，文壇發生了鮮明的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的論爭，出現了许多文學社團或文學流派，它們或同時並起、或先後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學傳統，提出一定的文學主張，表現一定的創作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落。晚明心學思潮澎湃，以王守仁的「致良知」和李贄的「童心說」為綱領，掀起了反對性理學說的狂潮，文人士子乃至百姓都以追求個性、回歸內心為尚。嘉靖、萬曆年間，社會上激烈反對復古派理論，主張詩文要有獨創性，要反映自己的真情實感。江盈科之師文

<sup>82</sup> 薛飛等編《光緒桃源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卷八，2002年，頁9

<sup>8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七），頁350

蓮山先生身當其時，他主張「說經必證諸心，不證諸心，說雖說，說鈴耳。摛文必根諸心，不根諸心，文雖工，雕蟲耳。以心釋經，因心為文，即經世吾垂不朽，有他道乎？」反對復古模擬和「師心」的文學觀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心學思想的影響。江盈科一生致力於反對復古，高揚性靈的文學革新運動，這不能不說與文先生的教導有關。

## 二、文學主張

### (一)、闡發「性靈」之旨，開「元神活潑」之說

就在袁宏道於〈敘小修詩〉中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理論主張後不久，江盈科就在〈敝篋集引〉中進一步闡發了「性靈」之旨，並對於如何實踐性靈理論做出了更為細緻地補充解釋。另一方面，在江盈科為袁宏道撰著的另一篇序文〈白蘇齋冊子引〉中，他更提出了與「性靈說」相互呼應的「元神活潑」之說：

吾嘗睹夫人之身所以流注天下，觸景成象，惟是一段元神。元神活潑，則抒為文章，激為氣節，泄為名理，豎為動猷，無之非是。要以無意出之，無心造之，譬諸水焉，升為雲、降為雨、流為川、止為淵，總一活潑之妙，隨觸各足，而水無心。彼白、蘇兩君子，所謂元神活潑者也。千載而下，讀其議論，想見其為人，大都其衷灑然，其趣怡然。……夫人之元神無不活潑，有弗然者，或牾之也。牾有二卷：人塵之慮，入焉而牾；義理之見，入焉而牾。二者清濁不同，其能為牾，則若臧谷之於亡羊，均也。<sup>84</sup>

黃仁生認為江盈科所說的「元神」，正是在王陽明、王艮、王畿所說「心性本體」和羅汝方所說的「赤子之心」、李贄所說「童心」之上凝聚而成，故或抒為文章，或激為氣節，無之而不可。「元神活潑」的理論認為，人的元神本來無不活潑，但是由於受到了「塵俗之慮」和「義理之念」的桎梏，因而壓抑泯滅了元神，戕害了「真我」。所謂「塵俗之慮」，指對功名爵祿、富貴利達的貪求；而「義理之見」，則與李贄所說的「聞見道理」相近，主要指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前者「濁」，後者「清」，

<sup>8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頁419

二者都桎梏元神，束縛個性的自由發展。於是他主張人們應：靜觀無始、洞見故吾、湛然虛明、一無所著。何物塵俗、何物義理、都歸無有。應該保留並跟隨自身的本然狀態，為人為文皆如此。由此可知，江氏「元神活潑」的理論很明顯地受到了王學左派有關「心性本體論」以及李贄「童心說」的影響，而與袁宏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更是息息相通<sup>85</sup>。

袁宏道提出「性靈說」的觀點，江盈科在與他商討以後也接納了他詩論觀點，並創作一系列的詩文來提倡，同時回應袁宏道的觀點。「元神活潑說」與「性靈說」是互相呼應的，「元神活潑說」強調在寫作詩文時，全憑個人情志自由驅遣語言文字，不被已有的陳規舊矩所限制，這與「性靈說」強調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重視表達形式的自主性和獨創性是一致的。

而後江盈科在〈敝篋集引〉補充闡述得更為細緻。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日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爾。」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螻蜂蠆皆足寄興，不必《睢鳩》、《騶虞》；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sup>86</sup>

袁宏道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文學作品以抒發內心真實性靈為主，不被外在形式格套所拘限，對語言文字、寫作技巧他並沒有正規的要求；但是江盈科則不然，他認為詩文創作必須自性靈流出，但是他也認同形式技巧有時也必須看重，所以他才提出了「手腕」之說。「手腕」指的就是文學創作的技巧和手段，作者固然不能被形式格套拘限性靈的抒發，但更重要的是要讓形式格套為性靈所用，所以「以心攝境、以腕運心」所強調的是外在景物與內心靈感、創作手段三者的靈活結合，只有用別具特色的藝術手法來抒寫詩人內心因被外物觸動而激發的靈感，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融真感情與真技巧於一爐的性靈之作。

<sup>85</sup> 黃仁生〈江盈科論〉，《文學評論》，第2期，1998年，頁75-76

<sup>8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頁399

「元神活潑說」與「性靈說」的核心思想都一再要求作者在創作詩文時必須抒寫真感情，運用具有個人特色的語言文字來展現真性靈和真精神，「真」就是「元神活潑說」和「性靈說」的基本內涵，也是公安派文學創作的根本。

## (二)、論模擬復古之非，倡真趣奇變

江盈科針對七子派復古模擬的反對態度與「三袁」是基本類似的。所謂「作詩者不能自出機軸，而徒踟躕於千古之題目名色中以為復古，真處禪之風也。<sup>87</sup>」「性靈」之旨與「元神活潑」之說實質上都是針對前後七子「尊古卑今」的主張，其理論旨歸都是要求以文學的個性表現和獨創精神，扭轉當時摹擬剽竊的文風，都具有強烈的革新意識和鬥爭精神。

崇尚真情是晚明文壇文學思潮的一大特點：李贄講「童心」、徐渭講「本色」、湯顯祖講「至情」、袁宏道講「性靈」，無不突出一個「真」。公安派由於主張「性靈」，在文學創作理論方面，就非常強調「真」。「真」是對人或事物最高的評價。袁宏道認為要寫「真詩」，首先必須作者是「真人」。最好的人是「真人」，最好的詩是「真詩」，最好的文是「真文」。在江盈科看來，無論作詩還是為文，首必求「真」：

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為真詩，則不久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個竊盜掏摸漢子。蓋凡為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詠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最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故余謂作詩，先求真，不先求唐，蓋謂此而漢魏可推已<sup>88</sup>。

江盈科〈雪濤詩評·詩品〉：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曠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者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澀；其詩豐腴者，其人必

<sup>87</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評·擬古），頁 800。

<sup>88</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評·求真），頁 799-800

華瞻；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修；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李杏，望其華，便知其樹。惟勤襲掇拾者，麤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竊盜也。不飲一盞，而言一日三百杯；不捨一文，而言一揮數萬錢；此是李太白家掏摸也。舉其一二，餘可類推。如是而曰「詩本性情」，何啻千里<sup>89</sup>？

他說詩本性情，若一讀其詩能見其人之性情，則是真詩。人有什麼樣的性情，便有什麼樣的詩文。「求真」是公安派作家群共同的文學趣尚和審美追求，「真」是一種樸而自然的原始狀態，與「假」相對而言，強調作家個性的真實呈現。「真」不僅是江盈科詩歌創作的指導理念，也是其鑑賞詩歌的價值標準。

江盈科於求「真」之外，他的詩文理論還十分重「趣」，而真與趣又恰恰是緊密相連的，他認為真詩必有趣，以「趣」做為品詩的衡量尺度：

夫為詩者，若系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處於假，即佳亦自無趣<sup>90</sup>。

從江盈科這段話可以看出：「趣」是由「真」而來的，「真」則是「性靈」之真實體現。因此，「趣」又是一種由「性靈」所散發出來的感染。他又說：

蓋詩有調有趣，調在詩之中，有目者所共見。若夫趣，則既在詩之中，又在詩之外，非深於詩者不能辨<sup>91</sup>。

「趣」作為我國古代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對我國古代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明代，「趣」更是作為一種審美標準而被實踐於士人生活之中。

真趣之外，江盈科詩文論亦主張尚奇倡變，公安派主張「性靈」，反對復古模擬，追求新奇獨創，不剽竊、不抄襲，因此著重「尚奇」。江盈科著〈解脫集引一〉：

夫人受才不同，故形諸題詠，亦各自別……？余觀古工詩之家，其大較三：

<sup>89</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評·詩品），頁 806

<sup>90</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評·貴真），頁 807

<sup>9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陸符卿詩集引），頁 417

有正，有奇，又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該博典核，包彙萬有，而鍛鍊之極，往往吐語驚人。譬如石季倫觴客，俎饌鏘核，水陸備陳，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此夫正而兼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妙絕、飄飄欲仙，冷然如列子御風而行，此夫專以奇勝者也。至於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特，如海市蜃樓、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莫可端倪，此夫不名為正、不名為奇，直奇之奇者乎！蓋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sup>92</sup>。

他認為古工詩之家，其大有三：「有正，有奇，又有奇之奇。」他稱杜甫「正而兼奇」，李白「專以奇勝者」，李賀「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特，如海市蜃樓、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莫可端倪，此夫不名為正，不名為奇，直奇之奇者乎！」由此可知「奇」、「變」也是江盈科詩文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特色，且有奇方能極其變，窮變則更能見其奇。

### 三、文學創作

江盈科與袁宏道商榷並共同提出了公安派的核心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此外他還獨立提出了「元神活潑」、「求真」、「重趣」等頗有價值的文學理論，並遵此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江盈科在公安派乃至晚明文壇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江盈科的文學成就，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對江盈科的詩文成就作了如下的評價：

余與進之游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雖其長才逸格，有以使然，然亦因時救敝，法當如是。論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為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乎、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

<sup>9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解脫集引一），頁 402

矯之敝，而闢時人之目故也。」……進之詩其為大家無疑矣<sup>93</sup>。

袁中道在《江進之傳》中也對江盈科的詩文成就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詩多信心為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圓妙。……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抒機軸，可驚可愛與可笑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笑者，專以套語為不痛不癢之章，作鄉願欺世。……但其中有清新光焰之語，獨出不同于眾，而為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俚語者，無損也<sup>94</sup>。

可見江盈科的詩文創作超逸爽朗、清新絕倫，雖有近俚俗之嫌，但在力矯蹈襲之風的情況下也是不得已。

江盈科的作品保留下來的由黃仁生博士整理搜集而成《江盈科集》，包括《雪濤閣集》、《雪濤詩文輯佚》、《雪濤談叢》、《談言》、《雪濤詩評》、《閨秀詩評》、《雪濤閣四小書》、《皇明十六種小傳》及附錄。

江盈科的詩文作品超逸爽朗、清新絕倫、內容豐富。詩歌既能信腕信口，揭露社會時弊，又敢於追求個性「真我」，其中也不乏抒寫性靈，關注世俗生活的篇章，更有對女性文學重視的《閨秀詩評》。散文有憂國憂民的政論文和諷諫小品，有與朋友訴說心情的尺牘，也有令人捧腹的寓言、笑話小品。這些作品格調超逸，意味深遠，為公安派開創了更寬廣的視野，增添了光輝。下面我們即將從江盈科詩歌及散文的特徵方面來探討闡述

## (一)、詩歌

江盈科的詩歌保留下來的有千餘首，取材寬廣、信腕信口、務為新切。既強調

<sup>9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序），頁 2-3

<sup>9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一），頁 1068-1069

表現個性真我又重視對政治和社會人生的關注，藝術上突出表現了他「求真」的特色，以「信腕信口」、「言今人所不能言與不敢言」的膽量和高遠的才識，也吟詠出了許多「可愛、可驚之語」。下面將從江盈科詩歌內容的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 1、戮力為官，關懷國事

江盈科自萬曆二十年進士及第任官長洲開始，一直到萬曆三十三年卒於四川提學副使任官之所。為官十餘年來，雖然曾遭「改官」之事，但是他仍敬業從事，不管在哪個職位都還是戮力為政、為民謀事，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民本思想的好官。在那樣政治敗壞、世道混亂的環境中，他為政以德、愛民如子，為人民所受的苦痛深深感到痛心、同情及憤怒。因此他在詩歌中就常常展現直接批判現實政治，或借詠史弔古以諷今。如在〈蜀中兵起感賦〉中，他就揭露了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災難：

楊蠻縱橫亂天紀，突然操戈稱禍始。綦江城子三日破，四五萬人同日死。我皇深宮頗輦蹙，閫帥受詔殊蓄縮。逗遛未必出有意，計算難炊無米粥。往年征倭度遼水，間關不啻十千里。七年費金八百萬，健兒纍纍半為鬼。只今國帑如洗空，行糧坐餼那能充？金錢不多士不飽，縱有韓白難成功。區區楊蠻不算數，怕有奸雄聞響赴。年來群小惑聖聰，曠使稅差填道路。宮中黃金高如斗，道傍死人如死狗。民苦君樂不忍聞，分明藉資與敵手。譬如貪食人，張吻啖其肉，肉盡而身亡，腹飽不越宿。前後諫者數百人，束置高閣生。……？  
嗚呼，小波臣，心勞騷，欲呼天，奈天高<sup>95</sup>！

詩中突顯了戰爭的殘酷，透露出他對戰爭的痛恨和對百姓的同情。同時他也大膽的將矛頭指向了統治者「宮中黃金高如鬥，道傍死人如死狗。民苦君樂不忍聞，分明藉資與敵手。」他不僅揭露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政策，以致造成民不聊生的悲慘局面，同時又毫不遮掩的對君王加以指責，慷慨激昂、痛快淋漓。

另外，他也描寫自然災害下百姓的無奈，如〈旱〉：「田裂爛龜甲，川枯破龍膽，銀河夜夜明，望斷老農眼<sup>96</sup>。」〈河南苦旱〉：「赤日火輪似，長天大冶同。驛亭愁

<sup>95</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二·蜀中兵起感賦），頁 115

<sup>9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旱），頁 87



上馬，米貴欺流殍，田焦泣老農。弘羊烹未得，無計答玄重<sup>97</sup>。」

江盈科直接反映了自然災害下百姓的艱困之狀，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則大膽揭露社會政治的弊端，透露出真切的愛民情感。以「求真」為創作之標準，用近於口語化的詩歌語言表達出自己強烈的愛憎情感，是“元神活潑說”的最好實踐。

## 2、表達吏隱心態

江盈科為官多年，雖然懷抱著民本思想，努力於官吏從事及為民服務，然政治環境的險惡及為官之遭遇，仍讓他不時顯露出不如歸去之想法，然因家中及現實環境的不允許，他也只能流露出吏隱的心態，但是卻還是繼續從政為官。如〈憶昔〉：「昔在長洲時，報遷吏主事。為幾遭口語，改屬大理寺。……。余豈敢自明？聊復徇人意。中心殊不然，素位寧擇地？……悲喜乃妄情，得失亦偶值。莫起計較念，方寸縈似織。達哉莊生言，三旌等羊肆。<sup>98</sup>。〈自嘆〉：「才薄應須滯散曹，輕肥那敢羨時髦？伏鷄滿月生新卵，瘦馬逢春落舊毛。千里斷腸生白髮，十年回首一青袍。自知不帶封侯骨，欲向溪頭學種桃<sup>99</sup>。」〈小漆園即事〉：「小園官署裏，物色頗相宜。學舞憐銅嘴，能言愛畫眉，筭于行處短，花以摘來稀，就此堪棲隱，但容曼倩知<sup>100</sup>。」江盈科既有匡世救國、建功立業之志，又有隱居田園的避世思想，所以在他的詩歌中就經常表現出這種矛盾無奈的心態，不僅揭露了官場對人性的束縛，同時也表達出追求個性自由，尋找真我的殷切願望。

## 3、順應個性，怡養性情

明代中葉以後，商業經濟日益興盛，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開始追求自由、財富等新型價值觀。江南氣候適宜、物產豐富、人文薈萃，自古是達官顯貴、富商大賈以及騷人墨客聚居的地方。加以明人結社風氣興盛，因此士人們閒來呼朋引伴談詩論文或遊山玩水，訪客交遊也愈加頻仍，留連詩文飲酒、賞鑒書畫、遊覽山川，並以之為人生樂事，而蘇州風

<sup>9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河南苦旱），頁 63

<sup>9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自嘆），頁 252

<sup>9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憶昔），頁 15

<sup>10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小漆園即事），頁 47

氣一帶更為興盛。江盈科生性好弈、好賭，好酒與色，蘇州豐富的遊樂生活，正好投其所好，江盈科著〈雪濤閣集自敘〉：

夫人之性，不能澹然無好。當其所好，無論有益無益，工、與不工，自有戀戀不能捨者。故性好弈，雖終日輸棋，不廢弈也；性好賭，雖終日輸錢，不廢賭也；性好酒，雖醉欲死、瘦欲死，不廢酒與色也。何者？誠好之也<sup>101</sup>。

江盈科尤其喜歡夜宴詩酒相會，多次夜間遊樂，留下許多作品。元宵節前，江盈科就與一些好友夜集賞燈、飲酒賞曲、觀舞賦詩，著有〈凌伯升金吾召同王百穀賞燈〉：「娟娟初月掛銀河，公子開筵樂事多。曲共新鶯爭婉轉，舞從梁燕借婆娑。座中曼倩工諧語，酒後陶潛嗜嘯歌。共把千觴酬一夕，莫須更問夜如何<sup>102</sup>？」元宵節當夜，江盈科又與三五知己夜集賞燈、飲酒賞梅、覽松賦詩。著有〈葉民部集徐園觀燈〉：「美景逢元夜，名園柱上賓。岸梅紅正好，徑草綠方新。覽勝登臺上，尋幽到水濱。一觸還一詠，不覺酒杯頻。<sup>103</sup>」好友元宵歡聚，豈不快哉！

江盈科雖然處處為國計民生著想，然日常生活中卻也有其肯定享樂，追求個人欲望的一面。他的詩歌描寫社會人生、人情世故，反映人之「真性情」，不僅關注現實生活，反映眼前之實景，同時也抒發一己之真情，不再承載教化的功能，實踐了「反復古模擬」詩歌主張，確確實實做到了以「元神活潑」而抒寫性靈。

此外，江盈科對於女性文學也十分關注，他曾於〈姑蘇鄭姬詩引〉一文中言道：

《毛詩》十五國風多婦人女子之言。然自《卷耳》、《葛覃》外，出于正者絕少；即《桑中》、《溱洧》，號為淫蕩之極，聖人亦不削而存之。蓋美惡邪正，雜然臚列，使夫覽自擇而法戒備焉。故曰：「詩可以觀。」迨于後世，婦人女子之能言者較少，……然雖不稟于正，而以閨閣之流揆藻摛詞，至掩騷人墨卿，關其口而奪其所長，斯亦造化所獨縱，故自不朽。夫鳳凰和鳴，中于律呂，是稀世之音，則《卷耳》、《葛覃》非乎？其他如能言鸚鵡、巧舌倉庚，

<sup>10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雪濤閣集自敘），頁 4

<sup>10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三·凌伯升金吾召同王百穀賞燈），頁 26

<sup>10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一·葉民部集徐園觀燈），頁 26

即于律呂無當，要之婉轉清妙，令聞者賞心娛耳，雖欲不傳不可得也。矧夫婦人能言而一稟于正，如姑蘇鄭姬者，何可以不傳？姬所著詩不甚多，然諸體略備，不佞從其耳孫仲修所披誦之，大較體裁峻整，音采娟秀，就中援引故實，似乎無書不窺。蓋匪獨資質偶合彼夫平日耽古嗜學有可鏡者，且也發乎性情，止乎理義，如王公大人非法不言，庶幾漢庭班婕妤好之流，《卷耳》、《葛覃》之遺響歟？……仲尼有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亦其一徵已。余故爲之序，且更題目〈姑蘇鄭姬詩引〉，欲使人人知鄭姬云<sup>104</sup>。

歷史上對於女性文學一向不是非常重視，江盈科偶得姑蘇鄭姬之詩作，他認為真詩的基調只推求作品是否從真情實境流出，不涉及創作效果優劣、格調高低的問題，毛詩國風能傳誦千古，亦同於此，蓋「自卷耳、葛覃外，出于正者絕少」，並且不乏淫狎嫫媢之語，但以「洩於人心自然之籟」，故為可傳。他能夠不受世俗對女性文學的刻板印象，從理論中去發掘其特色：「體裁峻整，音采娟秀，就中援引故實，似乎無書不窺。蓋匪獨資質偶合彼夫平日耽古嗜學有可鏡者，且也發乎性情，止乎理義。」並大加宣揚為之作序，足見其重視之一斑。

江盈科對於女性文學的關注不僅停留在理論，《閨秀詩評》便是他搜集歷代女性作家作品並逐一品評之著，書中選錄多才思雋永之作。江盈科于《閨秀詩評》前自撰小序言：

余自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各為品題，以見女子自攄

胸臆尚能為不朽之論，況丈夫乎<sup>105</sup>？

在男尊女卑的明代社會，此言足可體現江氏對於女性文學的重視程度了。

## (二)、散文

江盈科的散文同樣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稱「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他現存的散文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小品文和傳統散文。《雪

<sup>10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姑蘇鄭姬詩引），頁 434

<sup>105</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評·閨秀詩評），頁 843

濤小說》、《談言》、《雪濤談叢》、《諧史》以及序跋、尺牘、記文列為小品文，而《雪濤閣集》收集的古論、奏疏、論說文、志傳、贈文、祭文，及《皇明十六種小傳》等歸為傳統散文。

## 1、小品文

江盈科的小品文固然有「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的特性，同時也表現出幽默性、諷諭性的色彩。按其功用和風格又分為尺牘序跋小品和戲謔小品兩類。尺牘序跋小品包括他的序文、記文、尺牘等；戲謔小品包括《雪濤小說》、《談言》、《雪濤談叢》、《諧史》等專篇，大致可分為諷刺小品和笑話小品兩類來加以探討。

### (1)、尺牘、序跋小品

尺牘自古以來本就是一種實用性文體，往往帶有抒發自我、表現個性的格調。晚明尺牘短小簡潔、抒發性靈、雅俗並兼，實用又不乏審美價值，無論抒發感慨、日常應酬，還是摹寫山水風情、吐露讀書心得，皆可在文人於書信的字裡行間納入。江盈科平日與朋友書信往來密切，尺牘作品在他的眾多作品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前面的論述之中我們就常看到他與朋友之間的尺牘往來，無論是往來應酬、詩文共賞，甚或為官之路的心酸喜樂，多能夠於尺牘中自由的吐露心跡，一抒衷情。其中吳中名士王百穀就是他極要好的朋友，在他的尺牘中有十五封是寫給王百穀的。當江盈科離蘇州準備赴京就新職而暫留真州時，王百穀專程到真州看望他，並有所饋贈，江盈科深為感動，有詩云：「病移帶孔驚相問，醫指名家倍見憐。坐對殘燈怕言別，如眉纖月掛城邊<sup>106</sup>。」江盈科每過吳中，必定到王百穀居所「半偈菴」訪此長者，屢屢對於這一位名滿吳會長者的生活表示欽慕之意。江盈科著〈與王百穀〉：

日者辱枉顧，感甚，感甚！不佞從婁東轉江陰，候直指公。舟過虞山之麓，風暖日暄、綠肥紅瘦、遊人如蟻、遊女如花，遂亦不減虎丘之勝，恨不從徵君拍肩執袂，探韻聯詩，一賞此景耳。行盡虞山，日已西夕，前去二十里，

<sup>10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四·王百穀訪余真州次早遺書別去），頁 199

月色如畫，推蓬引盼，四顧皎然<sup>107</sup>。

與朋友暢談中真切表達了自己對悠閒生活的嚮往，筆下萬紫千紅、風光無限、遊人如織、歡樂自由。文字超脫，揮灑自如，可以說是實踐性靈文學主張的尺牘佳作。

序跋本是一種用於闡揚作者為書宗旨、評鑑各類文集內容風格的文體，晚明作家在其間注入感情，夾敘夾議，使之在作品中別具一格。以親身經歷或特殊感受為基礎，闡述己見、情真意切，江盈科的序跋文章在其散文中數量不少，但是在當時影響最大的還是一些為他人著述而作的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為袁宏道早年三部詩文集所作的四篇序文。袁中道〈江進之傳〉說：「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為叙，文如披錦，為一時名人所嘆。」袁宏道本人也評價甚高，其《江進之》書云：「近日作文如吾兄者絕少，《敝篋》之叙，謹嚴真實；《錦帆》之叙，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貴。」此外如〈白蘇齋冊子引〉、〈重刻唐文粹引〉、〈陸符卿詩集引〉、〈明文選盛後序〉、〈璧緯編序〉、〈耳談引〉、〈李小白詩引〉、〈五嶽游稿引〉這些皆是優秀之作品，身為公安派的副將，不僅對公安派的開展貢獻了極大的理論的基礎，同時對於自身不同的詩文思想也發揮得恰如其分。

## (2)、戲謔小品

江盈科「生平最喜聽奇談」，性好謔，也善謔，它在〈善謔〉中曾提到：「謔亦有一段自然出於天性者」，「矢口而出，令人解頤，亦是一段別才，非可襲取<sup>108</sup>。」他十分重視笑話和寓言等諧謔文學。江盈科將這些文學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所謂「蘇代以土偶止田文之行，淳於以豚蹄加齊宣王之璧，曼倩以鹿觸之言悟漢武之殺卒，優伶以蔭室之說止二世之漆城。此豈非諧語之收功，反出於正言格論之上者哉！而又安可廢<sup>109</sup>？」除了強調諧謔令人解頤以外，還具有諷諭作用，下面我將分別就笑話和諷刺小品來加以論述。

<sup>10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三·與王百穀又），頁 592

<sup>10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四·善謔），頁 704

<sup>10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笑林引），頁 439

《雪濤諧史》大都收集文人諧謔之言，《談叢》、《談言》也有一些表達言外之意的作品，但大多無關宏旨，可歸之為笑話。潘之恒為《雪濤諧史》作序

善乎，李君實先生之言曰：「孔夫大聖，不廢莞爾；武公抑畏，猶資善謔。」仁義素張，何防一弛？郁陶不開，非以滌性。唯達者坐空萬象，恣玩太虛。深不隱機，淺不觸的，猶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風忽來、枝葉披應，有無窮之笑焉，豈復有禁哉<sup>110</sup>？

江盈科搜集和創作的笑話作品，既有文人式的風趣幽默，又有令人捧腹的市井笑話，而這些笑話大多取材於日常生活中，內容以講人情世故者居多，其風格新鮮活潑，語言淺顯通俗。有些滑稽可笑的笑話，又反映了市民日常生活的風趣：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曰：「橄欖味雖辣，卻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先甜了一會<sup>111</sup>。」

北人思維敏捷，他利用南人所稱的「回甜」的理由，巧妙的取得先品嚐棗的藉口。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為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沖淡，皆不憚，以次散去，惟一人不去。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答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的<sup>112</sup>。」

琴師以為自己技藝高超，本想博得市民的讚譽，不料聽者屢屢散去，只剩一人，他又自以為是曲高和寡，終得一知音，可是結果僅剩的一位竟是要琴桌的人，巧妙的諷刺了琴師的琴技，讀之令人捧腹大笑。

江盈科於萬曆二十八年完成《諧史》的寫作，這時正是他擔任大理寺正閒職時，擺脫了紛繁吏務的他有充裕的時間和心情從事自己喜愛的文學活動。這也體現了他性格中詼諧善謔的一面，唯有如此才能夠排遣內心的憂鬱，達到心理上的平衡。

諷刺小品的代表是《雪濤小說》，大致分為寓言小品和議論小品。文章短小精悍

<sup>110</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附錄二·潘之恒〈四小書〉），頁 1087

<sup>111</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諧史），頁 875

<sup>112</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諧史），頁 892

卻言切旨遠，特別是寓言故事的運用，諷喻性十分深刻。諷刺小品抨擊腐敗醜惡的朝政，嘲諷疏於政事的百官，揭露貪婪的人性，還有一些反映百姓聰明才智的故事，內容豐富、蘊意深刻，給人以很大的啟示。

江盈科在〈蜂丈人〉借養蜂翁之口表達了他對賦稅政策的主張：

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我逐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為卒歲計。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為出，以糊奇口；而蜂亦有於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以傳矣可為養民者法矣<sup>113</sup>。」

可見，江盈科主張適度徵稅，推崇厚民的治世之道，希望給百姓留以休養生息時間。同時他對多難的民眾也有著深切的同情，鮮明的民本思想於其中顯露無遺。

又如〈催科〉一則：

為令之難，難于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鰈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卧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橛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為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于此醫也哉<sup>114</sup>？

駝背只是病人表面的缺陷，生命才是人生最珍貴的內涵，笑話中醫者割裂了現象與本質的聯繫，僅看到駝背的現象而忽略更加重要的是病人的生命，他的「庸」、

<sup>113</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四·蜂丈人），頁 645-646

<sup>114</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四·催科），頁 651

他的「愚」自然令人嘲笑，但也因如此讓江盈科借此強烈地抨擊了晚明繁重的賦稅制度。

## 2、傳統散文

江盈科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散文是論說文，包括《雪濤閣集》卷六所收「古論」十五篇，光緒《桃源縣誌》所收〈王者所天在民論〉、〈治世莫若愛民論〉、〈法祖疏〉、〈宦寺疏〉、〈中興疏〉和《皇明十六種小傳》等，無論評論時政與歷史，皆富於批判精神，充滿思辨色彩，而且文筆態肆、理直氣壯，充滿了民本思想及人道精神。

江盈科針對統治者的用人之道，在〈用人〉篇批評了歷史上「必盡去小人，而後天下乃治<sup>115</sup>」的觀點，認為要消除小人是不可能的，仁君應當善用小人，做到「如貪如詐，如夷狄，如盜賊，皆可駕禦而全其才而適於用。」他以醫師治病用藥為喻，闡明自己的觀點，淺顯易懂，說理透徹，也體現了他為治理國家出謀劃策的良苦用心。同樣他在〈漢武帝〉中明確指出「人君之治天下，用人焉，盡之矣<sup>116</sup>。」要善用小人且人盡其才的觀點體現了他的主張的用人策略，也反映出他為統治者著想的良苦用心。

在〈王者所天在民論〉、〈治世莫若愛民論〉則充分展現他的民本思想及人道精神。〈王者所天在民論〉：

夫王者之所以成其尊貴者無他，政謂其權能予人奪入，能榮人辱人，能賞人賤人，能生人殺人如是焉止矣，而烏知民亦有權，民之權反出於王者之上哉？夫出王者之上，何也？蓋王者之權能予奪天下，而民之權乃能予奪王者；王者之能榮辱天下，而民之權乃能榮辱王者。且也王者之予奪天下以跡，而民之予奪王者以心<sup>117</sup>。

君主如果懂得這個極端重要的道理，「則必至不敢忽民，不忍殘民，不能一瞬息忘民。」

<sup>115</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六），頁 294

<sup>11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六），頁 322

<sup>11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雪濤詩文輯佚，卷二），頁 768



君主須「徹其肺腑以通眾庶之休戚」，「抱己饑己溺之慮，為之輕徭薄賦以阜其財，為之散金發粟以賑其困」，如此一來人民才能得到一個政治清明，安居樂業的理想生活環境。而〈法祖疏〉、〈宦寺疏〉、〈中興疏〉則是以論「法祖」的重要性為開端，向萬曆皇帝大膽地提出罷稅、罷礦乃至罷中貴的主張。

《皇明十六種小傳》雖然雖然分類品評人物的，但是其標準依然是忠、孝、廉、節為主，但通過對某些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仍體現作者對身處無辜和不屈者的同情、對廉潔忠貞者的讚揚、對貪官汙吏的不齒、對幹吏能臣的宣揚，其所要表現勸懲的意圖就非常明確而清晰，這在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之中獨樹一幟，也正因為這樣擴大公安派的視野。



### 第三章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書寫背景及其體例分析

江盈科所處的時代為世宗、穆宗、神宗三位皇帝在位之時，為明代政權步入中後期之際。這個國家從一心想恢復漢唐舊制的太祖洪武皇帝開始，除了幾段短暫的治平時期，伴隨的是更多跌宕不安的政局，在多位荒誕荒唐的皇帝主政下，綱紀廢弛、腐敗貪婪，宦官專權、黨爭不斷黑暗政治。明朝的經濟社會也從明初的民風純樸、有法守禮，一路走向奢靡享樂的商業社會。

明朝歷史，如同王天有、高壽仙先生所著的《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一書的副標題：這是「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書中〈前言〉中提到：

歷史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明朝歷史變化之大，是前朝各王朝無法比擬，這種變化有政治方面的、有經濟方面的、也有社會思潮方面的；推動變化的主因有的源於自上而下的力量，有的源於下層湧動。上下合力，變化加快；上下背反，曲折迂迴。總的來說：明朝政治的變化滯後於經濟的變化，社會思潮的靈敏度比政治家對改革的認知更是先知先覺<sup>118</sup>。

在這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化劇烈的時代，《皇明十六種小傳》成書的時代背景對本書內容的了解亦形重要，同時《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內容也包含了有明一朝從元末明初到萬曆年間各朝代之人物。因此，本章首先將探討明朝的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等背景，其目的在呈現作品的時代背景於潮流所在，進而能了解作品所呈現的主題、思想、與時代背景相互影響的關係。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本，最早刻于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是江盈科以大理寺正身份恤滇、黔在公務之暇創作的，成書的時間已是一個學術解放的年代，不僅世說體作品興盛，同時野史也大量出現。因此，本論文也將從比較世說體、私修國史的內容、特色及體例著手，試著找出《皇明十六種小傳》其體例及江盈科寫作目的為何。

---

<sup>118</sup>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2

## 第一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成書背景

### 一、《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政治背景

有明一朝，政治治亂循環，治少亂多，到了晚明甚至是更是綱紀廢弛，荒腔走板。政治黑暗、政府失能，導致明代士人在出仕與退離中擺盪。自古中國，士人參與政治時，要實現治國平天下政治理想，有許多因素需要參考：「帝王的賢能或昏庸、制度的合理或荒謬、政壇風氣的清明或黑暗以及個人的出仕入仕的機緣遇合等等問題。」

中國向來有「忠君」的觀念，就政治的實際面而言，皇帝向來是權力中心，掌握臣子生殺大權，然而明朝皇帝中除了寥寥可數尚稱英明的君王如仁宣之治、孝穆中興的守成之君外，絕大部分在歷史上的評價都不高，甚至可以三十年不上朝，長期怠政的君王，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評論：「明之亡，不亡於崇禎，實亡於神宗」<sup>119</sup>，認為明朝的滅亡，萬曆實是政治分水嶺。由他開始一路繼位的皇帝，都令人失望至極，明朝原本治亂起伏的國勢，就一路下滑直至滅亡。

#### (一)、皇帝治國的能力及評價

明朝的政治環境對待文人並不友善，明初隨著政權的穩定，朱元璋開始大肆殺戮功臣官吏，以高壓政策對士人嚴加防範，猜忌擔心，濫施淫威。朱元璋制定了相對於唐律的「大明律」，這部律法對於官吏與功勳貴族的違法行為加強了懲處，他「以猛治國」，動不動以整肅吏政、肅清貪污、大興黨獄、誅殺勳貴功臣，藉以強化專制統治。

隨著朱元璋的去世這樣的情形有所改善，但《大明律》對文人的不友善，有明一朝如影隨形。屈辱的廷杖、恐怖的詔獄壓迫著絕大部分正直賢能的文人，他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局。知識份子的人生經歷與思想情感，也在政治的水深火熱中遭受著漫長而痛苦的煎熬，直至明末始終如此。

---

<sup>119</sup>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廣文書局，卷 35，1992 年 8 月，頁 640

明成祖朱棣篡位登基，不論文治、武功，功績都非常顯著，同時也編纂了《永樂大典》。但即位之初，大殺惠帝親近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儒及其族屬等，方孝儒最後被處死於南京聚寶門外，成祖不僅將方孝儒九族誅盡，甚至還把方孝儒的門生和朋友也算作一族一併予以處死，被殺者高達八百七十三人，因此事投獄和流放充軍者更逾數千。在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四維」《忠類》中的〈方孝儒〉有所記載。「孝孺服斬衰號哭，鎮撫伍雲執以獻。見上，不遜，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及議頒即位詔問誰可草，皆舉孺。乃出之獄中，衰衣人見，號哭不少休。上慰之曰：「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我能滅人九族。」孺曰：「即滅十族，何怕？」乃仍繫獄，并其族朋友門生皆抄沒之，坐死者八百餘人。妻鄭氏及諸子先縊死，孝孺被磔于市。孺學術純正，文章類大蘇，嘗應蜀王聘，號曰正學。所著《周禮考》等書，皆以厲禁不行，惟《遜志齋集》晚出<sup>120</sup>。」

接下來，仁宣二帝穩健明智，志在守成，君臣關係和諧，二帝皆重視內治，整頓吏治，爲了舒緩日漸困苦的百姓生活和摺節費用，對外也停戰撤兵，調整對蒙古交趾政策。歷經六十年，明朝至此完成了文官政治格局，也帶來了一段時期的穩定，社會經濟也逐漸恢復繁榮。

英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掌政，內閣大臣齊心輔佐，國政平順。後來英宗親政，朝政大權落到了宦官王振手裡，肆無忌憚招權納賄、網羅黨羽、排斥異己，國家政治大為敗壞。對外在處理與蒙古的關係過於輕忽導致，最後甚至還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奪門之變」。英宗再復帝位，抗擊瓦剌保衛京城有功的大臣于謙等人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朝政日益敗壞。繼位的明憲宗是位糊塗皇帝，寵幸年長自己 17 歲的侍女萬貴妃、術士和宦官，宦官汪直負責秘密偵伺的內廷機構西廠，搞得天下雞犬不寧，大批賢能之士或被貶逐或罷官或去世。崇佛溺道的憲宗渴求長壽不死，縱情聲色、積貨屯利，政務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外有北方的蒙古韃靼的趁機騷擾，西南大藤峽的起事和因水旱災交替而激起的荊襄地區的百萬流民，內有奸臣當道，西廠橫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貪污剝削，人民處於飢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

<sup>12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方孝儒〉，頁 910

幸好接任的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仁君，在位期間，大力整頓吏治，抑制宦官，不僅吏治清明、任賢使能、勤於務政，同時積極倡導節約、與民休息，是明代歷史上少有的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人稱弘治中興。

而接位的明武宗是明代歷史上最為荒唐的皇帝之一，縱情玩樂至死，寵信人稱「八虎」的太監劉瑾等八人，朝政一片黑暗。奸黨橫行，忠良正直之士動輒遭到殺戮，驅逐殆盡。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農民起事及寧王叛亂。

從嘉靖年間開始，明王朝便潛藏著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世宗即位，爲了在尊崇其父母封號問題上與眾朝臣發生衝突，這也就是史稱的「大禮議」案。明朝的言官向來敢言，先前明太祖爲關注民間疾苦，故廣開言路，鼓勵吏民均得上書言事，因此養成士人正直敢言的風氣。明代政府的監察機構位高權重，設置許多規諫言官的職務，初期頗能糾朝政的得失，有關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中葉以後，君主荒於政事，政治開始腐化，其時內閣權力提高，御史大夫遂起而彈劾政府，政府與言官勢成水火，由於言官參差不齊，所以內部已分黨派，甚至彈劾正人君子。最後端賴君權的高壓結束了兩年多的對峙，也再次證明皇上的無上威權。

世宗個性剛愎、猜忌、專橫、暴虐，用人忽賞忽罰，搖擺不定，造成一種諂媚奉迎的政治氣氛，士大夫階層的士氣和骨氣都陷入萎靡不振的狀態。爲了提煉長生不死藥，其荒唐做法不亞於武宗，導致發生「壬寅宮變」<sup>121</sup>。二十餘年不敢回大內，置朝政於不顧，使貪贓枉法的首輔嚴嵩橫行亂政二十年。內政朝綱頹廢、官吏腐敗；外有「南倭北虜」之患、民不聊生之苦，內憂外患，世宗一朝，內閣混亂持續不斷，有識的官員不僅不能爲國出力，甚至慘遭殺戮。另外，世宗一朝在宮內外興建大量宮殿廟宇，不僅加重百姓的負擔，使得國家財政危機愈益深重。

穆宗到神宗初年，穆宗加強對官吏的考察，獎廉吏，罷貪官。推行一系列「安民生、足國用」的措施，而神宗即位之初，倚靠高拱、張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澄清吏治、加強邊防、整頓賦役、開放海禁。使得明朝有著中期最好的形勢。

<sup>121</sup> 壬寅宮變：嘉靖 21 年，世宗住在曹瑞妃宮中，楊金英，蘇川藥等十六名宮女，乘世宗熟睡以黃帶欲勒死世宗，可惜功敗垂成

張居正去世後的萬曆朝，神宗獨掌政權，國家開始崩解腐壞，朝政掌握在太監劉瑾手中。小人當道，君是昏君、臣是庸臣，為了廢長立幼「爭國本」事件長期怠政，無心政務，連郊廟祭祭祀都委人代行，不臨朝政、不批章奏、不補官缺，使得明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幾盡癱瘓<sup>122</sup>。而神宗個人及整個皇室生活卻日益奢侈腐化，除了朝宴夕飲、沉湎酒色外，無比貪婪的神宗和皇室貴族們大肆侵佔土地，以採木、燒造、織造、採辦為名搜刮民財。除不斷從國家財政公庫「傳索帑金」，他還派遣大批的宦官為「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搜刮民財、剝削工商。礦監稅使危害地域極廣，除了直接向民間敲詐勒索外，還侵奪了地方官府的正常稅收。嚴重破壞了城市商業和手工業，這種竭澤而漁，處處與民爭利的稅收政策，引發了百姓的抗稅鬥爭。萬曆末期，民變四起，山東、蘇州等地接連起事，總共爆發了三十多起民變。明朝後期國庫的空虛，農民起義四起，根源於此。

萬曆後期又廢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黷貨、臣下貪汙、黨爭激烈，權臣之間爾虞我詐的狀況更加嚴重。皇帝貪婪好利，影響所及政壇貪賄風氣大盛，御史錢一本曾說：「一遠臣〔地方官〕為近臣〔指京官〕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賄自執政治<sup>123</sup>。」從內閣的權臣、京官到地方官吏，都利用職權，上下通同，巧取豪奪、貪贓受賄已成為一種風氣。大臣不法、小臣不廉，地方官吏貪污掠取更是肆無忌憚。可以說萬曆中後期，皇帝的貪財腐敗導致國庫空虛、民不聊生；長期怠政，導致綱紀廢弛；各級官吏，大多熱中於搜刮金錢，導致政務癱瘓，明王朝滅亡的危機已然形成。

## (二)、宦官亂政

中國歷史上，宦官亂政在中國歷朝代時有所見，但是最為嚴重首推明代。明代多稱宦官為太監，本來太監是內廷官，而明初，明太祖使用宦官，但對宦官控馭極嚴，不僅嚴禁宦官干政，更曾於宮門內立碑云「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sup>124</sup>建文帝嗣位後，對宦官管制更嚴下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後來靖難之變發生，燕師逼江北，曾得到建文朝中宦官密情之助，洩漏朝廷虛實，因此自成祖以後宦官

<sup>122</sup>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334

<sup>123</sup>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338

<sup>124</sup> 《明史》卷304，列傳192《宦官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3月，頁7765

逐漸得勢專政，擅政為禍一直延續到明亡之時。

永樂期間重用宦官，給予出使、專征、監軍、出鎮之權。設置東廠，恢復詔獄與錦衣衛的北鎮輔司，二者同為偵探機密、辦理大獄之單位。它們彼此互相結合，往往凌駕於法律之上，進行緝捕、刑訊、定罪、行刑等權利。這一制度是對國家司法的破壞，各種腐敗因由而生，宣宗時又設立內書堂，培養一批選通文墨的宦官。司禮監地位提高，又取得用硃筆代皇帝批奏章之權（又稱「批紅」）。這本來是皇帝應親筆為之，後來漸漸多由司禮監漸代行。司禮監還負責傳宣諭旨，因此給了宦官日後專權的機會<sup>125</sup>。

英宗時司禮監太監王振擅權專政、肆虐朝野，首開明代宦官亂政之局。王振操縱軍政大權、疏於邊防、收受瓦剌賄賂、私運軍火。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犯明，警報傳至京師，王振好大喜功，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結果被瓦剌所俘，王振亂軍中被殺，官軍死傷者數十萬，史稱為「土木之變」。

景宗繼位，英宗返京，景泰八年初，代宗病重，曹吉祥即與將領石亨，文臣徐有貞等乃發動後稱「奪門之變」，擁英宗復位，殺于謙等。英宗復辟之後，石亨恃功驕橫，部屬親友得官職者四千餘人，內外將領多半炙手可熱。這在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常」《慎類》〈李賢論慎陞賞〉中便曾提及<sup>126</sup>。天順四年（1460年），石亨以圖謀不軌罪被下獄死，曹吉祥不自安，漸蓄異志，與其養子曹欽謀廢立。次年，曹欽領兵攻打宮闈，兵敗被殺，曹吉祥伏誅。是為「曹石之禍」<sup>127</sup>。

憲宗時寵幸宦官汪直，濫用職權屢興大獄，劾罷公卿大臣數十人，民間瑣事多置重法。汪直本人佔田兩萬餘頃，「威勢傾天下」，故傳言「今人但知汪太監而不知有天子<sup>128</sup>。」

武宗登基，宦官為禍日熾，武宗好逸樂，既登位，寵信宦官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稱之「八黨」或「八虎」。他們平日

<sup>125</sup> 《明史》卷 304，列傳 192《宦官一》，頁 7765

<sup>12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賢論慎陞賞〉，頁 973-974

<sup>127</sup> 《明史》卷 304，列傳 192《宦官一》，頁 7774-7776

<sup>128</sup> 《明史》卷 304，列傳 192《汪直》，頁 7778

引導皇帝遊戲淫樂不理朝政，權力實際掌握在劉瑾之首。劉瑾誅殺賢臣正士，杜塞言路正聽，故當時一批佞臣爭相趨附。後來劉瑾因被其他宦官所告發而處死。劉瑾死後，張永等宦官之權勢依然如故，朝政日益敗壞<sup>129</sup>。

面對這些令人失望甚至是絕望的君主及政治現況，想要有理想、有所一番作為的臣子打從心裡的「忠君」，對政治保持高度熱情實在有困難。皇帝如此昏暈、政治如此腐敗，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漸漸失去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患與現實政治的熱情，他們對政治與仕途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與希望，甚至於為了躲避捲入權黨之爭的迫害，紛紛逃離官場與政治的危險，走向內心世界的反思與世俗生活的享受。

## 二、《皇明十六種小傳》的社會背景

歷經了元代長期動亂，朱元璋於應天稱帝，國號大明。朱元璋認為重建強大而統一的國家，必須極度中央集權而適度分權於的地方，他一心一意想要建構一個和諧秩序、簡樸守禮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理想國度藍圖裡，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安土重遷、恆久不變，他實行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恢復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他對中央和地方官制都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奠定了明朝的基本政治框架，設置三司，互不統屬，分別聽命於中央；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廢中書省及丞相，自統六部、集中皇權；建立黃冊制度、丈量土地、編製魚鱗圖冊，控制權全國人力財賦；鼓勵農桑、興修水利、減輕租賦、與民休息，也奠定經濟恢復的基礎，而這一系列的政制擬定也維繫了兩百多年的國祚。<sup>130</sup>

朱元璋出生貧窮的佃農之家，明瞭百姓的痛苦，即位之後，招撫流亡，開荒擴土、興修水利、免租減稅、嚴懲貪污，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他立法保護佃農的權利，也利用戰亂時土地拋荒，地主經濟受到削弱的時機，立法否定舊地主對拋荒田地的所有權，把丁口多少和開荒能力做為佔墾荒地的指標，大力鼓勵自耕小農經濟，使大量無地的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明初三十年，全國的荒地大多變成良田，明初非常重視對興修水利，朱元璋在全國進行大規模水利興修工程，因為水利的廣泛興修，增強對自然災害的抵禦，提高了農作物的產明代中期，大規模的農業開發大抵

<sup>129</sup> 《明史》卷 304，列傳 192《劉瑾》，頁 7786

<sup>130</sup> 《明史》卷一，本紀第一《太祖一》，頁 1



結束，農業建設也完成一個穩固的基礎。

明朝皇帝對交通都十分重視，朱元璋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驛站，並大規模修路。到了明朝中後期，陸路交通已十分發達，京杭大運行的利用也十分頻繁，陸路交通發達之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為明代商業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也帶動了明代後期城市發展。人口大量增加，社會經濟也有了穩固發展，改善了百姓生活、安定了社會秩序，也鞏固了政權，穩固了經濟發展，也為隨之而來的商品經濟打下良好的基礎<sup>131</sup>。

穆宗到神宗初年，倚靠高拱、張居正等大臣鼎力相助，實行新改革除弊端。不僅積極澄清吏治、加強邊防、整頓賦役，更推行一系列「安民生、足國用」的措施。張居正於穆宗時就曾提出省議論、重詔令、析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事」，這也是他改革的政綱，是影響明朝最大也是最受後人關注的一次改革運動，尤其在整頓吏治和改善財政得到最大的效果。

在內政方面，他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萬曆元年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敘，大大提高對官僚素養和效率。在經濟上，為了穩定稅源，推行一條鞭法，改革賦役制度，清丈全國土地，抑制勳貴、縉紳漏稅，經過這些整頓，國家財政迅速好轉。軍事上，張居正落實邊務，且知人善任、授權邊將，增加軍事實力，安定北邊防務、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來平定東南沿海多年倭患，對海外貿易政策因此奠定了基礎。這段時期經濟發展十分迅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達到空前繁榮。以江南為中心興起大批的工商業市鎮。社會生活也出現極奢侈的風氣，呈現出明代中葉以來最好的形式<sup>132</sup>。

綜合前述，農村經濟的復甦、農業建設完成、交通建設的底定、水利工程的興建，建立了牢固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穩定初期經濟發展，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社會秩序穩定及農業生產技術明顯進步，糧食產量也大幅提高，農業從單一經營走向多種經營，生產量的提高造成了造就成剩餘農產品經常性的通流，也造成貿易的流

<sup>131</sup> 《明史》卷 83，志 59《河渠一》，頁 2013-2174

<sup>132</sup> 《明史》卷 213，列傳 101《張居正》，頁 5643

通，也促成了農產及商品生產與消費從地區擴展到全國性的商業網路<sup>133</sup>。

明朝中葉最令人矚目的手工業有礦冶、紡織、造船、陶瓷等。這些行業為經營者帶來大量財富。明初沿襲元朝官屬世襲工匠制度，但調整了服役制度，工匠獲得更多營業的時間和自由，手工業在平衡的政局有著長足的發展。

明初鼓勵種植桑麻、栽棉紡布，明代中後期，棉花的種植不僅僅是家庭紡織業原料供自家使用，當時在松江、嘉定從事棉作已完全壓倒稻作，成為主要農業作物，製成銷往市場的產品，棉花加工業亦十分興隆。

江南地區絲織業也同樣發達，南京、蘇州、杭州都是重鎮；浙江四川的蠶桑業亦是發達。明朝中後期的農業從單一經營朝多元經濟發展，不但改變農業生產作物種類，也帶動新興經濟作物因應而生。明代中葉紡織業已發展成專業性的商品生產，也促成一批如吳江縣、嘉興等絲織業市鎮的迅速形成。

明代造紙業的發展，已達成手工造紙的巔峰，廣泛存在南北方，尤其以南方為盛。明代紙張類別眾多，製造品質也非常精良。造紙業的發展為印刷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從農業經濟技術進步、商品經濟的欣欣向榮、手工業的繁榮，造就當時的明朝商業空前繁榮。明代中葉以後，商業經營者遍布全國以及海外，江南地區、東南沿海和運河沿岸地區都是商人聚集的地方。隨著商品性農業發展，手工業朝精緻化走去，專業分工愈細，當時已有數量眾多專業的工坊，專門的營業賣店、專屬的銷售通路，商業經濟貿易往來愈盛，商人活動範圍和經營規模越來越大，出現不少富商大賈。

明代初期，官定貨幣為銅錢和紙鈔，進入明朝中期，原本被禁用的白銀異軍突起，成為主要貨幣，銅幣已是輔助性貨幣，紙鈔逐漸廢棄。商品出口將日本與西班牙的白銀吸引到中國市場，明朝經濟的繁榮運轉，成為當時世界國勢最強大的國家。財富積聚深深影響著社會及文化層面，不僅商人地位大為提升，百姓生活富庶，許

---

<sup>133</sup>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249

多城市熱鬧繁華的景象，已有如現代化都會的雛形，社會形成一股追求時尚奢華的風氣，對生活品味的要求也隨之提高，奢華轉高雅的趨向也逐漸發展。

明初朱元璋對商業的態度還是承繼了歷代的重農抑商的政策，規定商賈之家不准穿細紗之服，雖然在社會地位予以貶抑，但卻又認為商人可以「通有無」，不僅民間需要，官府也需要商人為其服務，主張給於商人一定的社會地位，建立一套制度以圖把商業置於政府的全國面控制之下。但晚明因為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帶動城市的發展，又帶動官商的合流。萬曆年實施一條鞭法，商人終於有了自己的戶籍，商人子弟才有資格參加科舉，成為「士」。萬曆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那時，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都是商人出身。商賈的地位不受歧視，與儒生漸漸相提並論。

「士商相混」的情形已漸漸明顯，尤其是具有商人背景的太學生在明代中、晚期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勢力，他們處處於士與商之間，加速了兩者的合流。自古學而優而仕，晚明大有士而優則商的趨勢。商人的勢力並不僅僅表現在官商一體化及官商爭鬥中，商人的生活方式及經營方向也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也是晚明出現社會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朝社會經濟獲得新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發展和城市商業的繁榮造就了富有活力的市民階級，與之相應的是文學的興盛及其印刷出版業的發達，除了官方大量出版儒家經典，民間印書也很普遍。<sup>134</sup>商業的發展促成書籍的出版，圖書出版業的發達是文學普及最直接的產物，主要根源於廣大的讀者群，市場需求量大。明代由於民眾識字率較高，而明中晚期江南地區的經濟繁榮，民間社會有餘力消費書籍這類文化商品，閱讀大眾的基礎益形豐厚，經濟的發展以及流行作家的出現，與書籍商品的大量生產成為相互推動成長的重要力量。

印刷業的興盛，也造成許多人在生前就將自己的著作陸續出版，而不是等死後由他們的門徒或後代集中印行，文人著作的出版蔚為風氣。印刷業的興盛，書籍取得越來越容易，同時也帶來了大量資訊，即使朝廷的禁書亦如此，李贄的著作的查禁，在他生前死後都大為流傳，市場的需求、商業性刻印書籍使得禁書成為不可能。

---

<sup>134</sup> 黃燕生《古代藏書漢藏書樓一天祿琳瑯》，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6月，頁95。

印刷術的進步，使得大量的資訊流通於明朝社會，已成為明朝政府無法抵擋與控制的潮流。

### 三、《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文學背景

中國思想發展到明朝，儒、道、佛及各家各派的思想交會融合，已有一定程度的參雜互通。官方的政策，結合八股取士，儒家思想、程朱之學，即物窮理為學道功夫成為王朝的正統思想。然而皇室的荒誕行事、政壇官員的傾軋鬥爭，整個社會逐漸失去儒學道德精神。僵化的禮儀道德和荒唐的朝廷作為加深與實際面的落差。受著傳統儒學訓練的知識份子感到巨大的焦慮與疑懼，在令人失望的年代，面對不確定的未來，知識分子們心情矛盾複雜、徬徨無依，王陽明心學一出，為他們開了另一條具生命力的活潑開闊的思想之路。隨著不可逆轉之勢，重視生命主體存在的泰州學派、李贄的童心說、禪學思想對晚明讀書人意識形態產生另一股激烈的變化。

明代自成化，弘治以前，在思想領域形成了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他們的哲學最高範疇是「理」。「天下物可以理昭，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他們認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它包括無物虛無的理，又包括社會上的孝、悌、忠、信都是「理」所規定的。因此明代帝王每每以此作為穩固政權，禁錮束縛士人思想的武器，要求士人壓抑個人欲望的追求而絕對服從於王權的統治。然而自成化至正德年間，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的荒淫、腐敗，世人對王權統治漸漸產生不滿同時也對中興美夢幻滅，隨之而來的是對僵滯、壓抑的理學的反叛和對個人情感的宣洩。

明代中期最主要的影響是心學崛起，先驅人物是陳憲章提出「一心」的觀念，提倡以自然為宗的為學宗旨。真正引領風潮的是王守仁的心學「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明代中期許多人對陳腐的程朱之學早已厭煩，心學一出，人們彷彿撥雲見日，見到了未來。王學從此成為門徒遍天下，流傳百年的顯學。

王陽明的心學確實動搖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在學術界產生具有積極精神，反抗傳統追求個性的哲學思想，雖然八股文的形式未廢，但明人的思想不再單調沉寂。因此許多人紛紛拋棄程朱理學轉而追求王氏心學，心學鋒芒漸漸蓋過程朱理學，成為晚明時期的社會主導思潮。

王陽明去世後，學說繼續傳衍各地。然各家主張有所異同，互有爭論，時見分歧。晚明時期以王艮的泰州學派和王畿的浙江學派最盛，尤其泰州學派。

王艮雖繼承王陽明之說，在學習過程卻「時時不滿師說」、「往往凌駕師說之上」，提出一些獨創性的看法：「百姓日用即道」和「淮南格物」及「尊身」等思想。他從王學出發，提出「百姓日用之學」，認為：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sup>135</sup>。」

「道」與百姓穿衣吃飯等日常生活相聯繫，「道」是聖人與人人共學。而「格物」是以「安身立本」為核心，指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還進一步強調「尊身即學」的絕對個人價值和平等價值。

王艮的理論與講學當時已在民間深植，大型的「講會」十分盛行，深深影響士人階級。王艮去世後，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還有王艮之子王襞及徐樾、顏山農、羅汝芳、李卓吾、何心隱等，都是具有鮮明異端性格的思想家。

其中，李贄是明朝思想最大的反派者，終其一身走在「求道」的路上，悲劇以終。他對王陽明甚為推崇，更拜王艮之子王襞為師，對泰州學派的羅汝芳、何心隱及浙中學派的王畿也都很尊敬。李贄不僅繼承泰州學派的思想觀念和叛逆精神，同時也受到王畿、羅汝芳思想的一些影響，融合創新成為一位特立獨行著名思想家。

李贄生活的時代，專制而腐敗的政治，充斥著身披儒服，行若狗彘的庸俗小儒。對於性好高潔的李贄而言，明代那種沒有生命真實的氣息，無處不存在的「偽道學」，是很難忍受的。正因為他極度厭惡假道學，李贄在發出了回到童年，回到本初狀態的呼喊，李贄提出「童心說」：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也。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

---

<sup>135</sup> 龔傑《王艮評傳》，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0-74

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sup>136</sup>。

他認為人們一生下來，都具有「童心」，這就是一種未曾受過汙染和侵蝕的天真、真誠、純樸的精神狀態。強調「童心」是「絕假純真」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強調順應本真之性率性而為。追求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人生境界，追求個性的獨立和自由。

李贄與王陽明都高倡個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精神，但他們所言的「心」又有所不同：王守仁主張「心即理」，力圖將倫理置於個人的主體之中，成為主體的自覺的活動；李贄則主張心非理，反對用倫理來規範個人的主體，而保持主體的純真、自由的本性。

李贄認為「民情之所欲」即為「至善」，「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期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sup>137</sup>」自私乃是人的天性。李贄的種種言論，在當代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在世俗和統治者的眼中，他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妖人」。萬曆三十年，李贄被戴上「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入獄。當時他已七十歲，最後在獄中自刎。然而，李贄在晚明知識分子中影響力已經很大，即便是種種傳聞，也未影響他在當世的思想 and 人格的魅力。他的著作《焚書》、《說書》、《藏書》風行江南，即使被朝廷列為禁書，他的書籍還是盛傳於世。他的思想和人格對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他慘烈的死亡也昭示著文人的離經叛道是多麼容易招致殺身之禍。

此外，樂好參佛的風氣對晚明文學的創作與欣賞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大陸學者羅筠筠認為「參佛所謂的『悟』，具備有直覺性與非理性的特點，而這一點同藝術創作與欣賞中的心理過程有某種共同之處。……影響了晚明小品創作的趣味與風格，使晚明小品呈現出空靈、趣、幽、淡等審美情趣<sup>138</sup>。」

明代的知識份子對佛教的接觸與了解十分密切，士僧結社，明初已有，如雲印詩社、閩中詩社，史家陳援庵指出：「萬曆而後，禪風寢盛，士大夫無不談禪，僧亦

<sup>136</sup> 李贄《焚書／續焚書》卷三，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5月，頁98~99。

<sup>137</sup> 李贄《藏書》卷二四〈德業儒臣後論〉，台北：學生書局，1986年6月，頁544。

<sup>138</sup> 羅筠筠《靈與趣-晚明小品文美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41~151。

無不欲與士大夫結納。<sup>139</sup>」對晚明人士產生兩種影響，一是形成所謂的狂禪思潮，二是在晚明士人中形成了一股禪悅之風。

晚明佛教興盛之地，如江浙閩贛等地區，同時也使王陽明良知心學產生廣泛影響，陽明後學分化與流變的區域。「狂禪」指晚明心學學者某些激進的思想家，那種禪儒混雜的思想及狀態，尤其以泰州學派為主流。趙偉先生在《晚明狂潮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經過考證認為「狂禪」的本意是程朱學者對王學左派中那些行為與學說都十分「狂」的學者的稱呼。他認為晚明鼓倡「狂禪」者是一個群體，如王艮、顏鈞、羅汝芳、焦紘、李贄及袁宏道等人。在這種情況下，處於「狂禪」之風下的人數眾多，地域分布廣泛，可稱之為狂禪思潮。狂禪派文人吸取了禪宗的反叛傳統的精神，在思想上破除程朱僵化教條的禁錮。在文學理論上提出了不依傍古人的主張，以求「真」作為文學創作的中心。狂禪思潮這種思想和品格通過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表現出來，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sup>140</sup>。

另一方面晚明士大夫深受禪悅之風的影響，在結社論學、遊山玩水的同時往往也喜歡靜坐禪榻上談經論佛。袁中道之《珂雪齋前集》於〈潘去華尚寶傳〉說「至則聚譚，或游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見，或靜坐禪榻、或作詩，至日暮始歸。<sup>141</sup>」可見一斑。另外因為「禪學」與「心學」一樣重視所謂「心」的本體，而對戒持修行等佛教清規戒律的淡化，更契合了晚明文人渴望自由、追求享受的心理。晚明大多文人潛心於禪佛與道學的修養中，藉以陶冶心靈。根據何宗美先生的考證，袁宗道於萬曆十六年與憨山大師與諸交友於京師舉辦的龍華會及後來結成了諸如葡萄社、香光社、清蓮社等社團，推進了京師的禪學風氣，進而促進文學與禪學的融合<sup>142</sup>。當時與僧人交往密切的如公安派的「三袁」兄弟及江盈科、陶望齡等文人領袖，及當時結社的成員如董其昌、唐文獻、瞿汝稷、吳用先都是公安派的盟友。他們不但熱衷於佛道的信仰，而且常與禪師道人交往，參禪問道，在禪道宗教心性學說的影響下，許多文人在詩中也大談「性靈」之論，並且形成了棄仕歸隱、悠游山水、賞風吟月的審美情趣。

<sup>139</sup> 陳援庵《明季滇黔佛教考》，台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年，頁129。

<sup>140</sup> 趙偉《晚明狂潮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7年11月，頁21

<sup>141</sup> 袁中道《珂雪齋前傳》卷一，〈潘去華尚寶傳〉，上海：新華書局，2007年9月，頁728。

<sup>142</sup> 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頁388-9

明代文人結社的風氣盛行，一般文人雅士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定盟結社，或十日一會，或月一尋盟，每每在風景優美的山水勝地或清幽園林吟詠詩文、酬唱應和。既有朋友相契之樂，又有砥礪詩文的作用這種詩酒酬唱的文士聚會。根據何宗美在《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一書考證指出元末至崇禎結社個案有 681 例，其中隆慶、萬曆年間二二四例，隨著考證工作的深入，明代文人結社在數量上在還將有增無減，明中後期文人結社的興盛情況超乎人們想像<sup>143</sup>。

有關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演進有以下三點領域：一、參加結社幾乎是明代文人的共同經驗，二、文人結社影響明代各體文學，三、文人結社的地域特徵非常突出。因此文人結社影響明代文學至為深廣<sup>144</sup>。

從元末至清初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大多數都加入結社活動。文人結社影響明代散文是多方面的，明代文學流派如台閣體、復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結社活動十分活躍，社友間作序跋、尺牘往來、同遊山水寫作遊記、文章的品評、古文時文的辯論，這類結社產物的社團散文，在明代散文中也有相當數量和地位。

文人結社因文化地緣的差異則形成各地不同的地域性文學，我們從中可以了解明代文學主要的活動中心、了解城市文化和社群文化的特徵。例如萬曆十六年至三十年湖廣地區文人結社發展迅速，主要是公安派的袁氏兄弟、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先後興起，引領風潮，湖廣地區成為明代後期文學新興力量最強勁的地區。結社之初，多是志趣相投，原為小型聚會，後來逐漸有大的結社出現，社盟的主張與影響力也逐漸累積，漸漸影響到政治、思想、文化、藝術、學術、科舉等多方面。

---

<sup>143</sup> 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頁9

<sup>144</sup> 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頁21-24



## 第二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文體與體例分析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小傳》自序中曾就該書的編輯體例和意圖作了闡釋：

《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輯其語而為之傳，匯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奸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謂之國史中雜劇，不亦可乎<sup>145</sup>？

可見其取材皆於國史之中，另外在《四庫全書》之中，江盈科的這部作品是被收入在史部存目中傳記類，其著錄為《明十六種小傳》四卷，僅去一「皇」字而已。

《皇明十六小傳》書前有鄧原岳序，文云：

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慕說古哲，灑灑不休，暇則采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成者，不率仿《世說》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之。<sup>146</sup>

後之學者便多以《皇明十六種小傳》為世說體之體例認知。然考證歷來對於晚明世說體之研究，卻未發現有將此書列入世說體的研究範疇之內。那麼到底《皇明十六種小傳》該歸類為何種文體，一直未被確定。因此，辨明其體例將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此書其內容所要呈現的真正意涵。

### 一、《皇明十六種小傳》與明代野史關係

中國很早就把歷史的撰寫權和解釋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傳統的歷史意識一直是由官方主導，而經學的價值體系就是官方價值體系的化身；反之，官方意識是經學價值的實踐。可以說，一部中國史學發展史實際上是史學自主意識與官方意識之間的抗拒與妥協的過程。

廖瑞銘曾指出先秦時代由史官記錄政事，其史學意識以官方為主，只有官史。

<sup>14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頁 904

<sup>14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頁 903

孔子據《魯史》作《春秋》，一般認為是私人作史的開端，嚴格說，是經而不是史。班固的《漢書》雖亦為私撰，但是全書充滿官方意識，也只能算是官史作品。朝廷一直掌握著歷史的撰寫權和解釋權。待漢末社會解體，經學衰微，儒家思想失去原有的權威地位，官方意識無法約束社會思潮，史學便趁機從經學中解脫出來。不但「史學」的性質發生變化，不再只是經學（官學）的一部份，著作的形式也得以解放，出現許多新的著作形式，著作本質（內容）也發生轉變。隋文帝開始禁止私撰國史。唐初，史館制度建立，史學再度被官方收編，官史又成為主流<sup>147</sup>。中國官史意識的發展隨著唐朝史館制度的完備被制度化了，「正史」的權威性於是建立。相對的，正史之外的史書不是被輕視，就是被趕出史學的範疇。

中國傳統史學將史書分為正史與野史兩大類，正史是官方修纂或欽定的史書，而野史是民間修撰的作品。包括具備史書體例的私史及毫無體例的筆記小說。不管私史或是筆記小說都僅是供修撰正史時採擇的參考，本身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很多筆記小說甚至不能與史學之列。謝國禎曾說：「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學士以及貧士寒儒所寫的歷史紀聞，都可以是野史筆記，也可以說是稗乘雜家。」<sup>148</sup>

中國上古時代，朝廷設有專人到民間採集風俗民情，叫「稗官」，「稗官野史」自古連稱，其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沒有什麼固定的形式，大部分是以筆記雜聞的形式記載，而筆記又常常與小說混淆，結果，野史、筆記、小說三者的界線變的很模糊。其實，三者還是有其個別的差異與意義。

對於筆記之界定，今人劉葉秋曾在《歷代筆記概述》一書中將筆記分為三大類：第一是小說故事類：凡志怪、軼事小說，從晉干寶的《搜神記》、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到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王昶的《今世說》等，都屬於這一類。第二類是歷史瑣聞類：凡記野史、談掌故、輯文獻的雜錄、叢談，從晉人偽託漢劉歆的《西京雜記》、唐劉餗的《隋唐嘉話》、李綽的《尚書故實》到清王士禎的《池北偶談》、褚人穫的《堅瓠集》等，都屬於這一類。第三類是考據辨證類：凡讀書隨筆、

<sup>147</sup> 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 第 19 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2

<sup>148</sup> 謝國禎〈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一版，頁 37

札記皆屬之，從晉崔豹的《古今注》、唐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戴埴的《鼠璞》等到清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孫詒讓的《札迻》，都屬於這一類<sup>149</sup>。

明代胡應麟對於小說範疇的分類最具代表性，其文云：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訂：《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范》、《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sup>150</sup>。

這六類除傳奇、箴規外，都屬筆記範圍。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小說家類與雜史類作了更清楚地分別。對雜史的定義是：

雜史之目，肇於《隋書》。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衆體，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遺記》、《汲冢璣語》，得與魏尚書《梁實錄》並列，不爲嫌也。然既繫史名，事殊小說，著書有體，焉可無分。今仍用舊文，立此一類，凡所著錄，則務示別裁。大抵取其事繫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云爾。若夫語神怪、供談啁、里巷瑣言、稗官所述，則別有雜家、小說家存焉。<sup>151</sup>

歸納以上要點，《皇明十六種小傳》在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中可被歸類為第二類歷史瑣聞類；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可被歸類為雜錄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從「其事繫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

<sup>149</sup>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7月，頁3~4

<sup>150</sup>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5月再版，頁374。

<sup>151</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一，史部雜史類小序。

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云爾」條件中，可認為其該歸於雜史，惟因其內容多涉有鬼神之事。以「至於語神怪、供談啁、里巷瑣言、稗官所述」則可劃入小說家。

然而，小說與雜史筆記向來就有重疊的部分，其中的分別，端看書目分類者的見解，沒有一定的共識。筆記、小說與歷史三者就歷史記事的角度看，是很難分別的，但是在傳統史學家眼中，它們是各有定位的。歷史被視為實錄，而且有體例、有章法，具有最高義理價值，筆記和小說僅歷史的附庸，不但真實性不可靠，而且沒有體例、沒有章法，難與於正統史書之列。而其中筆記又比小說更具有史學地位，因為它的內容寬廣，不僅可以記實、可以考據，也可以做史事評述，史料價值較高。中國野史的概念與筆記小說的概念是重疊的。

而江盈科所處的明代由私家撰著的有關本朝歷史的著作，這種史著在明代大量湧現，當時即引起重視。明代究有多少野史，至今已難作出確切統計，自清初，人們常以「汗牛充棟」形容其數量之多。《明通鑒》義例有曰：「明人野史，汗牛充棟。<sup>152</sup>」今人謝國楨甚至據此稱「有明一代，史學最盛<sup>153</sup>。」

謝國楨曾將明清筆記分做七個階段，明代的部份有元末明初、洪武到宣德、嘉靖以來、明末清初等四個階段。謝氏說由洪武到宣德經過六、七十年來的休生養息，農工事業恢復生產，經濟逐步繁榮，加上宣德帝為人寬恕，長於文學、繪事，對於明代的文學藝術、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野史筆記逐漸出現<sup>154</sup>。嘉靖以後，在思想界，由白沙至陽明，已衝破程朱學的藩籬，文學界則發展出自由適性的風格。除了政治禁忌解除，文化環境轉變外，最重要的是商品經濟的持續發展，刻書業興盛帶動了書刊的流通，私人藏書風氣普遍。這些條件促成嘉靖，隆慶年間，掌故筆記蓬勃發展。另外，明代中期的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也激起了當代人敘寫當代史的風潮。由於社會繁榮、人才輩出，士人留心當時有明一代的歷史，野史筆記作品叢出，是明代野史筆記最盛的時期。

<sup>152</sup> 夏燮《明通鑒》，台北：西南書局，1982年1月初版

<sup>153</sup>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卷首自序

<sup>154</sup>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月，頁85-93。

萬曆朝之後，除了張居正當權努力變革的幾年中，朝政有明顯好轉以外，整個明代國力是明顯在走下坡。時局一天比一天敗壞，士大夫們力挽狂瀾之心更迫切，經世致用思想再度抬頭，同時也明顯反映在歷史意識及史學活動上。萬曆年間兩項官史的編纂，一項是萬曆十五年（1587）完成的重修《大明會典》、一項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陳于陸負責主持的《國朝正史》，帶動了修撰國史的風潮，這其中參與修史的主要人員之中亦包含了江盈科的好朋友黃輝、焦竑等人。另外，嘉靖十三年及萬曆十六年（1588）有兩次重錄各朝實錄的工作，使實錄資料因學者能夠私抄而得以輾轉流入民間。官方史料大量流入民間，不僅提供撰史者徵實參考，同時也讓野史由傳聞進而有官史核實之水準。其中沈德符《萬曆野獲編》34卷，內容包括明代歷朝史蹟，而以萬曆時期為主，分門別類，條理井然，所載史料豐富而有根據，朱彝尊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私史。

編纂名人、名臣事略，宋元以來已盛，明代續其風。明代人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地方人士；從編纂歷代名人傳到本朝名人傳記集、名臣言行錄，作品極為豐富、龐雜，值得重視。中國的正史中，以列傳佔最大篇幅，基於留名意識及懲惡罰善的要求，這些傳記的主要目的是除了對死者表示尊敬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他們的一生下結論。明代的傳記作品也負有這個目的，有其社會功能。此外，明代刻書業的發達，不但個人文集的刊行成風，還刊印許多大部頭的叢書，野史筆記發展到明代中葉，已經累積到一定的數量，於是有野史叢書的刊印，成為明代野史學的一項特色。明代野史從前期零星掌故筆記，到中期集筆記撰成當代全史，到進一步輯錄掌故筆記、野史著作，刊行野史叢書，這種發展軌跡隱然可見。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最早刻于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是江盈科以大理寺正身份恤滇、黔在公務之暇創作的，從其士宦及交游歷程上來推斷，加以自序所言：「《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考究其中所述之人物絕大部分在明史列傳之中除少數幾位之外皆有其傳文，江盈科寫作此書所能得到之參考資料，除了自身多年仕宦，輾轉經歷各地努力蒐集之外，加上前面提及參與修史的好朋友黃輝、焦竑等人的協助之下，自是非常豐富，益更能貼近史實。

## 二、《皇明十六種小傳》與世說體關係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一部志人小說，在雜記體的基礎上，自成一體。它篇幅短小、語言簡約、體例靈活。《世說新語》共三十六門，具體分類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這部作品以人的內在才性、品德、氣質等方面的分類體制、刻畫人物以形征神的審美特徵，體現了時代風貌和作者自己的審美情趣，有著獨到的特徵和審美內涵。作為一部影響深遠的古典文學名著，《世說新語》自其成書後，就成了眾多士子的案頭必備藏書，不僅自身流傳不衰，而且吸引了歷代文人對其進行閱讀、評點、改編，同時還以其不可抗拒的藝術力量影響了後世的文言小說創作，出現了一大批模仿《世說新語》而作的「世說體」小說。

「世說體」之名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體」即指編撰體例。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裏著錄宋人王讜編撰的《唐語林》時就曾說：「未詳撰人，效《世說新語》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sup>155</sup>」。民國初年魯迅於其《中國小說史略》曾對後世仿《世說新語》之作品，提出看法：

至於《世說》一流，仿者尤眾，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見《唐志》，然據《隋志》，則殆即所注臨川書。唐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見《新唐志》雜家，今佚），宋有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世說新語》、焦竑《類林》及《玉堂叢語》、張壙《廿一史識餘》、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為之不已。至於清，又有梁維樞作《玉劍尊聞》、吳肅公作《明語林》、章撫功作《漢世說》、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晔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而惠棟為之補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說》<sup>156</sup>。

將《世說新語》及其仿作稱為「世說體」的說法始自寧稼雨。寧氏在其《中國

<sup>155</sup>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59

<sup>156</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2-53

志人小說史》中將「世說體」定義為：

志人小說應該包括逸事和瑣言這兩部份文言筆記小說。……逸事小說中的非小說成分要多於瑣言小說……瑣言小說多模仿《世說新語》以類相從的體例，以記載文人事跡為主，是《世說新語》的附庸和餘波；逸事小說在形式上則追隨《西京雜記》，不分門類，只分卷次。內容龐雜，只收錄閭巷傳聞，野史故事為主。為方便起見，這兩類分別稱為「世說體」和「雜記體」<sup>157</sup>。

其定義是為了區分志人文言筆記小說中，內容分別偏重「逸事」或「瑣言」的小說。

從傳播學角度來說，「世說體」小說的作者首先都是《世說新語》的接受，他們從《世說新語》中汲取豐富的養料，借鑒其寫作技巧進行再創作。因此，仿書本身既是傳播的產物，同時又參與到小說傳播的進程中來。明清時期「世說體」小說的興盛充分證明了《世說新語》在這一期廣泛傳播的影響。因此，對「世說體」小說的研究也是《世說新語》傳播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世說新語》跟後世仿《世說新語》之所謂「世說體」小說，隨著時代的不同，其結構特點及敘事內容是否也有所變化，似乎需要來加以界定。因此，筆者將就《世說新語》的門類安排與「晚明世說體」的體例變化來加以說明，試著從中來探討與《皇明十六種小傳》體裁的關連性。

### （一）《世說新語》門類安排所展現的意旨

王能憲在他的《世說新語研究》一書中就曾說明《世說新語》三十六門的設立，充分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此乃編撰者藉以表達其用心之所在，而其三十六門目名稱與前後次第的安排，他認為有以下幾點可以注意：其一、孔門四科的突出地位，其二、三十六門與人物品題之風的關係，其三、各門內容多寡懸殊，其四、各門排列先後有序<sup>158</sup>。

關於第一點「孔門四科的突出地位」，《世說》首冠「孔門四科（德行、言語、

<sup>157</sup> 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9-10。

<sup>158</sup>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1

政事、文學)」並佔有整整一卷的篇幅，將及全書的三分之一。早已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傅錫王先生認為：「《世說新語》之首四篇，實為全書之中心思想，亦即所謂的本體論者也。而其他三十二篇均循此主體而演繹之，或可目為批評論<sup>159</sup>。」這樣的論述，皆認為儒家思想乃《世說新語》的中心主軸，然而細觀全書，雖也有尊崇孔聖與標榜儒家忠、孝、仁、愛思想內容，但考察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以儒學居首。生當元嘉之世的皇室貴族劉義慶在其所編《世說》中列孔門四科，顯然體現了劉宋統治集團尊孔崇儒的思想。然而，《世說》有崇儒思想，並不等於《世說》的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我們發現，《世說新語》一書的內容其實頗為複雜，即使在首列的孔門四科中，亦有不少談玄論道，違反儒家倫常觀念的文字，如「文學」門第十八則，「言語」門第二十八則。此外，在其他的門類中，亦有蔑視禮教、違背綱常的記錄。

由上可知，《世說新語》的思想並不限於儒家思想，而是兼有儒、道、佛三家。誠如余英時所言：「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其人則大抵為尊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sup>160</sup>。」

第二點「三十六門與人物題之風的關係」，這也就是《世說新語》分類的依據為何。唐君毅以才性發展的角度出發，於人的才德、性情之層面著眼，對於《世說新語》的性質與目的，較能有相當程度的澄清<sup>161</sup>。他以為，緣於魏晉時期個人自覺意識的發展，不但縱容自己任氣使才，各適其志，同時也試圖對這些才性和氣性的展現，進行細密的區辨與類分。筆者以為，這當與魏晉人物題之風有很大的關係，蓋自東漢以來，人物題鑑之風在政治實用目的下形成，因而劉劭《人物志》在此情形下應運而生，到了曹魏時代，實行「九品中正制」，助長了世族階層的形成，其時的人物題，仍與現實政治息息相關。但到了晉代，人物題失去了政治作用，而一些名士為了保身遠禍，改清議為清談，此時的人物題風氣便轉而往審美效用的方向發展。

<sup>159</sup> 傅錫王（《世說》四科對論語四科的因襲與嬗變（《世說新語》題旨探微之一），《淡江學報》，第12期，1974年3月，頁101

<sup>160</sup>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98-399

<sup>161</sup>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142。



第三點「各門內容多寡懸殊」，《世說》三十六門中，一百則以上的〈言語〉、〈文學〉、〈賞譽〉三門，最能代表《世說》的特色。〈言語〉門以記載清談為主、〈文學〉門以記載玄學為主、〈賞譽〉門以記載人物品題為主，這些都是魏晉名士風流的主要內容，最能反映時代特質。二十則以上的諸門，則從不同方面更為廣泛地反映了魏晉時代的道德觀念和士人風尚。〈德行〉、〈政事〉、〈方正〉、〈規箴〉、〈賢媛〉等門，反映了當時儒家道德觀念諸如仁愛、忠恕、孝友、廉正、剛直、賢淑等等依為世人所尊奉；〈雅量〉、〈識鑒〉、〈品藻〉、〈容止〉、〈任傲〉、〈排調〉、〈輕詡〉等門類，多側面、多角度地反映了魏晉士任誕放達的生活作風，是〈言語〉、〈文學〉、〈賞譽〉等門的生動補充。以上十五門是全書的主體部分，約占五分之四篇幅。其餘的二十一門，類目雖多，但所占比重極小。這二十一門的內容較為複雜，多數為魏晉風流的進一步補充，但也有反映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總之，《世說》諸門內容的多寡是以能否表現魏晉時代精神為準則的，換言之，即是魏晉時代精神決定了《世說》諸門的多寡。

第四點「各門排列先後有序」，王能憲以為：「三十六門的先後次序不是任意安排，總的來說，是「前褒後貶，漸次遞降<sup>162</sup>。」這樣的看法，和范子燁在《世說新語》書中的〈導言〉中所說：「各門的排列大致遵從由褒到貶的次序：褒在前，貶居後，愈往前愈褒，越往後越貶<sup>163</sup>。」二者應為一致，皆立基於《世說》乃以人物品題和鑑賞為視點而分門別類。就類目間的次第安排而言，其以孔門四科居首，目的當在以之為本源，呈示當時才性、氣性分化之所從出，其後諸類目之間的銜接次第，雖然很難說一定有緊密關聯，但大體上應是依循「由德性而才性、氣性，由正面而負面」的原則予以鋪排。」這樣的論述，當更能彰顯《世說新語》門類前後次第安排的意義。

## （二）「晚明世說體」的體例變化

近之學者對於「世說體」的定義研究者越來越多，臺灣的研究方面，蔡麗玲在其學位論文中提出「晚明世說體著作」的定義：

<sup>162</sup>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4

<sup>163</sup> 〔南朝宋〕劉義慶編撰，范子燁注釋《世說新語》，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2。

所謂「晚明世說體著作」，乃指晚明時期模仿《世說》體例，輯錄歷代遺文軼事的著作；包括小說家類、雜家類與史鈔類的著作，只要是晚明時期採集歷代史部、說部、雜纂，甚至文集集中的軼事瑣語，足以表現歷史人物或當代人物言、行之吉光片羽者，均在考慮之列，不過光是摘錄軼事、瑣語還不夠，必須分立門類，以類相從者才算。門類可以仿《世說》三十六門或部分襲用，甚至可以自創全新的門類<sup>164</sup>。

蔡麗玲的定義中強調了分設類目是劃分「世說體」作品的必要條件。內容上則是強調「足以表現歷史人物或當代人物言、行之吉光片羽者」，以人物言行的記事為主，其後的宮廷森的《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也沿用了蔡麗玲的定義。

至於中國大陸的研究，甄靜認為「世說體」小說必須具備三點特徵：「第一，體例上要「分門隸事，以類相從」，這是「世說體」小說最根本的特徵。第二，內容上「依人而述，品第褒貶」，以描寫文人士大夫階層生活為主，以表現士大夫階層的理想，思想和審美情趣為重點，對人物進行品評，暗寓褒貶。第三，在敘事方法上，篇幅短小，用簡短的語言記錄士人的軼聞趣事，具有清通簡靈玄遠而非典雅凝重的文體風格」<sup>165</sup>，以分門別類為其最高原則。此外也觸及幅的長短，以及強調關注的對象是士大夫階層。賈占林提出的定義則是：「所謂『世說體』即摹仿《世說新語》一類相從的體例，它是以文人事跡為主要題材，對原作所規範的敘事空間和敘事時間展開與延續的志人小說<sup>166</sup>」，強調敘述的人物以文人為主。

綜合以上各家的說法，可見「分門別類」基本上都是各家依從的根本原則。此外也會提及其內容應以輯錄歷代遺聞軼事，人物言行（尤以士人）為主。其中幾家也指出篇幅應短小的原則。個人認為甄靜的看法比較能完整呈現「世說體」應符合的條件，因此我們就以甄靜的論點來加以界定「世說體」小說：

### 1、「世說體」小說的結構特點—「分門別類」

<sup>164</sup>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甲組碩士論文，1993年，頁27

<sup>165</sup> 甄靜（明清時期現存「世說體」小說概況），《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7卷2期，2011年4月，頁1

<sup>166</sup>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湖南工業大學學報》，13卷3期，2008年6月，頁45

「世說體」小說根據內容的不同，編排若干門類，這些門類是審視人物的一種角度。這種分門別類對唐代以來的「世說體」小說影響很大，大致上有四種類型：

### (1) 完全模仿

一部分「世說體」小說是《世說新語》的忠實繼承者，認為《世說新語》的門類已經非常齊備，完全沒有必要進行改動，如明代的鄭仲夔《蘭畹居清言》、李紹文《明世說新語》；清代的吳肅公《明語林》、梁維樞《玉劍尊聞》。這些「世說體」小說完全模仿《世說新語》的門類，其名稱、順序、門數與《世說新語》完全相同。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對《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類」尊崇備至，他認為《世說新語》「門類精絕，無容增損」<sup>167</sup>，並且認為《何氏語林》自添「言志」「博識」二門，便覺贅疣，故其著作悉尊劉義慶《世說新語》之原目。

### (2) 基本依託

有一些「世說體」小說基本依託《世說新語》原目，但也做了一些改動，或者增加，或者減少，或者自創了一些門類。宋代王讜《唐語林》中三十五門襲《世說新語》舊目，自增 17 門，分 52 門類。孔平仲《續世說》在《世說新語》舊目基礎上，又增加了「直諫」「邪讒」兩門，共 38 門。何良俊《何氏語林》承襲《世說新語》體制門類，多出「言志」「博識」，共 38 門。梁維樞《玉劍尊聞》仿《世說新語》體例和門類，而「捷悟」「自新」二門有目無文，故實存 34 門。吳肅公《明語林》在《世說新語》36 門的基礎上增設了「言志」和「博識」二門。王綽《今世說》仿《世說新語》體例，分門敘事。惟為避傷人之嫌，摒棄「自新」「黜免」「儉嗇」「饑險」「紕漏」「仇隙」等 6 門，其餘 30 門全同《世說新語》。

### (3) 門類生發

門類生發是指從《世說新語》中的某一門類生發出來，且形成一系列與之相關的門類，這些門類也具有《世說新語》原目之遺風。曹臣的《舌華錄》即是從「言語」門生發出來的，突出表現人物的言談，其門類為：「慧語」「名語」「豪語」「狂語」

<sup>167</sup>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續修四庫全書》，第 1173 冊，上海古籍出版 2003 年版

「傲語」「冷語」「諧語」「謔語」……等 18 門。《兒世說》從《世說新語》的「夙慧」，其門類為：「屬對」「言語」「排調」「文學」……等 17 門。李清《女世說》從《世說新語》的「賢媛」而來，但又有所發展，不再僅僅局限於「賢」，而是把古往今來的婦女形象的優點、缺點全都包括在內，其門類分為 34 門，如「淑德」「仁孝」「能哲」「節烈」「儒雅」「雋才」「穎慧」……等。

#### (4)、作者自創

有些「世說體」小說沒有沿襲《世說新語》的本來的門類，而是自創門類。如林茂桂《南北朝新語》分六十一門，其門類為「孝友」「烈義」「嚴正」「鯉直」「清介」「恬潔」「雅量」「謹慎」「規箴」「棲隱」等六十一個門類等。這些門類中，十二個門類屬於《世說新語》原目，剩餘的門類少數與《世說新語》原目類似，如「棲隱」「圖新」「捷對」「姿儀」「恩寵」等。不過，《南北朝新語》的門類多數為林茂桂的自創，體現了作者的創作思想，如「死徙」「佞幸」「交遊」「狎侮」「赦宥」「癡呆」「黷貨」等。

分門別類是把不同的故事劃分到表現同一主題的類別中，使讀者對這一類小說的主題思想一目了然。「世說體」小說篇幅短小、數量眾多。如果沒有這種分門別類的結構，把眾多小故事結合在一起則顯得比較散亂，容易給人一種雜亂無章之感。許多「世說體」小說非但不冗長散亂，反而簡約有致、意蘊淳厚，這與分門別類的體制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不能不說這是《世說新語》的一大貢獻。

## 2、「世說體」小說的內容特點—「依人而述，品第褒貶」

全面審視晚明世說體創作，我們可以發現其作者既有位高名著的士大夫，也有科考仕途失意的知識分子。加上晚明政治局勢、社會風尚、哲學思想等方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做為統治思想、維繫人心的程朱理學已經衰落，王守仁的「心學」完成了對程朱理學的突破，心學得到了廣泛傳播，並逐步取代程朱理學，同時王學門派之一的泰州學派也已經崛起，並正在對王學本身進行突破。<sup>168</sup>泰州學派的

<sup>168</sup>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55

盛行正當嘉靖中葉以後的萬曆年間，其對士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很大，使士人的思想從程朱理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晚明社會由此掀起了一股個性解放思潮。

作為文人士大夫生活一部分的文學創作，也受到了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使這股世說體創作熱潮具有多方面的內涵。明代前期、中期文壇上籠罩著濃厚的復古風氣，先後出現了前後七子、唐宋派等復古文學團體，晚明雖湧現出了個性解放思潮，但復古思想依然有一定影響。慕古心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人的心理特點之一，對《世說新語》的追慕與復興，本身體現了一種復古心理傾向。當然，追慕魏晉風度也是與個性解放思潮相通的。

李贄是反對程朱理學，宣揚個性解放的，他編輯《初潭集》目的之一就在於表達他的哲學思想。其次，正德、嘉靖以後社會政治腐敗、權奸當道，有感於時事的士人們直接面現實、針貶時弊。這種傾向首先表現在取材的現實化、當代化，出現了幾部專門寫明代事蹟的作品，如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此書「惑溺」中記廬江監司貪得無厭，而市民階層不貪意外之財的風氣和意識；記立國初楊憲擅權，嘉靖年間嚴世蕃收受賄賂，而見士人們對權奸當道的憤恨。鄭中夔的《耳新》記載有明末東林黨與魏忠賢閹黨鬥爭的故事，表達了作者關注現實和對閹黨把持朝政的不滿。

### 3、「世說體」小說的敘事特點—「言約旨豐」

「世說體」小說常常只是通過兩三句話描寫人物形象，這就要求「世說體」小說在語言表達上，要用最經濟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內容。

#### (1) 語言之「言約」

魏晉以來，文學語言崇尚簡易，而晦澀難懂的詞語是不受歡迎的，《文心雕龍·煉字篇》云：「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sup>169</sup>。」《世說新語》的語言之所以講究「言約旨豐」，與這種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sup>169</sup> 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624頁。

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世說體」小說，沒有曲折故事情節，只是通過片言隻語描寫人物的一個舉止、一個容貌、一次對話等，因此，其篇幅都極為短小，與當代的微型小說相類，甚至多數篇幅比微型小說還要短小。

「世說體」小說不僅不同於短篇小說，它甚至比短篇小說還要短小。《世說新語》共 1130 則，字數在 50 字（包括 50 字）以下的有 654 則，占全書的 57.88%；字數介於 51 字和 100 字之間的有 367 則，占全書的 32.48%；其餘部分，100 字以上的有 109 則，占全書的 9.65%，這些條目也都沒有超過 300 字。在《世說新語》中的最長的條目只有 200 餘字。「世說體」小說由於是微型小說，受篇幅的限制，其對語言的要求非常高。當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說過微型小說的語言應該是這樣的，「舉一反三，一以當十，字字斤重<sup>170</sup>。」這對於「世說體」小說同樣是適合的。《世說新語》每則只寫一件故事，多則十來句，少則一兩句，語言都十分簡練，如「賞譽」篇第 142 則云：「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寥寥數字，就把吳郡四大家族的「文」「武」「忠」「厚」等特點表現了出來，可謂惜墨如金。

## （2）內容之「旨豐」

「世說體」小說的語言是「言約」的，但是並沒有影響到它的表達效果，反而通過簡單的語言表達出豐富的內容。《世說新語》不到十萬字，卻把魏晉時期的名士風度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同時魏晉時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宗教等也透過這樣的陳述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來。呂叔湘先生說：「一事多者百餘言，少或十數字。著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風尚，歷歷如睹，蓋善於即事見人，所為傳神阿堵者<sup>171</sup>。」清初王綽的《今世說》共 452 條，卻可以洞悉清初文人的掌故和習氣，這也正是魯迅推崇這部書的原因。這都能夠說明「世說體」小說的語言雖然簡潔，但是包含的內容是豐富的。

唐代以來的「世說體」小說，雖然達不到《世說新語》的語言成就，但它們還是追求語言的精煉、辭意的雋永，許多故事能夠做到言約旨豐。明人任肩生說：「片

<sup>170</sup> 江曾培《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成》，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613頁。

<sup>171</sup>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頁。

言儲不盡之義，一字作生平之目」。<sup>172</sup>這也正道出了「世說體」小說的語言特點。又由於「世說體」小說所描寫的內容，多系名士或文人非同一般的言談舉止，其行為往往是耐人尋味的，因此，「世說體」小說的語言又表現為簡澹雋永。

### 三、《皇明十六種小傳》的體例

人類社會活動的各領域間是相互關連而且相互影響，不能獨立發展；作為呈現人類社會活動總體相的歷史學當然跟其他現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史學發展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與當代歷史情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sup>173</sup>。政治環境會干預史書的撰作，時代思潮會影響歷史意識的焦點，經濟條件會改變史書刊印與流通等等。什麼樣的時代孕育出什麼樣的史學，是一定的。因此，史學的研究必須從宏觀的角度，掌握較長時期的史學意識的發展，闡釋這種發展的內在理路及其與時代背景的對應關係，把它放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等開闊的視野上加以透視，與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文學風格、思想潮流派同時並觀，找到適當的定位。因為它們之間有密切聯繫，而且互相制約著。如此才能看出意義，做適當的評價。

比較了《皇明十六種小傳》與野史、世說體的關係並加以歸納後，接下來筆者將從試著三方面來闡述《皇明十六種小傳》的體例。

#### （一）《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門隸事，以類相從」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在架構上採先分「四維」、「四常」、「四奇」、「四凶」四大類，每類再細分為四小類的做法，因此共有十六小類。查歷代「世說體」小說，極少採此種分法者：歷來研究者認定的「世說體」小說，差不多都沿襲《世說新語》三十六門的分法，唯依材料需要有所增刪而已。先分大類再分小類的「世說體」小說，在明代有李贄的《初潭集》、孫能傳的《益智編》、馮夢龍的《智囊》。孫能傳《益智編》分為「帝王」、「宮掖」、「政事」、「職官」、……等十二大類，以人事行政為分類標準的意味很強。馮夢龍的《智囊》則分為「上智」、「明智」、「察智」、「瞻智」、

<sup>172</sup> 林茂桂《南北朝新語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頁

<sup>173</sup> 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 第19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12

「術智」、「捷智」、「語智」、「兵智」、「閨智」、「雜智」等十類，專收與「智」有關的事例。而李贄的《初潭集》，該書分五大類七十九小類。五大類分別是「夫婦」、「父子」、「兄弟」、「師友」、「君臣」<sup>174</sup>，此五者被稱為五常，是中國傳統的倫理條目。江盈科的大類中亦有「四常」、「四維」這樣的倫理類目。可以肯定的是李贄被視為為公安派的先聲<sup>175</sup>，三袁都非常崇拜他。在袁家兄弟的推崇下，江盈科讀過《初潭集》應該是相當有可能的，也許從《初潭集》的分類法獲得了什麼啓發，因而創造了《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分類法，也符合「世說體」小說第四類型自創門類了。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分類依據似乎也與《世說新語》門類安排意旨多有契合，在架構上採「四維」、「四常」、「四奇」、「四凶」四大類，「四維」類中又分「忠、孝、廉、節」這不就和《世說》首冠「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尊崇孔聖與標榜儒家忠、孝、仁、愛思想內容不謀而合。其次，《世說新語》「各門內容多寡懸殊」，《皇明十六種小傳》也有此情況，江盈科在自序中曾就該書的編輯體例和意圖作了闡釋：「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其中「四奇」中的《機類》有三十則傳記，而「四凶」中的《貪類》則只有二則傳記。

## （二）《皇明十六種小傳》「依人而述，品第褒貶」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其自序內容：「《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輯其語而為之傳，匯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奸諂貪酷是也」。書中傳主除少數為平民百姓外，絕大部分皆為歷朝之帝王、官吏甚或宦官、閹黨，其所呈現之人物形象，不就是一整個明代政治現況的縮影嗎！

在《世說新語》中呈現了「各門排列先後有序」、「前褒後貶，漸次遞降」，而《皇明十六種小傳》「四維」、「四常」、「四奇」、「四凶」四大類似乎也有此意圖，只不過大體上《世說新語》應是依遁當時魏晉時期「由德性而才性、氣性，由正面而負面。」的原則予以鋪排。這和《皇明十六種小傳》所要表達的意涵截然不同，這部分將留

<sup>174</sup> 李贄《初潭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12月，頁4

<sup>175</sup>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臺北：二魚文化公司，2005年7月，頁151



待下節討論。

### （三）《皇明十六種小傳》「人物傳述，言約旨豐」

將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和「世說體」作一比較，其內容似乎無法符合「世說體」語言之「言約」之要求，江盈科在四門十六類中總共列舉了一百五十二篇小傳，其中文字敘述最為簡短的是《四凶》「酷類」〈黃景隆〉，字數 170 個字，最長的條目為《四常》「機類」〈趙臣〉，字數達 1262 字，足可成一首尾俱足的短篇小說。然而，我們試著將《皇明十六種小傳》內一百五十二篇小傳中總共一百五十四位傳主，與《明史》加以比較，其中在《明史》列傳或帝王有專傳的就一百零八位，比例高達七成，而如果再加上列傳無傳記，在他人傳記中卻有提及的二十二位，加起來總共有一百三十位，比例高達八成五，足見《皇明十六種小傳》的確是以史傳的形式在加以呈現的。

相較於正史，完整的敘述傳主的生平事蹟，《皇明十六種小傳》中的敘述似乎就只集中陳述傳主具有特色的部分。這些作品一方面是史，有歷史的紀實求真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同時具備某些文學的敘事和審美心態，和一般的正史有所區別，以補史為創作目的，以歷史的實錄和褒貶精神寫書，期能反映明代君臣的言行事蹟，書中的篇幅相對於正史而言大多短小；但是文中所記屬國史格局，著重教化的精神與功能；並不致力於展開太過曲折的故事情節，然而卻能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同時呈顯出輔翼政教的定位，具有垂鑒後世的使命感，對人物進行道德性的評斷，與《世說新語》記物風流的意圖大異其趣。因此，要認定《皇明十六種小傳》具有「人物傳述，言約旨豐」亦是有其道理所在。

《世說新語》的選材多為文人名士的言行軼事，苗壯說《世說新語》的內容多為「東晉百餘年間名流士族的玄言清談，疏放舉動」<sup>176</sup>。不過「世說體」小說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未必全符合《世說新語》的選材方式。姚琪姝在《「世說體」小說發展論述》裡透過語言特點、篇幅、文體形式以及題材性質來定義，「世說體」小說為「文言小說」、「短篇小說」（或微型小說）、「筆記小說」、「志人小說」。<sup>177</sup>而且官廷

<sup>176</sup> 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25

<sup>177</sup> 姚琪姝《「世說體」小說發展論述》，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0

森在《晚明世說體著作究》一文裡面提到，晚明「世說體」小說的發展有「重史」的傾向，「多以保存文獻史料自許」<sup>178</sup>，所以《皇明十六種小傳》取材自國史，並不是一個特例。

張瑞文在《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一文裡面提到江盈科史傳作品的敘事模式為「背景一事蹟--評論」，而《世說新語》及「世說體」的敘事模式幾乎只有「事蹟」，有些會加評論，所以《世說新語》的寫法跟《皇明十六種小傳》是完全不同的。並舉《史記》作品敘事模式，傳記開頭有傳主的背景介紹，接下來是事蹟部份，而且在整個列傳的結尾部份也有太史公的評論。<sup>179</sup>所以從寫作模式上來看，《皇明十六種小傳》與《史記》之類的傳統史傳之作是最相近的。不過《四庫全書總目》說《皇明十六種小傳》：「大抵委巷之談」，可見史傳的內容全為聖經賢傳，而《皇明十六種小傳》除了真實的歷史事件，還摻雜了一些傳說的成分。

明代萬曆年間，筆者在第二章第一節中已分別就政治、社會、文學方面加以陳述。這是一個不安定的時代，更是一個百家齊放的年代。在史學的解禁之下，官方史料大量釋出，私史創作不斷出現。與魏晉時期相仿的政治社會現狀則造成了仿《世說新語》的「世說體」小說大量產生。身處這樣的年代，江盈科所交游之文人學者不乏兩方面文體之著名作家，也或多或少受其影響。主張真趣奇變的個性本就是身為公安派一員的江盈科所努力追求的，這符合了《世說新語》及「世說體」文類所展現的特色，而江盈科亦曾被評為公安派中最具有人本思想的成員。藉由《皇明十六種小傳》陳述對各色人物的記載和敘述，以小事見大節，用微言見大義，展現了他們剛正不阿、善德仁勇之風姿。行文中處處流露出作者由衷的景仰，那份崇慕之情可謂溢於言表；而對於那些誤國苦民的弄權奸宦、阿諛奉承的奸諂小人則予以最無情的辛辣嘲弄和嚴正鞭撻，也因此攫取了「世說體」及野史特色創立自成一格之文類。

<sup>178</sup>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頁18

<sup>179</sup> 張瑞文《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93

### 第三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內容主題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則就該作的編輯體例和意圖作了闡釋：

《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輯其語而為之傳，匯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奸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或因一事紀一人，或就一人摘一事，大都事不能概當人，人不能概當代，…<sup>180</sup>。

江盈科在架構上採先分「四維」、「四常」、「四奇」、「四凶」四門，在這四門之下每一門類又分別劃分了四個小類，故曰「十六傳」。〈卷一〉「四維」部分下設《忠類》、《孝類》、《廉類》、《節類》（《節類》之下另外細分出《女節》一種），共有小傳五十三篇；〈卷二〉「四常」部分下設《慈類》、《明類》、《寬類》、《慎類》，共有二十五篇小傳；〈卷三〉「四奇」部分下設《隱類》、《怪類》、《機類》、《俠類》，共包括小傳五十四篇；〈卷四〉「四凶」部分下設《奸類》、《諂類》、《貪類》、《酷類》，有小傳二十篇，全書合計小傳一百五十二篇。

然細究其每一門類的內容並也不是完全照著標題所列，也有不符合小類類目定義，這在張瑞文《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中曾經提及過。而不同的人物在不同類目重複出現，也是一大特點，例如劉大夏就曾經在明類、慎類、機類共出現了四次。每一篇目並非只有一個傳主，有的列兩位傳主，甚至有的列到了四位傳主。還有，雖在四維中已列了女節類，但在其他篇章中仍能看到類似內容。此外，每個門類篇數不一，有如機類多達 30 篇，而貪類、酷類合起來卻只有 5 篇<sup>181</sup>。江盈科在這樣的分類之下是不是有其他隱含的深意呢？因此接下來，我將從《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內容及分類意涵方面做一深入剖析。

#### 一、《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內容

<sup>18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頁 904

<sup>181</sup> 張瑞文《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頁 96

表 3.1、《皇明十六種小傳》內容主題

四門	小類	傳記	傳主	四門	小類	傳記	傳主
四維	忠類	19	20	四奇	隱	6	9
	孝	6	9		怪	6	6
	廉	8	8		機	30	24
	節	11	11		俠	12	13
	女節	9	13		總計	54	52
	總計	53	61		四凶	奸	10
四常	慈	4	5	諂		5	5
	明	8	7	貪		2	4
	寬	6	6	酷		3	3
	慎	7	7	總計		20	22
	總計	25	25				

表 3.2、《皇明十六種小傳》內容分類

皇明十六種小傳內容分類						
四門	小類	傳記	傳主	傳主	傳文主要意涵	附錄
四維	忠類	19	20	于光	為國捐軀	北征元將納哈出 征討交趾黎利叛變
				濮真		
				馮貴、何忠、劉子輔		
				孫許(孫燧、許達)		
				徐輝祖	不事二主	全身而退 「靖難」時所犧牲的官員
				景清、鐵鉉、方孝孺、王良 劉璟、顏伯瑋		
				楊源、沈鍊、楊繼盛	直言進諫	宦官
				金英、懷恩		
				覃吉	盡心輔導太子	

四門	小類	傳記	傳主	傳主	傳文主要意涵	附錄
四維	孝	6	9	張鈞(於博、張承相、張永安)	皆以孝順為義	
				王溥、朱煦、陳茂烈、張宗魯		
				儲福妻		其妻守節養姑以終
	廉	8	8	胡壽安、虞信、毛吉、楊肅山雲、于謙、秦紘、石璞	指不貪取亦不接受額外的餽贈	
				節	11	11
	雪庵和尚、河西傭、東湖樵夫、補鍋匠	改朝換代之時隱於世				
	范理、薛瑄、陳敬宗、魏驥楊守陳	不事逢迎為節者				
	女節	9	13	潘氏、邵門二節婦、莊氏	恐受辱為保節而死	
				郃氏孫氏	夫死或未婚夫死殉節	孫氏為存孤之奇
				韓黃兩貞女	類花木蘭	
吉慶奴				自殘守節		
何氏二女				怕被賣掉而以死保節		
張氏、胡氏				受辱死節		
四常	慈	4	5	仁廟禁告謗 宣廟論肉刑	對人民仁慈之舉	
				劉髦、徐昂、李時勉	心存仁慈而行善舉終得福報	
	明	8	7	宣廟釋閩群兒等辟、宣廟釋何回、周新、謝子襄、魯穆、謝汝儀	明察冤屈為明者	
				黃淮言虜部宜分、劉大夏料魯麟	洞察事理具有遠見為明者	
	寬	6	6	韓雍、陳智	待人處事仁慈寬厚	能明真相隨機而變
				成祖釋盜書者、楊文貞諫止伐趙、于謙不較王禕、夏原吉		
	慎	7	7	杜太常	以梳剔事太祖	
				徐武寧王、夏原吉論慎封、鄭埜父、徐晞、李賢論慎陞賞、劉大夏慎密揭	為官之時遇事處處小心勤慎	

四門	小類	傳記	傳主	傳主	傳文主要意涵	附錄
四奇	隱	6	9	焦隱士、耆儒鮑恂(全思誠-余銓-張長年)	不願受官場生活拘束而拒絕做官	隱居避禍的先見之明
				郭德成、賀三老		不事二主
				陳遇、姚姐		
	怪	6	6	張邈邊、鐵冠道人、周顛、全寅	擁有奇能的人	《明史》列〈方伎傳〉
				鐵冠道人、周顛		篇幅不完整
	機	30	24	太祖、太祖敗陳友諒、成祖計制卜萬	善用機智之人物及其顯現之事蹟	帝王 6 位
				成祖致吳傑等與戰敗、仁廟計護大臣		
				成祖破宋忠之計、上皇計誅喜寧		
				英廟計制內臣、憲廟安儲、世宗登極		
				李文忠敗偽吳兵、解縉、許逵計守樂陵		
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王守仁計破群奸						
王守仁撫田州討藤峽、梁儲計止秦藩請地						
楊一清計誅劉瑾、胡宗憲計誘倭酋						
陶魯、趙臣、龔遂榮、劉大夏整理糧草						
項忠、張綵、萬祺、陳諤自全						
楊墳、阿丑、蘇州媼	官吏 15 人					
俠	12	13	平安	順應自己的想法知道什麼是對的就去做的人	戰場上的忠肝義膽	
			周敬心、高巍說燕、李實楊善使虜、馬士權、高瑤		不畏生死，抗顏極諫	
			陳達、王遴		身赴刑場，行其當行之事	

四奇	俠			李繼、康海		不顧自身安危，拯救忠臣
				沈小霞妾、昌平妓		可列女節
四凶	奸	10	10	王翰	爲了利益不擇手段	逢迎上位應在「諂類」
				都察院吏		所談為顧佐之事
	諂	5	5	序班楊善、彭德清、馮益、彭澤、嚴嵩、周恂、梁散人、劉金	爲達目的極盡阿諛諂媚，逢迎事上之人	
				呂震、李貫、黃玘、徐有貞、萬安		
貪	2	4	汪巡撫	貪心的官吏	另記有兩人	
			吳中			
酷	3	3	詹徽、黃景隆、楚令	殘酷嗜殺的官吏		

### (三)、《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架構的問題

從上面的統計分析中，我們可將《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架構的問題歸納爲：

第一、小類下收傳記不符合小類類目定義：奸類〈王翰〉一篇講王翰換了主子就更換自己的立場，逢迎上位者，終於事發被殺，就其內容而言，似乎應放在在「諂類」。

第二、各小類定義重複：如四維的四個小類中，忠類、節類，甚至四奇當中的隱類都收有「不事二主」的篇章。

第三、篇名只記人，內容卻爲多人傳記：《小傳》中的傳記多爲獨傳，合傳的情況較少見。合傳最常見的是兩人合傳，這時候篇名就會有兩個人的名字，如「女節」類下的〈郜氏孫氏〉。篇名只記一個人名，內容卻爲合傳的例子有「隱類」〈耆儒鮑恂等〉、「貪類」〈汪巡撫〉和「孝類」的〈張鈞〉，可能因爲兩篇剛好都記錄超過兩個人的事蹟，〈汪巡撫〉是三人合傳，〈耆儒鮑恂等〉、〈張鈞〉是四人合傳，如果要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寫在篇名上，篇名過長，因此省略只寫第一人的名字。

第四、合傳中所收傳記定義不同：既是合傳，內容主旨應該要一樣才是，但是

《小傳》中卻有例外的情況。如「女節類」〈郅氏孫氏〉中郅氏夫死不獨生，歸女節類是恰當的，但孫氏之盡心護少主，似有討論之必要。

第五、史傳考證的正確性，如「忠類」〈濮真〉一篇其所記與史實並不相符。

從以上歸納可知，江盈科在設計《小傳》的分類架構時顯然不夠細心，否則不應該有這麼多結構上的問題，還是他有其他想法，值得我們再深入研究。

《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一百零七冊批評《明十六種小傳》的分類結構時說：「其分配諸目如：薛瑄入節類，于謙入廉類，姚廣孝姊入隱類，亦往往無義例也。」<sup>182</sup>可見《四庫全書存目》的作者已經注意到《小傳》的分類結構有許多不恰當之處，不過他所舉的這三個例子，從傳記內容來看，倒無不恰當之處，〈薛瑄〉一文講薛瑄不事逢迎，終至招禍<sup>183</sup>，以「不事逢迎」入節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于謙〉一文講于謙不貪取，以貧困自適<sup>184</sup>，入廉類並不奇怪。〈姚姐〉一文講姚廣孝姊清靜寡居，不願意和做官的弟弟多有牽扯，也不願意兒子靠弟弟的關係謀官<sup>185</sup>，這與隱類其他篇章的定義並不相違背。所以入隱類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小傳》的分類架構並不嚴密是可以確定的。不過《四庫全書存目》作者的觀察方式，可能與本文依小類定義來作觀察的方法不同，《四庫全書存目》的作者並未明言所謂的「義例」指的到底是什麼，可能因為觀察的角度不同，導致觀察的結果有所出入。

## 二、《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意涵

在前面研究動機曾經提到，《四庫全書》之中，江盈科的這部作品是被收入在史部存目中史傳類，其著錄為《明十六種小傳》四卷，僅去一「皇」字而已。似乎在《四庫全書》中，《皇明十六種小傳》是被以史書認知的。此外，筆者對《皇明十六種小傳》「四維」、「四常」、「四奇」、「四凶」四大類的內容中曾就一百五十二篇小傳其背景加以分析得之，其中具有官吏身分有一百篇，帝王身分十四篇，其他類三十

<sup>182</sup>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一百零七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8月，頁687

<sup>18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薛瑄〉，頁941-942

<sup>18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于謙〉，頁934

<sup>18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姚姐〉，頁981-982



八篇，這其中包含宦官、女節類、隱者、方伎類等，其中官吏比例高達六成五。上一節中在《皇明十六種小傳》的體裁中我們也曾談到本書將具有儒家忠、孝、仁、愛思想的「四維」放置於最前端。同時也具《世說新語》「各門排列先後有序」、「前褒後貶，漸次遞降」的特色。綜此所述，那麼《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的依據便能呼之欲出了，亦即從「輔翼政教」的角度出發，從國家政治的角度著眼，將自明太祖以迄世宗嘉靖年間的人物事蹟，一一置入作者所立的門類中，採先正面而負面的原則，正面從「四維」《忠類》、《孝類》、《廉類》、《節類》開始，乃是作者藉以勸善之言行事蹟，而從「四凶」部分《奸類》、《諂類》、《貪類》、《酷類》開始，則收錄負面人物的範例，以作為懲惡的借鏡，以實現其勸善懲惡，保存史實的目的。而其中夾雜「四奇」《隱類》、《怪類》、《機類》、《俠類》，則為江盈科「尚奇」的精神所呈現。

中國傳統的史學文化以懲惡揚善做為標的，以鑑戒為宗旨。中國歷代的歷史著作，無論史官是以記言、記事作為忠於事實的職業標準判斷，都會在有意與無心之間，筆鋒帶上了倫理道德的色彩。作者對人物善惡的評定，也多以道德倫理標準作為依據，都有褒善貶惡的道德目標。通過書寫善或惡的人物形象，給予世人一個警戒。這些作品都不是單純地寫歷史人物，而是把歷史人物納入道德的範圍中加以選擇，使這些人物具有正面或反面的「模範作用」。因此，以史為鑑、借古鑑今，這種經世致用的史學意識自古以來就十分明確。中國古代史官已形成優良史學傳統，就是秉筆直書、書法無隱，也就是所謂的「實錄」的精神，而書法無隱的任務與目的，在於「善善惡惡」。從政治上來說，實錄、直書，就是要正確陳述歷史經驗，以充分發揮史著的經世致用功能。在實錄原則與勸懲精神的積極發揮之下，使得史學從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作者要忠於史實、堅持原則、明辨是非、善善惡惡、黑白分明。《皇明十六種小傳》一書中所記，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和出現過的人，江盈科以存一時代之文字，並以存事實之全。這種作法，正是其於實錄原則的實現，而通過門類的選擇與設立，則能體現出其勸善懲惡的價值觀。

因此，我們接下來將試著以各個的角色的特色為主來討論江盈科分類的依據為何，有何特別的意涵。

## （一）四維不彰，國乃滅亡

首先，身為受傳統儒家文化浸潤甚深的明代知識份子，江盈科曾自稱「不肖楚西南豎儒」<sup>186</sup>〈與馮開之太史〉。雖說也曾極力標榜陽明心學的自由、性靈，但在他的心底還是以儒者本位自居的，因此始終奉行著儒家的傳統價值觀，重視忠孝節義的選材原則，對於自己筆下能夠體現出忠、孝、節、義的人物保持著由衷地熱情讚賞。因此，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分類時取「四維」《忠類》、《孝類》、《廉類》、《節類》為首，對忠孝節義之士加以稱頌自然是順理成章。忠、孝、節、義皆是我國傳統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和重要思想內涵，在幾千年的歷史變遷中逐漸演變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一部分。在封建時期，忠孝節義是統治者穩定政權的無形基石，自然也就成為了官方大力宣揚的主流價值觀。

「四維」之中傳主的共同之處就在於為國君盡忠、為家族盡孝、為知己盡義，並以此為準則來砥礪自身的德行與節操。他們不懼奸諂貪酷者的囂張氣焰，散發出光明磊落的凜然正氣，即便要他們赴湯蹈火、慷慨赴死也在所不惜。儘管他們對忠義的見解或許還存在一定的階級侷限性，甚至一些人淪為了封建皇權鬥爭的工具和犧牲品，但是他們能夠在舉世皆非、奸邪當道的大環境下還能堅定自己的立場，這份氣概節操就已是難能可貴的。作品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鐵鉉〉、〈方孝孺〉、〈王艮〉、〈沈鍊〉、〈張宗魯〉、〈楊翥〉、〈于謙〉等十幾篇，這些作品中的傳主在《明史》中上大多有記載，其中更不乏一些耳熟能詳的名人。但江盈科在塑造人物時並非只是將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的史實簡單羅列，而是選取了最能表現出人物的重點事件和關鍵言行，以小說手法將其處理的活靈活現，使其在不失真實性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文學色彩。

例如「四維」《忠類》中的〈沈鍊〉

鍊仕世宗朝，為錦衣衛經歷。會北虜人犯，薄城下求貢，下廷臣議，時翰林趙貞吉力言虜挾眾要我，宜勵兵與戰，不當甘城下之盟，忍《春秋》之耻。執政嚴嵩方主款虜，恨貞吉所言非是。時鍊在眾中，大言贊貞吉語，喋喋不

<sup>18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九），頁 581

休。尚書夏邦謨目之曰：「何物小吏，多言乃爾？」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且臣有大小，忠肝義膽當一般大，莫得分別。」又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數萬，邀擊虜，虜必情歸，可大捷。不報。鍊以嚴嵩沮抑其奏，乃抗言「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虜引衆內犯，不聞諮諏方略，但圖自保，妬忠悅佞，納賂市交，且朝廷賞罰，皆自嵩出，故人人皆計嵩愛憎，不復知有朝廷。」因歷數其父子奸貪十罪。嵩痛恨之，譖于上，編發鍊保安州爲氓。鍊至保安，父老問其被放始末，皆相與詈嵩父子，而爭敬事鍊。鍊于暇時執弓矢演射，乃束芻爲人者三：其一曰李林甫，一曰秦檜，一曰嚴嵩。日夕挽弓射之，曰：「吾射奸相。」嵩聞之益銜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報首功掩敗，鍊復忿懣，貽書諄讓，既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至，殺避虜人益多，鍊讓之，語益峻，復爲詩嘆曰：「割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sup>187</sup>。」

傳主沈鍊在廷議時，慷慨陳言力主以戰爭來抵禦侵犯邊疆者，他所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得罪了爲內閣首輔的嚴嵩，被嚴嵩譖害流放到保安。而他仍不爲淫威所逼，暇時執弓演射時，箭射分別代表李林甫、秦檜、嚴嵩的草人，義憤之情不言可喻；而後他又嚴辭指責在地方督戰的侍郎總督等人殺敵不力、虛報戰功。沈鍊在廷議時言辭激亢、鏗鏘有力，後文以「嵩痛恨之」這寥寥數字，就從側面寫出了沈鍊這番激切言辭一針見血，使人在閱讀之時彷彿能夠切身體會到沈鍊那肝膽怒張的神態。通篇傳文不過數百字，作者卻能用簡約而不失豐潤的筆法，通過人物的言行、神態和動作幾個方面分別從正面和側面進行了層層渲染烘托，表其忠、述其勇、言其威、狀其烈，將沈鍊這個人物的忠肝義膽塑造的栩栩如生如同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又如「四維」《孝類》中的〈張宗魯〉

宗魯，鈞州人。生四歲，病瞽，白晝佹佹，無異昏夜。其母每持而泣曰：「世亂家貧，即兩目睜睜者尚不能奉母，而况雙瞽乎？安卜所終？」及宗魯稍長，乃謀于母，請學卜，曰：「瞽而卜，可得糲，庶幾不餒吾母耳。」已乃學卜，

<sup>187</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沈鍊〉，頁 917-918

爲人占吉凶，頗有符驗。及年二十，里中盜起，宗魯自負母，令妻掖之以行，所至賣卜給母食，妻拾野蔬佐之。盜每見魯瞽而負母，率憐焉，不忍加害。後亂定，與其妻奉母歸鄉里，仍求前母曹、沈、吳三氏遺骨，合葬父塚。有司上其事，朝廷曰：「瞽人孝行如此，誠爲可嘉，世之明目而甘不孝者，當抉其眼矣。」命旌其門，曰：「瞽孝。」噫，余居鄉見饒裕之家，其父母臨死，諸子不復侯永訣，相與乘其彌留競取篋貲帛，以多爲勝，若此輩者，可令宗魯見耶！<sup>188</sup>

張宗魯出生在一個時局混亂，家境貧窮之境，四歲時即因病眼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正常人想要奉養老人尚且十分吃力，更何況一個盲人！但是他不避辛苦通過自己的一技之長支撐起了全家的生計，並且在賊道橫行的時期仍不避自己的目疾，負母輾轉於他鄉，這份孝心甚至打動了無惡不作的盜賊，因此最終能夠得以存活並得到朝廷「瞽孝」的旌表。比起那些健全且有贍養老人能力的正常人來說，張宗魯無疑是一個榜樣人物。瞽人尚能爲之，況常人乎？江盈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這一個榜樣人物的展示來向世人說明奉老盡孝的重要性，體現了他對中國古代傳統仁孝觀念的推崇。

此外，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四維」《節類》之下另外細分出《女節》一種，特別值得一提，在明代之前，最多出現於文學作品中的女子形象莫過於「孝女」和「烈婦」這與封建社會思想的統治者——儒家的推崇密不可分。到了明代，這樣的觀念仍是根深蒂固，《明史·列女傳》中記了265位忠孝、節烈婦女，其中貞婦、貞女占有很大的比例<sup>189</sup>。明代是一個封建專制集權統治的頂峰時代。也是一個極力推崇封建禮教的專制朝代。婦女處於生活的底層，承受著多重壓迫，特別是夫權家長制的絕對權威，使婦女處於劣勢地位，承受著與男子相比不公正的待遇。她們沒有自己的權利，其行為一定要遵從「事夫如天」的規範，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段穎慧曾經提到，縱觀《明史·列女傳》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被所謂的正統文化扭曲了的鮮活的生命。從這些婦女的個案中我們可以感受得到她們背負的禮義廉恥，忠孝節烈文化的厚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傳統主流文化特別是理學

<sup>18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張宗魯〉，頁 928

<sup>189</sup> 《明史·列女傳》，卷 301-303，列傳 189-191，頁 7691-7765。

的齊家正倫思想的提倡、官方的獎勵、家族利益的需要等方面的影響，「為夫守節」，已成為明代婦女的中內在信念<sup>190</sup>。

明代中期後，陽明心學大行其道，對人性解放的訴求和希冀，對於個性張揚的讚頌和追求，在社會上掀起人文主義的巨大浪潮，被囿於深閨的女性也概莫能自外於此。東晉《世說新語》之中有一〈賢媛〉篇，其內容雖與《明史·列女傳》貞婦、貞女形象完全不同，但是明代流行的「世說體」小說，卻紛紛在繼承《世說新語》〈賢媛〉篇之後而有所改變，展現出不同形式的女性形象，出現新的題名。例如李贄的《初潭集》在《夫婦》之下，細分為〈賢婦〉、〈妬婦〉、〈苦海諸卿〉、〈彼岸諸媼篇〉諸篇，甚至在李清의《女世說》、張怡的《玉光劍氣集》都能見到此一改變，連其他社會階層向來不被重視的妓女、婢女守貞守節的德行也能與閨秀並列。

江盈科在《女節》之中，傳主所表現出來的節操之中，可見女性在弱勢，危險環境中的決斷及應對，不畏死亡，堅守信念而行。雖標榜「節」，但實際上，卻呈現了不少烈女的形象。衣若蘭曾經提到在《明史·列女傳》中，雖以節烈為高，但重「烈」甚於「節」，明清士人常以兩性的忠烈作為對照，特別是借女德來諷士，透過大量烈女的傳記，彰顯女性的節操，在盜賊危亂之際，許多女子都知死節，但是士大夫平日高談闊論節義，等到真正大難臨頭，很多人卻晚節不保。抨擊士大夫所作所為，不如弱女子的慷慨激昂，士人藉以批評男子道德有虧，能力不足<sup>191</sup>。

例如〈邵門二節婦〉

福建上杭縣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當成化時，鄧茂七反，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他往，止遺二氏與其母相守，皆被執。賊見其少且美，欲納之，語二婦曰：「爾夫走他鄉，死亂兵手為魚肉矣。爾能從我，當共保富貴，否者，我且魚肉爾也。爾計安出？」婦詒之曰：「妾窶大婦耳，陋劣之質，不堪充將軍下陳。將軍若不棄，收之幕中，俾薦床褥，誠大幸。第野合非所

<sup>190</sup> 段穎惠（從《明史·列女傳》析明代婦女的貞節觀念），《殷都學刊》，10卷，2005年4月，頁109

<sup>191</sup>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頁329-330。

欲也，將軍有意，願僦民居以禮見納，請奉巾櫛以從。」賊大喜，引與同載渡河，二氏就舟次耳語姑，謂寧死不辱，相對蘇蘇泣，賊以手扞其相，曲慰之。至梅谿渡，各抱嬰兒懷中，泣謂姑曰：「氏不能終事老姑，從此長別，命也。」並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嬰兒在其手，見者莫不流涕，為斂棺殯之。巡按涂棊言于朝，詔賜旌表<sup>192</sup>。

邵縉紳、邵縉纓兄弟在盜賊來臨之時，理應設法帶家族親人逃離避難，卻反而丟下妻兒，甚至連母親都置之不管，獨自逃難。留下孤妻寡母面對凶暴的盜賊，其後果可想而知。而二妻寧死不受辱，甚至還巧為言語使盜賊失去戒心為自己能順利守節赴義，其心其節讓那些只求苟且偷安，喪失廉恥本心的丈夫們能不感到羞愧嗎？

而除了《女節》篇外，在《皇明十六種小傳》其他篇章中，我們也可發現其他女性角色的陳述，江盈科似乎希望在傳統的貞婦、貞女之外顯現出不同的形象。

例如「四奇」《俠類》中的〈昌平妓〉

昌平侯楊信，襲父洪爵，善戰，有父風，功勳頗著。會于忠肅劾其擅殺將領，獄成，詔刑諸西市。綁縛既定，監斬者未至，適一婦縞巾素衣，攜一廝具觴酒豆肉詣信所，蓋信故所狎妓女也。信見其來，搖手止之曰：「爾胡來？來則無益於我？祇速禍耳，其亟去。」妓泣曰：「將軍，國之忠臣，無故罹此。夫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終古所悲，非一人也。今市曹無知不知皆冤將軍，為之扼腕。妾烟花賤品，辱將軍垂盼，列置下陳，使得薦歌舞，侍櫛沐，感恩非細，奈何臨歧不一見相永訣？」因酌酒飲信，信飲之，盡數觥，謝曰：「爾情至矣，其亟去，不去且死。信非項羽，敢要虞姬伏劍耶？」妓且泣且言曰：「將軍何厚待虞姬薄視妾？妾畏死，必不來，所以來者，恐將軍身首不得處所，故來收之。既收，妾亦以身殉將軍，不求生矣。」信聞之，不勝哽咽。無何，法官至，命行刑，信頭落地，妓乃盡飲其血，出布囊囊信頭，付其家人曰：「善葬此。」徐取袖中素練，自縊信屍傍，曰：「妾得從楊將軍游地下，心事了矣。」市曹人見之，莫不感動。噫，若妓者，可謂奇女子哉！彼臨利

<sup>192</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邵門二節婦〉，頁 948-949

害死生，輕棄其主以去，有愧於妓者不少矣。此予所以貴若妓也<sup>193</sup>。

前文已提到明代中期之後妓女的書寫已漸漸出現在一些描述女節的小說之中，江盈科就塑造了一位俠氣干雲的風塵奇女子形象。社會地位處在良民之下的妓女群體，在人們眼中本是卑賤放蕩、自甘墮落的代名詞，這和傳統女子身上的忠貞賢慧等美好稱譽是格格不入的。妓女們往往都是重利輕義，對自己的「恩客」毫無真情實感，「唯利是圖」四字才應是她們生活的座右銘。然而，「仗義每多屠狗輩，俠女從來出風塵」。這位無名無姓，僅被作者以「昌平妓」代稱的娼門女子，雖不幸深陷泥淖、淪落風塵，然其言行舉動卻足以令俗世的一些鬚眉男子汗顏。通常對於一個在法場候死之人來說，即使他之前的地位再顯赫，淪落至此，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但昌平妓就是個中的例外：她縞巾素衣，攜一廝具觴酒豆肉詣信所，在遭到昌平侯楊信令之「亟去」的制止後卻不為所動，只是以一番的感人言辭令所有在場者不禁為之動容。「將軍，國之忠臣，無故罹此。夫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終古所悲，非一人也。今市曹無知不知皆冤將軍，為之扼腕。妾煙花賤品，辱將軍垂盼，列置下陳，使得薦歌舞，侍櫛沐，感恩非細，奈何臨歧不一見相永訣？」楊信亦深諳其義，甚至將眼前這一普通的妓女抬升到了為項王伏劍自刎的虞姬的高位，謝其曰：「爾情至矣，其亟去，不去且死。信非項羽，敢要虞姬伏劍耶？」然昌平妓在如此褒獎之下仍不為所動，以「將軍何厚待虞姬薄視妾？妾畏死，必不來，所以來者，恐將軍身首不得處所，故來收之。既收，妾亦以身殉將軍，不求生矣」的之語回答楊信，並抱定信念以行動踐行誓言。江盈科非常精闢的幾句點評作結：「噫，若妓者，可謂奇女子哉！彼臨利害死生，輕棄其主以去，有愧於妓者不少矣。此予所以貴若妓也。」在明代中後期日漸浮華放浪的社會風氣下，能夠出現這樣一位義不畏死的奇女子，她的所作所為可謂超越了一般意義層面上嫖客與妓者之間以金錢維繫的男歡女愛關係，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前面曾經提到江盈科對於女性文學也十分關注，《閨秀詩評》便是他搜集歷代女性作家作品並逐一品評之著，而在《皇明十六種小傳》《女節》篇中對女性不同角度的書寫，可以顯見江盈科比當代之人對女性投以更多的關注。

<sup>19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昌平妓〉，頁 1043

## （二）為政之道

江盈科發表《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時間是萬曆二十九年，此時的他正以大理寺正的身份卹刑滇、黔。主要的工作就是複查獄訟，這項工作事關人命責任重大，正直愛民的江盈科盡力平反眾多冤、假、錯案，挽救了三百餘人的生命。同時，他也親睹了此地百姓生活的困苦，兵役、徭役、礦役等人禍以及諸多的天災，使得百姓們流離失所，死者、傷者不計其數，敦厚如他對此憂心不已。而細數江盈科從萬曆二十年得中進士至萬曆二十九年之間，一直沉浮於宦海，足跡遍佈北京、江蘇、雲南、貴州等地。他既在極度繁華的江南任職縣令，也曾恤刑貧瘠非常的偏遠之地。然而，無論地區經濟的繁榮抑或落後，他都親睹了百姓的痛苦和官場的黑暗，並對此憂心忡忡卻無計可施。但是也正因身處其間，他對政治弊病的認識才會如此深刻，對官場罪惡的揭露才會分外徹底。因此，取材分類之時對於選擇官吏的比例才會如此之高。而政治的良窳，除了官吏們的兢業勤事外，帝王的角色更是重要，蓋帝王是道德的榜樣，君主的勵精圖治、選賢任能、虛心納諫是王朝興盛的根本，善於納諫且從善如流、心胸寬大而不求全責備，矢志改革並以國為重的明君形象，才能締造出另一個太平盛世。下面就從帝王的角色及官吏的角色來加以陳述為政之道：

### 1、以為帝王角色分類

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各篇目中，除了官吏之外，出現最多的當屬帝王角色，在書中江盈科並未對帝王角色獨立設篇章，而是散在「四常」中的《慈類》、《明類》、《寬類》，「四奇」中的《機類》，雖然其他也有眾多以帝王為副角的篇章，但大部分皆是談及明惠帝至成祖時「靖難」事件中不事二主、慷慨赴義之事，並非篇目主軸，在此略而不談。而以帝王為篇章的小類似又和前面所言為官之德行及政能相契合，身處明代這混亂的時局，史學家皆認為帝王負有極大之責任，這是不是說明江盈科其在分類之時是否也希望以古鑑今，藉古之帝王事蹟，加以勸懲當世。

江盈科在《法祖疏》中以論「法祖」的重要性為開端，向萬曆皇帝大膽地提出罷稅、罷礦乃至罷中貴的主張：

今皇上採礦之使且四出，深山窮谷，斷地絕脈，人嗟人恐，不為衰止，甚至



礦無可鑿，有司且攤礦以充起解之需矣。然則皇上而誠法世廟也，胡不法世廟之罷礦者，以罷今日之礦耶？夫稅，礦，其大者也，猶有大於此者；罷稅、罷礦，其急者也，猶有急於此者；則罷遣中貴是已。……今皇上采稅、採礦，盡委中貴矣，直省郡邑，旌旗塞道，鼓角彌天，始而凌小民，繼而凌守令，今且凌撫按矣。是倒持太阿授以其柄，患將奚底也。<sup>194</sup>

法世廟，即效法明世宗皇帝的為政之道。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明朝第十一位君主，在位早期勵精圖治，整頓朝綱，後史譽之謂「中興時期」。江盈科在文中一一列舉嘉靖皇帝輕徭薄賦，限制宦官權力的舉措，期望「法世廟」的萬曆皇帝能真正仿效世宗于國家政事有益的治理之道，使天下得到大治。世宗的治亂之道為何？江盈科認為主要有三：一、免除賦稅，二、免除礦稅，三、罷免宦官的官職。此三項舉措中尤以第三項最為重要。萬曆之時，皇帝遣宦官為稅使，四出而搜刮，且將所收之物收入皇帝的私囊，供其奢靡享樂，百姓苦不堪言。而這些握有重權的宦官們對下則欺凌百官，對上則阻塞君之耳目，憑藉隻手遮天的本領將天下之人玩弄於股掌中。皇帝對他們卻分外寵信，一味聽之任之，更加深了百姓的災難，克制皇帝的欲求，扭轉宦官專權的局面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如果國君能罷稅、罷礦、罷中貴，自然寡欲少求，踐行節儉；如若還能將「自愛」之心推及百姓，自然一時都不敢忘愛民之志；國君寡欲愛民，自然萬民歸附，天下大治。

例如「四奇」《機類》中的〈英廟計制內臣〉

英廟復辟後，大小政事皆自留心，猶嚴束閹宦。一日鷹坊司內臣奏請以時出獵，上不許，固請曰：「獵以擊鮮，獻宗廟，供太后，充上用，舊制固爾。」上乃許之，曰：「獵則獵矣，毋擾吾民。朕必按之，擾者罪無赦。」內臣應曰：「不敢。」各辭出，相與言曰：「此謾說耳，誰按我者？」比至州縣，不獲一禽，乃亟令有司督促小民，捕得獐鹿兔雉，遣人進曰：「獵得也。」上固已遣人按實所斂州縣多寡，數目具悉，及至出示，曰：「此爾獵得乎？朕固戒爾，奈何故犯？杖黜之。」自是內臣屏息，莫敢有擾民者。噫，英廟之于內臣，懲其一，警其百，此蘇老泉所謂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

<sup>194</sup> 《江盈科集》（雪濤詩文輯佚·卷二·散文），頁754

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是不測之說，御世之大機也。英廟以困衝進德，此亦其一端矣<sup>195</sup>。

英宗復辟之後深知宦官之害，處處留心，藉田獵之事揭發長久以來宦官無故擾民的惡行，並加以告誡其不得再犯。江盈科無不藉此文希望在上位者，不要讓宦臣們蒙蔽一切，如此明代宦官為禍、民不聊生之景況將能有所改變。

另外，「四奇」《機類》中的〈仁廟計護大臣〉

仁廟時，李慶、呂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皆為大臣。其年適值朝覲，先是李慶等言于上曰：「比歲北民牧馬頗蕃，頃解入京，散給軍伍，尚餘數千匹散于民間，則疊役難支，莫若敕人覲官各領馬一匹，比民間孳牧。」上令與蹇義、夏原吉議，皆曰可。獨士奇力陳不可，曰：「朝覲諸臣，尊者岳牧，次者守令，皆朝廷賢良，所使牧民者也。不聞使賢者牧馬，況與百姓同牧，則官民無等；牧民之官兼使牧馬，則人馬同類。非所以尊賢敬臣、貴人賤畜之意，甚不可。」上曰：「李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比及兩日，不得旨。兵部督諸司領馬幾半。士奇復奏，上曰：「朕偶他冗，遂忘此爾。」乃密召士奇諭之曰：「朕豈真忘耶？朕使人伺慶、震皆諱汝，恐汝府怨。頃得陝西按察陳智疏，論官牧馬非是，此可為汝弭怨，汝但據此疏草敕。」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有事，須盡言。慶等不識大體，不足與語，第先朝舊臣，不欲輕退。」陳智疏略曰：「按察風紀之官，陛下所使肅僚貞度，而今乃使牧馬，降同皂隸，諸僚將目攝臣曰：『是馬曹耳。』奚彼之憚？又何肅焉？不肅則弛，弛則亂從生。夫以馬易亂，所得幾何？」頗與士奇同意。噫，大臣在人主左右，權位相軋，議論不合，動至彼此相忤，賢不肖相擠，及至相忤相擠，往往小人勝，君子不勝，因而引去，遂使人主有孤立之嘆，而國事日非，朝政日壞。惟識微之主能察其機而斡旋之，俾和衷之風著于上，而又安之福逮于下。若仁廟處楊文貞一事，真可謂萬世君人龜鑒已。嗚呼，仁哉，仁哉<sup>196</sup>！

<sup>19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英廟計制內臣〉，頁 1000

<sup>19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仁廟計護大臣〉，頁 997-998

仁宗皇帝雖然在位僅短短一年，但是他與其子宣宗皇帝，在歷史上號稱「仁宣致治」<sup>197</sup>，文中群臣都是其父成祖皇帝留下來輔佐他的大臣，而並非每一個大臣都是盡忠職守，戮力為國者。身為一個在上位者能不專斷，傾聽臣子的各種意見表達，並加以明辨其真偽。同時又能調和臣子之間的齟齬，不致破壞君臣和諧之象。難怪江盈科在傳末大加讚揚：「大臣在人主左右，權位相軋，議論不合，動至彼此相忤，賢不肖相擠，及至相忤相擠，往往小人勝，君子不勝，因而引去，遂使人主有孤立之嘆，而國事日非，朝政日壞。惟識微之主能察其機而斡旋之，俾和衷之風著于上，而又安之福逮于下。……」無非也是希望君王能效法祖先行蹟，而深以為嘆！

## 2、以官吏之角色分類

### (1)為官之德行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對官吏的分類，除了要求具備前面所提的忠孝節義傳統道德外，更加要求的是內在品德的體現也就是強調「為官之德行」，在這腐敗的政治和黑暗的官場當中，面對人民所受的痛苦災難，他的內心何嘗不想要有所改變。因此，他對於能苦民所苦、為民奉獻之好官，會不吝情的大加讚揚，我們就可從《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四維」中的《廉類》，「四常」中的《慈類》、《寬類》得到這樣的例證。

例如「四維」《廉類》中的〈楊翥〉

楊翥，字仲舉，吳郡人。少負才名，以清節自砥。楊文貞薦之，仕至尚書。平生取予之際，凜然四知，一無所苟。忽夜夢入隣家園，食其二李而甘，比醒，深自咎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精神感召，如響答桴。隣家之李，我夢食焉，必旦晝義心弗明乃有此耳。」蓋余聞一人嗜飲，夜夢人持酒飲之，乃曰：「酒欠熱，盍往溫焉？」遽然而覺，深自懊悔。其妻問故，因述所夢，且曰：「早知夢覺，即酒冷，何妨進數觥也。今無及矣。」故觀貪飲者之悔其

<sup>197</sup>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62

失飲于夢中，則清如仲舉悔食夢中之李固宜矣<sup>198</sup>。

江盈科用詞約義豐的語言講述楊翥夢中食鄰人之李，他連對自己睡夢中所做的一點不合道德的細小行為都要做一番深刻的檢討，實在是將自己對操守品行要求水準提高到向聖人看齊的一種更高的境界。楊翥本人也意識到了「必且晝義心弗明，乃有此耳」。那麼既然他能夠做到「平生取予之際，凜然四知，一無所苟」，他自然不會允許自己在夢中出現的行為超越意識的控制表現至現實，所以才通過深刻的自省行為來控制自己的欲望。通過這樣的講述，作者已經把楊翥這個人的自律特徵塑造得非常成功，但為了加深讀者印象，江盈科又在此則篇尾增加了一個嗜飲之人夜夢遇人權飲的故事。同樣是悔其夢中所作所為，楊翥那是因為自己的一己私欲而自省，貪杯者卻是對沒能在夢中讓自己的私欲得逞的悔意，二者的對比之義十分明顯。江盈科就這樣通過自己精妙的選材和簡約的語言，將一個人的清廉自制與嚴格自律烘托地恰到好處。

又如「四常」《慈類》中的〈李時勉〉

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為御史。其人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游燈市，市中男女雜遝，簪履併集。會時勉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壹股，珠貝嵌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勉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為？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釵當畀我，俟釵主來索，我當畀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原釵見比，儼然相肖，時勉從篋中出所拾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勉固却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相與嘆息。時勉之賢，非人所及。……後時勉乃受千戶血竭，謹藏之。無何，時勉以上疏忤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瓜，折勉筋，掖出，筋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眾皆謂勉必死。……勉使家人取諸筥中，持血竭以傳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如初<sup>199</sup>。

傳文中李時勉潔身自愛，拾得金釵壹股之後所想到的並不是占為己有，而是感同身

<sup>19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楊翥〉，頁 932-933

<sup>199</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時勉〉，頁 956-957

受地認為失之者可能因此貴重之物而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其心之仁善為其帶來福報，身受酷刑之災卻能因行善所得之血蠅活其命。此非心存仁善而能得其回報之最佳例證。同樣之事亦出現在「四奇」《俠類》中的〈李繼〉：

李繼，吳人。性豪舉，成化間官助教，多游戚畹、公侯之門相引重。時祭酒李時勉恬澹高潔，見繼所為，心薄之。會大璫王振專橫，惡時勉不阿己，欲中之。……振謂其擅伐聖殿古樹，白上，傳旨枷號時勉。勉儒臣，又齒長，人謂且死，……李繼乃曰：「事急矣，不為營救，不但勉無生理，且使上以細事有殺儒臣之名，其累聖德不小。」於是謁所厚會昌伯孫公求為勉地，蓋上母舅、皇太后兄也，孫公許諾。其日孫誕期張宴，珠履滿堂，稱觴上壽，太后遣中使致饋孫所，孫見中使，貌顰蹙不樂，使問故，孫答曰：「往歲誕日，得佳客增光几席，今歲佳客囊三木，座上縱不乏人，然無如此人佳者，殊覺落莫。」中使問：「佳客為誰？」答曰：「李祭酒也。」比歸，太后問曰：「舅樂乎？」中使述其事白后，后亟召上，厲色言曰：「李祭酒，好官也。且諸生師囊三木，祖宗無此事。」上遽對曰：「兒偶弗知。」太后怒曰：「此事不知，如何做皇帝？」上叩頭謝有罪，遽傳旨赦時勉<sup>200</sup>。

其文雖是在陳述李繼藉太后之手營救李時勉之事，然不是因時勉恬澹高潔，聲名在外，為眾人所欽佩而得李繼戮力以救之故。

## (2) 為官之政能

對於官吏的要求，江盈科並非只是要求他們具有良好的道德傳統，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的操守而已。面對國勢岌岌可危、身處苦難多時的百姓而言，一個具有良好的行政能力，能夠為國家人民解決經濟問題，使人民安居樂業，能夠明法慎刑、視民如傷、苦民所苦、慈善對民的官吏，才是廣大民瘼所真正需要的。我們可從《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四常」中《明類》、《慎類》，「四奇」中的《機類》得到很多例證。

<sup>20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繼〉，頁 1038

例如「四常」《明類》中的〈謝汝儀〉

汝儀，嘉靖間官福建按察司副使。初，晉江巡檢為海盜劫殺，追捕不獲，所司督責捕盜官員及兵甚急。會漳州民陳大淵等操舟往他所販米粟，適至其地，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劫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皆誣服，坐死者十有五人，展轉敲朴囹圄中者，已三之一。汝儀覆案淵等，視成牘嘆曰：「盜非細犯也，斬首非輕刑也。大淵等何據坐之盜，累累就死？若日舟中器仗是盜兵也，此中濱海之民皆以舟為家，誰不設器自衛，將何人不可論盜耶？彼殺人奪貨者，貲入其手，委仗于水，水濱莫可問，人莫敢執矣。夫此十數人固可惜，且奪民救而授盜資，如吾丘壽王所言，關係更巨。」遂為平反其獄，請于直指使者并宥之，而罪妄執者。汝儀所平反他獄，皆若此，直指薦于朝，世廟嘆賞曰：「令執法者皆如汝儀，天下無冤民矣。」屬銓部擢用之<sup>201</sup>。

執法官員為盜賊所害，身為同僚急切破案，其心古今皆然，然就因急切便常有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個的心態。在此情形之下，很多跡證就往往會被放大檢視。在嚴刑拷打之下，市井小民豈有不招之理，而冤獄往往就這樣造成了。文中陳大淵等操舟往他所販米粟，適至其地，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劫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皆誣服，坐死者十有五人，如非謝汝儀細究案卷曰：「若日舟中器仗是盜兵也，此中濱海之民皆以舟為家，誰不設器自衛，將何人不可論盜耶？」這些人將為枉死。在這裡我們除了看到謝汝儀能站在人民的角色設想，真心為人民著想，也看出江盈科崇尚本乎人情的斷案方式。

又如「四常」《慎類》中的〈夏原吉論慎封〉

原吉，湖廣湘陰人。仕成廟為吏部尚書，以國之元老日夕資啓沃，獻籌畫，多所裨益。會張輔等既定交趾，朝廷論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其他若王友進封清遠侯，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世

<sup>201</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謝汝儀〉，頁 963-964

襲；親擒黎季犛軍兵王柴胡陞指揮使，次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總計纔十數人爾。先是交趾平，上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嗟夫，夏忠靖此言足為萬世賞功之法，蓋作始既巨，則末流濫觴，莫可收拾。其後王驥麓川一役，冒封賞至萬人。成化、正德間抑又甚矣。昔英廟一日語內閣李賢曰：「國家錢糧出多入少，即如京師武官支薪俸，每季四十五萬，何以處此？」賢對曰：「武官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一時君臣非不商畫及此，然竟不聞有所救正，遂為空言。惟是世廟初御，采諫議夏言等說，毅然汰洗，歲損祿米百餘萬，此二百年一大快也。要之慎封爵于初，嚴比試于後，毋事姑恤，毋避仇怨，然後武弁清而財之末流稍可樽節。近日中丞郭相奎氏亦言本朝武弁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實，欲漸裁之，此即夏原吉、李賢同意。<sup>202</sup>

古今中外不管哪個朝代，不管哪個國家，為求國家長治久安，你爭我奪在所難免，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所有將士們在戰場拋頭顱灑熱血，除了為了國家為了人民之外，還希望能夠在戰勝之後獲得豐厚的封賞，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然而該加官進祿亦或是賞賜錢財，皆有所不同。然而，一場戰事要耗費多少資源和資金，戰事過後百廢待舉，正是要用錢之際，因此會有以封官不賜賞為要，如此不致更增加負擔，但如果仔細去分析，封官後其俸祿增加是長久的，其增加之國庫負擔最終還是得加在人民的身上。夏原吉在文中能干冒功臣之眾怒提出自己看法，殊為難得，其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他能眼光看遠而非短視近利，這真是一個治事之能臣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文中提到了英宗時的李賢，在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中有「四常」中《慎類》〈李賢論慎陞賞〉之文，這兩則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賢，南陽人。仕英廟時，為宰相，甚見信任。其時有內直將軍，自言天順初以迎駕陞擢，後以冒功概革，求復原官，上念其久役，許之。已而訴者蜂起，上問李賢曰：「何以處此？」賢對曰：「石亨貪天之功，濫陞若輩凡數千人，名器隕越，莫此為甚。夫國家令甲，非軍功不侯，非從征斬級不世襲，所以

<sup>202</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夏原吉論慎封〉，頁 971-972

慎名爵重操柄也。陛下光復舊物，此輩何功？而滿朝陞擢，金紫輝映，印纍纍，綬若若，所以取富貴者，何其易也！人見取富貴之易，日夜冀幸朝廷有事，謂可僥倖乘機得富貴。夫使人人懷有事之心，則無事尋事。為人主者，豈不甚危？宜慎重之，以遏濫觴，杜瑕釁。」上善其言，命兵部查迎駕陞官者，遂革太平侯張瑾、濟陽伯楊宗等以下凡千餘員，歲損費巨萬。嗟夫，韓昭侯藏一敝袴，曰：「以待有功。」彼一諸侯，猶能慎于其小如此，況為萬乘之君，大者且不能慎，將安所底止哉？南陽此論，可為萬世慎賞者之法。<sup>203</sup>

李賢曰：「夫國家令甲，非軍功不侯，非從征斬級不世襲，所以慎名爵重操柄也。陛下光復舊物，此輩何功？而滿朝陞擢，金紫輝映，印纍纍，綬若若，所以取富貴者，何其易也！人見取富貴之易，日夜冀幸朝廷有事，謂可僥倖乘機得富貴。夫使人人懷有事之心，則無事尋事。為人主者，豈不甚危？宜慎重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無功績而能加官晉爵，那豈非人人只需阿於奉承，天天行鑽營苟且之事即可，那有志報效國家之士當如之何，最後受害者仍是黎民百姓。

### (3)、奸諂貪酷者戒之

同樣的，對於荼毒百姓，殘民自肥的貪官汙吏，江盈科在很多篇幅中對這些惡官凶吏毫不避諱地大加譴責。因為混跡黑暗官場的官僚們所見最多的就是勾心鬥角的齟齬伎倆和口蜜腹劍的無恥小人，對於官場的生存之辛，他們可謂有著清醒地認識和豐富地體驗。我們可從《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四凶」中《奸類》、《諂類》、《貪類》、《酷類》得到這樣的例證。

如《奸類》的〈王翰〉

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及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來，翰

<sup>20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賢論慎陞賞〉，頁 973-974



謂復蒙賞賜，超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稽顙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夫翰仕景皇，則媚景皇以傾英廟；仕英廟則又媚英廟以傾景皇。邪佞反覆，巧於遮飾，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回風飄疏，奸謀畢著，立遭誅戮，豈非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無回風發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赧然於暗室屋漏中也？可戒已<sup>204</sup>。

代宗景泰年間，他曾「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待英宗歸京復位之時，王翰「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於肅潛及其黨不已。」如果不是英宗偶然在文華殿看到一本被風吹開的代宗易儲的奏疏，經查實為王翰于景泰年間所寫。他可能依然會靠著自己的見風使舵、逢迎拍馬的絕技平步青雲，「終身富貴至死」。像王翰這種前後不一、奸邪善變的佞臣，對自己構陷忠良、排除異己的所作所為，根本不可能有一絲一毫的忐忑和不安。為了保住手中既得權力和眼下的政治資本，進一步謀求進階之法，官員們會千方百計地排除異己，不惜用各種卑劣的手段剷除仕途前進之路上的所有障礙。

又如「四凶」《貪類》中的〈汪巡撫〉：

巡撫汪姓者，逸其名，直隸欽縣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都御史，巡撫湖廣。性貪鄙，無論其大，即官衙所貯糠粃、淘米汁，必呼市民分給，倍征價值。夫官至中丞，非小也，擁全楚之大祿，人非簡也。而乃以細物剝民，豈未讀孟獻子鷄豚之戒耶？余因噫古之貪吏有賦筍者，散萬錢市筍萬箇，民請輸筍，乃曰：「寄養汝林，待秋取之。」遂成萬竹，因而計竹值徵十萬錢。有賦鷄卵者，散萬錢市卵萬顆，民請輸卵，乃曰：「寄蓄汝家，待秋取之。」遂成萬鷄，因而計鷄值徵二十萬錢。彼自謂巧于取民不知民亦非拙，特制于上，不敢不應。及至近世，又有巧貪，不啻賦筍與卵者。聞一縣令嗜財無厭，小民有犯，必責贖鍰。一日坐堂上，見一人尿屏牆下，命隸持之曰：「爾犯不應，當輸金二兩。」呼左右將撻焉，其人曰：「幸救予撻，請即輸金。」遂解囊出金，白令曰：「予罪應輸金二，而予囊中金，其數四，願賜鑿鑿去其伴。」令

<sup>20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王翰〉，頁 1047

曰：「不須整，爾往再尿可也。」因盡沒其金，其人空手出，亦不復尿<sup>205</sup>。

本篇傳文有兩位傳主，前傳主汪巡撫性貪鄙，無論其大，即官衙所貯糠粃、淘米汁，必呼市民分給，倍征價值。江盈科借古之貪吏賦筭與卵者一事大大諷刺一番，位居高官，坐擁高邸及豐厚之俸祿，卻與民爭利如此。而下一則之縣令，其作為更是令人大開眼界，竟有要求人民預付罰金之事，其吏政敗壞至此，無怪乎人民深受其害，敢怒而不敢言。

### 3、奇人志士

明朝中後期政治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讓許多生活於其間的有識之士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或者有一技之長，對世事格局有著自己清醒而獨到不同於流俗的認知。於是在這個難以實現傳統儒家知識份子「達則兼濟天下」社會理想的混亂世道下，他們選擇了與之相對的「窮則獨善其身」：退居歸隱，過著枕流漱石、釣月眠雲的生活；或是選擇「大隱隱於市」，混跡於芸芸眾生之中，自食其力，就算布衣寒舍、粗茶淡飯卻也甘之如飴。他們選擇了放任自我卻絕不會恣肆放縱，只是不再受制於世事凡塵的困擾，不再涉身官場的險惡是非，到塵寰之外完成自我價值的最終實現而已。江盈科本人就有寄身官場而心在山林的吏隱傾向，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不佞山林之性，誤而嬰世網，時時注念，未嘗不在丘壑中。思得一卷石，置之齋頭，聊寄吾興<sup>206</sup>。」〈與陳上舍〉當初出茅廬、邁上仕途時那一腔憂國憂民的家國理念逐漸被黑暗政局消磨殆盡的時候，江盈科把目光轉向發現官場俗世之外的高人逸士，未嘗不是一種禮失於衣冠而求諸草野的積極改變和精神寄託。我們可從《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四奇」中的《隱類》、《怪類》、《俠類》得到很多例證。

「四奇」《隱類》中的〈焦隱士〉：

焦隱士，江陰人，逸其名。少與太祖善。太祖登極，思隱士，遣人召之，不赴，議遣大行往趣，隱士聞焉，曰：「奈何以我故，勞貴人爲里中苦？」遂裹

<sup>20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汪巡撫〉，頁 1062

<sup>206</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十三），頁 636

裝詣金陵謁上，用竹籠盛鷄，瓦罌貯酒為贄。謁者為通，上喜，延入便殿，促膝道故。上問曰：「公謂隱士樂耶？天子樂耶？」對曰：「各有其樂，兩不相入。如受圖納貢，撫華賓夷，天子樂也；嗽泉枕石，釣月眠雲，隱士樂也。然天子能憂，乃能終樂；隱士但樂，不復知憂。竊謂隱士樂，乃勝天子樂耳。」上曰：「何居？」焦對曰：「天子未明視朝，日中聽政，日夕糾刑，丙夜就寢，中恒念曰：『民失所乎？啼饑乎？號寒乎？泣隅乎？官失敘乎？墨乎？殘乎？四夷叵測，時跳梁乎？』思之終身，循環無端，而後太平可期，杌捏不生，是謂以憂而易樂。若夫隱士，則藜藿自飽，旨于膏粱矣；濁醪自醉，美于醇醴矣；溪毛為席，山石為枕，倦而偃臥，穩于象床矣。花開以當錦繡，鳥鳴以當管弦，麋鹿以當友朋，烟霞以當帷幕，不營而足，不取而得，一年之內，四時之中，陶陶然自樂其樂，寧復知有所謂憂乎？」上嗟嘆久之，曰：「信哉！天子之樂，不逮隱士之樂也。」因留焦盤桓凡數日，稱觴壽焦，酒既酣，命左右持三帶置案上，金銀革各一束，曰：「朕欲授公一官，請自擇帶。」焦無意于官，然感上雅意，不忍拂，遂取革帶，上乃命司馬授焦千戶侯。……取上所賜革帶及冠服挂桑枝上，曰：「朱皇帝待老焦厚則厚矣，非知我者。夫老焦，懶人也，虱癢懶捫，飯熟懶吃，奈何以進賢冠為我牯、革帶為我綫耶？語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此三物，用付桑君。」浩然長歌而去。<sup>207</sup>。

在《焦隱士》一篇中，江盈科通過焦隱士與明太祖朱元璋關於「天子樂還是隱士樂」的幾句簡單的對話討論，刻畫出了一位豁達放曠、追求自適的隱者形象：「天子未明視朝，日中聽政，日夕糾刑，丙夜就寢。中恒念曰：『民失所乎？啼饑乎？號寒乎？泣隅乎？官失敘乎？墨乎？殘乎？四夷叵測，時跳梁乎？』思之終身，迴圈無端，而後太平可期，杌捏不生，是謂以憂而易樂。若夫隱士，則藜藿自飽，旨於膏粱矣；濁醪自醉，美於醇醴矣；溪毛為席，山石為枕，倦而偃臥，穩於象床矣。花開以當錦繡，鳥鳴以當管弦，麋鹿以當友朋，煙霞以當帷幕，不營而足，不取而得。一年之內，四時之中，陶陶然自樂其樂，寧復知有所謂憂乎？」對話中天子生活與隱士生活的對比，被描述的非常具有畫面感，這些游離于傳統知識分子事功觀念之外的隱逸高人，過的是一種能夠讓天子都發出「信哉！天子之樂，不逮隱士之樂」這樣感喟的率性逍遙生活。

<sup>207</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焦隱士〉，頁 976-977

此外，又如「四奇」《怪類》中的〈胡日星〉：

日星，元末時人，以談命爲業。上微時，命日星布筭，筭畢，跪拜曰：「帝王之命也，當爲真主。」上戒勿言，然心喜之。其後掃除群雄，混一天下，思日星蚤見，遣人召之，賜以酒食，慰勞甚洽。上問之曰：「爾爲朕布筭有驗，今當相酬爾。欲金乎？欲官乎？恣所自擇。」日星叩首辭曰：「臣爲人布筭，自可得糲，不願金也。布筭之人，性好閑散，罔諳吏事，不願官也。」上曰：「然則將何所願？」對曰：「臣願得陛下爲臣題一詩，俯賜褒譽，遨遊四海，足矣。」……一日，倦游歸家，餘一年，忽語其妻曰：「吾將往謁上。」妻曰：「老年之人，不奉召命，休息里中可矣，願無往。」日星曰：「吾往就死耳。」妻曰：「爾未得罪朝廷，何以死爲？」答曰：「數固然耳，不可避也。」遂赴京，及入見，上慰勞之甚厚。適大將軍藍玉征西還，召星布筭，星曰：「公命當加保傅，加後七日當刑，我乃與公同難。」無何，玉果拜太傅。玉素恃功，頗驕傲，乃曰：「我固當太師，奚而太傅爲？」上聞之怒，使人按玉，謂玉謀反有狀，命斬于市，玉臨刑嘆曰：「從日星言，辭加太傅，或無此禍。」上聞其語，召日星問曰：「爾知藍玉死日乎？」曰：「然。」上又曰：「爾亦知自死日乎？」曰：「臣死在今日，臣出門時，已先言于臣之妻矣。」遂見殺<sup>208</sup>。

傳文之中胡日星深諳布筭之術，能測知太祖一統天下，而太祖亦以「欲金乎？欲官乎？恣所自擇。」回報。本可因此飛黃騰達，但他卻以「布筭之人，性好閑散，罔諳吏事，不願官也」加以拒絕。然世事終有命定，伴君如伴虎，雖曰其知其必死之時，然讀來亦令人有不勝唏噓之感。

<sup>20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焦隱士〉，頁 988-989

## 第四章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敘述及思想呈現

史傳文學的根本特徵在於文學與史學的融合為一。就史傳文學而論，它不僅是歷史，也是文學。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展現了古代社會漫長的歷史的進程、歷史的運動、歷史的變化，它是歷史著作，文學不過是其表現手法。從文學的角度而論，史書只是載體，它以歷史的形式包容了人類社會的眾生萬象，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縮影，是具有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史傳文學的載體既然是史書，它當然具備歷史著作的本體特徵。大凡歷史著作所應有的本體意識，如史鑒與勸懲，講求實錄的原則，以至史家所必須具備的德、才、學、識，在史傳文學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現。

郭丹曾提到史傳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並不是只以簡單枯燥地排比歷史史實或機械地闡述歷史變化規律，而是用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來解釋歷史。它極少作令人乏味的說教，而是將歷史意識融通於人物的言行之中，將歷史運動轉變成情節複雜的歷史故事，將歷史文學化、故事化、人物形象化。有的人物性格相當鮮明，有的人物形象具有了典型意義可而複雜紛紜的歷史事件，富於戲劇性的故事情節；有時還增加了許多興味細節描寫，心理情態刻畫<sup>209</sup>。

文學的特質在於形象，敘事文本構成在於情節，史傳文學的上述特徵無疑使其成為具有品味的文學作品。不但如此，在以形象和情節解釋歷史的過程中，作者還會適時表現出自己的評價，注入個人的感情。與此同時，史傳文學還為敘事文學確立了楷模，《左傳》文章的敘事手法，《史記》中的寫人藝術，千百年後仍然被史家和文學家奉為圭臬。

趙明政在《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曾歸納出筆記小說一般性的體制特徵：「一、具有一定情節與較完整的結構，並以人物為中心鋪寫故事，以記敘為主，間或有議論和抒情，二、選取具有特徵性的、典型意義的細節，突出人物某個方面的個性特徵，刻畫出「剪影」式的人物形象，三、由於筆記小說屬於「私家著述」，因而顧忌較少，行文不拘一格，內容繽紛多彩，生動具體，四、採用史體筆法，短小精悍，文字簡潔。」他以為，凡採用筆記體，又具有小說意味，符合上述筆記小

<sup>209</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3

說體制特徵的方可稱為筆記體小說<sup>210</sup>。

另外，趙毅衡〈「敘述」還是「敘事」〉這篇文章中主張統一用「敘述」來取代「敘事」，包含派生詞組：敘述者、敘述學、敘述化、敘述理論。其因有三：一、語言以從眾為原則，「敘述」使用度高於「敘事」。二、從使用方便上來考慮，「敘事」這個動賓雙音詞，已經有賓語。三、從學理上說「敘事」暗示事件先於講述而存在，但是變化本身無法自行呈現，只有被敘述出來後才成為事件。敘述主體把意圖性置入文本，這才使狀態變化成為事件，成為一個有意味的敘述<sup>211</sup>。

在本文中他又提到敘述研究首先遇到的最基本分野，是虛構性/事實性。所謂「事實性」指的是對敘述主體與接受主體的關聯方式，即接收人把敘述人看作在陳述事實。這兩者的區別至關重要：內容不受敘述程序控制，要走出文本才能驗證，而理解方式，卻是敘述表意所依靠的最基本的主體間性。「事實性敘述」包括新聞、歷史、法庭辯詞等。」他又指出敘述分類當中的語態的有三種基本方式，具有傳達表意的普世性，那就是陳述、疑問和祈使這三種說法。按內在時間向度，可以對敘述作出以下的劃分：一、陳述式（過去向度敘述）：歷史、小說、文字新聞、檔案等；二、疑問式（現在向度敘述）：戲劇、電影、電視新聞、音樂、歌曲等；三、祈使式（未來向度敘述）廣告、預告片、預測、未來學等。這三類敘述真正區分在於敘述主體意圖關注的時間方向：過去向度著重記錄，因此是陳述；現在向度著重演示，意義懸置，因此是疑問；未來向度著重規勸，因此是祈使<sup>212</sup>。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中著重在對過去歷史的陳述，有強大的事實性，他將傳主分門別類，把這些人物和事件理解成有內在時間和意義向度的文本。故事之中至少會有一段完整的情節及結構，內容生動精采，而每一個傳主其所要表現的就是在它這個門類下的特殊性，每篇文章雖說有長有短，但也能適時展現傳主言行舉止的特色，也可說是特寫鏡頭。

<sup>210</sup>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8

<sup>211</sup> 趙毅衡：〈「敘述」還是「敘事」？一個不能再「權宜」下去的術語混亂〉《外國文學評論》(No.1, 2009)，頁228-232

<sup>212</sup> 趙毅衡：〈廣義敘述學：一個建議〉《敘事》中國版(第二輯)，頁156-157。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中曾就該書的編輯體例和意圖作了闡釋，而上一章中我們也曾就《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內容及主題做了一番介紹。做為一部以記載人物言行事蹟為主，藉以保存史實和勸善懲惡的作品。而勸善懲惡就是未來向度著重在規勸，因此也是符合趙毅衡所提到的祈使，希望未來大家能以資鑑戒。《皇明十六種小傳》深受中國傳統史傳文學敘事傳統影響，然而它又符合筆記小說的體制特徵，此項說明似乎更能符合《皇明十六種小傳》所要呈現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以此基礎來探討《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敘述藝術、人物形象、思想呈現。

### 第一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事實性敘述

對於史書的敘事要求，中國古代史家早就很明就很明確。劉知幾曾指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文而不麗，質而非野」<sup>213</sup>《史通·敘事》，即是劉知幾所理解的標準。宋人吳縝說得更為明確：「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sup>214</sup>「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sup>214</sup>。〈新唐書糾謬序〉要有文采，就要講究敘事的方式。中國古代史傳文學作家找到了這個方式，就是文學化的敘事方式。史學的敘事方式與文學的敘事方式是不同的。史學的敘事方式，大概如吳縝所說：「有是事而如是書」，「因事實而寓懲勸」<sup>215</sup>〈新唐書糾謬序〉而文學的敘事，則要求進行藝術上的加工，它講究敘事的角度，講究辭藻，要充滿感情色彩，更可以想像虛構<sup>216</sup>。狄德羅曾說過：「歷史家只是簡單地，單純地寫下了所發生的事實，因此不一定盡他們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沒有盡可去感動人，去提起人的興趣。如果是詩人的話，他就會寫出一他以為最能動人的東西。他會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詞，他會對歷史添枝加葉。對於他，重要的是做到驚奇不失逼真，只要他遵照自然的程式，而自適於把一些異常情節結合起來，同時是這些異常的情節為情況所容許」<sup>217</sup>。我們看《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晏子春秋》等作品，

<sup>213</sup> 〔明〕王惟儉《史通訓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頁302

<sup>214</sup> 〔北宋〕吳縝《新唐書糾謬》，《景印摛藻糖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三十四冊，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頁5

<sup>215</sup> 同前注，頁6

<sup>216</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04

<sup>217</sup> 狄德羅著，余秋雨譯《論戲劇藝術》，載《西方文論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356頁

作者總是避免用簡單平面的方式記載事件，而是採用多面向立體化手法，將歷史事件解釋成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故事。作者在敘事之中常投注著自身的感情，在適當的時候對歷史加以評價。同時加入了許多虛構想像的情節，使作品變得更加瑰麗多彩。這種文與史的結合，使得歷史著作成為傑出的文學著作。

## 一、正文採陳述語態

史傳文學採用的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方式，也就是所謂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敘事者是一個獨立於故事外的敘事者，但是並不進入一群角色的意識，而是聚焦於單一角色身上。敘事者持續進入某個角色的意識，專注描述某個角色的經歷和心路，詳述某個角色對人對事的想法和感覺。敘事者不充當情範中的任何角色，只是以一種局外人、旁觀者述一切歷史事件，客觀的將事件、情節的發生、發展、結局一一展現出來。敘述者可以無所不知，無所不在，跨越時空而探尋於歷史的各個細部，描述事件的任何細節。史傳文學一般都用三人稱敘述。我們看《國語》、《左傳》、《國策》、《史記》、《漢書》等，作者一般都是作為局外人從旁敘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時雖也插進對人物事件的褒貶評價，更多的只是將褒貶隱含於情節中，作者只一味的說開去。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四維」《忠類》中的〈濮真〉：

真，鳳陽人。太祖起兵時，率衆來投，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總兵征高麗國，兵敗見執，國王愛其驍勇，欲協真降。真嗔目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犬豕耳，敢以此望我？」王怒，欲殺之，真大罵曰：「爾害我命，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我烈丈夫，心可剖，志不可屈。」即抽刀剖心示之，立死。王初意止欲協真，不虞真死。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梁侯，報真功<sup>218</sup>。

《明史》〈濮真〉傳中所載，濮真是隨大將軍馮勝北征元將納哈出，遇伏為國捐軀。

<sup>21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濮真〉，頁 906



江盈科傳文中則為征高麗國，兵敗見執，前已考證與事實並不相符。然作者描寫濮真：「真嗔目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犬豕耳，敢以此望我？』」，「『爾害我命，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我烈丈夫，心可剖，志不可屈。』即抽刀剖心示之，立死。」被賊所擄仍寧死不屈痛罵賊寇的英烈行為。其敘述雖然只有短短 234 字，卻字字如在眼前，句句栩栩如生，不須太多冗辭贅言便能使讀者深受震撼而大為感動。這樣的敘述，讀者不會感覺敘事者存在，而自己卻不知不覺的沉浸入事件與情節中去了。在時空方面，作者也可以不太受其限制，空間與場面可以多方位進行。

同樣在「四凶」《酷類》中的〈詹徽〉：

詹徽，武昌人。同之子，性殘忍，用法好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嘗陷太師李善長，竟坐死。又惡解縉為虞部郎王朝用草疏救善長，並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惡徽刻，嘗因錄囚，欲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且密言于上，謂太子妄有縱舍。太子為囚白于上，上執先人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徽所持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自為之。」太子懼，因感疾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及建文為皇太孫，監徽錄藍獄。徽鞫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但株連。玉乃大呼曰：「徽實吾黨，故欲促殺玉，恐相株連耳。」上聞之，命並鞫徽。既服，太孫令先斷徽手足，戮于市。人皆以為天道之報云<sup>219</sup>。

作者站在一旁觀者的角度來陳述詹徽生性殘忍、用法好刻之事。「太子為囚白于上，上執先人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徽所持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自為之。』」所謂刑獄之事當求情、理、法兼具，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寫作之時正是以大理寺正刑恤滇黔之際，當年他活人無數，因此對於君上對刑獄制度的看法以及像詹徽這樣的酷吏，自然是他要拿來引以為鑑，列為門目的。

<sup>219</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詹徽〉，頁 1063

## 二、 贊語採祈使語態

史傳文學也有用第一人稱敘事的，多半在結束語中，主要是《史記》、《漢書》的論贊之中。如《項羽本紀》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sup>220</sup>。」《史記留侯世家》曰：「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sup>221</sup>。」等等。在《皇明十六種小傳》絕大部分小傳文末都有江盈科的「按語」或是「噫」等論贊語，他表達自身對傳主的看法及評論，當是以第一人稱敘事模式書寫。

從先秦到漢魏六朝的史書，在體裁結構上有一個特徵，就是每篇作品之後附有論贊。《左傳》中有「君子曰」、《史記》中有「太史公曰」、《漢書》中有「贊曰」等等。這些，本屬於史學批評即史論範疇的一種形式。就史學批評方面說，隨著史學的發展，史論的形式還出現了專文和專書。自古以來，中國的史書就重視史論。從萌芽的形態說，孔子《春秋》中的「春秋筆法」，一字定褒貶，就是一種原始的歷史評論，只是它過於隱晦而且簡陋，無法讓史家充分闡述自己對歷史事件的意見。論贊式的史評肇端于《左傳》。《左傳》中多次出現的「君子曰」、「君子謂」，開創了後代史書論贊體的先河。

司馬遷正是在先秦史書的「君子曰」這種論贊體形式的基礎之上，創立了「太史公曰」這一新體式，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論贊」體史學批評模式。《史記》全書每篇正文或前或後都附有一段「太史公曰」，共 137 條，約三萬餘字。篇前稱「序」，篇末稱「贊」。這些序贊，精意深旨、言辭精練、議論宏闊、筆勢縱放。更重要的是司馬遷在這些贊序之中，或藉以補充原篇中的事和義、或進行歷史上興亡成敗經驗教訓的總結、或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或綜合概括篇中內容，充分發揮了作為史學

<sup>220</sup>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38

<sup>221</sup>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2049

批評「論贊體」的功能。從此之後，「論贊」體史評已成為一個固定格式。

就史學的意義來說「論贊」體的批評，是史家表達歷史識見的一個重要方式。正如前面已經談到的，中國古代史學與西方史學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從不把自己置身於歷史之外只作「純客觀」的描述，而是將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在對歷史事件進行描述的時候，又進行多方面的評價，使史家的觀點、思想傾向和才識見解得到充分的表現，其目的，在於更充分發揮史著和史學經世致用、借鑒資治的作用。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特立「史論」類，並說明其原因：「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敘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sup>222</sup>。」《文選·序》這說明了史書中的序、述、論、贊具有「沉思」「翰藻」的特點，即經過精心結撰，講究文采辭藻，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和審美價值，在史書之中只會為史書增色。由此可見「論贊」的獨特作用與地位。

郭丹也曾經提到「論贊」對於史傳文學作品來說，其功能可以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可以用來敘事。也可以補充原來篇章中的事和義，使得全篇的材料組織剪裁更為合理。第二是對歷史人物進行評論使性格形象更為鮮明。《史記》人物傳記中的「太史公曰」，大量的的是對人物性格的概括，對人物的功過、作用、地位、影響的全面評價。第三是增強了史傳文學的議論和抒情的特徵。鮮明的褒貶所產生的強烈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的史事記載和史學分析，二者常不容易統一。而司馬遷則把它們統一起來了。這就是利用論贊議論抒情，這樣，既不影響實錄的原則，又可為作者找到條宣洩感情的途徑<sup>223</sup>。

前面曾提到，在《皇明十六種小傳》絕大部分小傳文末都有江盈科的「按語」或是「噫」等論贊語，在一百五十二篇小傳之中有如「論贊」般文字敘述的篇章就高達一百二十四篇，比例高達八成以上。

江盈科在〈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一篇之中贊揚了劉大夏能用計阻止汪直欲伐

<sup>222</sup> 〔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文選序），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7月，頁3

<sup>223</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56-58

安南之事，不僅使人民不必受戰亂之苦，也斷了奸賊欲中飽私囊之謀：「嗟夫，小人欲冒封賞，圖富貴，往往以人之國僥倖，至于兵連禍結，莫可救藥。昔太監王振一試于麓川，而萬乘之國半殘；再試于土木，而萬乘之尊且為俘虜。大抵皆輕舉妄動，生于一念之貪，而不顧國家安危之筭。然則汪直此舉，向非劉大夏以計遏之，其流毒又不知所終矣<sup>224</sup>。」在〈山雲〉一篇中，為讚揚山雲的清正廉潔和鄭姓皂衣的成人之美，作者用了「嗟夫，雲之清廉，固將領中所絕少，而鄭皂能持正論，以成雲之廉，亦人所難能也<sup>225</sup>。」〈于謙〉篇，江盈科引用一句古語「勞其心，躬其身，以憂社稷<sup>226</sup>。」來作為對於于謙的評判。〈阿丑〉篇末，在極力描摹優人阿丑得寵於上的各種情態後，分析總結其受寵的根本原因為「凡譎諛得意者，皆由其言中于機宜，非苟而已也<sup>227</sup>。」〈康海〉篇中，對於人們非議頗深的康海，作者查其本心，發出了不用於常人的異樣言辭：「噫，海非有求於謹者也，不能致，乃以救夢陽，故不恤其身，不自有其名節，濡足於瑾。充是心也，可以托孤。觀過知仁，若海者，真節俠也。惜乎世之不諒，然後世自有諒海者矣<sup>228</sup>。」

而〈彭澤〉篇末，江盈科對於彭澤只不過是想求取吏部侍郎之位，竟然大費周章造謠生事，借刀殺人，其心能無愧乎，甚至引詩經·小雅·巷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sup>229</sup>」來說明造謠者連豺虎皆不食：「噫，鄙夫志於富貴，無所不至，若彭澤者，真其人哉！澤不過欲得吏部侍郎耳，乃下石於徐縉，設阱於薛侃，借張孚敬之手以傾人，即至於誤敬而不顧，扼夏言之吭以伸己，即至於殺言而亦甘心焉。假令其計盡行，去者去，死者死，澤靦顏居於其位，能不愧死乎？詩人所稱「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澤之謂矣<sup>230</sup>。」對那些汲汲營營於追求功名利祿之人，深有諷刺之意。

在公安派文學綱領中，「獨抒性靈」的「性靈」即「審美主體對現實人生喜怒哀樂和嗜好情欲的真實感受」，江盈科希望在用記敘與議論兼顧的方式採第一人稱敘事

<sup>22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頁 1007

<sup>22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山雲〉，頁 933

<sup>22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于謙〉，頁 934

<sup>227</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阿丑〉，頁 1025

<sup>22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康海〉，頁 1039

<sup>229</sup> 李辰冬《詩經通釋·下》，台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5月，頁 1205

<sup>23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彭澤〉，頁 1049-1051

模式書寫，發表自己對人情事理的精彩見解，強調著作者這個創作主體本身的各類情感體驗來深化了傳文的主旨，表達自身對傳主的看法及評論。

### 三、事實與實錄

客觀敘述成為史傳文學乃至於中國古代史著的傳統敘事手法，這與史學傳統強調「實錄」、「直書」有關。史家記載歷史，要「秉筆直書」，讓客觀事實自己說話，不必加以太多的評論。所以，史學中「實錄」的原則，讓史傳文學採用了客觀敘述的方式作者將自己隱蔽起來，把事件或故事按照實際樣貌敘述出來，讀者並不感覺到有一個敘述者站在面前，這就是客觀敘述。這裡並不排除作者對原材料的剪裁、取捨，只是在敘述時作者是隱蔽的。

在前面曾提到宋人吳縝所言：「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吳縝認為三者之中，「事實」乃為第一要義。所謂事實，即「有是事而如是書」，也就是說，客觀發生的歷史，史家「如是」地即按其本來面貌記載下來，這就是實錄，這就是「為史之意」的根本，褒貶和文采都必須資此而行。如果「事實未明」，則「為史之意」，褒貶、文采也就毫無意義了。吳縝的概括，使得「實錄」原則的要求與作用更加明確。實錄的原則，成為史學批評的一個崇高的評判標準。西方史學理論也同樣強調「實錄」的原則。古希臘思想家盧奇安說：「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又說：「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歷史家要講的事件已經擺在他的面前，既然是真實的事件，他就不得不如實直陳<sup>231</sup>。」

實錄的原則，為史傳文學乃至中國傳記文學樹立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就是強調真實。真實是史傳文學和傳記，要忠於歷史、忠於事實，這就要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去寫，不但人物和事件要真實，細節也應是真實的。不僅如此，就是圍繞著人物活動的環境也是真實的。這一點，在司馬遷的筆下已初步實現。

司馬遷要學習《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敢於揭露歷代統治者的得

---

<sup>231</sup> 盧奇安《論撰史》，載《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194



失。司馬遷不僅對先秦帝王敢於善善惡惡，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他敢於揭露漢代統治者的陰暗面。所謂「馬遷述漢非」《史通·直書》，這是更為難能可貴的。諸如劉邦，司馬遷既寫出他的戰略眼光，善於用人，又寫出他的流氓無賴作風、好酒及色、因人成事。對於項羽，儘管這是司馬遷所喜歡的一位英雄，也同樣寫出項羽的優柔寡斷，缺乏政治家的遠大目光。漢武帝朝，是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而《史記》深刻地揭露了漢武帝時代的種種弊端和社會矛盾。揭露當朝統治者的陰暗面，的確需要非凡的膽識與勇氣。

司馬遷之後，歷代的傳記文學作家，無不將「實錄」真實地寫作歷史人物奉為自己創作的要義，力求將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物展現在讀者面前。這就使史傳文學比之於其他任何種樣式的文學作品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再一個方面，實錄的原則不但是一个著史的方法論問題，從作主體的角度來說，強調實錄，反映了人們對歷史著作創作主素質的要求，顯示出創作主體對歷史的態度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中也展現了「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精神，例如「四維」《忠類》中的〈楊繼盛〉：

繼盛，北直隸人，性中心鯁。世廟時第進士，仕為兵部員外，以諫阻馬市，謫為荔浦縣典史。其後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先見，擢為令，一歲之間四轉，仍為兵部郎。繼盛乃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譖于上。竟坐誹謗罪，當死，獄具，至冬月，繼盛三木詣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囊嵩與世蕃？」繼盛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延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上雖論盛死，心實器之，每讞，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惟邊防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上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匣，備諸苦楚。年荒家

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讞，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在不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抑不得達，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西市。<sup>232</sup>！

傳文中將嚴嵩父子專橫跋扈把持國政的囂張氣燄如實呈現，「繼盛乃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譖于上。竟坐誹謗罪，當死。」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君上知否：「上雖論盛死，心實器之，每讞，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知之又如何，終又被嚴嵩所蒙蔽。楊忠愍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與忠魂補。」夫人張問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張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忠愍不應，足見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甚之連鬼魂都為其感到不值得「旋繞案前，啼號甚哀」。而江盈科只在傳後以好漢哉！好漢哉！做為評論，然其前所敘述，表張忠愍公忠義英勇、慷慨赴義的精神在此表漏無遺，讓人敬佩。吾怪乎今人高陽曾評斷：「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蕩，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亡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姦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sup>233</sup>。」

又如「四常」《寬類》中的〈楊文貞諫止伐趙〉：

宣德時，漢王高煦謀叛，宣廟躬帥六師往伐之，擒煦凱旋。時大臣陳山、楊士奇、榮、溥、甯義、夏原吉皆護從。尚書陳山言于上曰：「漢趙一體，漢亡趙存，如剪草留根，終必滋蔓，莫若乘滅漢之威，并擒之。二王就擒，陛下高枕卧無憂矣。」上以為然，召榮、義、原吉議之，皆曰：「山言是。」榮曰：「事須有名，今宜降敕趙王，數其通漢之罪，因而六師猝至趙，趙亦亡漢之續耳。」上喜，遂命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固須有名，亦須有實。況舉大逆之罪加于叔父之親，不實何以服天下？趙王當先帝時，辭常山護衛，至再至三，其意固欲以自明，今乃比于漢王同類共誅，何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且敕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欲沮撓大事耶？我不圖人，人將圖我。但令緹騎嚴訊漢府繫累責趙通漢狀，必有承者，何患無詞？」奇曰：「詞則有矣，

<sup>232</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楊繼盛〉，頁 919-920

<sup>233</sup> 高陽《明朝的皇帝》，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85

然非其實。假令趙王含冤死，謂公論何？公等不畏鬼神乎？」因謂榮及原吉曰：「文廟止三子，上親叔二人，誅其反者，厚待其不反者，庶可仰對皇祖之靈。」……至京，上始思奇言，召奇諭曰：「仗卿言，使朕不獲罪皇祖，又趙王妻子得免繫囚。此仁人之言。但今臣下論趙事者益衆，何以處此？朕意欲封諸臣疏致趙王，以明朕之不疑，且絕小人口而堅王翼戴之心，如何？」士奇再拜稱善，且曰：「得陛下手書數行，親諭之更善。」上從之，遣駙馬袁容、都御史劉觀賚至趙，趙王讀敕語及諸臣疏，北向痛哭，曰：「微陛下鑒臣孤忠，臣妻子爲魚肉矣。」即遣人謝恩，獻護衛，言者乃息。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是自古以來所人所共知之通例，傳文之中漢王高煦謀叛為宣宗皇帝親征平定，朝野上下無不希望趁滅漢之威，一舉拿下與漢王關係密切的趙王，獨有楊士奇獨排眾議力陳趙王無謀叛之心。其議初時不為群臣甚至是皇帝所接受，然事緩則有所變。宣宗最終明白楊士奇之苦心，不僅將眾臣之疏致趙王，甚至親筆為文予趙王，陳其護宗親之苦心，致此事圓滿而成。楊士奇所言：「事固須有名，亦須有實。况舉大逆之罪加于叔父之親，不實何以服天下？趙王當先帝時，辭常山護衛，至再至三，其意固欲以自明，今乃比于漢王同類共誅，何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且敕旨以何爲辭？」他忠於事實而能秉公直言，其情節鋪陳亦能表達之真實之意義。

再如「四凶」《諂類》中的〈黃玠〉：

玠，思明府土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垌祖職，密遣刺客殺垌一家，次日佯爲聞變也者，往赴屍所痛哭，而又故爲捕盜狀，以自掩飾。未久，事覺，廣西撫按按治之，當死。玠計無可免，度上欲易故太子，未有其端，于是詣闕上疏言：「父有天下傳諸子，古今通義，陛下紹大統數年于茲，而青宮震器猶然未正，非所以崇大本，定大計。此在遠夷尚且日夜冀儲位早端，而况中國臣民乎？願幸留意。」上久萌此念，憚公議未發，覽玠疏，大喜，遂命中官持示內閣，仍賜內閣陳循等各金五十兩，銀一百兩，以關其口，遂定議，易英廟所立故太子，而自立其子爲太子，舉朝陞賞無數。尚書王直嘆曰：「嗟嗟，此何等事？乃出西南夷罪繫口，其謂辱宗廟



何？」玠會赦復職，尋陞都督。後英廟復辟，玠仰藥死，剖棺鞭屍，其子政等皆伏誅<sup>234</sup>。

傳文中黃玠為謀一己之私，派遣刺客殺害其嫡兄奪其祖職，事發本應當死刑，然奸邪之人無所不用其極以避死。竟能度上之意迎其改立太子之議，上下交相賊，遂免其死，並得陞都督。黃玠以一邊夷土司竟能動國之大本立儲之士，其汲汲於趨利避難之能躍然紙上。然善惡終有報，最終英廟復辟，仰藥死，剖棺鞭屍。



---

<sup>23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黃玠〉，頁 1058

## 第二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人物形象

史傳作品與一般的歷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它不是簡單枯燥地排列歷史事實，而是用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闡述歷史。郭丹曾說過由於形成了以形象和情節解繹歷史的傳統，史傳著作的作者在記敘人物和事件時避免平板地介紹，而是採用故事化的手法敘述，這使得作品中人物常常具備鮮明的性格。而為了突出人物的某些特徵，可以壓縮不必要的時間交代過程，延長或放大富有生命特徵的事件。歷史敘述的故事化、情節化，加上鮮明的人物形象，史傳作品便具有很強的小說成分與小說模式<sup>235</sup>。而張新科也曾經說過不同於一般列歷史著作在敘述人物事件時採用概括法，只是概括介紹某人做了某事，史傳作品歷史著用的是形象法，把事件過程具體化、故事化，使死的資料變成活的藝術形象。其在表現手法上，常出現以下的特徵：（一）除了作者的敘述語言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歷史人物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人物的個性。（二）通過細節描寫或生活中的某些插曲來刻畫人物。（三）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以突顯人物形象。（四）以互見手法展現同一人物的不同面貌<sup>236</sup>。上述的特徵，皆可在《皇明十六種小傳》書中找到類似的痕跡。以下就以《皇明十六種小傳》常常出現的類型來加以歸納整理：

### 一、善用語言陳述人物個性

例如「四維」《廉類》中的〈虞信〉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貢入胄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一屬吏饋其子金研，受之，置案頭，信忽見研，訝曰：「適從何來？爾父橐中無長物，爾清白吏子，胡爲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子跪以情告，信怒曰：「墜我家聲者，必癡鬼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噫，父子天性也，受一研，罪不應死，而必殺之，蓋矢志清白，即骨肉有所不暇念。行雖過當，然令貪夫聞之，汗流浹踵矣。《沔陽志》載此事，亦嘉信之清而少其度。予謂

<sup>235</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02

<sup>236</sup>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陝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頁55

獨往之行可以風，故述其略<sup>237</sup>。

文中的虞信其形象本就為「有直聲，猶敦尚廉節」，聞其子受屬吏金研，其反映完全表達在言語之上：「適從何來？爾父橐中無長物，爾清白吏子，胡為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墜我家聲者，必癡鬼也。」甚至到最後竟撲殺此子，其言行一致，再再顯現其捍衛清廉行政之堅持

「四奇」《機類》中的〈阿丑〉

丑，成化間優人，供奉御喜宮，性善諧謔，每於御前打院本，時有匡救，頗類東方生譎諫之風。時太監汪直有寵於上，手握天憲，舉朝憚之。威寧伯王鉞、兵部尚書陳鉞皆附直起功名，陞擢濫觴，名器掃地。然直勢侔主上，人莫敢斥。丑一日於上前打院本，扮一醉漢大酗酒，或駭之曰：「兵馬來。」亦酗。又駭之曰：「御史來。」亦酗。復駭之曰：「皇帝來。」亦酗。既而曰：「汪公公來。」乃逡巡起避。問者曰：「爾不怕皇帝，怕公公乎？」醉漢曰：「皇帝當得汪公公那些？」上聞之感悟。久之，又扮一人，左右手各仗一鉞，或問：「此鉞何名？」答曰：「左邊王鉞，右邊陳鉞，兩鉞在手，橫行亂走。」問者曰：「爾何名？」乃叱曰：「瞎眼奴，兩京十三省，誰不知俺姓汪的？也須問。」上微哂，然心漸悟直橫矣<sup>238</sup>。

在這一篇傳文之中，作者似乎在帶領讀者欣賞一部官場現形記的大戲，文前只交代：「時太監汪直有寵於上，手握天憲，舉朝憚之。威寧伯王鉞、兵部尚書陳鉞皆附直起功名，陞擢濫觴，名器掃地。然直勢侔主上，人莫敢斥。」而後藉由阿丑諧謔般的演出，如「爾不怕皇帝，怕公公乎？」醉漢曰：「皇帝當得汪公公那些？」，「瞎眼奴，兩京十三省，誰不知俺姓汪的？也須問。」不需冒死犯顏直諫直言，便將這班橫行於世、目無尊上惡吏貪官的形象，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展現在世人眼前，讓主上深為感悟。後直等雖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為奸臣結黨弄權誤國者之戒。然這般寓褒貶懲戒於演出之中，不啻是讓人耳目一新，不僅大快人心，亦收良好之效果。同樣在〈阿丑〉中又提到另兩件事：

<sup>237</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虞信〉，頁 931

<sup>23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阿丑〉，頁 1025

時保國公朱永役團營兵二千人起私第，丑於御前扮一儒生，朗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問者約：「還少二千。」答曰：「那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至孝廟時，程學士敏政受萬金賄題，事覺，猶自展辨，丑乃於御前扮二人相語，其一曰：「昨日外夷進貢大豬一隻。」問者曰：「可如牛大？」曰：「不止」。又曰：「如象大？」「亦不止」。「然則何如？」曰：「我不知多少大，只說割下一副頭腸蹄，便賣一萬兩銀子。」上大笑，敏政聞之，亦伏罪<sup>239</sup>。

保國公朱永役團營兵二千人起私第、程學士敏政受萬金賄題二事，其演出呈現更是令人戲謔發噱、拍案叫絕。無怪乎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中曾言：「譬如燕會看演傳奇，全本演完，又於別本中抽演雜劇，夫雜劇非全本也，而實全本中之豔麗新特者也，故更盡酒闌之後醒人睡眠者，必雜劇也。然則茲編也，謂之國史中雜劇，不亦可乎<sup>240</sup>？」其理不言可喻。

又如「四凶」《貪類》中的〈吳中〉

吳中，宣德間官工部尚書，性嗜財，積貲巨萬，置嬖妾數十人。其妻剛正，中嚴事焉，凜不敢犯。宣廟聞之，嘗宴臣僚，陰屬教坊扮戲嘲笑中。優人扮大司馬、點閘總戎等官，內一人金兜鍪，銀鎖甲，跪階下，司馬因事詰之，其人叩頭曰：「奶奶見饒也罷。」司馬愈怒，曰：「爾不呼老爺，呼奶奶，豈喪心耶？」其人答曰：「小將平日不怕老爺，只怕奶奶。」左右因目之曰：「此是怕婦人的元帥。」上大笑，中亦知其嘲己，然竟不敢有加于妻。及一日受封誥，迎置于家妻拜畢，謂其子曰：「試為我朗誦一過。」誦訖。問曰：「誥中語果出皇上？抑翰林先生代筆耶？」其子應曰：「亦翰林代筆耳。」妻曰：「這翰林文章句句皆真。」子請曰：「何也？」答曰：「他道爾父事事好，並不說清廉兩字，豈非真言？」中聞之甚愧<sup>241</sup>。

吳中身為工部尚書，是經手工程、營建、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國家重要建設的最高首長，其能經手之經費當屬最高。然卻不知潔身自愛，嗜財之名遠近皆知，

<sup>239</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阿丑〉，頁 1026

<sup>24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頁 904

<sup>241</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序〉，頁 1061

連皇帝都知道，並借「其妻剛正，中嚴事焉，凜不敢犯。」之事，在宴會中藉優人之口來加以諷刺。「爾不呼老爺，呼奶奶，豈喪心耶？」「小將平日不怕老爺，只怕奶奶。」「此是怕婦人的元帥。」簡單數語卻維妙維肖的奚落了吳中懼怕夫人之事實。其妻剛正亦深知其夫之醜行，一日受封誥，本是該大加慶賀並深以為幸之事，然其妻曰：「他道爾父事事好，并不說清廉兩字，豈非真言？」字裡行間之中把一個身為官吏之妻對於其夫之所做所為，她的無奈的心情完全表現在言語之中。

## 二、運用細節描寫人物行止

自《史記》運用細節描寫以突顯人物性格獲得巨大成功之後，歷來的史傳作品無不藉此方式以記事寫人。賈文仁曾提到關於細節的作用有如下數端：（一）細節可以增強故事情節的真實感、具體感和作品的藝術魅力。蓋真實才能可信，具體才能形象，細節正是使作品產生強烈的真實感、具體感，產生可信的形象和藝術魅力的必要條件，（二）細節有助於塑造血肉豐滿的典型人物，細節正是對人物進行典型化，賦予以血肉和生命的重要手段，沒有細節，故事的具體性減弱了，人物的性格特徵也就模糊了。（三）細節可以闡明並深化主題。細節一是必須真實，富有特徵，二是必須配合人物，故事和主題的需要，才能產生好的作用<sup>242</sup>。《皇明十六種小傳》的許多傳文之中無論是人物、故事和主題思想，都通過細節，尤其是富有特徵性的細節，把具體的形象切實而有力地表現出來。

例如「四常」《明類》中的〈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成廟時，舉孝廉，官御史，權貴憚之，目為周鏡面。巡按閩、直，赫奕有聲，及擢為浙江按察，數決疑獄，時人比之包孝肅焉。蓋新既廉直，又善發奸。偶一日坐廳事，風飄一葉旋階下，新曰：「此何葉？」左右曰：「城外某寺有之。」新即詣寺，直造樹下，視其地墳，命掘焉，得婦人屍，蓋僧匿之與淫者，恐人窺焉，殺以滅口，因瘞于此。按之，僧伏罪。未幾，新有所往，忽青蠅數萬團聚車前，新曰：「豈冤魂耶？當群詣冤地，我按治之。」命廝徒隨蠅所向，至一處，掘得男子屍，帶間繫小布印。新佯曰：「此

<sup>242</sup> 賈文仁：《古典小說大觀園》，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3月，頁251

骨無主，地方其瘞之。」即陰遣人赴市易布，諸家皆遍，于群布中覈印記同者，知其殺人盜布，按而誅之。又所部一人久客于外，及歸，夜將半，去家三舍許，謂携貲頗重，不能疾行，乃置古廟一石下，擬明辰早取之。至家坐定，妻曰：「君為客經年，乃空手歸乎？」夫委曲告之故，辰起往取貨，愕然石耳。其人忿甚，鳴于新。新繫之，遣人逮其妻，及至，語之曰：「爾夫昨夜回，爾所私人從床縛起立壁間，竊聽久之，爾知之乎？」妻不能隱，但曰：「所私誠有之，竊聽與否，不知也。」新叩其名，即遣人逮至，問曰：「爾昨夜于某廟石下取某人金，可持原封見還，否者，立誅汝。」其人如命，持金至，封識宛然。<sup>243</sup>？

所謂官吏審案，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方能為之定讞，力求勿枉勿縱，文中傳主周新：「成廟時，舉孝廉，官御史，權貴憚之，目為周鍊面。巡按閩、直，赫奕有聲，及擢為浙江按察，數決疑獄，時人比之包孝肅焉。」傳文前半陳述其因一葉飄至而至古寺得婦人屍，青蠅數萬團聚車前而得男子骨，這或許是為其善斷獄而附神怪之事已增益其聲。然從「赴市易布，諸家皆遍，于群布中覈印記同者，知其殺人盜布，按而誅之。」至後文審邑中游居外地之民歸家失其物一事，「君為客經年，乃空手歸乎？」，「爾夫昨夜回，爾所私人從床縛起立壁間，竊聽久之，爾知之乎？」，「所私誠有之，竊聽與否，不知也。」，「爾昨夜于某廟石下取某人金，可持原封見還，否者，立誅汝。」周新能以其斷案經驗，鉅細靡遺地從蛛絲馬跡中去找尋線索，而後利用一些偵查辦案技巧使真相大白，情節高潮迭起，有如今之偵探電影一般，將史傳文學中細節作用充分展現出來。雖然後來觸怒君王而遭枉殺，然無損其明查斷獄之能

又如「四奇」《機類》中的〈李文忠敗偽吳兵〉：

偽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寇諸全新城，圍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文忠率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日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詣文忠曰：「眾寡不敵，姑避之，俟大軍至，再圖。」文忠曰：「以眾論，則制勝在彼；以謀論，則制勝在我。昔苻堅擁八十萬眾，謂江流之險，投鞭可斷，

<sup>24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周新〉，頁 959-960

謝安乃以八千勝之，然則衆何必強？寡何必弱？顧用之何如耳？況我若見寡，少生怯心，彼因而蹂躪，將坐受困，雖大軍至無能濟。莫若奮兵擊之，伐謀取勝，將在此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寡而銳。驕者，敗之征也；銳者，勝之符也。以銳當驕，一可當百，保爲諸軍破此虜。既破之後，輜重悉歸軍士。」士皆喜。明日交戰，文忠復語軍士曰：「國家大事，在此一舉。爾輩勉之，予亦何敢自愛處三軍後？」即橫槊據鞍，乘高而下，繞敵後衝其中堅，敵列陣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自相蹂躪。德濟帥城中將士鼓噪出，呼聲震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益奪。<sup>244</sup>？

傳文之中，德濟言「衆寡不敵，姑避之，俟大軍至，再圖。」充滿失敗主義，而文忠則舉東晉謝安肥水之戰大敗苻堅之例極言「以衆論，則制勝在彼；以謀論，則制勝在我。……然則衆何必強？寡何必弱？顧用之何如耳？況我若見寡，少生怯心，彼因而蹂躪，將坐受困，雖大軍至無能濟。莫若奮兵擊之，伐謀取勝，將在此舉。」「彼衆而驕，我寡而銳。驕者，敗之征也；銳者，勝之符也。以銳當驕，一可當百，保爲諸軍破此虜。既破之後，輜重悉歸軍士。」以此凸顯李文忠果斷機警，同時又善用謀略激勵士卒，同時身先士卒勇往殺敵，不以敵眾我寡為慮，終至克敵制勝。其有勇有謀之形象躍然紙上。

江盈科在其古論〈精兵〉中亦曾提到：

古之善用兵者，往往以寡制衆。夫非寡之能制衆也，精與不精之間耳。蓋兵苟不精，則百不當十，十不當一，愈多而愈見爲不足不足；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愈寡精而愈見爲有餘。故衆鳥累百，一鷹鷂奮翅擊之，鳥群空矣；……大將如耿炳文、李文忠，善以寡制勝者，亦多矣<sup>245</sup>。

亦可見在江盈科的眼裡，李文忠就是善以寡制勝者的典範。

<sup>24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文忠敗僞吳兵〉，頁 1002-1003

<sup>245</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六〉，頁 309-310

再如「四凶」《詔類》中的〈彭澤〉：

彭澤，嘉靖間官太常卿。會吏部侍郎徐縉爲國子生詹榮所訐，澤遂謀代縉，乃僞爲縉書，具黃精白臍，遺內閣張孚敬，以激怒之，而因嗾孚敬劾去縉。及縉斥，吏部遂推澤代縉。上意欲用夏言，澤遂謀傾言。會行人薛侃見上無嗣，乃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疏具未上，澤與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曰：「願携歸細閱。」因而持白孚敬曰：「此侃疏，出夏言筆也，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聞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草，深嘆忠愛，胡不亟上？」侃猶豫，孚敬復詰澤，澤坐趨侃上之，孚敬復密稱侃疏出夏言筆。上大怒，命逮繫侃。時上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密疏。次召言，示以侃疏，問：「可否？」對曰：「陛下春秋富，前星方耀，安得此不祥語？」上意其詭對，命出待訊。言出，侃已械至。群臣方會鞠，言未知當鞠，猶然就列。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鋹以被論注籍，孚敬趨令出。比至，孚敬首詰侃曰：「誰使爾爲此？」侃曰：「我自爲之，誰使我者？」敬曰：「聞夏言主此，胡不吐？」侃曰：「言雖同年，久不通刺，何得相誣？侃初草此疏，惟彭澤見之，謂携白相君，相君亟賞再四，趨侃上，侃乃上，是相君固教侃上也，胡爲妄及不相聞之夏言耶？」汪鋹從傍大言曰：「言實主之，何飾稱無？吾與爾矢對神發誓。」言不勝憤，擊案大詈曰：「奸賊，爾主此，反陷忠良耶？當與汝面奏」。孚敬怒，趨入左掖門，言排闥尾其後，閱者不納。孚敬乃入閣具奏；言亦就史館草疏，俱上。頃之，命逮言詔獄，諭勿拷掠。比再訊，侃曰：「言實不知，惟歐陽德、黃宗明及弟僑見起草耳。」時給事中孫應奎、葉洪面斥孚敬儉壬，疏劾之，孚敬乃奏逮德、宗明、僑、應奎、洪，俱下獄同訊。明日復鞫侃，五毒備至，侃曰：「必欲拔夏言，請釋我繫，矢諸天則可。」諸涖訊者縮不敢言，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仍未決。又明日甲寅，彗出東井，上知言冤，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令孚敬坐閣中勿至訊所。比訊，彭澤見孚敬不在，不敢復誣言，侃對簿曰：「鍛煉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萬死，唯侃爲之。聖上至明，不免爲太傅誤；如侃至愚，宜其爲彭澤誤。」佐等以聞，晡時命釋言、德、宗明等。明日，上詔群臣至闕下，論曰：「薛侃猖狂發言，不諱法，當重論。彭澤狡詐，交關口語，且使輔



臣亟於攻擊，情犯甚惡，當遣戍邊。張孚敬昧有容之量，專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實不預知，然擊案誼誥，亦宜有罪，念受冤所激，姑不問。餘皆並釋。」於是彭澤戍山西，侃納贖爲民<sup>246</sup>。

此傳文之中主角彭澤為了達到升官吏部侍郎之目的，不惜用計除去徐縉，然當得知上意欲用夏言後，又千方百計的阻撓。通篇傳文中幾乎不見其陳述，他絕大部分都深居幕後，運籌帷幄，利用臣屬之間的利害衝突，唆使他人為其效命達其目的，此為借刀殺人之計。然善惡終有報，其計謀終未得逞。而此傳文中寫彭澤為得官用計無所不用其極之細節描寫，不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

### 三、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以突顯人物形象。

史傳作品常用對比襯托的方式凸顯人物性格，如《史記》中〈李將軍列傳〉將李廣與程不識、李蔡對比。突顯李廣不幸的遭遇；〈魏公子列傳〉將信陵君與眾人對侯嬴的態度對比，強化信陵君的禮賢下士。關於《皇明十六種小傳》如何以對比襯托的手法突顯人物性格形象，可以從下例中找到例證：

#### 「四常」《明類》中的〈黃淮言虜部宜分〉

淮，仕成廟時，與三楊、金幼孜、解縉同典機務，備顧問，多所裨益。會虜酋阿魯台來款，請併女直、吐蕃屬其約束，上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違？」侍臣皆曰：「酋率衆來附，觀我聽違為喜怒，宜從所請，順適其意。」黃淮曰：「不然。虜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中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之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為群，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嗟夫，祖宗時，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榷，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對日食而忠佞見，

<sup>24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彭澤〉，頁 1049-1051

陳山與楊吐奇對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虜部分合而明闇見，然則爲聖子神孫者，何可不復此芳規爲鑒別人材之地也哉<sup>247</sup>？

對於蒙古酋長阿魯台希望能請併女直、吐蕃屬其約束，上問侍臣皆曰：「酋率衆來附，觀我聽違爲喜怒，宜從所請，順適其意。」然黃淮獨排眾議：「虜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爲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爲中國害，豈不更烈？」相較於眾臣們只見眼前的利益，更能襯托出黃淮的高瞻遠矚。他能預見若讓蒙古聯合女直、吐蕃的勢力，那日後大明將難以牽制他們，試問後來的北族蠻橫，不就印證其所見，如不預先防範恐其將更難以收拾。對於這樣有遠見，能做較為長遠規劃的官員，這是江盈科在爲官之政能之中所大爲欣賞及推崇的。

「四維」《忠類》中的〈王艮〉：

艮，建文朝鼎甲第二名。先是擢第一，後嫌其貌不及胡廣豐偉，遂首廣次艮。歷官浙江按察使。時靖難兵已下金陵，艮聞之，度無可爲，但東向痛哭，自爲引決計。會成祖遣使來召，艮初欲誅使者，已而嘆曰：「誅此豎子無益，有自家乾淨死耳。」乃整衣坐堂上，召同官與訣曰：「艮今日無力以報陛下，請先諸君死，願諸君還我所佩諸印章。」乃收諸印章，置一篋封識之，退語其妻曰：「吾死矣。」妻曰：「君能死國，妾亦能死夫，有同死耳。」艮曰：「然此時只有各自完事，無他策。」于是其妻先赴後苑池中溺死，艮舉猛火痛哭，携所收印章赴火死。嗟夫，當登第之日，胡廣偶以貌先艮；及臨大難，廣乃甘心事二主，而艮身投赤焰，完名全節，殊烈烈然，令人起敬。語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廣之于艮是已<sup>248</sup>。

「四凶」《諂類》中的〈李貫〉：

貫，建文朝登第第三人，後仕成廟，仍爲修撰。一日，上命解縉番閱建文諸臣章疏，凡關係兵馬糧儲吏道民事者留覽，餘涉干犯者一切焚毀。已而上顧

<sup>247</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黃淮言虜部宜分〉，頁 958-959

<sup>24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王艮〉，頁 911

縉曰：「爾等宜皆有疏？」衆未及對，李貫獨曰：「臣實無有，疏具在此，可覆按也。」上曰：「爾以無疏為獨賢耶？夫國勢傾側，近侍之臣鉗口結舌，惡得為忠？朕非惡夫忠建文者，惡其導建文壞祖制者耳。」嗟嗟，戰國說士論取再醮之婦曰：「在彼人所，則欲其為許我者也。今取之，則欲其為詈人者也。」貫以建文第三名及第，甘仕二君，所謂許人者也，欲其能詈人，得乎？自謂無疏，本色面目畢露矣<sup>249</sup>。

王艮為建文朝鼎甲第二名。先是擢第一，後嫌其貌不及胡廣豐偉，遂首廣次艮。而當年的第三名便是李貫。三人同朝為官遇到成祖靖難時其表現卻截然不同。王艮與其妻不事二主，慷慨赴義，而胡廣、李貫卻變節投靠。李貫為逢迎成祖無所不用其極，卻反弄巧成拙，徒遭斥責。由此可見，忠臣寧忠故君亦不願變節以降，其忠其義為後人所景仰，更襯托出小人為了私利逢迎諂媚，卻仍為人拆穿的可笑可悲。

又如「四凶」《奸類》中的〈序班揚善〉：

楊善，仕成廟時，以他事繫獄。會翰林院庶吉士章朴亦在繫，日從囹圄中，彼此來往譚話，朴固謂善無他腸，靡所避忌。先是，上因方孝孺忤旨，既夷九族，怒猶未釋，仍禁其生平所著書，若詩文之類，詔民間敢收藏方氏隻字者，罪無赦。而朴家適有《遜志齋集》一部，自以語善。善遂從朴借觀，密以其書奏聞，上怒，戮朴於市，復善官。嗟乎，死生，蜉蝣耳；官至序班，蟻蠊耳。善但欲自延其蜉蝣之生，自完其蟻蠊之官，至於誘外擠朴，無故而推之入井，且下石焉，小人之險心如此。吁，可畏哉，可畏哉<sup>250</sup>！

文中傳主楊善因事繫獄，利用庶吉士章朴對其信任無防備之心，卻反咬其一口，供出其私藏禁書一事。章朴後遭殺戮而楊善卻因此得復官。江盈科對於楊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故推人而落井下石，人心險惡至此。對於其所作所為深以為恥。然而對於楊善在另一則事蹟所表現的行為，江盈科又顯現其不同的看法。

「四奇」《俠類》中的〈李實楊善使虜〉

<sup>249</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貫〉，頁 1057

<sup>25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序班揚善〉，頁 1044-1045

久之，朝廷復以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充使臣往迎，至虜營，也先見善等喜，許歸上皇。其平章昂克問曰：「你們迎上皇，禮物安在？」善曰：「太師仁心，仰體天意，歸我君父，豈財是圖？中國亦何敢用財污太師君臣愛我君父之意？」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俺們保全一個大明天子，只圖挂名青史上，若圖財貨，俺上馬一番，何求不得？奈何以天子易財？」已又問曰：「皇帝此回還做否？」善答曰：「天位已定。」先曰：「堯舜亦爾中國之君，今不可以相讓乎？」答曰：「堯讓位於臣，今上讓位於弟，正同堯舜。……」噫，沙漠險遠不測，而也先狼子野心，難可逆知，乃李實、楊善掉三寸舌於虜營中，使虜君臣相顧太息，既然以好歸南狩之駕，遂成千古以來所未有盛事<sup>251</sup>。

傳文中的楊善奉旨出發前往北虜之地迎接英宗南返，藉由其能言善道、條理分明的應答，使得北虜君臣在英宗仍被俘於手的有利情況下，私毫無法再討得任何益處，而能順利迎回英宗。無怪乎江盈科認為以當時沙漠險遠不測，而也先狼子野心，難可逆知，李實、楊善能掉三寸舌於虜營中，順利達成任務，真是值得大加稱揚。從兩則傳文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江盈科對於人物的對比性之看重，對於奸邪小人，他總是大加抨擊撻伐，而對於有利於國家人民之行為，他也不吝予以加以歌頌，大事宣揚。這是做為一個處處為人民著想的良吏，所念念不忘的職責。

#### 四、以互見手法豐富人物面貌

太史公司馬遷常用的互見法，每每為人所稱道，據韓兆琦言，所謂的「互見法」，即是把那些對於這個人物來說不能不寫，但為了保證人物性格的完整突出而又不便寫入本傳的東西，有計畫有安排的寫到別人的傳記中去，讓讀者可以參酌互見<sup>252</sup>。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也常常使用此中方式，

例如前面章節曾提到「四維」《忠類》中的〈楊繼盛〉：

繼盛，北直隸人，性中心鯁。世廟時第進士，仕為兵部員外，以諫阻馬市，

<sup>251</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李實楊善使虜〉，頁 1033-1034

<sup>252</sup> 韓兆琦〈《史記》與我國古代傳記文學〉，收錄於張高評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 540。

謫爲荔浦縣典史。其後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先見，擢爲令，一歲之間四轉，仍爲兵部郎。繼盛乃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譖于上，竟坐誹謗罪，當死，獄具。……及遇害，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王遴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請配公次子應尾。」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辱賢女？」遴曰：「不如此，則世上無朋友矣。」夫世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披鱗逆耳者，不絕于前，其極抗直嬰觸者稱三楊，謂大理卿楊最，御史楊爵，與忠愍而三，乃其受禍，惟忠愍最烈。要之至死不變，其忠固根于天植也。好漢哉，好漢哉<sup>253</sup>！

文中王遴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請配公次子應尾。」其無懼嚴嵩之威脅意欲替忠愍公傳後之精神，意讓人深為感佩，在「四奇」《俠類》中的〈王遴〉中有更深刻的敘述：

王遴，霸州人。與椒山楊繼盛同舉進士，居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粵。西幕，及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爲兵部副郎，又疏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嗾上重處，引誹謗律論斷。上心憐繼盛忠，故置囹圄，不忍殺，嵩乃乘間置繼盛姓名於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方赴市曹時，繼盛吟詩自若，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不了事，留與忠魂補。」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省者，獨王遴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曹。繼盛臨刑，遴賀之曰：「天下好事。年兄做就了。雖罹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臣，何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爲之耳。」遴曰：「兄亦有家事欲相托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遴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未娶，遴有弱女，願托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裔，當御魑魅，何敢辱配名姝？」遴曰：「即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爲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犯者必焦，孰肯以身就焚？四君子視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遴於刀劍之林締絲蘿之雅，一言既出，九鼎不移，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今上在御，屢

<sup>25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楊繼盛〉，頁 919-920

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燕國男子矣<sup>254</sup>。

身遇刑獄之事，凡人避之唯恐不及，擔心遭受牽連而惹禍上身，但是文中王遴等人不畏嵩之威焰親赴刑場，遴曰：「兄亦有家事欲相托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遴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未娶，遴有弱女，願托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裔，當御魑魅，何敢辱配名姝？」遴曰：「即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四君子視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遴於刀劍之林締絲蘿之雅，一言既出，九鼎不移，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可見在亂世之中仍有不畏死之忠義之士，而其後亦終有善報。

同樣為「四維」《忠類》〈楊繼盛〉之事，在「四凶」《奸類》中的〈嚴嵩〉，亦可以互見之手法來陳述嚴嵩禍國殃民之害：

嵩，分宜人。世宗朝官宰相，典機務。本朝稱奸相，必首嵩。嵩處尚書丁汝夔，則猶其奸之最者。先是北虜薄京城，調大同兵入衛，以總兵仇鸞統之，鸞怯而性狡，會大同兵詭稱遼兵劫村落，鸞縱不治。京師人意其真遼兵，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山東人也。故論者不謂仇鸞縱大同兵，而誤疑故夔以鄉曲庇遼兵。時虜在城下，鸞憚與戰乃故引兵遠出稱禦虜，實與虜相左，故城下之虜愈縱橫。相嵩又陰諭汝夔，謂我兵近城與虜戰，即有敗創，莫可掩飾，姑聽其擄掠飽而去，可幸無罪。於是，附京民被虜魚肉者，皆怨汝夔怯不肯戰。流聞大內，上震怒，逮丁汝夔及侍郎楊守謙下獄，立促刑部具爰書，斬二人以徇。夔當被逮時，嵩恐其泄前語，遣人諭夔曰：「無慮，吾為汝地。」而陰反嗾上行刑。汝夔臨刑，乃悟嵩詭己，大呼曰：「奸嵩誤我！」夫嵩不過欲為飾罪計，遂縱虜不與戰，欲使飽去。聞其被召入對，亦但曰：「此搶食賊也。飽即歸矣。」向非天佑聖朝，則一言喪邦，即齏粉嚴氏，可勝贖哉？故人主慎論相。若嵩者，可畏。亦可鑒也<sup>255</sup>。

文中言嵩處尚書丁汝夔，則猶其奸之最者。然在嚴嵩的算計之下，仍不免當其代罪

<sup>254</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王遴〉，頁 1040

<sup>25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嚴嵩〉，頁 1050

羔羊，足見嚴嵩在明代之評價能列為奸臣之中，當不為過<sup>256</sup>。

又如「四維」《忠類》中的〈孫許〉，傳主分別是孫燧和許達兩位。

孫，名燧，仕武宗朝，為都御史，巡撫江西。許，名達，同時仕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會宸濠久蓄異謀，燧與達下檄所屬，整飾兵糧，以備緩急。燧屢具疏，疏濠逆萌，皆為濠所置用事人阻截不得達。濠定計擇日大舉，適孫、許以他事入謁濠，行禮畢，濠大聲語二公曰：「太后有密旨召我入監國，二卿可保駕否？」燧問：「密旨安在？」濠曰：「既云密旨，安得輕泄？」達曰：「若此，則無旨矣。安得輕有舉動？天朝何負殿下？毋自作孽，悔將弗及。」濠乃仗劍起曰：「毋多言，不用命者，視吾劍。」二公知濠不可回，又度其身必不容不死，乃相與大詈濠。達遂脫所著皂靴擲濠，不中，濠立命左右引出門外，斬以徇衆。時天正午，白日忽黯黑如夕，城中民聞二公死，罔不流涕。其後濠被擒，朝廷旌二公死節，為立廟，賜額「雙忠」，有司歲時祭祀勿絕。

兩人同為朝廷派駐在江西的命官，對於寧王朱宸濠意圖謀反之事，不僅能事先預知加以防範，面對寧王之詰問時，亦能義正嚴辭加以反駁並曉以大義，希望寧王能迷途知返。然最終能不免為寧王所殺慷慨赴義殉國，其忠肝義膽之精神為後人深為景仰並立廟奉祀不已。同樣在「四奇」《俠類》中的〈許達計守樂陵〉中，江盈科亦以互見之手法來陳述許達奇計退敵之事。

達，仕武宗朝，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死宸濠之難，謚忠節。其初仕為樂陵令，會流賊劉七、楊寡婦等作亂，所至殘破，莫有嬰城自守者。將犯樂陵，達預築城池，貧富均役，踰月，城成，使民各築牆高於屋檐，開竇如圭，僅容人，各令二壯丁執刀俟竇內，餘人各入隊伍，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仍設伏巷中，賊至，洞開城門，聽其直入，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賊又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千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賊遂遠遁去。夫世率言兵法，然兵法何可拘也？譬如藥方，方有定，病無定，病萬變，藥亦萬變，故不讀方書而能

<sup>256</sup> 《明史》卷 308，列傳 196〈奸臣嚴嵩〉，頁 7914

治病者無之，執方書以治病而無隨症下劑之術，亦未有能起病人者。許忠節之守樂陵，高其垣，竇其門，家自爲守，巷自爲戰，兵法寧有是？皆隨機應變之法耳。其後在江西，與孫忠烈同死難，臨死時，謂忠烈曰：「前日肯用吾言，當不束手就縛。」此必有術先發制濠，曾言於忠烈，而忠烈未之行耳。可惜哉！

面對圍城之難，多數將領選擇投降避難，如欲死守，萬不能只逞匹夫之勇，必須要有所計謀，方能克敵制勝。許達能善用兵法預築城池，同時針對地形擬定作戰策略，要軍民確實遵守執行，在上下一心的情形之下，終能退敵保全樂陵。難怪江盈科於文後贊曰：「譬如藥方，方有定，病無定，病萬變，藥亦萬變，故不讀方書而能治病者無之，執方書以治病而無隨症下劑之術，亦未有能起病人者。」許達隨機應變之能深為其所讚揚。





### 第三節 《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思想呈現

以史為鑒、借古鑑今，這種經世致用的史學意識，自古以來就是十分明確的。孔子作《春秋》非常重視勸懲的原則。這裡要說明的是，勸懲的目的還在於鑑誡當世。《春秋》的時代背景正處於上古三代封建體制解之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sup>257</sup>。」面對禮樂崩壞的變局，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就是要達到勸懲的目的，而勸懲的目的在於鑒戒當世目無法紀的諸侯。面對綱常紊亂，君權下移的現實，他認為最好的糾正辦法是借助於歷史，以警誡現實中的亂臣賊子。《春秋》的勸懲精神，體現在「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之中。誠如《左傳·成公十四年》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sup>258</sup>」《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sup>259</sup>」《春秋》以簡約的記事風格，傳達了深厚的「勸惡懲善」，「借古鑒今」的倫理精神，以求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一統的終極精神。孔子的《春秋》可說是開創了中國勸諫史學的先河。

這種史學精神如同歷史一般具有一貫的連續性，且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一種時時念茲在茲的神聖性。司馬遷在其〈太史公自序〉中鄭重地寫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足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sup>260</sup>

在司馬遷的眼中，還有什麼事比繼《春秋》，乃至於上古三代思想還來的重要的是？司馬遷不只是一要上繼先聖的神聖使命，更要將其轉化，藉「一家之言」而成千古之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sup>257</sup> 《孟子·離婁》見〔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295

<sup>258</sup> 《左傳·成公十四年》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頁870

<sup>259</sup> 《孟子·滕文公下》見〔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272

<sup>260</sup>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296

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sup>261</sup>。

司馬遷除在其〈自序〉中不斷強調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更藉著將孔子列「世家」中以彰顯孔子的道德情操，肯定《春秋》勸善懲惡的功能與影響。在司馬遷看來，《春秋》的史學功用，提供了一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的後人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其次是為褒揚美善，貶抑醜惡樹立榜樣標準，增強了司馬遷期待自己的著作能繼承《春秋》的精神，肩負起「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的巨大歷史作用。

「資治」和「借古鑒今」的思想，是深刻的歷史意識和敏銳的時代意識的結合。此二者的結合，強化了史學的本體意識，也使得史傳文學從一形成開始就帶有很鮮明的現實性和功利性，因而成為史傳文學一個極其重要的本體特徵。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較，史傳文學絕沒有其他文學樣式諸如詩、詞、歌、賦、駢文等總是不可避免的內容上的空乏，形式上的過分追求，無病呻吟等種種弊端，它不可能成為一些人手裡遣興娛情的工具，也不可能疏離現實生活而走入象牙之塔，它只有對歷史的極大的融合和對現實的積極的貼近，它注重的是實用性和戰鬥。「資治」與「借古鑒今」的史學思想，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上的致用思想是相通的。

郭丹曾提指出文化會影響歷史書寫的發展，在中國傳統的宗法制社會，強調人倫道德觀念，它使中國社會形成一個以倫理意識為中心的系統。而人倫道德觀念強調「親親」、「尊尊」的禮教規範，追求勸善、揚善、求善的教化目標，在歷史著作與史傳文學中表現出來的即是「懲惡勸善」、「借古鑒今」、「大一統」的精神。而倫理型的中國文化，將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史官文化的精神內涵便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離不開以人為中心，注重現實人事的原則<sup>262</sup>。此一特徵對歷史著作產生極大影響。史家所面對的對象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和出現過的人，都要展現歷史的變化，揭示社會發展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提供統治者作為借鑒。有時是用事件，有時是以人物為主來展現歷史的變化，包括歷代王朝的更替，君主的變人事的變動等，以此來呈現歷史的來龍去脈，表明歷史人物的立足點。

<sup>261</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297

<sup>262</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1

因此下面將以「借古鑑今與勸善懲惡」的角度為出發點來剖析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思想呈現。

## 一、崇德性，奉正統

身為一個官員到底要做到什麼地步，才能合於國家和民眾的期待，對於這一點自古以來就有所謂「官箴」來加以規範。「箴」具有規誡，告誡的意思。「官箴」，原指「百官對帝王進行勸戒的文獻」。隨著時代更迭，「官箴」指的是針對官員從政道德，言行舉止要求之文獻記載。崔憲濤〈關於中國古代官箴書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官箴即「做官的箴言錄」，是中國古代官員道德自律的標準<sup>263</sup>。裴傳永〈關於古代官箴幾個基本問題的辨析〉，認為官箴的內容非常龐雜，但就主體而言，可概括為兩部分：「為官之德」、「從政之道」，並為官箴下定義：「所謂官箴，就是針對從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為規範的統稱，是從政者應當恪守的職業準則<sup>264</sup>。」據此，判斷官箴文獻的標準為：針對從政者所寫的規誡，關於「履行行政職責」的內容才能納入官箴，而個人為人處世，思想行為的內容，則屬於私箴的範疇。

江盈科身為一個自小接受儒家學說的封建正統知識份子，在自己的文章之中自然也就會受到儒家傳統「文以載道」的文藝創作觀念影響，流露出「勸善懲惡」之意。在他的《皇明十六種小傳》自敘中對「勸懲」意圖的表述就非常明確而清晰：「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緝其語而為之傳，匯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奸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或因一事紀一人，或就一人摘一事，大都事不能概當人，人不能概當代，要於挺拔突兀，不經聞見，使人讀之，能有所聳動而感發焉。」《皇明十六種小傳》萬曆二十九年刻本中另附明人鄧原岳為其所作之序，在這篇小序中，鄧原岳又進一步提到江盈科創作的「法戒」之義：「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慕說古哲，緬緬不休，暇則采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戒者，大率仿《世說》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之。」雖說出於時代和階級局限性致使原序中不乏諸如「明德方隆、士

<sup>263</sup> 崔憲濤：〈關於中國古代官箴書的幾個問題〉，《理論學刊》，2005年第1期，頁100-102

<sup>264</sup> 裴傳永：〈關於古代官箴幾個基本問題的辨析〉，《理論學刊》，2005年第1期，頁100-102

習醇正、善無近名、惡無隱慝、一二澹辭，皆可書而誦，此盛世之軌也<sup>265</sup>。」之類對明朝的溢美之詞，可事實上當時的明朝已經進入了一個吏治腐敗、刑名失序、外患猖獗、邊境不寧的內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加之商品經濟的來襲使重利輕義的價值觀對傳統的封建道德帶來了極大衝擊，致使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就更加需要作者運用文章的諷喻、勸誡之力來扭轉人們的觀念，達到有益教化之效。

江盈科雖對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心學有所關注，骨子裡卻終歸流淌著儒家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功宗旨，對家國民生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這份責任感的驅使之下，江盈科就自覺地擔負起了歷史和道德的義務，把對百姓的教化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小說文本之中。「忠、孝、廉、節、慈、明、寬、慎」這些類別的選擇就體現著作者教化的用心。希望藉由這些典範人物「借古鑒今」，讓今世之行政官員都能以資效法確實實踐正確的為官之道。如「四維」《節類》中的〈薛瑄〉

瑄，仕英廟朝，官至宰相。其先為山東提學，適大璫王振操柄，振問內閣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瑄，振為言于上，召拜大理少卿。瑄至，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後遇諸途，瑄復不為禮，振甚恨。會指揮某死，其妾美而豔，振侄王山求娶焉，揮妻不可，妾忿妻扼己，遂誣妻毒殺夫，經刑部都察院審鞫，妻苦掠誣服，妾乃得自如，隨所適。會瑄覆鞫，既悉揮妻冤狀，以孽妾幾殺無罪妻，三尺安在？駁還之。督察院王文怒，訴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死罪，遂下獄，欲處以死。瑄曰：「辯冤得死，死亦何恨？」在獄惟讀《易》自娛。會大有申救瑄者，振亦憚瑄時名，得減死放歸里。久之復起，官至宰相，乃止。嘗觀薛文清公，未嘗以皎皎之行，求標于世，獨其自守一節，于利害死生看得透徹，了不介意，他人視公勇如賁育，公自視等閑事耳。文貞欲見而不能，金英飲餞而不與，孰非行所無求者哉<sup>266</sup>？

官場之中得人之助而獲重用高升，於情於理總會需要餽禮以謝，然文中薛瑄『士奇薦瑄，振為言于上召拜大理少卿。瑄至，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豈有受爵

<sup>265</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皇明十六傳小序〉，頁 903

<sup>266</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薛瑄〉，頁 941-942

公朝，拜恩私室？」』完全展現其身蒙國恩，不拜私室之節操。甚至遭受迫害幾至於死也不改其節。其於《薛文清公從政錄》載：「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sup>267</sup>直接點出「居官七要」，即「正、廉、忠、恭、信、寬、敬」。這七要不僅他加以恪遵奉行，這不也是為官之士所必須時時警惕自己加以奉行的為官之德嗎？

又如「四維」《廉類》中的〈秦紘〉：

秦紘，仕憲宗朝，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藩旗校橫肆，大為民害，有司莫敢問，紘遣人擒治論如法，不少貸。王不勝忿，秦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具。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嘆曰：「好清官，幾被枉命」釋之，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以事至，直威權震赫，擬于至尊，他巡撫率屈事直，紘獨與抗禮。直聞上賞其廉，亦加敬，不為較。紘密疏直侵擾地方，後直回，上問：「各撫臣賢否？」直曰：「秦紘好。」上示之疏，直叩頭伏罪，稱紘不置，上釋之。按英廟時，太監金英以使事往江南，比歸南都，士夫皆具席致餞，獨薛瑄不餞，及英抵京師，所稱南京好官，必以薛瑄為最。今紘比他巡撫，獨慢直，又密疏直，而直終賢紘不容口，殆與金英之賢薛瑄無異。然金英立身自賢，故其賢薛瑄也，秉彝好德之意也；若直之專橫，遠非英比，特秦紘以一黃絹之故，受知憲宗有素，故直不得不稱其賢。嗟夫，以極專橫之汪直，不得不稱極疏慢之秦紘，則士君子立身，可不思所以為取重小人之地也哉？不能取重小人，而徒罪小人輕我，其去小人一間耳。

這兩篇傳記有異曲同工之妙，相較於薛瑄因不餽禮於王振而幾致於死，秦紘抗禮太監汪直甚至密疏君王彈劾汪直侵擾地方，然因其廉節有名於外，連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直只能照實回答曰：「秦紘好」，「以極專橫之汪直，不得不稱極疏慢之秦紘」，足見其身正孰與不正，只要謹守為官之分際，自然外力之橫逆也無法撼動其心。

<sup>267</sup> [明]薛瑄：《薛文清公從政錄》，（《官箴書集成》影印《寶顏堂秘笈》民國石印本），頁1



## 二、能臣幹吏善治國

在前面的篇章已提到江盈科所處當時的明朝已經進入了一個吏治腐敗、刑名失序、外患猖獗、邊境不寧的內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對家國民生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這份責任感的驅使之下，江盈科就自覺地擔負起了歷史和道德的義務。而改變這一切並非只有端靠為政者修養自身德行就能加以改變。這時「為政之道」的展現就非常重要了。所謂「為政之道」就是「為政才能」的展現。一個好的行政官員雖說不需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是至少要做到處處留心、認真盡責、苦民所苦、體恤人民，把人民的需要當作是第一要務。當吏治腐敗，就想到要慎選用人、拔擢良吏；刑名失序，就想到要詳讞刑獄、勿枉勿縱；外患猖獗、邊境不寧，就想到要修建武備、拔擢良將，用政治、外交、軍事的手段來加以解決。

江盈科在他的古論文章〈用人〉、〈理財〉、〈變法〉、〈將臣〉、〈邊材〉、〈精兵〉等篇章中對於攸關國家進步的各項作為有其獨到的看法，這不就顯現出他希望君臣們都能夠具備此種執政的認知與能力。在〈理財〉篇中他談到：「故謀人之國，而能以其國富、以其兵強者，是有用之才、經濟之臣也。謀人之國，而其國匱乏而不能給，其兵脆弱而不能支，束手仰屋，莫可誰何者，是腐儒也，是無用之道學也<sup>268</sup>。」這不就說明官吏的行政能力好壞有多重要。在〈邊材〉篇中談到：「我朝英廟與李文達論制閩，曰：『必得魁梧如韓雍者，乃堪其任。』此以標格勝也。郭定襄之制北虜也，以八百騎夜馳入數千之軍，違衆取捷，功號第一，此以膽量勝也。鄭亨之鎮大同也，前導一出，鷄犬皆避，人望之如天神，莫敢有睥睨者，此以氣魄勝也。項襄毅之伐王滿四也，計日決策，度必能收功於敵，大司馬數請出京益之，襄毅堅拒，謂不必益卒，之敵果克，而京兵免于擐甲損費不貲，此以籌筭勝也。嗚呼，此四君子者，真傑品，真邊材<sup>269</sup>。」足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就如前章所言為政之能的篇章散見於《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常」中《明類》、《慎類》，「四奇」中的《機類》之中，前面篇章已多有舉例，其篇幅計有四十五篇，其中《機類》高達三十篇，為各分類小傳之冠，足見江盈科對「執政能力」有多麼重

<sup>268</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六〉，頁 299

<sup>269</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六〉，頁 308-309

視。如果一個行政官員同時兼具有以上之各項能力者，那更是他所大為推崇者。孝宗時名臣劉大夏在《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就出現了四則小傳，分別是「四常」《明類》的〈劉大夏料魯麟〉、《慎類》的〈劉大夏慎密揭〉，「四奇」中《機類》的〈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劉大夏整理糧草〉之中

大夏，仕孝廟寺，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兵魯麟者，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部在大同甚眾，麟賄結近倖，求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甚怏怏，萌不臣之念。漸聞于上，上召劉大夏曰：「魯麟怨望，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自歸耳。」上曰：「彼部落然將無起歹念耶？」對曰：「邊將跳梁，亦必能結士卒，而後士為之用命乃可。麟貪且酷，士卒切齒，彼度其下不為用，必不敢萌他志。今直解其兵權，有窮而歸耳。」果然，麟家積黃金數十萬，遣使詣大夏所親，曰：「但得掛印，願致千黃金為公壽。」大夏曰：「總兵印，能者得之，縱黃金高北斗，無可買處。麟苟奮忠義，為國滅虜，朝廷且不靳封侯之賞，何但一印？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以不得印為恨，恚病死。上嘆曰：「大夏明于料人。」<sup>270</sup>〈劉大夏料魯麟〉

在外交軍事方面，他善於了解人心、觀察局勢，對於魯麟欲掛印之事能細為剖析：「邊將跳梁，亦必能結士卒，而後士為之用命乃可。麟貪且酷，士卒切齒，彼度其下不為用，必不敢萌他志。今直解其兵權，有窮而歸耳。」而後對於魯麟的賄賂，能把守原則並以「總兵印，能者得之，縱黃金高北斗，無可買處。麟苟奮忠義，為國滅虜，朝廷且不靳封侯之賞，何但一印？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使魯麟知難而退，而局勢最終亦如其所估算。

大夏，仕孝宗朝，為兵部尚書，甚見信任，凡國家大事，輒與面相籌咨。一日，上謂大夏曰：「朕每欲召卿商榷，又念非卿職掌，此後朝廷有當興當革者，卿宜具密揭見奏，與朕覽閱如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云：「何？」對曰：「陛下所欲咨臣，皆係公務，所言公，公言之。若具密揭，踪迹韜晦，易以叢疑，恐左右揣摩，外庭臆度，耳目既眩，口舌橫恣，君將失臣，臣將失身，遺患匪小，宋李沆所以不具密奏，非無見也。」上曰：「朕意在求言，

<sup>27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劉大夏料魯麟〉，頁 962-963

未念及此。」稱善者久之<sup>271</sup>。〈劉大夏慎密揭〉

於君臣之間，他能謹守分際，雖說其深獲孝宗皇帝信任而能有具密揭之權，然其深以為不可，其言：「陛下所欲咨臣，皆係公務，所言公，公言之。若具密揭，踪跡韜晦，易以叢疑，恐左右揣摩，外庭臆度，耳目既眩，口舌橫恣，君將失臣，臣將失身，遺患匪小，宋李沆所以不具密奏，非無見也。」其光明磊落之心、公私分明之遠見，深得孝宗稱許

大夏，仕憲宗朝，為兵部職方司郎中，與陸容同官。時太監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屢歲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出師討之。汪直乘機遂獻平安南之策。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一旦加之兵，恐失夷心，啓邊釁，遺禍匪細。直猶攘臂持議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直，詳叙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嗟夫，小人欲冒封賞，圖富貴，往往以人之國僥倖，至于兵連禍結，莫可救藥。昔太監王振一試于麓川，而萬乘之國半殘；再試于土木，而萬乘之尊且為俘虜。大抵皆輕舉妄動，生于一念之貪，而不顧國家安危之筭。然則汪直此舉，向非劉大夏以計遏之，其流毒又不知所終矣<sup>272</sup>。〈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

劉大夏能通曉時勢之發展，善用計謀，力抗奸邪小人欲妄興戰事從中飽圖私利之謀，不僅黎民百姓不用深受戰爭禍事所帶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國家也不用因輕啟戰端而造成財政軍備的重大負擔。

大夏，仕孝宗朝，為戶部侍郎，奉命往北邊整理糧草，時倉場告乏，處置甚難。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十石，草百束，俱准，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場有餘蓄。蓋

<sup>271</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劉大夏慎密揭〉，頁 974-975

<sup>272</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頁 1007-1008



往時糴買，告糧千石，草萬束，方准，致中貴子弟賤買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貴賈入官。大夏此法立，糧草之家皆自往報，中貴人即欲收羅無處得。邊上軍民云：「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僅見此耳。」此所謂以事處事，合於自然機宜，故其善爾耳<sup>273</sup>。〈劉大夏整理糧草〉

於內政方面，奉派至北方整理糧草，面對中貴子弟把持許久的陋習壞政，仍能堅持原則，制定法則、依法行政，其言「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使得遭剝削已久的百姓能深蒙其利，邊上軍民云：「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僅見此耳。」由此可知之人民是多麼期待一位勇於任事、正直不阿的好官吏。

以上四則小傳之中，劉大夏充分展現其為能臣之各項作為。《明史》《劉大夏》列傳中贊曰曾云：「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恭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蘊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跡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稱黃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疏。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乘權，耆舊擯斥，進退之際所系詎不重哉！<sup>274</sup>」對劉大夏稱譽有加，無怪乎江盈科要將其傳大肆宣揚，不也就是希望所有行政官吏都能向他效法看齊，奉之為圭臬。

### 三、尚奇好異資勸懲

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其思想意涵中「愛奇」也是一大特色，所謂奇，就是指奇人奇事。在人物方面，即指不同於凡俗之人，超凡拔俗有特立獨行的人。李長之先生曾說：「至於司馬遷在所愛的才之中，最愛的是哪一種？一般地說，是聰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於平庸，或意識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為他所深深地禮贊的，則是種衝破規律，傲睨萬物，而又遭遇不幸，產生悲壯的戲劇性的結果的人物<sup>275</sup>。」從他的《史記》來看，立功名於天下，追求扶義俶儻的慷慨人生，欣賞一

<sup>273</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劉大夏整理糧草〉，頁 1021-1022

<sup>274</sup> 《明史》182 卷，列傳 70《劉大夏》，頁 4844。

<sup>275</sup>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北京：三聯書店，1984 年，頁 95

種不完美的非道德化的曠達瀟灑的人生態度，渴望救士人物的實際歷史作用與內在價值，司馬遷愛奇，在寫人物中有意識的突出其人之奇，即物中的特異事蹟，特異行動<sup>276</sup>。這些人物，或富於抗暴精神，具有剛烈之氣；或雖處社會地位底下，卻能砥礪名節而功勳卓著；際遇坎坷，命運偃蹇卻忍辱負重，竭力奮鬥而終成功業。司馬遷對這些人物不僅是情有獨鍾，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他對歷史人物的審美旨趣。對於這些人物，他寫來總是情緒澎湃，筆墨酣暢、氣勢雄渾，讓讀者每每閱讀這些人物傳記，總不免感慨擊節，盪氣迴腸。

江盈科對文章之奇就很贊同，他說：

夫近世論文者輒稱復古，貴崇正而諱言奇。然有不奇而可言文者耶？夫正者，文之脈；理從脈而升息變化，時隱時見，時操時縱，時闔時闢，時陰時陽，時短時長，有自然之奇，然後盡文之態，而極虛明之變。世徒厭夫似奇者，至并奇諱之，相舉為戒。嗟嗟，《六經》而下若《左》若《國》，若《莊》、《列》、《韓非》、司馬子長，諸皆極天下之至奇。至奇將盡舉而付諸祖龍，而徒取老生腐儒訓詁講解之語，指而名之曰：「此文之純正者」，而以為軌<sup>277</sup>。

他認為文脈的自然變化本身就是一種自然之奇，人們對奇唯恐避之不及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古代留下來的典籍就是奇文的代表，人們捨棄這些奇文而咀嚼腐儒的陳詞濫調，當真是本末倒置。江盈科在批判人們對奇文的態度時，也批判了那些對奇文大加敵視的腐儒。正是這些人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讓自在靈活的思想難以生存。而這不也就和《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所要的精神不謀而合。對江盈科來說，尚奇之心本就是公安派文學家獨抒性靈、跳出本我局限，追求自由穎異、活潑元神的內在體認。

「四奇」《怪類》的〈張邈〉

邈，姓張，名君實，字玄一，又字玄玄，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自號三丰子。寒暑衣

<sup>276</sup> 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110

<sup>277</sup> 《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八·璧緯編序），頁409-410

一衲，出游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輿論三教經書，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浹旬累月始一食，登陟山巒，其行如飛，隆冬齧卧雪中，汗出如暑月，雪爲之釋，俗呼爲張邈過。元末居實鷄金臺觀，嘗一日辭世，從者爲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游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嘗游揚州，咏瓊花，詩句超逸。曾寓黔中張揮使名信家，爲治小兒輒效，以貧老故，出入房闈無忌。一日遺尿，乃自脫褲，謂揮使妻曰：「爲我浣此。」妻怒告揮使，揮使曰：「老實頭不曉事，何足較？」使婢爲浣褲，婢以竹竿持褲就池水，簸蕩成蓮花，俄而滿池皆花，異香襲人，婢走白其主，夫妻同往觀大詫，自是乃拜事之。邈過因爲信父母卜葬，皆有奇兆，密約信，謂當有異貴，已而信果與靖難，功封國公，俱如其言<sup>278</sup>。

文中傳主張邈過「每遇事，輒先知。或浹旬累月始一食，登陟山巒，其行如飛，隆冬齧卧雪中，汗出如暑月，雪爲之釋，俗呼爲張邈過。」其形其像自與古之傳說中的得道仙士無二般。而文末遺尿浣褲而成蓮花之事更是奇特，然細究其因，不啻爲以其事試指揮史，如同漢初圯上老人之試留侯之例。指揮史「老實頭不曉事，何足較？」爲其換來「邈過因爲信父母卜葬，皆有奇兆，密約信，謂當有異貴，已而信果與靖難，功封國公」之收穫。雖爲奇特，亦有其深義所在。

史傳堅持實錄的原則，但也不排除虛構和想像，這在先秦兩漢的史傳文學作品中時常見的，例如史傳中的夢境神怪陳述。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同樣有不少神怪傳說與怪異描寫。夢境和神怪妖異描寫，雖然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定的宗教與迷信意識，同時也是爲歷史事件發展的情節和塑造人物形象服務的。《左傳》中的夢境描寫，大多用來作爲預言、暗示情節發展的訊息，或用來刻畫人物心理，或爲人物形象設色添彩。

歷史著作屬於科學的範疇，文學卻需要充分的想像力。史傳作品中虛構和神怪夢幻情節，當它們成爲歷史事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或是成爲揭示歷史人物的性格、命運等歷史事件的發展趨勢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劑時，它並不會損害史傳作品的科學

<sup>278</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張邈過〉，頁 983

性。郭丹曾說過先秦兩漢史傳作品的最大特點，是以文學寫歷史。想像神怪情節的入史，似失之于荒誕不經，卻因其奇幻瑰麗的虛構想像而更富藝術魅力。這些虛飾情節雖不可盡信，卻隱含著真，體現著真，可謂虛中有實。一部小說出來，那些最動人的地方往往不是寫實的部分，而是想像虛構的章節。史傳文學作品也是如此。而這不但不影響這些歷史著作如《左傳》、《史記》、《漢書》作為信史的地位，反而提高了它們作為文學巨著的藝術品位。劉知幾在評論《左傳》時說它「工侔造化，思涉鬼著，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史通·雜說》，看來，他倒是熟知歷史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的藝術辯證法的<sup>279</sup>。

前文曾提到過，江盈科是以「新異」作為該作品的選擇標準的，因此小說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又加入了許多神靈、鬼怪、占夢、卜筮的成分。神鬼靈異之事在作者行文中頻頻出現，本身就表明了作者「發明神道之不誣」的價值取捨。在肯定歷史人物的美好品質、嘲弄奸諂貪酷的邪行之外，《皇明十六種小傳》中對鬼神的態度也頗值得我們進行一番仔細探究。

例如「四維」《忠類》中的〈景清〉

景清，陝西真寧縣人。號禽山，登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建文時，受密詔為北平參政，圖燕。成祖時為燕王，曾燕清，見其言論爽朗，陰相器重，及靖難，師克金陵，清知建文行遁，頗欲效荊軻、豫讓之計，乘間一逞，乃詣上自歸，上見之，喜曰：「故人也。」善遇清，命仍舊官。一日，司星氏奏火星犯帝座甚急，適清入朝，委蛇觀望，神色有異，上意疑焉，命搜清，于衣襟中得利匕首長有尺，蓋清衣緋應火星之占。及匕首出，清知事不濟，乃躍起大罵，上立命殺之，抉齒截舌，罵轉厲，不少衰止。上命解其皮，實草其中，懸長安門，警反側者。是夜，上夢清仗劍繞殿相追逐，幾為所逼，甚窘。翌日駕過，其所懸忽斷，皮囊奮躍三步許，若將上指者。上愈怒，命赤其族，夷其祖父墳墓。按清初舉于鄉，偕計過淳化，逆旅女子被侵于妖，清宿其家，妖不敢至，清去復來，女詰問故，妖答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告父，父追及清問計，清為書「景清在此」四字畀之，父歸，粘于戶上，妖遂滅迹。

<sup>279</sup>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35

噫，景公忠烈異常，即爲鬼，猶思犯萬乘以報故主，至今思之，令人吐舌，髮上指冠。此其生必有自，即滅妖事觀之益信<sup>280</sup>。

篇中景清之事古有明例，東漢戰國時燕國壯士荊軻刺秦王，唐末德宗段秀實笏板擊篡位為王之朱泚之事歷歷在目，文中不論是主管觀察天象的官員通過占星提醒皇帝小心刺客、景清緋衣恰應火星之占；還是景清死後夢中仍追殺明成祖、翌日屍身奮躍，直指成祖；抑或景清年少時為逆旅女子驅妖之事，都體現出了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添加的虛化傳奇元素。從篇末作者的點評中也可以明顯的看出，對於鬼神之說，江盈科認為是確有其事的，不然他不會這麼煞有介事的將其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我們並不能簡單地以談神說鬼為藉口，全盤否定江盈科的現實主義精神，只能說明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士人普遍受陸王心學和王門狂禪的影響，參禪信佛，對神鬼之事多有敬重。

除《景清》篇外，神鬼之事多次出現於《皇明十六種小傳》中，例如「四常」《慈類》中的〈徐昂〉

徐昂，泰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年踰強仕，尚乏嗣息。客都門，有風鑑王姓者，爲人相面多奇中，昂往問嗣。王曰：「君相實不利嗣，當擇猶子入繼可耳。」久之，昂登第，就途次納一姬，爲生子計。姬頗妍，徐詰其所自出，姬縷數以告，蓋其父宦游，没于官，扶觀櫬歸，受掠于盜，遂轉販至此。言畢，泫然泪下，昂歎歎憫焉，還其券而遣之，擇部民士行者一人，出簪服使爲之配，女乃得所，朝夕未嘗不注香禱鬼神，願徐公子孫繩繩也。比昂秩滿人京，前風鑑復至，一見輒大驚曰：「君相有異，子孫滿容，豈非行陰德，天爲換骨歟？」昂心領之，亦不言所以。後果因衆妾一歲誕五子，皆磊落越人。然則慈心之能感神，鬼工之能改相，信不誣已<sup>281</sup>。

文中許昂原本如相士所言「君相實不利嗣，當擇猶子入繼可耳。」然經其一念之慈解救宦宦之女，後相者再見之驚曰：「君相有異，子孫滿容，豈非行陰德，天爲換骨歟？」，這或許是經宦宦之女朝夕未嘗不注香禱鬼神之功，然不是江盈科欲藉此大加

<sup>280</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景清〉，頁 907-908

<sup>281</sup> 《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種小傳）：〈徐昂〉，頁 955

讚揚「慈心之能感神，鬼工之能改相，信不誣已。」行善終有得，善惡終有報之心嗎？再再為小說增添了傳奇性和可讀性，也能看出作者的用心是深化對傑出人物優秀品質的讚美，以及借鬼神之事寄託對黑暗現實的無可奈何，希望能夠以此滿足廓清帝宇、海內克定的美好願望。



## 第五章 結論

以往對公安派文學進行研究時，人們往往著眼於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而忽略了公安派其他成員，談到江盈科其人其作時，也多從其為官經歷、文學活動和學術思想等角度進行論述，對他作品中的有關史論及史傳因素少有涉及。江盈科作為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曾經創作了體裁豐富的大量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又包含著為數不少的散文作品。這些散文作品內容充實，文筆雅潔，存在于江盈科不同的作品集中，為人們展現了一幅極為生動寬廣的明代後期社會生活畫卷，具有較高的社會文化價值和文學審美價值。然而這些散文作品之中有些如《雪濤小說》、《談言》、《雪濤談叢》、《諧史》以及序跋、尺牘、記文等列為小品文的部分，慢慢獲得重視，其研究不斷的出現，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而另外一部分如古論、奏疏、論說文及《皇明十六種小傳》這樣一些具有時代背景、研究意義的史傳散文，卻因為各種原因長期得不到研究者的發現與重視，現有的論述和研究也都由於研究視角和論述重點的問題顯得不是那麼的具體、全面、系統，因此本文採用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方式，結合江盈科的家世生平資料和明代中後期的時代背景對其進行重新審視和定位，從不同角度進行有序整理和類型劃分，深入發掘江盈科這些作品的思想文化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

筆者透過閱讀前人的研究成果得知對江盈科的研究集中於江盈科的地位及其生平、為官經歷、文學活動和學術理論及思想，而作品方面的則集中在詩作、詩論及散文中的尺牘、序跋小品及戲謔小品，然而觀察江盈科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史論及史傳作品，不過針對對此類文體，尚乏全面細微探討的研究。因此本論文主要以江氏的《皇明十六種小傳》為題。由於本文研撰動機一部份是因為前賢研究的不足而引發，所以本章先討論前賢研究成果，以引起下節之動機。筆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來研究，試圖以文獻考察，作品分析、歸納、比較等方法從作者創作因緣與發展、分類內容及意涵來探討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本質與特質。得到了四點結論：

一、江盈科身為農夫之子，家境雖清貧，卻堅持學習；為官時間雖不長，仕途也算不上十分通達，卻頗有政績，深受百姓的愛戴。他與公安派大將袁宏道同科進士

乃至同府為官，蘇州的山水園林，名勝古跡等就為袁，江孕育靈感，提供素材，為性靈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兩人互相交游唱和共同商證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基本理論。入京為官後與活躍於當時的三袁兄弟組織詩社，酬唱應對。而江盈科作為副將在公安派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闡發「性靈」之旨，開「元神活潑」之說』及「論模擬復古之非，倡真趣奇變」來作為自己文學主張。在文學創作中以「戮力為官，關懷國事」、「表達吏隱心態」、「順應個性，怡養性情」三個特色來介紹其詩歌作品；接著探究其散文作品並分析《皇明十六種小傳》在其作品中角色地位。

二、從明代的政治、社會、學術三方面來探究《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書寫背景，同時分析了《皇明十六種小傳》與「明代野史」、「世說體」之關係及其體例。《皇明十六種小傳》在形式上確實承襲了《世說新語》分門隸事與以言寫人的體例，但在門類的選擇、創作思想、題材主題等方面皆表現出獨特的風貌，在廣義上或許可視為「世說體」之一，然細論之，實不宜與後世純以模仿《世說新語》為目的的作品等同觀之。或許有人會懷疑，既然江盈科並不想承繼《世說新語》，何以借取《世說新語》分門隸事的體制？關於此點，筆者以為：「筆記體乃是文士釋懷寫心最便捷，最自如的文體<sup>282</sup>。」江盈科欲創作能夠表達己意的著作，選擇筆記體當不令人意外，而在筆記體創作中，《世說新語》開始擺脫六朝以來志怪的內容，《皇明十六種小傳》既是記人事，當可採說《世說新語》的體制，所借鏡的正是其分門隸事，以言寫人的模式。另外也析論了《皇明十六種小傳》的內容主題，將《皇明十六種小傳》分四大門十六小類的內容做一梳理分析，並陳述其不合門類規範的原因，同時以「四維不彰，國乃滅亡」、「為政之道」、「奇人志士」三個面向來說明分類意涵。

三、從「正文和贊語的敘述模式」及「事實與實錄」的觀點來強調《皇明十六種小傳》做為史傳類文體，以記載人物言行事蹟為主，是一部藉以勸善懲惡與保存史實的作品。人物形象中則以（一）善用語言表達出人物的個性。（二）運用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三）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以突顯人物形象。（四）以互見手法

---

<sup>282</sup>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75



展現同一人物的不同面貌。來表現《皇明十六種小傳》在敘述人物事件時，採用形象法，把事件過程具體化、故事化、情節化的表現手法。

四、從「崇德性，奉正統」、「能臣幹吏善治國」、「尚奇好異資勸懲」三個面向表達江盈科「借古鑑今與勸善懲惡」的思想呈現。研究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後發現，他擷取絕大部分在歷史上有所記載之人物，加以分門別類，不僅對對傳統的忠孝節義由衷景仰、對君王官吏的德行政能大加讚揚，更對腐敗的官場無情抨擊，同時亦能展現其尚奇好異的一面，身處在那樣混亂的明朝社會中，江盈科的從政實踐和文學創作，鮮明地貫串著民本思想和人道精神及「資治道」、「善勸懲」的作用。

歷來人們談論公安派文人的作品時，多因為他們的文學主張強調「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而由此片面地認為公安派作家不關心國計民生，只談山水嬉游之樂和文人的閒適之趣，致使作品缺乏一定的社會文化意義，思想內容較為貧乏。但綜觀江盈科的散文創作，他不僅寫了一系列憂國憂民、批評時政的作品，而且寫的「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事實證明了即使是關注世事民生、飽含人道悲憫思想的作品，同樣也可以抒發作者的「性靈」。

對於《皇明十六種小傳》相信有更多方面值得我們探討研究，例如，後世研究為何不受到重視、研究方向及方法是否正確、門類的選擇標準為何、內容篇數比例問題、與其他文體的關聯性，但是礙於時間及個人能力，只能留待後學了。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依據朝代順序）

- 〔春秋〕左丘明著，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頁870
-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296
-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10月
- 〔南朝宋〕劉義慶編撰，范子燁注釋：《世說新語》，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 〔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7月
- 〔北宋〕吳縝《新唐書糾謬》，《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三十四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 〔南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
- 〔南宋〕晁公武撰，孫猛校《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明〕王惟儉《史通訓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
- 〔明〕江盈科《雪濤諧史》明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 〔明〕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
-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續修四庫全書》，第1173冊，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版
-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10月
- 〔明〕李贄《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
- 〔明〕李贄《初譚集》《四部刊要》，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2年12月
- 〔明〕李贄《焚書／續焚書》卷三，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5月
- 〔明〕李贄《藏書》卷二四〈德業儒臣後論〉，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6月
- 〔明〕李贄《明六十家小品文》〈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
- 〔明〕江盈科《江盈科集》上、下，黃仁生校注，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4月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5月再版
-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1976年9月
-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傳》卷一，〈潘去華尚寶傳〉，上海：新華書局，2007年
-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箋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明〕袁宏道著，孟祥榮箋校《袁宏道集箋校》，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明〕張德夫修、江盈科增修：《長洲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十一冊，金壇中國書房，1992年12月

- 〔明〕曹臣《舌華錄》，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2月
- 〔明〕潘之恒《鸞嘯集》，明萬曆間原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 〔明〕薛飛等編《光緒桃源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卷八，2002年
- 〔明〕薛瑄《薛文清公從政錄》，（《官箴書集成》影印《寶顏堂秘笈》民國石印本）
- 〔明〕鍾惺《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
- 〔清〕《四庫全書存目》，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8月
- 〔清〕曾國荃等撰《湖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 〔清〕趙翼（清）《廿二史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92年8月
- 《光緒桃源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光緒湖南通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
- 《湖南府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
- 《嘉慶常德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

## 二、現代著述（依姓氏筆劃）

-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6月
- 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 王恒展《中國小說發展史概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
-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1
- 左東嶙《明代心學與詩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3月
-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10月
- 江曾培《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成》，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頁
-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4月
- 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吳志達《明清文學史·明代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 吳承學、李光摩《晚明文學思潮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
-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頁。
-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李辰冬《詩經通釋·下》，台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5月

李紹先、王曉琳《明清小說話幽》，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汪榮祖《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9月

狄德羅《論戲劇藝術》，載《西方文論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55

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論袁宏道的生平及其風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5月

易聞曉《公安派的文化闡釋》，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5月

林茂桂《南北朝新語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

孫之梅《中國文學精神·明清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徐朔方、孫秋克《明代文學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

袁世碩《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12月

高陽《明朝的皇帝》，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張桂萍《史記與中國史學傳統》，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12月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陝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張覺明《晚明公安派副帥江盈科研究》，新北市：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7年4月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10月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7月

許建平《李贄思想演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郭丹《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04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4月

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

陳飛《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

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5月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臺北：二魚文化公司，2005年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臺北：二魚文化公司，2005年7月

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陳援庵《明季滇黔佛教考》，臺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年

越偉《晚明狂潮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7年11月

黃燕生《古代藏書漢藏書樓—天祿琳瑯》，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葉慶炳、邵紅《明代文學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9月

- 賈文仁《古典小說大觀園》，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
-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12月
- 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9-10
- 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19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 熊禮匯《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
- 趙士林《心學與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6月
-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
-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 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5月
-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7月
- 劉燕萍《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7月
- 潘重規《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3月
- 稽文甫《左派王學》，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4月
- 鄧紹基、史鐵良《明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3月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盧奇安《論撰史》，載《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 謝桃坊《中國市民文學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月，頁97。
- 謝國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
- 鍾林斌《公安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
- 韓兆琦《〈史記〉與我國古代傳記文學》，收錄於張高評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
- 羅筠筠《靈與趣-晚明小品文美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
- 龔傑《王艮評傳》，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8月

### 三、期刊論文（依姓氏筆劃）

- 王三慶〈從市場經濟看明代小說的幾個問題〉，《古典文學》，2000年9月
- 王成〈論江盈科《閨秀詩評》的創作內涵〉，《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0卷2期，2011年4月
-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三十二卷第四期，2006年
- 何國平〈公安派副將江盈科的「吏隱」心態論〉，《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5期，2000年9月

- 李兢兢〈元神活潑說」淺析〉，《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3期，2006年06月
- 李兢兢〈論江盈科在公安派創立時期的地位〉，《惠州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2年5月
- 孟祥榮、毛洪文〈公安派形成時間和原因的考察〉，《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5卷第5期，2000年9月
- 林美秀〈論江盈科的文學新變觀〉，《中國國學》第18期，臺南：臺灣省中國國學研究會，1990年11月
- 段穎惠〈從《明史·列女傳》析明代婦女的貞節觀念〉，《殷都學刊》10卷，2005年
- 夏咸淳〈晚明小品的審美特徵〉，《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0年第1期
- 夏咸淳〈論公安派重要成員江盈科〉，《文學研究叢刊》第5輯，1988年12月
- 崔憲濤〈關於中國古代官箴書的幾個問題〉，《理論學刊》，2005年第1期，頁100-102
- 章培恒〈《江盈科集》序〉，《書屋》湖南：書屋雜誌社，1997年04期
- 連文萍〈詩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以兩部明代詩話為論述中心〉，《漢學研究》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
- 陳平原〈晚明小品論略〉，《中州學刊》，1995年第4期
- 陳本源〈「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略論袁宏道、江盈科吏吳時期的小品〉，《蘇州教育學院學報》蘇州：蘇州教育學院，第18卷第2期，2001年6月
- 陳蒲清〈晚明詩文運動的一員主將—江盈科〉，《衡陽師專學報》，1996年04期
- 梁容若〈葡萄社與公安派〉，《純文學》第6卷第6期，1969年12月
- 傅錫壬〈《世說》四科對論語四科的因襲與嬗變（《世說新語》題旨探微之一）〉，《淡江學報》，第12期，1974年3月
- 黃仁生〈四百年來對江盈科的接受與批評〉，《書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 黃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考〉，《中國文學研究》湖南：中國文學研究雜誌社，1997年第2期
- 黃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3卷5期，2008年9月
- 黃仁生〈江盈科論〉，《文學評論》第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
- 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復旦學報》上海：復旦學報編輯部，2006年第6期
- 黃仁生〈論公安派副將江盈科的文學思想〉，《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湖南：湖南師範大學，1997年03期
- 黃仁生〈論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及其他〉，《復旦學報》上海：復旦學報編輯部，1998年第5期
- 楊碧雲〈論江盈科的小品文〉，《新余高專學報》，2005年6月
-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湖南工業大學學報》，13卷3期，2008年6月

- 甄 靜〈明清時期現存「世說體」小說概況〉，《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7 卷 2 期，  
2011 年 4 月
- 趙毅衡〈「敘述」還是「敘事」？一個不能再「權宜」下去的術語混亂〉《外國文學  
評論》(No.1， 2009)
- 趙毅衡〈廣義敘述學：一個建議〉《敘事》中國版( 第二輯)
- 裴傳永〈關於古代官箴幾個基本問題的辨析〉，《理論學刊》，2005 年第 1 期
- 諶貽春〈試論江盈科對公安派文學的貢獻〉，《江西社會科學》，2004 年 10 月
- 薩兆瀉〈明公安派詩社活動淺析〉，《新視野》，2000 年 6 月
- 龔鵬程〈江盈科詩論小箋〉，《古典文學》第 15 期臺北：學生書局，2000 年 7 月

#### 四、學位論文（依姓氏筆劃）

- 朱銘漢《袁中郎之文學批評觀》，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 朴鍾學《公安派文學思想及其背景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1988
- 李 亮《江盈科文學活動及文藝思想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2010 年 4 月
-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研究，嘉義：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 周 坤《江盈科小品研究》，江西：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 年 5 月
-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 林艾齡《《智囊補》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 林美秀《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高雄：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 姚琪姝《「世說體」小說發展敘述》，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 年
- 姚麗麗《江盈科研究》，浙江：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5 月
- 徐 敏《江盈科小說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
-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年
- 張瑞文《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 陳新怡《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新竹：清華大學  
文學研究所甲組碩士論文，1993

附錄一 《皇明十六種小傳》摘要

四維--忠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101	于光	133	21	3893	556	太祖	◎	◎	伐元王保保，猝遇敵被俘寧死不屈，大呼曰：「我不幸被執，甘為斷頭將軍，以死報陛下，公等宜厲志徇城，徐總兵大軍且至，臊狗輩亡可立待矣。」虜怒批其頰，立殺光。	為國捐軀
102	濮真-英	133	21	3894	234	太祖	◎		以總兵征高麗國，兵敗見執，國王愛其驍勇，欲協真降。真嗔目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犬豕耳，敢以此望我？」王怒，欲殺之，真大罵曰：「爾害我命，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我烈丈夫，心可剖，志不可屈。」即抽刀剖心示之，立死。	明史記載其應為北征元將納哈出為國捐軀
103	景清	141	29	4026	456	惠帝 成祖	◎	◎	頗欲效荆軻、豫讓之計，類 段秀實-荆軻。事敗，上立命殺之，抉齒截舌，罵轉厲，不少衰止。上命解其皮，實草其中，懸長安門，警反側者。成祖夜夢-有鬼神之事	不事二主
104	徐輝祖	125	13	3730	349	惠帝 成祖	◎	◎	徐達之子，成祖之后徐氏，輝祖姊也。成祖未舉兵時，謂婚姻之故，祈助于祖，祖乃心王室，每對建文主密圖防燕之計。察次甥高煦有英氣，且志慮叵測，然不為採，後成祖登基為文詈之，上怒，數欲加誅，然念元勛國戚，徘徊久之，竟釋輝祖。	不事二主
105	鐵鉉	142	30	4031	531	惠帝 成祖	◎	◎	鉉，當靖難兵起時屢拒其兵。其後成祖既定天下，使人縛致鐵鉉。堅不肯降。割耳截鼻，至死罵不絕口。遂誅其族，二女俱充教坊，皆守貞不污，上聞憐之，聽嫁士人。	不事二主
106	方孝孺	141	29	4017	703	惠帝 成祖	◎	◎	孝孺，為學士宋濂所愛重，聞于太祖。曰：「留為子孫作宰相爾。」及建文時，靖難兵作，多與帷幄之謀。燕師初出，僧道衍密啓上曰：「方孝孺，南朝好秀才，武成之日，彼必不屈，幸曲赦焉。」上首肯。後成祖欲其草詔，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我能滅人九族。」孺曰：「即滅十族，何怕？」其族朋友門生皆抄沒之，坐死者八百餘人。	有鬼神之事，以為蛇報云，不事二主



107	王良	143	31	4047	320	惠帝 成祖	◎	◎	良，建文朝鼎甲第二名。先是擢第一，後嫌其貌不及胡廣豐偉，遂首廣次良。靖難時兵下金陵，良聞之，度無可為，但東向痛哭，自為引決計。嗟夫，當登第之日，胡廣偶以貌先良；及臨大難，廣乃甘心事二主，而良身投赤焰，完名全節，殊烈烈然，令人起敬。	因醜換胡廣仍為忠，不事二主
108	劉璟	128	16	3783	319	惠帝 成祖	◎	◎	璟，誠意伯劉基次子。以峻直為朝臣所憚。成祖登基，至京，上善遇之，欲授以官，不受。對上稱「殿下」，遂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不事二主
109	顏伯瑋	142	30	4041	297	惠帝 成祖	◎	◎	成祖靖難兵起，將攻沛，伯瑋謂其子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爾報大人：因忠虧孝，願恕瑋罪。」燕師入城，瑋衣冠焚香，南向慟哭，再拜曰：「伯瑋不能為朝廷完此城，死不瞑目，願陛下赦臣萬罪。」遂自縊，其子聞之，不忍去，歸抱父屍慟哭，亦自刎。	不事二主
110	馮貴	154	42	4229	212	宣宗	◎		貴，湖廣武陵人。仕宣宗朝，為交趾左參政。會黎利反，貴所部羸卒纔數百人耳。貴仰天泣嘆曰：「死戰自吾分也，但恨奸閹奪我勁兵，使不能樹尺寸功報國，死與螻蟻等，吾目終不可瞑也。」與賊戰，皆死。	交趾之亂
111	何忠	154	42	4229	291	宣宗	◎		忠，荊州人。起家進士，以御史出知平州，會黎利反，為賊所得。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乞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蠻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交趾之亂
112	劉子輔	154	42	4229	208	宣宗	◎		子輔，江西廬陵人。宣宗朝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有惠政，會黎利反，攻諒江，至城破，無一人降者。輔見城破，曰：「吾分當死，不可污賊手。」遂自經。	交趾之亂
113	楊源	162	50	4418	482	武宗	◎		源，按察使楊公瑄子。正德時，適內監劉瑾專橫，手執國柄，擅作威福，舉朝憚之。源乃屢上疏言其非。」瑾大怒，罵源曰：「爾何等官，亦學為忠臣乎？將令龍逢、比干，車載斗量，不可勝計矣。盍三緘其口，多吃幾年飯為得筭？」源答曰：「官豈在大，盡職為良。吾所司天文也，知而不言，職守安在？寧懼死乎？且生，苟負君，固不如死。」瑾愈怒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114	孫許	289	177	7427-30	392	武宗	◎		孫，名燧，仕武宗朝，為都御史，巡撫江西。許，名達，同時仕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會宸濠久蓄異謀，燧與達下檄所屬，整飾兵糧，以備緩急。燧屢具疏，疏濠逆萌，皆為濠所置用事人阻截不得達。後二公知濠不可回，又度其身必不容不死，乃相與大詈濠。達遂脫所著皂靴擲濠，不中，濠立命左右引出門外，斬以徇眾。	明史 忠義 1 孫燧 許達
115	沈鍊	209	97	5533	759	世宗	◎	◎	鍊仕世宗朝，為錦衣衛經歷。屢次陳言力抗嚴嵩，因歷數其父子奸貪十罪。嵩痛恨之，譖于上，編發鍊保安州為氓。鍊至保安，父老問其被放始末，皆相與詈嵩父子，而爭敬事鍊。鍊于暇時執弓矢演射，乃東芻為人者三：其一曰李林甫，一曰秦檜，一曰嚴嵩。日夕挽弓射之，曰：「吾射奸相。」有白蓮社妖人通虜，被誣以謀叛聞，下兵部議。舉朝皆知其枉，尚書許論，竟不為雪。嵩擬旨殺之，籍其家。	嚴嵩所害- 沈小霞-其子襄妾
116	楊繼盛	209	97	5535	961	世宗	◎	◎	繼盛，北直隸人，性中心鯁。世廟時第進士。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坐誹謗罪，當死，上欲救之不可得。其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與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後王遴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請配公次子應尾。」	有鬼神，俠類王遴亦記此事
117	金英	304	192	7769	483	英宗	◎	◎	英，閩人也。仕英廟時，為司禮監太監。面唾徐程，曰：「京師宗廟百官六宮三軍及累朝儲畜皆在，奈何不言固守，輒圖退避，蹈弱宋亡國之轍耶？」與兵部于謙，日練兵秣馬，為戰守計，神京乃安。稱許大理卿薛瑄不饒為好官。作婉詞陰沮景皇易儲之計。	宦官-因貪被關
118	覃吉	304	192	7777	372	憲宗	◎	◎	吉，閩人也。仕憲廟時，充東宮典璽局。時東宮，即孝皇帝是也。吉為人溫雅誠篤，知國家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導東宮之功為多。	宦官-孝宗師傅
119	懷恩	304	192	7777	506	憲宗	◎	◎	恩，閩人也。憲廟時仕為司禮監太監。力救南刑部員外林俊，諍曰：「國家百餘年未聞有殺諫官者，今一旦殺諫官，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後守其正，屢拒上之任命。	宦官

## 孝 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201	王溥	140	28	4004	454	太祖	◎	◎	溥，貴溪人。父名晉，母葉氏，生溥及漢。元亂，兄弟二人奉母傾側亂離中，相與避兵貴溪之桃源山，無何，兵至倉卒，母子相失。後溥從陳氏，日夜思母不置。太祖惻然聽之，仍勅賜祭以歸。後孝感動天得尋母墓。	尋母墓
202	朱煦	296	184	7591	308	太祖	◎	◎	煦，台州人，福州知府朱季用之子，其父因罪欲圖自盡，煦謀于父僚同役者曰：「吾無術脫吾父，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由訴免父，雖身被戮，萬萬無恨。」遂陳詞通政司以聞，上憐之，赦季用，復其官。	孝義一(類緹縈救父)
203	張鈞	297	185	7613	399	武宗	◎	◎	記張鈞、於博、張承相、張永安四人皆為救其父或母，捨身而死之事。	孝義二(四人)
204	陳茂烈	283	171	7265	565	孝宗	◎	◎	茂烈，其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少喪父，烈繼其役，晝入公署，夜讀書，每至丙夜，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及長，登進士，仕為吉安府推官，行取為御史，以母老上疏陳情乞終養。類西晉李密陳情表之言。	儒林二類陳情表
205	張宗魯	296	184	7584	308	太祖		◎	宗魯，鈞州人。生四歲，病瞽，白晝偃偃，無異昏夜。稍長，乃學卜，為人占吉凶，及年二十，里中盜起，宗魯自負母，令妻掖之以行，所至賣卜給母食，妻拾野蔬佐之。盜每見魯瞽而負母，率憐焉，不忍加害。後亂定，與其妻奉母歸鄉里，仍求前母曹、沈、吳三氏遺骨，合葬父塚。	孝義序文-點到大為宣揚
206	儲福妻				364	惠帝 成祖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知書，慕氣節。建文末，因靖難兵起，不事二主，日夜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為營地瘞其骨。范時年二十，有色，欲殉其夫死，而不忍其姑之獨也。乃強活奉姑甚謹。織席，售于市，養姑以終。	記事本末體 18 王午殉難應列女節類

廉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301	胡壽安				408	成祖			壽安，徽州人，性清儉。永樂中，任新繁縣令，官廚止食脫粟，佐以園蔬，屢月未嘗啖肉。阿郎自家往省之，居兩月，烹食二鷄，安怒曰：「鷄亦性命也，奈何妄殺？爾父居官二十年，一味澹家，尚且兢兢虞于玷缺。爾一介布衣，好嚼若此，鷄非所恤，將毋累我？」	類司馬光訓儉示康之言
302	虞信				249	成祖		◎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其子受金研，信怒曰：「墜我家聲者，必癡鬼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	
303	毛吉	165	53	4471	559	憲宗	◎	◎	毛吉，成化官廣東按察司副，為賊所乘死于陣。文中借鬼神事曰：「吉平生勉持清白，志存報主。奈何才略短淺，身死戰場，不能滅賊以報國家，而又因之以為利？吾所不為。即暴骸野草，見蠹烏鳶，吾甘之矣。四知之金，非所敢受，願公諭吾家出其金，使歸故帑，吾目瞑矣。」	有鬼神之事
304	楊翥	152	40	4193	222	英.代宗	◎	◎	楊翥，字仲舉，以清節自砥。平生取予之際，凜然四知，一無所苟。忽夜夢入隣家園，食其二李而甘，比醒，深自咎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精神感召，如響答桴。隣家之李，我夢食焉，必且晝義心弗明乃有此耳。」	夢境中-貪念
305	山雲	166	54	4482	331	成祖	◎	◎	雲，永樂中為指揮使，性廉潔，等敝屣于千金，避微嫌于二卵，即文臣中罕見其儷。鎮廣時，一皂衣姓鄭，素有直名，雲召問曰：「人言將不忌貪，有之乎？」鄭跪曰：「將能而貪，欲用其能，故略其貪，然終以貪敗，不如不貪。」	鎮廣西-大藤峽
306	于謙	170	58	4543	425	代宗	◎	◎	謙，仕景皇帝時，為兵部尚書，內籌軍國，外攘夷狄，朝廷倚以為重。然性甚廉潔，自其登第後，先世室廬田園，盡畀其弟，歷官至大司馬，自常俸賜予之外，一無所受，故所居敝屋數椽，僅蔽風雨。及身受國家重托，念王事多艱，不暇自為計，姑就朝房栖止，携一蒼頭與俱，瓦器蔬食，即儒生不如。及英廟時，謙得罪被誅，命籍其家，僅僅常俸賜予，無他長物。	簡單寫其一生後半輩子

307	秦紘	178	66	4743	454	憲.孝宗	◎	◎	秦紘，憲宗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具。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嘆曰：「好清官，幾被枉命。」按英廟時，太監金英以使事往江南，比歸南都，士夫皆具席致餞，獨薛瑄不餞，及英抵京師，所稱南京好官，必以薛瑄爲最。今紘比他巡撫，獨慢直，又密疏直，而直終賢紘不容口，殆與金英之賢薛瑄無異。然金英立身自賢，故其賢薛瑄也，秉彝好德之意也；若直之專橫，遠非英比，特秦紘以一黃絹之故，受知憲宗有素，故直不得不稱其賢。	點到金英與薛瑄事與汪直
308	石璞	160	48	4360	248	代宗	◎		璞，臨漳人。舉于鄉，至景泰時，歷官兵部尚書。性清介，食祿四十年，家無餘貲，致政歸，田僅百畝，敝廬數椽，取蔽風雨而已。見其鄉人有爲典史歸者，宦蠹甚豐。言汝兩年典史而富如此，不貪安從得來？」深爲不恥遂拂衣出。	
<b>節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401	蔡子英	124	12	3713	306	元末明初	◎		子英，河南人。元進士。元滅，英遁入終南山，有司物色得之，械送京師，渡江逸去。至是又爲捕者所得，械而經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子英曰：「頭可斷，志不可屈，况腮毛耶？焚即焚耳。」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上書曰極言其不事二主之心，上聞之，嘆曰：「爲人臣者，當如是。」敕有司送出塞。	不事二主
402	楊維禎	285	173	7308	191	元末明初	◎		維禎，號鐵崖。元時人，官翰林。及元亡，隱居山中，以詩文自娛。太祖御極，聞禎名，遣使召之。上愛其才，欲使爲詞臣，禎不肯就。未幾，放之還山。	文苑一重節

403	雪庵和尚-葉希賢	141	29	4023	421	惠帝成祖	◎	◎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九族皆赤。當是時，和尚壯年祝髮為僧，西南走重慶。墟中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因逃禪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靖難-曰其死或逃
404	河西傭	143	31	4062	259	惠帝成祖	◎	◎	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成祖人金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于市，金城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故葛衣其上，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故葛，直悶悶不答。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或問留都官：「傭何人？」亦不答。	靖難
405	東湖樵夫	143	31	4056	198	惠帝成祖	◎	◎	樵夫，不知何許人，栖住浙江臨海縣東湖上，家無恒業，采樵為生。入山為樵，易米自給。易米有餘，即易酒，約鄰人共飲，相與譚古說今，縷縷可聽。人問其姓名，不答。成廟革命，詔書至臨海鄉，民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在？」或曰：「燕兵圍金陵，已燒宮自投火死。」樵夫放聲大哭，遂赴湖水死，竟不知其何許人。	記事本末體 18 壬午殉難靖難
406	補鍋匠	143	31	4062	274	惠帝成祖	◎	◎	蜀中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取直自給。一日，忽于夔州市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其語。語畢，又相持哭，且別去，言從此永訣，此輩大抵建文行遁之臣也。	靖難
407	范理				333	宣宗		◎	理，仕宣廟時，為江陵縣知縣，誠心實政，不求人知。會內閣文定公楊溥子自首赴京，獨理平平相與耳。比至京，文定問其道路所經狀，公子懸江陵縣令薄視己，且曰：「兒不足惜，獨不念阿翁乎？」公聞之唯唯，然心已服理之高。後廉其為政，政恬靜愷悌，似其為人，公乃薦理于朝，擢守德安府，一再轉，遂至貴州布政。	三公楊溥知人之明，似應入廉

408	薛瑄	282	170	7228	380	英宗	◎	◎	瑄，仕英廟朝，官至宰相。其先為山東提學，適大璫王振操柄，振問內閣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瑄，振為言于上，召拜大理少卿。瑄至，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後遇諸途，瑄復不為禮，振甚恨。	儒林 1-王振
409	陳敬宗	163	51	4424	257	英宗	◎	◎	敬宗，慈谿人。正統時，為南京國子祭酒，清介拔俗。會以考績詣京，大璫王振方握天憲，欲引賢者以為重，念無繇致宗。適南直巡撫周忱亦在京，方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示之意，忱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無故謁中貴，恐諸生目笑我，我乃無面目相見。」謝不往	王振
410	魏驥	158	46	4318	233	英宗	◎	◎	驥，初舉鄉試，仕為松江府訓導，陞太常寺博士，累遷至南京吏部尚書。賫捧至京，上疏請骸骨。時內閣陳循為驥所取士，聞其乞休，乃詣驥謂曰：「先生位冢宰，于人臣為極品。然未及立朝，盍少需之？事在我輩，必有以報先生。」驥遜謝。	王振
411	楊守陳	184	72	4875	252	孝宗	◎	◎	守陳，鄞縣人。登進士，官為翰林，文采蔚發，性恬澹，無營于世。其後官五品，凡十六年不調，泊然處之，無少介意。會有權幸重其賢，將援之，先使所親喻意，欲致守陳附己而後應焉，守陳語所親曰：「我猶嫠婦守節二十年，齒髮變衰，無情門外東風久矣。子乃欲我塗脂澤粉，覩顏自媒，從新取媚少年為耶？我没這一副厚臉皮，實耻為之。幸謝某人，無以守陳為念。」	不願攀附權貴
<b>女節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501	潘氏				231	元末明初		◎	潘氏，其夫為徐允讓。元末兵起，允讓奉其父安逃避山中，為賊所執，將殺之，讓跪而號哭，賊乃舍安殺讓。蓋賊睨讓妻有色，欲圖之，潘氏大哭，投火中。至是事聞，上曰：「孝子節婦，刃可蹈，火可赴，此正氣也。」	徐允讓之妻

502	郜氏孫氏				462	元末明初	◎	郜氏，花雲將軍妻也。雲與知府許瑗共守太平府，時陳友諒悉衆來攻，雲與許瑗皆被執，罵賊不屈死。雲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危，郜氏抱兒託孤孫氏，及聞雲就縛，郜氏赴水死。孫氏後遇雷老得保將種。	花雲將軍妻鬼神相助
503	韓黃兩貞女	301	189	7693	472	元末明初	◎ ◎	明玉珍據四川，保寧府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懼見掠，乃偽爲男子混處民間，編行伍七年，人莫知其處子也。後同事者皆驚異，稱韓貞女云。陸鉞曰：「此無愧古之木蘭矣」。成化中，金陵淮清橋一女名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其父業販香，乃令男服攜與俱，父客死於外，女乃詭姓名張勝。會鄉人李英亦販香，勝與結伴，同寢食踰年，恒稱病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其姐初不信，後始歸英。	列女一
504	吉慶奴	147	35	4115	573	成祖	◎ ◎	吉慶奴，大學士胡文穆廣女。永樂間，廣與解學士縉同官，成祖謂曰：「縉、廣生同鄉，少同業，仕同官，遭際同朝，可謂奇遇。聞縉有子，若得廣生女爲配，詎羨朱陳之好耶？」後縉以定策事爲漢王陰構，重得罪，謫戍遼左，廣輒謀毀婚，然吉慶奴以死相逼，遂罷其事。	胡廣之女-與解縉有關
505	邵門二節婦				318	憲宗		福建上杭縣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當成化時，鄧茂七反，縉紳兄弟俱避難他往，止遺二氏與其母相守，皆被執。賊見其少且美，欲納之。二氏謂寧死不辱，各抱嬰兒懷中，泣謂姑曰：「氏不能終事老姑，從此長別，命也。」並投水死。	
506	何氏二女				333	世宗		何氏女，居民何雄出也，長年十七，次年十二。幼喪母，與其父居。會嘉靖十年歲饑，轉死溝壑者甚衆，雄計無從得食，欲鬻二女娼家。女聞之，泣告父曰：「娼非人所爲，奈何以父母遺體墮烟花爲門戶辱？」于是相持泣，以帛繫臂，姊妹相連投水死。	
507	張氏	301	189	7700	272	世宗	◎	張氏，其夫汪綬。嘉靖間商販他境，遭母陸氏與張家居。張事姑備盡婦道。陸故淫縱，私通于鄰人某，張時時諷諫。姑惡其形已也，乃謀于所私者曰：「不殺此婦，終不利我兩人。」于是定計，候漏下二鼓，陸與其人執婦，將捶殺焉。	汪綬妻列女一改編



508	胡氏				214	世宗		◎	胡氏，李華妻。華隨父行賈于外，胡與其姑易氏獨居，姑縱淫，日通于鄰人徐璉等，相與百計誘胡，胡貞白自誓。不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遂百計凌之，逼與同污，圖滅口，胡終不從。姑與璉計，夜實土于囊，擗胡其下，壓殺之	
509	莊氏	301	189	7702	569		◎	◎	莊氏，金童妻。金童因家貧，與其兄吳祈謀赴新會縣傭力糊口，挈妻同往，附土民劉銘、梁狗之舟以行。銘與狗見莊氏少而美，百計誘之，不從。二人乃誘童往捕魚，持斧斫其腦，投之江，莊氏顧度力不能報，又不忍其夫以己死，輒擁幼女以身附金童屍溺死其鄰李逢春心憐之，然憚銘等不敢發，但買棺瘞三屍。	列女一

#### 四常--慈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101	仁廟禁告謗宣廟論肉刑	8	本紀8	2305	477	仁-宣宗	◎	◎	國朝自二祖刑亂，用重一時，臣工奉行不善者，率多以刻為明，圖博聲譽。仁宗在青宮時深睹其弊，及即位，遂下詔禁民告誹謗，及宣廟御極，其治率以精明為表，渾厚為裏，一日御文華殿，與侍臣論古之肉刑未免過慘，或對曰：「肉刑慘，民畏之，故重犯法。及漢文除肉刑，民輕犯法，則肉刑亦自有益。」	刑法二
102	劉髦	176	64	4591	372	成祖	◎	◎	劉髦領永樂戊子鄉薦，歸而道淮徐。會泮水大至，一女子浮植出沒波濤間危甚，亟呼求救。髦曰：「螻蟻亦性命，古人上編竹渡之，況人乎？奈何疾視其死？」遂厚犒長年，迂舟往救，女乃自濤中得附舟不死。後髦乃納為貳室，生子定之、寅之，皆登進士，為顯官，有聞于時，蓋髦一念真慈，蒼蒼固默相之矣	劉定之-寅之之父
103	徐昂				289	孝宗		◎	徐昂，弘治丙辰進士，年踰強仕，尚乏嗣息。客都門，有風鑑王姓者，為人相面多奇中，昂往問嗣。王曰：「君相實不利嗣，當擇猶子入繼可耳。」後昂登第，一念之仁救一姬女乃得所，朝夕未嘗不注香禱鬼神，願徐公子孫繩繩也。後果因衆妾一歲誕五子，皆磊落越人。然則慈心之能感神，鬼工之能改相，信不誣已。	有鬼神

104	李時勉	163	51	4421	600	仁-宣宗	◎		時勉，仁、宣二廟時御史。其人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游燈市，時勉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壹股，不占為己有矣。後得真血蝎者，乃夷方物，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後勉遇罪深受重傷，勉使家人取諸筭中，持以傅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如初。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蠍之力不少矣。	
<b>明 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201	宣廟釋閻群兒等辟	94		2305	238	宣宗	◎	◎	宣廟勵精躬親庶政，萬幾畢照。會有義勇將軍閻群兒，其妻毛氏，與人私通，誣首其夫與宣等九人共劫，法司擬群兒等斬。上命都察院鞠之，群兒所稱左驗果有之，乃訊得毛氏誣閻及貴等情節，請釋群兒等，殺毛氏。	閻群兒之妻 刑法二
202	宣廟釋何回				233	宣宗		◎	何回，仕宣廟時，為刑部郎。有兗州護衛指揮宋真，誣小旗馬全父阻滯鈔法一事，何回有俱獄論真斬，論彬配。會有言回受真金者，事聞，下錦衣衛掠問，回不勝痛楚，遂承福。回家人上書訴冤，上覽書命三法司同訊，奏無受金事，遂釋回。並告誡錦衣衛指揮李順。	
203	黃淮言虜部宜分	147	35	4123	389	成祖	◎	◎	淮，成廟時，與三楊、金幼孜、解縉同典機務，備顧問，多所裨益。會虜酋阿魯台來款，請併女直、吐蕃屬其約束，侍臣皆曰：「酋率眾來附，觀我聽違為喜怒，宜從所請，順適其意。」獨黃淮力排眾議指出狼子野心，狡詐百出。上聞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三楊
204	周新	161	49	4373	711	成祖	◎	◎	新，廣東南海人。成廟時，舉孝廉，官御史，權貴憚之，目為周鏡面。巡按閩、直，赫奕有聲，及擢為浙江按察，數決疑獄，時人比之包孝肅焉。蓋新既廉直，又善發奸。善於觀察細微事物以為判案依據。	判獄明快-杭州城隍

205	謝子襄	281	169	7193	278	成祖	◎	◎	子襄，新淦縣人。洪武間舉人材，擢知處州甚著異政。郡多虎，襄禱之，虎徙；又多蝗，襄禱之，蝗滅。會盜竊官鈔不獲，襄禱于神，盜就其家發所竊，忽大風從室中起，卷鈔墮于市，盜乃獲。觀其禱虎禱蝗，動獲顯應，豈其誠能感神，誠至而明生歟！至小寇不煩大兵，以計擒剿，則燭事之明，自應如此。	循吏--鬼神助之-
206	魯穆	158	46	4320	560	宣宗	◎		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間第進士，官監察御史，執法不撓。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狀，留中。擢福建僉事，摧強懲墨，一意孤介，尤注意雪冤。舉泉州有李姓者，其妻吳美而艷，夙私于富姻林姓者一事證之。	
207	劉大夏 料魯麟	182	70	4843	322	孝宗	◎		大夏，仕孝廟寺，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兵魯麟者，自先世歸附，賄結近倖，求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甚怏怏，萌不臣之念。劉大夏能明查事實，自身亦廉潔不受賄，後順利解決此事。	
208	謝汝儀	318	260	8244	346	世宗			汝儀，嘉靖間官福建按察司副使。初，晉江巡檢為海盜劫殺，追捕不獲，所司督責捕盜官員及兵甚急。會漳州民陳大淵，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劫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皆誣服。汝儀覆案淵等，視成牘能明其冤，遂為平反其獄，世廟嘆賞曰：「令執法者皆如汝儀，天下無冤民矣。」	明史無列傳-廣西土司二
<b>寬 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301	成祖釋盜書者				208	成祖	◎	◎	成廟在御，用法嚴峻，蓋刑亂用重之意。法司奉承風旨，亦所尚在嚴。會京師民有盜勸善書者，事覺，刑部擬黥戍，具奏，上命釋其人，仍畀以所盜書。噫，成廟釋一人，而鼓舞嗜書向善之人，不知幾何？大聖人作用，其不凡如此。	查刑法一

302	楊文貞 諫止伐 趙	148	36	4131	677	宣宗	◎	◎	宣德時，漢王高煦謀叛，宣廟躬帥往伐之，擒煦凱旋。尚書陳山言于上曰：「莫若乘滅漢之威，并擒之。二王就擒，陛下高枕卧無憂矣。」士奇獨排眾議曰：「事固須有名，亦須有實。况舉大逆之罪加于叔父之親，不實何以服天？」上從之，遣駙馬、都御史劉觀賚至趙，趙王讀敕語及諸臣疏，北向痛哭，曰：「微陛下鑒臣孤忠，臣妻子為魚肉矣。」即遣人謝恩，獻護衛，言者乃息。	楊士奇
303	于謙不 較王禕	170	58	4543	332	代宗	◎	◎	謙，景皇時，為本兵，托心膂重寄，所言皆見聽。有王禕者，其先為兵部職方司郎，謙謂其才可任用，薦于上，未久擢本部侍郎，與謙共筦樞密。一日禕伺謙他事，密疏于上，上覽而笥之，及謙入見，命左右取以畀謙，謙覽疏，叩首謝曰：「臣在樞密久，所形容或未當，誠有如禕言者，非陛下聖慈，臣罪無所可逭。」因出密疏示禕，禕跣躄無地，愧汗久之。	提拔王禕 反被咬一口而不介意
304	夏原吉	149	37	4150	424	成仁 宣	◎	◎	原吉，仕永、洪、宣三朝，官至吏部尚書。雅量恢擴，于物無所不容。不較館卒炙所着襪。在部堂時，吏捧精微文書請押，風回，受染于墨，吏懼，肉袒以俟，其曰：「以風故免汝，若汝自污須撻汝矣。」又一廝隸曾污公金織賜衣，懼甚，公曰：「是可浣也，毋懼。」嘗夜閱文案，執筆躊躇，欲下屢止，夫人問之，答曰：「此大辟奏，吾筆一下，遂決死矣，吾故憐之。」公之寬大，類如此。	
305	韓雍	178	66	4732	274	英宗	◎	◎	雍，英宗朝，為都御史。會總兵石亨以逆誅。有緹騎指揮使劉敬曾與亨往來，至是有謂其被亨邀與同飯者，應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方坐，今敬與亨交，亦士夫往來之常耳。乃欲以一飯誅劉敬，其他可盡誅乎？」敬遂得釋。按雍征大藤峽時，甫入境，有儒各藏短刀在身，雍立斬以徇，蓋藤峽賊酋所遣健卒。雍發其奸，賊大驚，以為神，蓋所居之位不同，隨時從道，與居儒狃定一局者自別。	藤峽盜亂- 前寬後機

306	陳智	321	209	8309	246	宣宗		◎	智，初為御史，巡按陝西，有德政，秦民懷之，超陞江西左布政。宣德末年，江西永豐賊曾子長聚眾作亂，官兵擒戮之。智謂其中有因饑被誘者，捐俸作粥賑之。奏上，報決首惡三十人，脅從皆宥。時有告富民三百人與賊通者，智令被告人皆自白狀，面諭之曰：「如人言，下吏鞫訊，爾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能出粟濟民，當貸爾。」眾流涕，乞如命，得粟萬石，所活不可勝計。	無列傳外國 2 安南有提到
-----	----	-----	-----	------	-----	----	--	---	---	---------------

## 慎 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401	徐武寧王	125	12	3723	399	太祖	◎	◎	武寧王姓徐，名達，開國第一元勳也。性端厚慎重，其功愈高，其心愈小蓋古郭汾陽、李西平之流也。太祖定天下後，既已剖封勳臣，然察其中驕恣不馴者，率繩以法，即親侄如朱文正亦無少假借，獨武寧以敬慎取信于上，上極愛重之。曾大醉，上命闈侍送至舊內安宿，後驚起。」于是整衣冠，趨丹陛下，北面拜叩謝罪出，上益重之。	徐達
402	杜太常				217	太祖			杜太常，業梳剔，居恒挾其技侍太祖。一日為上修飭手足，舉爪甲之遺，用佳紙包裹納諸懷，杜曰：「臣謹持歸，檀而藏之以遺子孫。」上留杜，命人往按之，見杜所藏爪甲，以朱檀封鑰，置佛龕前，香燭森嚴，供具甚飾。比奏，上喜，謂杜敬慎知禮，即日拜為太常寺卿。	
403	夏原吉論慎封	149	37	4150	499	成仁宣	◎	◎	原吉，成廟為吏部尚書，以國之元老日夕資啟沃，獻籌畫，多所裨益。會張輔等既定交趾，朝廷論功，封侯進祿世襲多人。先是交趾平，上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嗟夫，夏忠靖此言足為萬世賞功之法，蓋作始既巨，則末流濫觴，莫可收拾。	藉夏李二人談萬曆朝藉古鑑今

404	徐晞					英宗	◎	晞，少爲縣吏，有才能，性更端慎。曾辦事兵曹，有縣民某誤被勾攝，將往代戍，謀禱于晞，求脫。然念家貧無貲，莫可以饋晞者，乃語其妻以身薦，妻不得已從之，乃夫婦治具夜飲晞，止之宿，遂以其妻薦，晞曰：「爾何至爲此？毋論污爾夫妻，且污我矣。請言所欲言，吾力苟能辦，當無所靳。」謝遣其妻，次日爲治文書，明其人不當戍，得不戍。	明史紀事本末第二十九卷王振用事 無列傳-蔣貴條目-雲南與薛暄 陳敬宗 有關
405	鄺堃父	167	55	4504	303	英宗	◎ ◎	堃，宜章人。正統間以戶部侍郎扈從北征，死土木之難。其父平生教堃有法，大約謂爲人居官，總只一慎。初，堃爲陝西按察副使，父爲楚中司教，曾以絨褐一段相寄，蓋關中土物也。父詫曰：「提刑之官，所貴清慎。此褐何從得來？得無污我且自污耶？」封還，以書諭堃。	
406	李賢論慎陞賞	176	64	4673	365	英宗	◎ ◎	賢，仕英廟時，爲宰相，甚見信任。其時有內直將軍，自言天順初以迎駕陞擢，後以冒功概革，求復原官，上念其久役，許之。已而訴者蜂起，上問李賢曰：「何以處此？」賢對曰：「石亨濫陞若輩凡數千人，名器隕越，莫此爲甚！人見取富貴之易，日夜冀幸朝廷有事，謂可僥倖乘機得富貴。夫使人人懷有事之心，則無事尋事。爲人主者，豈不甚危？宜慎重之，以遏濫觴，杜瑕釁。」上善其言，命兵部查迎駕陞官者，遂革太平侯張瑾、濟陽伯楊宗等以下凡千餘員，歲損費巨萬。	與前夏原吉同-類似藉古鑑今
407	劉大夏慎密揭	182	70	4843	371	孝宗	◎ ◎	大夏，孝宗朝，爲兵部尚書，甚見信任，凡國家大事，輒與面相籌咨。上謂大夏曰：「朕每欲召卿商榷，又念非卿職掌，此後朝廷有當興當革者，卿宜具密揭見奏，與朕覽閱如何？」大夏對曰：「陛下所欲咨臣，皆係公務，所言公，公言之。若具密揭，踪跡韜晦，易以叢疑，恐左右揣摩，外庭臆度，耳目既眩，口舌橫恣，君將失臣，臣將失身，遺患匪小，宋李沆所以不具密奏，非無見也。」上曰：「朕意在求言，未念及此。」稱善者久之。	

四奇--隱類-明史有隱逸傳但是不同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101	焦隱士				790	太祖			焦隱士，逸其名。少與太祖善。太祖登極，思隱士，遣人召之，不赴，議遣大行往趣，隱士聞焉，曰：「奈何以我故，勞貴人爲里中苦？」遂裹裝詣金陵謁上，上問曰：「公謂隱士樂耶？天子樂耶？」對曰：「各有其樂，兩不相入。如受圖納貢，撫華賓夷，天子樂也；嗽泉枕石，釣月眠雲，隱士樂也。然天子能憂，乃能終樂；隱士但樂，不復知憂。竊謂隱士樂，乃勝天子樂耳。」	明史傳無
102	郭德成	131	19	3844	617	太祖	◎	◎	德成，其兄名子興，從太祖征伐，屢立戰功，封鞏昌侯。女弟郭氏入宮，進位寧妃。成事上，充驃騎舍人，性嗜酒，不擇甜苦好惡，得即飲之，終日大嚼，醉則欹枕，醒復嗽醪，其于爵祿，澹然不以爲意。上一日召授成某都督，固辭不拜，上變色。德成免冠泣謝曰：「臣性疏放懶慢，耽酒喜卧，官常世務，了不關心，若不自揣，謬托高位，必且曠職，必且怠事，曠且怠，陛下鈇鉞之誅，將必及我。」久之，黨禍起，成竟以酒自全，禍不及焉。	郭子興之弟太祖嗜殺獨完
103	耆儒鮑恂等	71	志47選舉三	1171	396	太祖	◎	◎	太祖即位後，數征山林耆逸，咨訪治道。其時有鮑恂、全思誠、余銓、張長年者，皆宿飽經學，年俱七十餘，隱居山林，絕意當世。上聞其姓名，具書致幣，命有司聘之。命四人皆爲文華殿士，輔導皇太子。恂等叩首辭，上不能強，乃賜宴，賜敕放還。	鮑恂-全思誠-余銓-張長年
104	陳遇	135	23	3913	319	太祖	◎	◎	遇，元爲溫州路教授，元末兵起，歸隱于家。國初秦元薦遇宿學，可備訪問，上致書具禮征之禮待甚隆。上時稱爲先生，屢幸其第，所商榷，皆人所不衆知者。數命遇拜官，輒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	屢辭官不仕

105	姚姊	145	33	4079	447	太祖	◎	◎	姚廣孝，佐成祖定天下，封少師，仍不蓄髮，寄住禪寺。上賜之二姬，嘆曰：「此火坑地獄也，乃欲以陷我耶？」姑拜受焉，閱數月，終無所近，復還宮。有老姊與一子寡居，廣孝往見，姊詈之曰：「曾見做和尚不到頭的，是甚好人？妾雖賤且老，終不以汝為見。」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爾子與我俱北，當為乞一官，所入常俸，差足供姊饘粥耳。」姊拒之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教他做歹事。即家貧餓死，吾子母甘之矣。」廣孝察其真誠，不敢復言官，遂別去。	此記為姚廣孝
106	賀三老				323	英宗			三老，逸其名，英宗時人，蓋閭閻庸保之流也。生一女，適曹欽。及欽與總兵石亨以奪門迎駕，偃然處于元功之列。天順初政，大抵欽與亨手握其柄，一時赴臚者填集其門，三老見而憂曰：「此非好消息也。」欽欲畀以一官，賀老曰：「我崦嵫之日耳，又惟鄙不習事，吾願留老性命優游光天之下足矣，不願以官買禍。」竟不受。	曹欽岳父

### 怪 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201	張邈	299	187	7641	725	太祖	◎		邈，姓張，名君實，字玄一，又字玄玄。張仲安第五子。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自號三丰子。寒暑衣一衲，出游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與論三教經書，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浹旬累月始一食，登陟山巒，其行如飛，隆冬齧卧雪中，汗出如暑月，雪為之釋，俗呼為張邈。文中多有奇異之事，曾寓黔中張揮使名信家，為治小兒輒效，以貧老故，出入房闈無忌。一日遺尿，乃自脫褲，謂揮使妻曰：「為我浣此。」妻怒告揮使，揮使曰：「老實頭不曉事，何足較？」使婢為浣褲，婢以竹竿持褲就池水，簸蕩成蓮花，俄而滿池皆花，異香襲人，婢走白其主，夫妻同往觀大詫，自是乃拜事之。	方伎傳--原名張三丰



202	鐵冠道人	299	187	7640	289	太-成 祖	◎	道人姓張，名中，字景華。元末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好戴鐵冠，因號鐵冠子。至正間，太祖起滁陽，道人詣軍門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明公殆其人乎？」上因叩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殊常，直少須之，滯氣盡釋，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日也。」上留置幕下從征伐，遇事則諮，多所驗證，愈信之。未完缺頁	方伎傳--原名張中
203	周顛	299	187	7639	673	太祖	◎	前段缺頁，偶游寺，顛出遊，與同飲于翠微亭。上密戒僧閉之空室，一粒不入口，凡旬有三日，顏色渥然如故」及我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云何？」顛應曰：「好，好。」上曰：「彼已稱帝矣。」顛仰視搖手曰：「上面無他的分。」遂從征，以手中杖作壯士揮擊，示必勝。舟抵皖城，無風，顛曰：「雲從龍，風從虎。殿下但行，風且至矣。」已而果風，瞬息達小孤山，偶見江豚吹浪，顛曰：「水怪出，損人多。」左右白上，上怒，令投顛江中。久之，復與眾俱，蓋頻擲水，水不能溺，上更與同食，食畢別去，莫知所之。出沒無常。	方伎傳
204	冷謙				471	太祖		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居雪川，交趙孟頫。嘗于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真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利用五鬼搬運之術取內帑之物，又能全身而退。	明史樂志 記載
205	胡日星				699	太祖	◎	日星，元末時人，以談命為業。上微時，命日星布筭，筭畢，跪拜曰：「帝王之命也，當為真主。」上戒勿言，然心喜之。其後掃除群雄，混一天下，思日星蚤見，遣人召之，賜以酒食，慰勞甚洽。上賜金賜官皆不受，遂辭去。足迹所歷，遍于四方，未嘗支人酒一觴，錢一文。一日，倦游歸家，餘一年，忽語其妻曰將死，果驗。	明史無記載-因藍玉案死

206	全寅	299	187	7648	402	英宗	◎		寅，少瞽，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未北狩時，已聞寅善占卜。及幽虜庭，日夜思南還，乃遣使命太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賀」果驗之。其歲月日皆符寅占，授寅錦衣衛百戶。	方伎傳
<b>機 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301	太祖	1	本紀第一	太祖一	416	太祖	◎	◎	太祖微時避難濠州，偶屬知滁陽王郭子興，使掌兵事，每有密謀，輒與商榷，嘖嘖稱善。及領軍攻伐，所向多捷，威名日著，滁陽王遂以養女馬氏配上，比于館甥。王二子忌上，謀殺之，一日置酒別業，飲中將置毒毒上，馬太后知之，陰以語上。太祖將計就計解此危難。	
302	太祖敗陳友諒	1	本紀第一	太祖一	1190	太祖	◎	◎	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我猝難敵。」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見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以舟師順流，宜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吾有一計，足破之。」于是召指揮康茂才用康茂才反間計而成其功。	明史卷一 有此文，神機妙算-
303	成祖致吳傑等與戰敗之	5	本紀第五	成祖一	655	太成祖	◎	◎	成祖領兵欲與南將吳傑等戰，會傑暨陳暉等擁重兵屯守真定郡中，上語諸將曰：「敵有三策，未卜安出？」曰：「傑等嬰城以御我旅，上策也；師出即歸，劍鋒不戰，中策也；若來索戰，是下策矣。」上曰：「必出下策。」諸將曰：「何以知之？」上曰：「彼可誘而來也，來則出下策矣。」于是命士卒聲言糧盡，將四出取糧，又令民間婦女，提携幼穉，東奔西驚，為避兵狀。吳傑等果如其計而敗，成祖善用兵法而得最後之勝利。	善用兵法

304	成祖計制卜萬	142	30	4038	445	太-成祖	◎	◎	成祖領兵攻大寧。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府之間，在喜峰口外，俯瞰北平，其都司所統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真、陳亨、都指揮卜萬、宋鑿四將分領其地。成祖將攻之，使人偵諸將強弱，具知真性怯懦，亨有二心于我，獨卜萬驍勇忠義，次則宋鑿，乃用計間之。	用反間計-靖難
305	成祖破宋忠之計	142	30	4037	628	太-成祖	◎	◎	成祖駐通州，將攻居庸關。時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相為犄掎，謀攻北平。王謂諸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襟喉也，必據此，乃無北顧之憂。聞俞瑱不量力，欲來攻我，莫若乘其猶豫，擐甲趨之，一鼓可破。」眾皆曰：「善。」王又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見居庸破，必提兵相救，可乘其未發，先擊之。」皆曰：「敵眾我寡，宜慎待之。」王曰：「爾不知宋忠寡謀而躁，剛愎而自用，又其眾初集，非素所拊循。以寡謀之將，御新附之卒，利在急攻，十保九破。」遂帥馬步八千，倍道而進。王又破宋忠仿田單之計終成克敵制勝之功。	計中計-用田單計被識破
306	仁廟計護大臣	8	本紀第八	仁宗	627	仁宗	◎	◎	仁廟時，李慶、呂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皆為大臣。其年適值朝覲，先是李慶等言于上曰：「莫若敕人覲官各領馬一匹，比民間孳牧。」上令與蹇義、夏原吉議，皆曰可。獨士奇力陳不可，上曰：「李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比及兩日，不得旨。兵部督諸司領馬幾半。士奇復奏，上曰：「朕偶他冗，遂忘此爾。」乃密召士奇諭之曰：「朕豈真忘耶？朕使人伺慶、震皆誅汝，恐汝府怨。頃得陝西按察陳智疏，論官牧馬非是，此可為汝弭怨，汝但據此疏草敕。」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夏原吉 楊士奇 呂震
307	上皇計誅喜寧				201	英宗		◎	寧，本閩人，陷入虜，遂為也先用，凡虜入寇，多寧為鄉導。及上皇陷虜庭，寧數見扼，時扈從者止袁彬一人，寧一日幾誘殺彬，賴上皇力解得脫。至是，上皇語彬曰：「不誅喜寧，吾南歸無日。」乃密謀殺喜寧。	

308	英宗計制內臣				308	英宗	◎	英廟復辟後，大小政事皆自留心，猶嚴束閹宦。一日鷹坊司內臣奏請以時出獵，上不許，固請曰：「獵以擊鮮，獻宗廟，供太后，充上用，舊制固爾。」上乃許之，曰：「獵則獵矣，毋擾吾民。朕必按之，擾者罪無赦。」	
309	憲廟安儲	15	本紀第15	孝宗	455	憲宗	◎ ◎	憲廟先寵萬貴妃，權傾六宮，上亦為所制，每事唯唯而已。萬有子，已冊立東宮，久之薨，謚曰「悼恭太子」。初，上曾幸紀妃，感娠生一子，是為萬孝皇帝。妃憚萬妒，不敢以聞；上微聞之，然亦憚萬，佯為不知也者。至是，上慮乏嗣，聞紀妃所生子已長，未敢明言，恐生他釁，或不利于皇子，乃委曲諭意宮監張敏，敏因用厚賄結納萬貴妃宮監段英用計使萬貴妃接受而能安儲。	
310	世宗登極	17	本紀第17	世宗一	274	世宗	◎ ◎	自興邸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先是群臣詔命金符趨安陸迎上，上拜受，辭興獻王陵及聖母別，聖母曰：「兒此行入主天下，好為之，毋負祖宗之托。」上拜受教啟行，所過止貢獻，戒騷擾，民大喜。及駕次良鄉，禮部員外楊應奎進儀注，上覽畢無言。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等朝畢，請上由東安門人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曰：「我所至日，百神效靈，吉莫大焉，安事擇？」遂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當時聞且見者莫不曰：「聖天子獨斷獨行，不惑群疑，不牽陰陽，度越凡品萬萬。」	
311	李文忠敗偽吳兵	126	14	3741	596	太祖	◎ ◎	偽吳將李伯昇率寇諸全新城。胡德濟求援于李文忠，文忠援之。德濟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之，俟大軍至，再圖。」文忠曰：「以衆論，則制勝在彼；以謀論，則制勝在我。昔苻堅擁八十萬衆，謂江流之險，投鞭可斷，謝安乃以八千勝之，然則衆何必強？寡何必弱？顧用之何如耳？況我若見寡，少生怯心，彼因而蹂躪，將坐受困，雖大軍至無能濟。莫若奮兵擊之，伐謀取勝，將在此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寡而銳。驕者，敗之征也；銳者，勝之符也。以銳當驕，一可當百，保為諸軍破此虜。既破之後，輜重悉歸軍士。」身先士卒，力破賊兵。	仿謝安之計-張士誠之戰

312	解縉	147	35	4115	643	成祖	◎	◎	縉，字大紳。弱冠舉進士，爲文天才宏放世罕其儷。太祖時，官御史。及成廟時，起家拜翰林，與胡廣、楊士奇、金幼孜四人，朝夕左右備顧問。會儲嗣未建，皇長子以忠厚見厭于上，但愛皇長孫，以爲妙齡英赫，可托宗廟。次子高煦素勇健犀銳，上起兵時，數出奇制勝，既正大位，高煦甚見寵于上，自謂當代兄爲皇太子。縉曰：「建儲之道，齒均論貴，貴均論長，不易之道，宜立長子，從民望。」上未答，縉復贊曰：「好聖孫。」上喜，復密召黃淮、尹昌隆問之，其對皆如縉，上意遂決。	以計斷成祖易儲之事。
313	楊墳-軍匠	166	54	4509	1104	英宗	◎	◎	楊墳，又名瑄，京衛彩漆匠也。當天順年，適錦衣衛都指揮門達職緝捕，有寵于上，羅織傾陷，以數百計。惡指揮袁彬爲上所親信，懼其軋己，乃緝彬陰事數十條上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冤。獨楊墳嘆曰：「人臣從寵，自古有之，然未聞苦功高如彬也者。迹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肱，但欠嵇紹之濺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實，雖剖符錫壤，不爲賞溢，乃今官不過指揮，猶然被陷讒口，行且加法，豈非千古極冤，萬人隱痛者哉？」於是利用門達與李賢不和之事求取門達信任，於上前翻案終至解救袁彬，自身亦能全身而退。	明史無-此為袁彬傳-騙門達救袁彬
314	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	182	70	4843	296	憲宗	◎	◎	大夏，憲宗朝，爲兵部職方司郎中，與陸容同官。時太監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會安南國屢歲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出師討之。汪直乘機遂獻平安南之策。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一旦加之兵，恐失夷心，啓邊釁，遺禍匪細。直猶攘臂持議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直，詳叙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315	王守仁 計破群 奸	195	83	5159	995	憲宗	◎	◎	宸濠起兵反，守仁率江西兵討平之，擒濠欲詣闕獻。時武廟駐蹕南京。先是群臣勸上親征，既聞守仁已擒濠，甚不喜，蓋不以其擒叛為功。守仁往金陵，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守仁縱宸濠鄱陽中，待上至親擒示武。守仁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守仁夜渡玉山，遇太監張永于杭州，守仁浮慕永，永喜，仁因語永曰：「仗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西民不堪重毒。足下胡不早赴，稍約束之，其猶有蘇乎？」因張永此事平，又善用計謀以好言悅北軍之心，以哭泣動北軍之思，因而亟還，民不盡肉，則百姓安矣	
316	王守仁 撫田州 討藤峽	195	83	5159	611	憲宗	◎	◎	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斷藤峽八寨賊，悉平之。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諸蠻稍靜。正德時遺孽復熾，橫掠商舟，都御史陳金務姑息。初蠻以坐得利不為害，久之無厭，大肆掠，不愜即殺之，道路皆梗。守仁往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相機撫定，湖兵當還，蘇、受亦願立功自效。兩江父老遮訴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約日會剿。先求諸將人心安定，而後相與進攻，一擊而中，遂竟其功。	
317	梁儲計 止秦藩 請地	190	78	5046	473	武宗	◎	◎	儲與楊廷和、蔣冕同仕武宗朝，為閣臣，典機務。會秦王違祖制，疏請陝西邊地益其封，厚賂嬖倖朱寧諸輩助之請，三人在上左右勸予秦藩地，上許之。儲草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此地不畀藩封，蓋念其土廣而饒，藩王得之儲糧蓄草，養士牧馬，馴至富強，不免生凶謀，窺社稷。……，朕欲保全骨肉不可得，其何有于地？」此事便休。	阻止親王 擅權

318	楊一清 計誅劉瑾	198	86	5225	864	武宗	◎	◎	一清，仕武宗朝，為宰相。時太監劉瑾專政五年，毒遍海內，人人切齒，然日與上起居，莫有指者。會寘鐻以誅瑾為名，起兵內犯，上遣太監張永督兵往討之，未久，寘鐻就擒，永自挾以為不世功也。一清心欲除瑾，念無間可乘，獨計永有夙憾於瑾，又新立功，其言易信於上，乃造永曰：「明公剪鋤叛藩，動在社稷，封侯之賞，所不必言。然功更有進於此者，亦惟明公能成之，豈有意乎？」像張永剖析利害關係，借力張永遂成誅殺劉瑾之大功。	借宦官張永之力
319	許達計守樂陵	289	177	7427	405	武宗	◎	◎	達，武宗朝，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死宸濠之難，謚忠節。其為樂陵令，會流賊劉七、楊寡婦作亂，莫有嬰城自守者。將犯樂陵，達預築城池，貧富均役，使民各築牆高於屋檐，開竇如圭，僅容人，各令二壯丁執刀俟竇內，餘人各入隊伍，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仍設伏巷中，賊至，洞開城門，聽其直入，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	前有忠 14 許達-寧王之亂
320	胡宗憲 計誘倭酋	205	93	5410	1224	世宗	◎	◎	宗憲，仕世宗朝，歷官兵部尚書。御史，巡按浙江，時倭寇正熾。其誘倭人寇魚肉內地者，率中國奸人為之主首。如桐鄉之役，巡撫阮鶚方在圍城中，則實徐海、麻葉領之。宗憲度我兵未聚，桐鄉旦夕破，賊虜巡撫去愈益輕我。於是謀間徐、麻二人使其互不信任各個擊破，成其功，然因諸將爭功，賊亂復啟，人民受難，殊為可惜。	戚繼光老師-討倭寇
321	陶魯	165	53	4464	378	憲-孝宗	◎	◎	魯，廣東人。其父諱成，為僉事，曾單騎入山降賊，久之，賊復叛，單騎出討之，為賊所害。朝廷錄忠，贈成官，廕一子胄學，即魯也。後仕為縣丞，屢治賊有功，歷陞憲副，平浚、梧、荔浦、府江諸寇，擒斬數萬計，皆親冒矢石，身被數十創，刀痕箭瘢布滿其體，威名大著。後進秩湖廣左布政，奉敕撫治兩廣，賊皆遁迹，號稱三廣公。公為人多機智，長於用兵。	陶成之子-- 因果-大藤峽有其父必有其子- 神機妙算

322	趙臣	319	207	8266	1262	世宗	◎	◎	臣，廣西千戶，為人性警有機智。會都御史姚鏞巡撫廣西，奉旨討岑猛。猛聞大軍至，斂兵令毋戰，裂帛上白狀，姚鏞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鏞下令：旁近土官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先加誅。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女失愛憾猛，又知千戶趙臣善璋，遂採趙臣之計，離間臣岑猛、岑璋遂得其功。	明史無其傳-此為廣西土司三殺岑猛一事
323	龔遂榮	169	57	4533	264	英宗	◎	◎	遂榮，閩中千戶。其人有機智，能誘賊。時寧陽侯陳懋討閩寇鄧茂七，茂七死，其子伯孫繼之，勢轉昌熾，懋乃懸賞格曰：「能殺賊首來獻者，賞萬金，官都督。」遂榮計賊中梟將莫如張留孫，若能間伯孫，使疑留孫，則破賊有期，餘人不足慮也。於是偽為書遺留孫，盛加獎詡，約使來降，書成，故令持書者誤致伯孫所。伯孫啓書視，果疑留孫有貳心於我。自此賊將人人見疑，皆棄伯孫來降，	明史無其傳-此為高毅
324	劉大夏 整理糧 草	182	70	4843	323	孝宗	◎	◎	大夏，孝宗朝，為戶部侍郎，奉命往北邊整理糧草，時倉場告乏，處置甚難。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立法嚴行，此風立變。	
325	項忠	178	66	4727	532	憲宗	◎	◎	忠，憲廟時，屢立邊功，仕至兵部尚書，謚襄毅。先是正統己巳之變，忠為兵部主事，扈從陷入虜庭，為虜所得。虜喜其才俊，善遇之，命忠飼馬，馬肥，虜益喜，畀之胡女以固忠，忠與女好，日飼馬不怠。實則看準時機在其妻協助之下，順利回歸祖國。	似說其外族妻土木堡之變逃回
326	張綵	306	194	7840	320	武宗	◎	◎	綵，仕武宗朝，為吏部侍郎。時大璫劉瑾專擅威福，賄賂公行，凡官員，皆致厚饋，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謠。綵素負時名，又以同鄉故，為瑾所厚，思遏瑾圖賄之念。一日說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內外諸司頗以有聞，皆若以明公為名者，此為明公累不少，宜亟止之。」然終因瑾事死之。	閹黨-勸劉瑾勿收賄



327	萬祺			548	代宗		◎	祺，少爲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祺布算，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算，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後用計救李賢於曹欽之手。		
328	阿丑			993	憲宗		◎	丑，成化間優人，供奉御喜宮，性善諧謔，每於御前打院本，時有匡救，頗類東方生譎諫之風。時太監汪直有寵於上，舉朝憚之。佞臣皆附直起功名，陞擢濫觴，名器掃地。然直勢侔主上。丑一日於上前打院本，扮一醉漢大酗酒，或駭之曰：「兵馬來。」亦酗。又駭之曰：「御史來。」亦酗。復駭之曰：「皇帝來。」亦酗。既而曰：「汪公公來。」乃逡巡起避。問者曰：「爾不怕皇帝，怕公公乎？」醉漢曰：「皇帝當得汪公公那些？」上聞之感悟。後多利用其善謔之事諷諭時政，大快人心。	優人 類東方朔 -汪直	
329	蘇州媼			411	太祖		◎	太祖定天下，都金陵，每微服行城市中，察民向背。一日至某地，見兩人偶語，頗涉忤慢，上怒，遂詣徐武寧王宅，其妻知之，遂朝服出見，上呼曰：「媼，爾知人欺慢我乎？」其妻謝不敢。上已諭左右調護衛兵若干人，殺偶語者，并及同里數百人。一日，又微行至三山街，見一媼，問媼，知其姑蘇人也。上曰：「張士誠在蘇州好麼？」媼曰：「張王無他好，但能知大明天子是真主，遂全城歸附，百姓不喫虧，是他好處。」	暗諷明太祖嗜殺	
330	陳諤自全			268	成祖		◎	諤，成廟時起家孝廉，拜給事中，彈劾不避。一日奏事，聲徹殿上，上目爲大聲秀才。後以他事忤旨，上命所司掘坎瘞諤，止許露頂，意在殺諤也。諤度不可免，臨瘞，詒掘者曰：「上欲我死，我喫苦不得，亦自求死。我死，則汝當受賞。盍若覓大甕貯我，瘞土中，縱使露頂，然四肢氣窒，不半日死矣。」掘者如其言，諤乃回旋甕中，反得不死。		
<b>俠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401	平安	144	32	4069	309	惠-成 祖	◎	◎	安，仕建文朝，官至都督，梟將也。自成廟起兵靖難，宿將俱不能收克捷之功，惟瞿能父子及平安。安善於馬上運槩，淝河之戰，橫槩逼上，幾為所中。安戰敗，為上所擒，問曰：「向者馬不蹶，將軍何以待我？」安叩首曰：「臣何敢無狀？但恐臣槩不肯相饒耳。」上壯之，嘆曰：「好，好。高皇帝養下這條好漢。」釋之。及即位，仍用為都督如故。一日，上在道偶聞語安名者，訝曰：「平保兒無恙耶？」保兒，安小字也。安聞之，不自安，遂縊死。	與機 303 吳傑等有關 惠帝大將-後被俘為官-自殺
402	周敬心	139	27	3998	755	太祖	◎	◎	敬心，洪武中為太學生，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陛下但當修德，則祚可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陛下連年遠征，為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疏奏，上頗納之，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上疏太祖言其弊
403	高巍說 燕	143	31	4046	741	惠-成 祖	◎	◎	巍，山東人。居恒讀書，慨慷有大志。見靖難師起，我兵御之多失利，乃憤然請於建文主曰：「古有掉三寸舌，罷兩國之師，歸於和好者，臣請效其人，往說燕王。」書再上，不報。噫，成祖擁重兵南伐，英風銳氣，即猛將軍當之，尚爾膽落神沮。巍以一老儒直人行間，上書游說，詞嚴義正，使人讀之凜凜然，成祖卒不能有加於巍，但停書不報而已。	高巍說燕罷兵
404	李實楊 善 使 虜	171	59	4565	909	英宗	◎	◎	實，仕正統間，為都給事中。善，為都御史。土木之變，上皇陷虜庭，景皇御極，時也先兵威熾甚，又南北間關萬里。朝議遣使往候上皇，頗難其人，李實慨然曰：「主憂臣辱，何得規圖自便不往候故主？」遂請往，於是實充禮部侍郎，以羅綺充大理卿，往使虜。久之，朝廷復以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充使臣往迎，至虜營，也先見善等喜，許歸上皇。其平章昂克問曰：「你們迎上皇，禮物安在？」善曰：「太師仁心，仰體天意，歸我君父，豈財是圖？中國亦何敢用財污太師君臣愛我君父之意？」	談李實、楊善兩人之事

405	馬士權	171	59	4561	417	英宗	◎	◎	士權，有氣節，博極群書，多游搢紳先生之門。武功伯徐有貞與士權厚善。會總兵石亨及有貞同議奪門迎駕，亨忌有貞權位軋己。乃乘其謫官嶺表，詐為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朝廷逮訊，秉彝至死不服。亨乃言此疏係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之，托名秉彝，規圖脫禍，上遂遣官逮有貞，收士權。時掌衛指揮門達希亨旨，陳諸苦刑，士權終無言，乃摘武功伯誥券有「續禹神功」語，謂出有貞自撰，指為逆謀，士權昂首大呼，辨論慨慷，門達不能折，有貞遂得減死，編發金齒衛為氓。	明史無其傳-此為徐有貞與諂4有關 有貞忘恩負義
406	高瑤	164	52	4460	523	憲宗	◎	◎	瑤，仕憲廟時，為湖廣荊門州學正。上書云：「在昔己巳之變，先帝蒙塵，陛下齒未，社稷如髮，仗景皇繼統，勘定禍亂，鞏固河山，俾鑾輿之返有期，靖康之耻頓雪，其功非小。夫何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於景皇厚加詆誣，俾一切典禮俱從減殺。伏惟陛下以至公之心，特敕禮官集議，增加廟號，以篤親親，以慰在天之靈。」事下禮部，其後左春坊黎淳乃極詆景皇，斥高瑤，至引魯隱公為比，議遂寢。	上疏復景帝名號
407	陳達	170	58	4543	538	英-代宗		◎	于忠肅公諱謙，當土木之變，輔景皇帝內修朝政，外捍強虜，也先聞之，憚中國威嚴，遂以好歸我上皇，避位南宮，越八載重正大位。其時總兵石亨、太監曹吉祥挾奪門功，圖釋銀于忠肅，誣以謀立外藩，噉殺公，與王文同斬西市。忠肅子婿及族人懼曹石虐焰，恐遂株連，為家門累，因屏伏不敢收忠肅七尺。時有都指揮陳達者，忠肝義膽，人間男子，當做人間好事，從此具棺殯殮，荷鍤瘞埋，豈曰鈞豪俠之名，姑以慰秉彝之好耳。」	明史無其傳-此為于謙、為于謙收尾
408	李繼	163	51	4421	484	宣宗	◎	◎	李繼，性豪舉，成化間官助教，多游戚畹、公侯之門相引重。時祭酒李時勉恬澹高潔，見繼所為，心薄之。會大璫王振專橫，惡時勉不阿己，欲中之。國學古樹事陷之於罪，人謂且死，李繼乃曰：「事急矣，不為營救，不但勉無生理，且使上以細事有殺儒臣之名，其累聖德不小。」於是謁所厚會昌伯孫公求為勉地，事成救時勉命。	慈 4 李時勉有其事

409	康海	286	174	7348	745	武宗	◎	◎	康海，有才名。時關中李夢陽以古文詞著，海雅知之，然兩不相下，神交有之耳。會正德初，大璫劉瑾專橫，權侂人主，生殺予奪，屬其指掌。瑾惡夢陽代韓文草疏劾己，以他事矯旨下夢陽獄。夢陽有門客求康狀元海。曰：「海素知公。彼意氣中人也，加之憐才。」授張生乞海，海覽字，掀髯起，曰：「李夢陽關中才子，我若斬一言不救此人，此人死，關中文獻弱一個矣。」為此折其節見劉瑾，瑾慕海才，又鼎元也，常以禮先期致海為重，海不肯往。至是忽詣瑾求見，瑾闖海來，倒屣出迎，而後夢陽得救。	文苑二-前 七子、找劉 瑾救李夢 陽
410	王遴	220	108	5789	529	世宗	◎	◎	王遴，與椒山楊繼盛同舉進士，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召還為兵部副郎，又疏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曠上重處，引誹謗律論斷。上心憐繼盛忠，故置罔聞，不忍殺，嵩乃乘間置繼盛姓名於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省者，獨王遴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曹。王遴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為經紀其喪。	楊繼盛
411	沈小霞 妾				520	世宗		◎	臨湘令沈襄，號小霞，蓋忠臣沈鍊青霞子也。鍊，上書極詆嚴相國嵩，編氓保安州，於教場中置塚三：一書嚴嵩姓名，日挽弓射之。後構陷鍊謀逆，斬西市。鍊三子，嵩殺其二獄中，止襄未死，謫戍烟瘴。嵩子世蕃意欲趕盡殺絕，襄知蕃意，挾一妾與俱。陰以其意語妾曰：「爾能制此人乎？我則逸去，聽爾為計。爾若不能，我乃與爾同死矣。」其妾應曰：「吾與君俱死役人手，與螻蟻等耳。君宜逸，妾自有術制之。」後妾用計而襄終能保全其身。	沈鍊之妻
412	昌平妓		173		465	憲宗		◎	昌平侯楊信，襲父洪爵，善戰，有父風，功勳頗著。會于忠肅劾其擅殺將領，獄成，詔刑諸西市。綁縛既定，監斬者未至，適一婦縞巾素衣，攜一廝具觴酒豆肉詣信所，蓋信故所狎妓女也。信見其來，搖手止之曰：「爾胡來？來則無益於我？祇速禍耳，其亟去。」其妓不從，後法官至，命行刑，信頭落地，妓乃盡飲其血，	昌平侯楊 信-

									出布囊囊信頭，付其家人曰：「善葬此。」徐取袖中素練，自縊信屍傍，曰：「妾得從楊將軍游地下，心事了矣。」	
四凶--奸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101	序班楊善	171	59	4565	226	成祖	◎	◎	楊善，成廟時，以他事繫獄。會翰林院庶吉士章朴亦在繫，日從囹圄中，彼此來往譚話，朴固調善無他腸，靡所避忌。先是，上因方孝孺忤旨，既夷九族，怒猶未釋，仍禁其生平所著書，若詩文之類，詔民間敢收藏方氏隻字者，罪無赦。而朴家適有《遜志齋集》一部，自以語善。善遂從朴借觀，密以其書奏聞，上怒，戮朴於市，復善官。	
102	彭德清	162 167	50 55	44024 501	663	英宗. 前		◎	德清官錦衣衛指揮，時大璫王振權侷人主，德清因附振，時有翰林侍講劉球者德清同鄉，視清蔑如也，德清遂傾球。會球因雷震奉天殿鳴吻上言十事。其一勸上親政，德清乃摘其疏語示王振曰：「劉球疏中所稱『親政務，總乾綱』，此語甚侵公公。」振大怒曰：「當遂殺此廝」。會編修董璘自請為太常，得罪繫獄，振使所親指揮馬順酷掠璘，令招球主其謀。既得詞，遂執球下獄。夜使順携一小校挾刀入獄中，球共璘卧，校持球，球知不免，乃呼曰：「賊奴，敢殺直臣，我死訴汝於帝，必殺汝。」校立斷球頸。行借刀殺人之計。	明史無-此為劉球.曹鼎.王振
103	馮益	304	192	7774	251	英宗. 後		◎	馮益，天順中以游客出入諸權貴之門，與太監曹吉祥侄曹欽極相善。會欽以逆誅。獨一妾賀氏尚被拷訊，治獄者令吐其夫共謀之人，賀不應厲聲曰：「公等誰非吾夫門下士？」眾愕然。適邏卒捕得馮益，令與賀質對，馮故為不識賀也者，賀曰：「馮先生，爾忘向者曹操之言歟？」「吾夫一夕觴馮先生，酒酣，問曰：『古亦有宦官家為天子者乎？』馮先生答曰：『那得無？有曹操，非曹節一家耶？』今何詈我為？」馮語塞，遂與賀同死於市。	明史無-此為曹吉祥-宦官

104	王翰	189	77	5026	321	代宗	◎	◎	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及英廟復辟，又數言為非，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皮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來，翰謂復蒙賞賜，超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稽顙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明史無-此為王鑾
105	都察院 吏顧 佐	158	46	4310	547	仁宗	◎	◎	顧佐，自為都御史，引繩持法，毫不假借，吏胥凜凜，官署如秋。其時奸猾見謂妨己，圖傾之。一狡吏曾被佐撻，乃曰：「上所為重佐，以其廉也，吾得計矣。」遂誣奏佐受皂隸某等賄賂，縱放私歸，具列姓名。上袖其奏，示楊士奇曰：「爾不薦佐廉耶？何乃有此？」對曰：「事誠有之，然不獨佐，臣及朝臣皆然。」	借題發揮 賴君上明辨
106	彭澤	198	86	5235	1131	世宗	◎	◎	彭澤，嘉靖間官太常卿。會吏部侍郎徐縉為國子生詹榮所訐，澤遂謀代縉，乃偽為縉書，遺內閣張孚敬，以激怒之，而因嗾孚敬劾去縉。及縉斥，吏部遂推澤代縉。上意欲用夏言，澤遂謀傾言。會行人薛侃見上無嗣，乃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疏具未上，澤與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曰：「願携歸細閱。」因而持白孚敬曰：「此侃疏，出夏言筆也，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聞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草，深嘆忠愛，胡不亟上？」侃猶豫，孚敬復詰澤，澤坐趨侃上之，孚敬復密稱侃疏出夏言筆。上大怒，命逮繫侃。時上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密疏。	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
107	嚴嵩	308	196	7914	417	世宗	◎	◎	嵩，世宗朝官宰相，典機務。本朝稱奸相，必首嵩。嵩處尚書丁汝夔，則猶其奸之最者。先是北虜薄京城，調大同兵入衛，以總兵仇鸞統之，鸞怯而性狡，會大同兵詭稱遼兵劫村落，鸞縱不治。而兵部尚書丁汝夔，故論者不謂仇鸞縱大同兵，而誤疑故夔以鄉曲庇遼兵。相嵩又陰諭汝夔，謂我兵近城與虜戰，姑聽其擄掠飽而去，可幸無罪。於是，附京民被虜魚肉者，皆怨汝夔怯不肯戰。上震怒，逮丁汝夔及侍郎	奸臣.丁汝夔

									楊守謙下獄，立促刑部具爰書，斬二人以徇。夔當被逮時，嵩恐其泄前語，遣人諭夔曰：「無慮，吾為汝地。」而陰反嚇上行刑。汝夔臨刑，乃悟嵩詒己，大呼曰：「奸嵩誤我！」	
108	周恂	102	世表三	2715	260	英宗後		◎	恂之女適漢陰王微鋌為妃，無子，妾亦無子。及王疾革，恂入問後事何？王因就恂問計，恂曰：「請如陽翟呂君，則無子而有子矣。」遂定議，令兩宮詐娠。及王薨，恂乃以其乳子及他人子次第納宮中。比長，俱冊封。已而恂姻家仇恂，發其事，朝廷迫降漢陰王為庶人，賜其母死，偽郡王皆死，磔恂於市。	諸王世表三
109	梁散人				371			◎	散人，挾術遊徽王載堦府中。王所為多不法，侵民間田園木石無數，凡女子佳麗者，輒奪為宮婢，不當意，則以予衛卒，忤旨者或以啖虎豹，及活閉棺中焚死。所昵伶人，縱使凌轢士夫。時挾客微行鳳陽留都間。散人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曾竊王所煉女癸，詣京獻上，上服之喜，復見索，散人不能繼，貽書轉索于王，王怒曰：「我固自獻，何乃假手於汝？」散人自是銜王，行其報復之事。	
110	劉金	116	4	3570	397	世宗		◎	金，優人也，隸楚府。金有妓名宋么兒者，聲色俱佳，楚王顯榕昵之。其世子英耀素淫縱，既已私王宮人方三，事覺，王錮方三，杖殺其使陶元。耀明知其父與么兒昵，乃亦昵么兒，王怒，欲杖殺劉金。金度不免，遂與其黨嚇世子曰：「殿下所為，犯父王之忌，罪在不赦。與其坐而待斃，盍若先發制人？遂行其事。	明史無此為諸王1-楚王楨
<b>詔類</b>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201	呂震	151	39	4179	1061	成祖	◎	◎	震，仕永樂朝，為禮部尚書。性好詔，遇事輒詔。會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召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應受賀否？」呂震對曰：「日食，朝賀，先後不相妨。」儀智曰：「終是同日」。楊士奇曰：「元旦日食，天變之大。宋仁宗朝亦值此，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恐契丹行之，為中國羞。」他日	前機6仁廟計護大臣亦有此事

									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果罷宴，仁宗深悔。儀智言是。」上曰：「這事呂家人說的都不中聽。」遂命免賀。後遇事則諂。	
202	李貫	143	31	4047	203	惠成祖	◎		貫，建文朝登第第三人，後仕成廟，仍為修撰。一日，上命解縉番閱建文諸臣章疏，凡關係兵馬糧儲吏道民事者留覽，餘涉干犯者一切焚毀。已而上顧縉曰：「爾等宜皆有疏？」眾未及對，李貫獨曰：「臣實無有，疏具在此，可覆按也。」上曰：「爾以無疏為獨賢耶？夫國勢傾側，近侍之臣鉗口結舌，惡得為忠？朕非惡夫忠建文者，惡其導建文壞祖制者耳。」	明史無其傳此為-忠類王良
203	黃玠				338	代宗	◎		玠，思明府土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岡祖職，密遣刺客殺岡一家，次日佯為聞變也者，往赴屍所痛哭，而又故為捕盜狀，以自掩飾。未久，事覺，廣西撫按按治之，當死。玠計無可免，度上欲易故太子，未有其端，于是詣闕上疏言。	無傳(易儲一事)土司
204	徐有貞	171	59	4561	389	代宗	◎ ◎		有貞，景泰朝，為左諭德。以才自負，然德不勝才，亟于自見，迹其遇合，往往以諂干人。當英廟北狩時，貞謂北平王氣已盡，宜南遷，為太監金英厭薄。時有貞名理，英遂記理名字，以為不可用。未久，于謙為大司馬，見柄任，貞乃托謙求達于上，轉祭酒，謙乘間言之，景帝曰：「徐理有才，然心術不佳，使他做司成，教壞秀才心術。」遂不用。久之，貞伺陳循將柄用，往謁循，自言善祿命，預賀循當大拜，循喜，無何，循拜相。循諭之曰：「汝吃名累，內家習汝名。」理悟，乃更今名有貞。	原名徐埏
205	萬安	168	56	4522	335	憲宗	◎ ◎		安，憲廟時為宰相，專事容悅。時萬貴妃寵傾後宮，安萬氏兄弟，黨同己者，鋤異己者舉朝側目。孝廟在東宮，稔聞其為人。會憲宗賓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安前後所進春方。上見之，遣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此宰相變理陰陽封事也。」安惶恐汗出，言官因交章劾之，安猶躊躇在位無去意。懷恩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赴地下，為先帝進時興房術。」	



## 貪 類

編號	傳主	卷數	列傳	頁數	字數	皇帝	明史	贊語	傳文簡述	內容大要
301	吳中	151	39	4183	370	宣宗	◎	◎	吳中，宣德間官工部尚書，性嗜財，積貲巨萬，置嬖妾數十人。其妻剛正，中嚴事焉，凜不敢犯。宣廟聞之，'嘗宴臣僚，陰屬教坊扮戲嘲笑中。優人扮大司馬因事詰之，其人叩頭曰：「奶奶見饒也罷。」司馬愈怒，曰「小將平日不怕老爺，只怕奶奶。」左右因目之曰：「此是怕婦人的元帥。」上大笑，中亦知其嘲己，然竟不敢有加于妻。	
302	汪巡撫				444	世宗		◎	巡撫汪姓者，逸其名，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都御史，巡撫湖廣。性貪鄙，無論其大，即官衙所貯糠粃、淘米汁，必呼市民分給，倍征價值。官至中丞，非小也，擁全楚之大祿，人非簡也。而乃以細物剝民，豈未讀孟獻子鷄豚之戒耶？余因憶古之貪吏有賦筭者，散萬錢市筭萬箇，民請輸筭，乃曰：「寄養汝林，待秋取之。」遂成萬竹。雞事亦同，彼自謂巧于取民不知民亦非拙，特制于上，不敢不應。及至近世，又有巧貪，不啻賦筭與卵者。	
酷 類										
401	詹徽	136 138	24 26	39293 97	294	太祖 惠	◎	◎	詹徽，同之子，性殘忍，用法好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嘗陷太師李善長，竟坐死。又惡解縉為虞部郎王朝用草疏救善長，並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惡徽刻，嘗因錄囚，欲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且密言于上，謂太子妄有縱舍。太子為囚白于上，上執先人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徽所持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自為之。」太子懼，因感疾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	

402	黃景隆				170	憲宗	◎	景隆，江西吉安府知府，性殘酷，杖殺百姓凡三百八十人。巡按御史沃類疏之，憲宗覽疏詫曰：「景隆所殺人何多也？豈漢屠伯復出耶？胡不鑒許聰？」蓋先是吉郡知府許聰，未久以酷誅。遣官往勘虛實，比回奏，景隆所杖殺更浮于巡按所奏之數，遂命逮隆至京，磔誅之。	無傳
403	楚令				1137	神宗	◎	楚長沙有以歲薦起家，仕為蜀中知縣者，其人揮霍敏幹，所期立就，縣務井井，甚有能聲，然而以酷濟貪，世所罕見。余曾于縉紳間聞其行事，甚詫駭。已于黔中晤侍御方麓宋公，公蜀人也，向余譚前令三數事，余聽之，不覺髮上指冠，嘆曰：「此楚之檣杵也。」按令蒞縣五年，所罰贖鍰凡五六萬，大都嚴刑迫之，他不具悉。	此為江盈科刑恤滇黔所聽聞

